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neity

德勒兹与当代性

——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neity

閃出一道光，這一道光將有一個名字：德勒茲。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茲的文章里，在我們面前，在我們中間跳躍、舞動……有朝一日，這個世紀或許會成為德勒茲世紀。

——米歇爾·福柯

ISBN 978-7-5633-6878-5



9 787563 368785 >

定價：28.00 元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neity

德勒兹与当代性

——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 麦永雄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633-6878-5

I. 德… II. 麦… III. 德勒兹 (1925~1995) — 哲学
思想—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5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8.5 字数：2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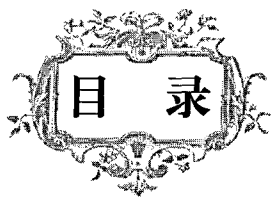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000 册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麦永雄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现为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东方丛刊》主编。个人主要著作：《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译著，2007）、《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2002）、《多维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学》（2001）。主编教育部高等教育教材《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2001）。主译《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2000）、《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2000）；合译《审美意识形态》（1997/2006重印）。目前主要从事文学、西方文论及文化传媒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 王梅贵 封面设计 / 杨琳 版式设计 / 陆润彪



导 论	后现代湿地:德勒兹与当代语境	1
第一节	德勒兹:哲学中生命的轨迹	4
第二节	国内外德勒兹研究现状梳理	8
第三节	德勒兹思想与当代语境	16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第一章	过滤思想:德勒兹与西方哲学及美学	33
第一节	德勒兹与西方哲学史	33
第二节	德勒兹与加塔利	39
第三节	德勒兹与尼采:权力意志与永恒回归	42
第四节	德勒兹与福柯:德勒兹世纪?	47
第二章	创造概念:德勒兹差异哲学与流变美学	57
第一节	“差异”论哲学图式:千高原、块茎、褶子和机器	59
第二节	“生成”论美学意蕴:游牧、解辖域化、无器官身体	75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第三章	反俄狄浦斯:精神分裂症与分裂分析	91
第一节	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	92



第二节	精神分析背景下的俄狄浦斯问题·····	100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分裂分析·····	112
第四章	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 ·····	119
第一节	欲望生产的三种综合与构型·····	120
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三类社会体与欲望微观(反)历史哲学刻录 ·····	130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第五章	走向少数族文学:“褶子”论与卡夫卡的诗学解读·····	166
第一节	语言的“褶子”问题: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	167
第二节	精神分析与政治视阈:反俄狄浦斯与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 ·····	170
第三节	文学“机器”与声音的集体装配·····	176
第六章	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	180
第一节	戏剧光辉所掩盖的小说大师:贝克特小说三部曲·····	180
第二节	文学与哲学:贝克特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关联性·····	182
第三节	辖域化与解辖域化: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叙事特质·····	185
第四节	规训与逃逸: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后结构主义诗学意蕴 ·····	187
第七章	普鲁斯特论:符号与文学机器·····	193
第一节	德勒兹的符号论渊源与特征·····	194
第二节	译名之辩与艺徒小说:“追忆”的界说·····	197
第三节	普鲁斯特的四个符号世界·····	200
第四节	永恒的回归:真理、符号与时间的四种结构·····	204
第五节	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论·····	207
第八章	穿皮裘的维纳斯:施虐—受虐癖的解辖域化·····	214
第一节	心理学与文学:关于“施虐—受虐癖”的正典观念·····	215

第二节	“受虐癖”语境还原:以《穿皮裘的维纳斯》为中心	221
第三节	德勒兹关于萨德(施虐癖)与马佐赫(受虐癖)的分裂分析	230
第四节	关于德勒兹“受虐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观的评价	236

第四编 德勒兹与当代性:思想影响与未来维度

第九章	德勒兹世纪:文艺理论与电影研究举隅	245
第一节	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	245
第二节	德勒兹与电影艺术哲学	252
第十章	德勒兹与鲍德里亚:拟像时代与控制社会	261
第一节	鲍德里亚与“完美的罪行”	261
第二节	德勒兹论当代控制社会	265
结 语	德勒兹哲学与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270
参考文献		280
后 记		286

导 论

后现代湿地：德勒兹与当代语境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 法国著名的哲学教授和社会心理学家,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有“哲学中的毕加索”之誉, 尤其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历史性嬗变的思想史上, 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把德勒兹与后结构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 视其为大陆理论的支持者。而在 20 世纪最后的 25 年中, 欧洲大陆理论在英语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

德勒兹与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合作, 创造了一系列特色斐然的理论概念。他关于电影的两本著作甚至被认为是“达到了艺术(电影)哲学探究的最高峰”。尽管德勒兹及其著作未能像他的同时代人福柯、德里达那样引起具有轰动效应的关注, 但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他的声誉一直在持续上升。1997 年、2004 年和 2006 年欧美都曾专门举行过关于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互联网上也设有关于他的专门网站。进入 21 世纪后, 国外每年都有多部德勒兹研究著作面世, 国内对他的关注也逐渐升温。

作为思想领域的游牧者, 德勒兹涉猎广泛并且创造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德勒兹涉及的主要学术领域或题旨包括哲学、美学、文化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等, 他与加塔利倡导差异哲学、生成论、分裂分析, 以多元流变的思想在当代学术界独树一帜, 并在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文化与文学研究、精神分析、电影哲学和美学、女性主义理论、空间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德勒兹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反俄狄浦斯: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千高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卡夫卡: 走向少数族文学》、《什么是哲学?》)是与



“(反)精神病学家”、政治活动家加塔利合作的思想结晶。他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福柯》、《电影》(I、II)、《柏格森主义》、《受虐癖》、《康德的批判哲学》、《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批评与诊疗》、《对话》、《差异与重复》、《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实践哲学》、《尼采》、《尼采与哲学》、《培根:感觉的逻辑》、《普鲁斯特与符号》等。

德勒兹极为重视哲学和美学概念的创造,认为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概念创造的历史,思想观念史生成于问题史。福柯关于20世纪或许将会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强调的正是德勒兹思想的创新力量。德勒兹有“游牧美学家”和“概念工厂”之称,他思想深邃,兴趣广泛,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陡然出现,他是“播种无序、过滤哲学史的叛逆教授”。他在所涉及的哲学、美学、戏剧、电影、绘画、语言、心理分析、文学以及政治价值等各方面,“无一不是哲学概念的创造更新以及生命意识的实践”^①。德勒兹及加塔利所倡导的富于特色的哲学和美学概念主要有:生成(becoming,或译作嬗变、变成),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块茎(rhizome),褶子(fold),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或译作千面原、千平台),游牧(nomad),流(flow,或译作流变),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或译作无组织的身体),事件(event),机器(machine)与装配(assemblage),辖域化(territorialize)、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与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逃逸线(a line of escape, or a line of flight),少数民族文学(a minor literature,或译作次文学),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克分子(molar)与分子(molecular),横截线(transversality),动像(movement-image,或译作运动一图像)与时像(time-image,或译作时间一图像),社会体(socius,或译作聚落),等等。

德勒兹的著述情况颇为复杂。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同意访谈者将他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①哲学史研究时期:哲学家个案研究——主要以《差异与重复》和《感觉的逻辑》这两本著作作为代表。②与加塔利合作时期:以尼采

① 于硕:《德勒兹〈文学与生命〉译者按》,摘自《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140~1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哲学综合与超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两部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著作作为代表,即《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72)和《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80)。这是他们在当代思想界最负盛名的两部学术著作。③美学旨趣时期:主要是关于培根和电影两方面的研究——德勒兹在这一时期分别写了两部关于培根的著作和两部关于电影哲学的极为重要的著作,聚焦于对“运动—图像”(动像)和“时间—图像”(时像)的研讨。^①但实际上,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例如德勒兹著有三部以其哲学和美学思想观照文学的专著——《普鲁斯特与符号》(1962)、《受虐癖》(1967)和《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1975),它们的性质属于美学旨趣方面,但时间却属于编年史意义上的早期著述。大致说来,德勒兹以“差异哲学家”名世,他早期对“差异与重复”命题作了系统的哲学研究,而其“生成”论的哲学和美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他思想的核心(德勒兹本人是反对中心、反对思想等级制的,而主张非中心的千高原、褶子和反树状等级制的块茎),不少学者认为德勒兹的差异哲学、生成美学具有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意义,由此衍生出他各个时期关于欲望机器、游牧(文化)、无器官身体、块茎、千高原、装配、社会体、流变、解辖域化、分裂分析、克分子和分子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由于德勒兹的著述常常回到早期的主题或思想观念,在重复中创造差异,呈现出思想多元拓展、概念不断增殖的丰富多彩的理论形态,因而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思想拒绝简单化的归纳与框定。

E. W. 霍兰德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1999)中以《反俄狄浦斯》为例,谈到德勒兹研究的复杂性 with 艰巨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是一部涉及众多领域及学术资源的令人惊讶的复杂之作,可以说一般的单部研究著作无法恰如其分地探究其丰富的蕴涵。确实,仅仅是对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文学艺术、人类学、人种学、经济学、心理学、物理学、美学、生物学、哲学、数学等等的关联性进行一次思想巡礼,也需要数倍于《反俄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 3,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狄浦斯》的篇幅才行。^① 值得指出的是,德勒兹的一些关键术语或概念往往不加以清晰明确的界定就随处运用,加之其哲学及美学思想内部还具有较强的互渗性——他的一系列构想或观念交织着贯串在他著述的始终并且有所变化,这更增加了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的难度。因此,对德勒兹的深入研究是一个极为复杂艰巨的工程,仅仅以一篇博士论文或一部论著加以阐述或论析是远远不够的。

本书的核心部分参照上述德勒兹本人所认可的三个分期,在梳理德勒兹生平和当前国内外德勒兹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置于当代语境中,主要择取德勒兹哲学的三个重要维度并分为三编加以论述:①德勒兹与哲学,②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③德勒兹与文艺美学。德勒兹及加塔利富于创见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观念将通过这三个环节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并获得较为深入的研讨。第四编则探讨德勒兹的当代影响与未来维度。本书旨在择取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中重要问题和关键概念加以梳理和阐发,探讨其富于特色的思想观念与当代性的关联,深化中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会通,促进国内文艺美学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深入研究和当代文艺观念形态的建构。

第一节 德勒兹:哲学中生命的轨迹

德勒兹 1925 年 1 月 18 日生于法国巴黎,卒于 1995 年 11 月 4 日。他近 70 年的人生轨迹,横跨了 20 世纪大部分时段,给当代哲学和美学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他在异彩纷呈的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流变中,尤其是在法国思想史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嬗变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勒兹和加塔利特色斐然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具有丰富和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潜在意义。

德勒兹的生平展示了一条特殊的“哲学中的生命”的轨迹。他曾经自述出生于巴黎 17 区一个“没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家庭,童年的记忆甚少,但能感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所弥漫的紧张气氛:不断触发的经济危机,混乱无序的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viii, London: Routledge, 1999.

街头冲突和日益浓厚的战争阴云。他开始从政治维度来理解世界,并意识到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倾向。30年代末法国遭到侵略的前夕,德勒兹和哥哥一块被送到多维尔(Deauville)国立中学读书。平凡无奇的学生德勒兹在那里遇到了 Pierre Halwachs 这个充满思想灵感的老师。Pierre Halwachs 引导他研读了法朗士、纪德和波德莱尔等作家的经典著作,点燃了德勒兹的文学兴趣。战争期间,德勒兹回到巴黎,在卡诺大学(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该校任教,但没有直接教过德勒兹)预科就读。1944~1948年,德勒兹在巴黎大学(索尔邦神学院)研习哲学,确立了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并于1949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此后他曾经在多所中学教授哲学,直至1957年。他于1957年至1960年期间(32~35岁)回到巴黎大学讲授哲学史,1960~1964年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从事研究工作。1962年德勒兹结识了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大学任教的福柯,8年后,福柯有了关于20世纪将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1964~1969年德勒兹在里昂大学任教,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他那一代最优秀的哲学阐释者之一。196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差异与重复》,同年邂逅拉康一脉的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1930~1992),两人成为思想上成功的合作者。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72)和《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80)给他们带来了国际声誉。1969~1987年,德勒兹在法国的巴黎第八大学任教,至62岁时退休。1992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饱受肺部疾患的折磨,于1995年11月4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①

德勒兹在大学期间与众多同学浸润于理性传统思想之中,接触了“三H”,即黑格尔、胡塞尔和早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哲学史在当时的学院制教育中被视为学科的基础,德勒兹曾经描述他们这些学生犹如一群幼犬饥渴地扑向学问,其热情与执著比中世纪的学究更甚。日后,德勒兹致力于哲学史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对象和思路颇为特殊。他既不与学院制的理性主义产生思想共鸣,也不追随战后时兴的黑格尔、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哲学思潮,而是转向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p. 269~270,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了他心目中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包括那些虽然构成哲学史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与主流哲学分道扬镳的哲学家,如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姆、尼采、柏格森等等。此后,德勒兹于1953年出版了论休姆的第一部著作,1961年发表了论卢克莱修的论文,1962年出版了论尼采的专著,1966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关于柏格森和斯宾诺莎的著作。

对德勒兹影响最大的是尼采,因为尼采为德勒兹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取向和哲学灵感。由于俄国移民作家 A. 柯耶夫在巴黎黑格尔研讨班的影响(1933~1939年巴黎一大批重要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柯耶夫的研讨班),黑格尔主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盛行一时。德勒兹在60年代多方面地发展了尼采差异哲学,《差异与重复》(1968)和《感觉的逻辑》(1969)颇为详细地阐释了这种思想。德勒兹论差异与德里达论解构是并行不悖的,两人都挑战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假设和思想表达模式,皆在差异(或延异)中发现反概念的概念(aconceptual concept),以非确定性消解西方理性哲学传统的确定性观念。两人都由此扬弃了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扬弃了该运动强调科学理性的一面,而继承和发展了其更为激进和扰攘不安的一面。

1988年,Claire Parnet录制了他与德勒兹的系列访谈节目,本打算在德勒兹辞世之后才公之于世,结果在德勒兹去世前夕由法国电台播出。这8个小时的访谈录构成了令人瞩目的关于德勒兹思想精华的文献。在巴黎寓所中,德勒兹谈及 A—Z 的多种主题,如以 A = animal, C = culture, L = literature, O = opera, T = tennis 的排列方式组成话题,加以谈论。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德勒兹的 ABC。此时德勒兹 64 岁,身体虚弱,呼吸困难,步履蹒跚。他谈及 M = malady/illness 时认为罹患某些疾病倒是一种有点“特殊”的人生体验模式,它能够使人从喧嚣芜杂的世俗世界解脱出来,使人的感觉变得敏锐,并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看待生活。这些访谈犹如一幅德勒兹的哲学画像:德勒兹哲学呈现出一个系统,由此他可以对一些关键概念加以简明的总括,而且常常信手拈来一些例子以阐明这些概念。换言之,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可以用一种概念平台统合起来。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德勒兹也常常以想象

式的跳跃和借助丰富的物质意象逸出这种概念框架。^①面对面的访谈不同于玄奥艰深的学术论著,德勒兹在访谈中令人感到更为亲切随和,真情流露。例如他鄙弃几种“愚蠢”、“弱智”的思维模式,矛头常常指向大众文化传媒,斥之为“平庸幼稚”、“残酷”。他认为哲学提出问题和困惑,引发思考,而不像某些文化传媒那样不断地询问人们的观点,试图引出忏悔。大众传媒倾向于把受众变成被动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生命”的概念贯穿于这些访谈,这与德勒兹尊重多种生命形态的“活力论”有着内在联系。德勒兹认为耻于为人(shame of being human)是艺术与思想的普遍性的伟大主题。在当代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视野中,德勒兹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如生成(动物)、褶子、块茎、千高原、游牧、解辖域化、逃逸线等和后人文主义审美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当1995年11月德勒兹从巴黎寓所跳楼自杀的噩耗传开时,在世界各国的出版界和学术期刊上出现了许多充满崇敬和惋惜之情的讣告。德勒兹是一位温和的、内向的人,脾性有点像他所崇敬的斯宾诺莎。利奥塔曾经忆及德勒兹作为孤独的学者和哲学家的大学校园生活。德勒兹作为一个“游牧思想家”驰骋在精神的千高原之中,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很少外出旅游,只是在他人的劝说下,曾经到美国、加拿大及黎巴嫩参加过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德勒兹的自杀虽然具有明显的个人因素,例如他患呼吸系统疾患多年,晚年健康状况恶化,但是,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行为,也有论者认为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普遍的颓丧和疯狂有关。20世纪是欧洲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经历过奥斯维辛与五月风暴之后,法国众多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痛苦折磨,其中的著名人士如福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及德波(Debord)皆与颓丧、疯狂相关,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以追求解脱。例如福柯是著名的同性恋者,他于1984年患艾滋病去世;阿尔都塞于1980年11月4日因精神失常而突然扼死相伴35年的妻子海伦·赖特曼;罗兰·巴特亦有同性恋取向;等等。约翰·马克斯在其著作《德勒兹:活力论与多元性》中提醒我们,理解德勒兹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代欧洲历史需要牢记如下几点: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p. 10~11,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①任何生命都是以秩序(order)和无序(disorder)为特征的,因此很明显,那些积极把无序原则推介到我们所习惯的有序的感觉世界中来的思想家,必然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受到随之而来的无序之果的骚扰。德勒兹享有的显然是传统的家庭生活——他婚后有两个孩子,而这恰好与他大胆的、反传统的精神生活构成鲜明对照。②德勒兹反对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家庭生活与学术生活之间作截然区分。他有时甚至提到,他的精神生活要“以不同的方式”通过药瘾、性发泄和个性化人际关系等才能达到体验上的极端效应。③在某种意义上,像德勒兹一类的思想家颠覆了休姆哲学著作的程式:休姆在阐明教育与秩序的文明化历程中分享着普遍性的启蒙信仰,而德勒兹则相反。恰如我们要为秩序付出代价一样,我们也同样要为无序付出代价。④德勒兹、福柯等法国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具有超越历史语境的未来维度。尽管他们体验了特殊的、反常的欧洲战后社会生活,但是他们的见解却不能简单地缩减为“时代的产物”,因为他们的思想中有着某种参与未来的鲜活的因素,不为历史语境所囿:他们关涉和关注的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事物。因此我们需要铭记福柯的预言:“有朝一日,这个世纪或许会成为德勒兹世纪。”①德勒兹与福柯皆浸润于传统哲学多年,但却叛逆式地创造出新的思想与方法,将哲学与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第二节 国内外德勒兹研究现状梳理

关于德勒兹研究的外文资料比较丰富。国外学者对德勒兹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呈现渐热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把德勒兹视为一流哲学家(Leading Philosopher)加以研究,甚至有人认为目前国外德勒兹研究的势头有超过德里达、福柯研究的倾向。德勒兹与当代性的研究对我们深入探讨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促进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德勒兹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术发展态势、培养文艺美学理论的前沿意识,同时还具有开拓思路、参照借鉴的重要作用。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p. 2~3,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一、国内德勒兹研究概述

在中国国内,目前对德勒兹的研究开始从译介转向思想采借。一方面相关中译本近年陆续面世,如《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尼采与哲学》、《福柯·褶子》、《什么是哲学?》、《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康德与柏格森解读:柏格森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和《电影 I:运动—影像》、《电影 II:时间—影像》,以及德勒兹哲学译文集《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等等。此外,日本学者筑原资明所著的《德勒兹——游牧民》(“现代思想冒险家们”丛书之一)已译成中文出版;美国学者凯尔纳和贝斯特合著的《后现代理论》(中译本)中也辟有专章讨论德勒兹、福柯、鲍德里亚和贝奥塔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的德勒兹研究也开始开花结果,一些学术报刊上有关德勒兹的论文开始出现。目前国内德勒兹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博士论文为主,如潘于旭的《反同一性逻辑的生成性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2006),贾福生的《流动中的生命:德勒兹内在性理论及对于文学解释的初步研究》(2005),姜宇辉的《审美经验与身体意象:思索德勒兹美学的一个视角》(2004),程党根的《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2004)、麦永雄的《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与当代语境》(2003)。此外,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编译的《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2003)“代前言”概述了“德勒兹思想要略”(1~15页)。方成在《精神分析与后现代话语》(2001)中有一章专论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精神分析与文化表征批判”(116~149页),对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无意识欲望与反俄狄浦斯概念、后现代语境下的根状思维与千座高原、精神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文化表征批判进行了论析,是目前国内关于德勒兹思想观念较为集中的论述。由《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结集出版的《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2001)中,将德勒兹与利奥塔、福柯、拉康、大卫·霍伊、布迪厄、萨伊德、理安·艾斯勒等后现代主义大师、社会学大师、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人类学大师辑于一书,加以评介。作者于奇智以“后现代思想家吉尔·德勒兹”为题,介绍了德勒兹的基本情况,对他赞誉有加,并指出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名著《反俄狄浦斯》、《千高原》与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精神联系。同书的“精品赏析”中收录了德勒兹《文学与生命》一文,译者于硕



在简洁的“译者按”中称誉德勒兹是“思想的骏马”、“精神和情感的游牧人”。

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外当代思想文化会通的深入,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思想价值和理论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相关著作与论文也将与日俱增。

二、国外德勒兹总体研究

从1990年代以来,国外德勒兹研究的重要成果不断涌现,热度不减。2002年笔者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进行相关文献检索和图书资料复制,当时国内能查阅到的德勒兹本人撰写的外文(英、法文)著作约14部(其主要著作皆有英译本),与德勒兹研究密切相关的英文论著约30部。此后每年都能够发现多部德勒兹研究的外文新著(参阅本书“参考文献”)。2007年1月18日笔者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输入“Deleuze”一词,“外文文献数据”显示为157项。其中2003年新增26项,2004年新增16项,2005年新增14项,2006年新增14项。

德勒兹研究最为宏大的著作当推 Gary Genosko 主编的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Deleuze and Guattar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2001年版,篇幅达1500余页(vol. 1: 472p; vol. 2: 475—1006p; vol. 3: 1009—1503p.)。编者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浩如烟海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学术刊物中精选了关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重要章节或论文,汇集成三卷本皇皇巨著。从该书可以窥见进入21世纪后国外对德勒兹研究的概况、水平和关注点。从研究范畴来看,全书主要分成十编:“文化理论与实践:戏剧、电影、绘画、文学、音乐、舞蹈”,“德勒兹与哲学传统”,“行为主义知识分子的画像与困境”,“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实践问题”,“精神分析、分裂分析和治疗学新方法”,“应用横截线(涉及空间、群体主体理论等)”,“主体性生产工具:符号、艺术、机器、动物”,“营造环境的意义(涉及建筑、块茎世界、解辖域化与边界书写等)”,“问题与评价:游牧与机器思想”,“女性主义阅读”。每编皆汇集了5~15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出版的《德勒兹词典》(*The Deleuze Dictionary by Adrian Parr*)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位思想复杂精深的哲学家提供了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德勒兹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哲学就是创造概念,哲学史就是思想观念史。他与加塔利特色斐然的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启迪人们以与传统迥然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问题。对其概念的研究可以说贯穿了所有关于德勒兹的论著之中。德勒兹与哲学(C. Boundas and D. Olkowski, 1994; K. A. Pearson, 1997; éric Alliez, 2004; 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 2004; Constantin V. Boundas, 2006)、德勒兹与美学(Joost de Bloois, 2004; Stephen Zepke, 2005)、德勒兹与空间(Ian Buchanan and Gregg Lambert, 2005)、德勒兹与政治(Paul Patton, 2000)、德勒兹与马克思主义(N. Thoburn, 2003)、德勒兹与文学(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2000; Ronald Bogue, 2003; Mary Bryden, 2007)、德勒兹与视觉文化(Patricia Pisters, 2003)、德勒兹与电影(B. M. Kennedy, 2000; Ronald Bogue, 2003; Anna Powell, 2005)、德勒兹与音乐(Ian Buchanan and Marcel Swiboda, 2004)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Ian Buchanan and Claire Colebrook, 2000; Marta Zaj c, 2002)、德勒兹与宗教(Mary Bryden, 2001)、德勒兹与环境(Mark Halsey, 2006)等论旨,皆形成了专著。此外,评介和阐发德勒兹思想的文字还散见于国外形形色色的关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批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中。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接近、切入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概念,并加以思想过滤和理论采借。

三、精神分裂症与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

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精神分裂症与资本主义的两本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或许是他们最具分量的成果,以至于任何关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研究,都无法避开精神分裂症与资本主义的论旨。仅仅从出版角度而言,《反俄狄浦斯》英文版自1977年问世以来,到2000年已经是第10次印刷;《千高原》英文版从1987年至2000年,也已经印刷了8次。

霍兰德的专著《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1999),从德勒兹与弗洛伊德、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及尼采、康德等人的思想联系,欲望生产与俄狄浦斯内在批评,社会生产与俄狄浦斯的外部批评,分裂分析与普遍历



史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德勒兹、加塔利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思想。他认为欧洲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的契机,《反俄狄浦斯》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一系列成果中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分裂分析”,是丰富多彩的法国思想领域近来最具魅力、最发人深思的思考之一。他们合作的成果不仅可以与英美反精神病学(加塔利的著作与反精神病学有着某种契合性)相媲美,而且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还可以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综合”(尤其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相提并论。^① 博格的《德勒兹与加塔利》(1996)也对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题旨作了深入翔实的论述。

凯尔纳和贝斯特合著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论证了“在解放和异化的双重运动中,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抽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抽象的欲望(在精神分析领域)。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不过,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recode),将它们‘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解辖域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编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非中心化过程,精神分裂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了其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的束缚以及其俄狄浦斯陷阱,从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②

阿利兹(Eric Alliez)曾言:德勒兹的全部哲学,都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为题旨。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一题旨,无法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vii-viii,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② [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98~14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割裂开来。N. Thoburn 的《德勒兹、马克思与政治》(2003)一书,是第一部探讨德勒兹散佚的著作《马克思的辉煌》(*The Grandeur of Marx*)的专著,它致力于探讨德勒兹的少数族政治学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动力学批判之间的思想共振域,对其相关政治、概念和文化基点加以批判性和启迪性的阐发。《马克思的辉煌》是德勒兹辞世前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德勒兹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结晶。近年来,学术界对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抱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德勒兹把资本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运作方式或‘社会体’,即生活之流的引擎——置于其构想的核心地位,并在此意义上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加塔利和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我们的方式不同,但两人都是如此。你明白,我们对任何政治哲学的思考,都必然转向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方式的分析。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系统加以分析,它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性,继而又用视野更为宏阔的形式来反对它们,因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局限就是资本自身。’(德勒兹《谈判》:171页)……德勒兹和加塔利声言‘逃逸线’在本质上和功能上都如同资本主义装配,他们的话语回应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著名描述:‘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那儿,一切关系‘在可能僵化之前就开始遭到了废弃’。”^①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差异与生成是最根本的哲学取向。

四、关于德勒兹的文化与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

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涵盖面极广,涉及文化研究、电影、文学、戏剧、音乐、绘画、舞蹈、语言、建筑诸领域,在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中,第一编“文化理论与实践”汇集了17篇文章,国外学者对上述诸方面皆有专门论述。如布坎兰讨论“德勒兹与文化研究”,侧重分析了德勒兹作为超验的经验主义者与文化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M. Kowsar 以《理查三世》为个案,探讨“德勒兹与戏剧”问题;A. Uhlmann 则研究贝克特与德勒兹的关系;等等。

在布鲁伊斯等主编的英法双语会议论文集《洞察力:德勒兹美学》(2004)

^① Nicholas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pp. 1~2, London: Routledge, 2003.



中,众多欧洲学者探讨了德勒兹哲学的精义和美学思想,追寻各学科(文学、音乐、戏剧研究与艺术理论)对德勒兹思想的接受,认为结构与生成构成了德勒兹美学的节奏。此论文集可以说以德勒兹及加塔利的美学思想为视野,勾勒和跨越了哲学方法与传统艺术理论,以及文学、表演与电影研究之间的界线,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和理论诠释,突出了德勒兹美学中异质思维的图式。譬如 Peter von Zilfhout 的论文以“审美经验”为题,认为德勒兹最笃实的贡献在于他将文学视为美学经验的主要源泉,并以德勒兹的审美空间与游牧体验为关联域,探讨里尔克的宇宙内空间(Weltinnenraum)的观念及对现代性的理解。再如 Sasha Vojkovic 的论文以“香港电影与反辖域化艺术:女勇士、邪恶太监、少林足球”为题,聚集于女性形象分析,结合香港电影角色的多元性,以及精神与物质领域之间快速的转型,认为欣赏香港电影需要一种新美学,以突出香港电影的流变性,而不是让电影囿于某种特定的地理—美学框架内。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美学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美学,并以大量例证(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例证)展示了香港电影能够抗拒辖域化的力量与进程。^①

从德勒兹著述方面考虑,对其文化理论与文艺美学的研究,在三个方面比较集中:

其一,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在德勒兹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题旨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维度。德勒兹所著的《受虐癖》(Masochism)英文版被出版商与马佐赫的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Venus in Furs)合为一书出版。众所周知,奥地利小说家马佐赫(Masoch, 1836~1895)的名字是受虐癖(Masochism)一词的词源。I. 布坎兰和克莱·科尔布鲁克主编的《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Deleuze and Feminist Theory, 2000)是这方面的一部专著。该书的“内容介绍”说:本书汇集了一些关于德勒兹的最好的评论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的论文。德勒兹既不完全赞同女性主义的理论观念,也不否认在理性历史上存在某种男性的错误,更确切地说,他从自己的哲学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表述为一种挑战和问题:如何思维?在三卷本《德勒兹与

^① Joost de Bloois, *Discern(e)ments: Deleuzian Aesthetics*, pp. 61~80, 257~276, Rodopi B. V. Amsterdam, 2004.

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中的第十编“女性主义阅读”中汇集了5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林菩狱中的女性”、“新游牧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德勒兹踪迹”、“千面小小的性(sexes)：女性主义与块茎论”、“少数民族的女性主义”等论题，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概念如“生成女性”、“无器官身体”、“块茎思维”、“欲望机器”等被用来讨论和阐发德勒兹中心主义中女性主体诸问题。

其二，电影哲学和美学研究。德勒兹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电影研究。德勒兹著有两本关于电影的论著《电影Ⅰ：运动—图像》和《电影Ⅱ：时间—图像》，前者讨论20世纪上半叶的行动电影，大略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美国自由主义孪生的意识形态论相应；后者主要审视战后以时间为主导的电影。德勒兹的电影理论与柏格森哲学、皮尔斯符号学密切相关。1997年在美国举行了德勒兹国际研讨会后，媒介和文化理论研究的英文刊物《话语》(1998年秋季号)出版了德勒兹专辑，其中有专文谈到德勒兹从哲学的维度对电影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但奇怪的是，英国出版的巨著《世界电影史》却只字不提德勒兹，因此该文作者认为这极不正常。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德勒兹长达700页的关于电影的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电影理论杰作之一”。由此可见，德勒兹的电影研究值得深入探究。约翰·马克斯的《德勒兹：活力论与多元性》(1998)中有专章论述德勒兹的电影思想观念。例如，他认为在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视阈中，电影是永恒流动的体系，它与哲学处于一种“非平行演化”的情境中，电影高度浓缩的力量所达到的效应，哲学要耗费数百年才能做到。2003年，博格出版了《德勒兹论电影》(*Deleuze on Film*)的专著。

其三，文学研究。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也渗透到文学研究领域。他及加塔利著有《普鲁斯特与符号》、《受虐癖》、《卡夫卡：走向少数民族文学》三部专著，从符号学与文学机器的维度论述普鲁斯特，从施虐癖与受虐癖关系的解析讨论马佐赫的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从多数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论述卡夫卡，这些题旨已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在玛丽·布莱顿(Mary Bryden)主编的《德勒兹与宗教》(*Deleuze and Religion*, 2001)的“文学与宗教”部分中，辟有两章分别讨论“尼采之箭：德勒兹论D. H. 劳伦斯”和“幻象的未来：梅尔维尔的德勒兹(反)神学解构”问题。2003年，博格出版了《德勒兹论文学》(*Deleuze on Literature*)的专著。2007年，M. 布莱顿出版《吉尔·德



勒兹：文学中的旅行》。

此外，在德勒兹的其他著述中，对文学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并不断地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引发人们的研究兴趣。

第三节 德勒兹思想与当代语境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当代哲学与美学思潮，无可避免地要与当代众多的思潮、流派、领域等产生交迭现象，因此亟待辨析，以明确其定位，凸现其蕴涵与特质。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通常把德勒兹思想归入后结构主义的范畴。因此，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辨析是德勒兹哲学、美学研究的题旨中应有之义。法国是 20 世纪中叶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重镇。根据约瑟夫·恰尔德斯《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辞典》中的相关词条：结构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运动，20 世纪 50～60 年代在法国首先凸现出其重要性。至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列维-施特劳斯、A. J. 格雷马斯和罗兰·巴特等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对英美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产生重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基础是多样性的，主要得益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与 V. 普洛普的叙事学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结构主义对当代思想最大的贡献就是其关于人类一切行为都是被建构起来而不是自然的基本假设。^① 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把这一原则引入文化分析，进行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文本研究，影响颇巨。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与 20 世纪“语言论转向”关系极为密切。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中存在着本身即是意指过程的组织系统，通过相关比照，它们被从一系列其他可能的秩序中选择出来，从而形成语言符号意义。在文学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概念通过索绪尔式的能指/所指、言语/语言的二元对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p. 286~28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立符号学模式而得到突出的表现。

或许结构主义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它对文学中模仿理论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式的模仿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崛起之前,一直主导着文学研究。结构主义不同于模仿论以及浪漫主义表现论,它的文学文本分析不把意义作为现实的反映,或某个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是聚焦于意义本身的探究。结构主义批评关注文本如何表达意义。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是一个客观对象,可以从中找到独立于作者、受众、现实世界的符码和规例。而后结构主义则关注不同话语实践的生成语境——谁在说话,在何处说话,因而对文本意义的异延(德里达)、权力话语(福柯)和多元生成与流变(德勒兹)更感兴趣。结构主义主要与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相关,而德勒兹一脉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更多地倚重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皮尔斯符号论尤其在影视等现代传媒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首先,它在诗歌分析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 Michael Riffaterre 的《诗歌符号学》(*Semiotics of Poetry*)。其次,结构主义在叙事结构分析方面成就更为出色:罗兰·巴特的《S/Z》具有奠基意义,它从巴尔扎克一篇小说中寻绎出众多不同的符码的功能,从而成为这类分析的范式。其他的如 G. 热奈特的《话语形象》(*Figures of Discourse*)和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The Poetics of Prose*)皆是展示结构主义叙事分析的理论方法的范例。再次,结构主义的原则和影响在文学与人类学(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分析)之外的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影响痕迹。例如,罗兰·巴特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以结构主义意味的独到眼光,分析大众文化中的时尚、摔跤、玩具、塑料、好莱坞明星(嘉宝的脸蛋)、书籍封面(黑人士兵与法国国旗)等现象所蕴涵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意义。现在公认的后结构主义著名哲学家福柯的历史分析著作如《诊所的诞生》,尤其是其《事物的秩序》,都曾经被人打上结构主义的标记,尽管当时福柯本人拒绝这种称号。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思想一般被描绘为属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拉康常常被视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他关于“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而成的”理论,确实有与结构主义思想相契合的维度,拉康一方面与结构主义具有



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他与罗兰·巴特类似,其思想亦不时地逸出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

但是,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尤其是其文本分析观念也常常为人所诟病:结构主义把文学文本视为自主的、非个人的、与语言的社会实践无涉的抽象模式和结构,在对极为丰富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时,其视野显得狭隘,其效用令人怀疑。

根据约瑟夫·恰尔德斯《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辞典》词条和相关资料,“后结构主义”一词事实上最早是在美国开始使用的,用来指称两种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思潮。其一是 R. 罗蒂所恰如其分命名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它以德里达及其在北美的追随者如保罗·德曼为代表;其二是福柯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福柯努力从对“机构或机器”(dispositif or apparatus)的界定、从已说与未说(the said and the unsaid)即话语与非话语的维度重构现代性的系谱学。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及雅克·堂兹洛特(Jacques Donzelot)均属此一脉思路。而文本主义否定我们有从话语中逃逸而出的可能性——德里达的名言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 de hors-texte.)亚历克斯·柯里尼科斯在《反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第三章“后结构主义的牴牾”(The Aporias of Poststructuralism)中,论析了上述的两种后结构主义类型,以及在理性、抵抗、主体三个问题框架中的“后结构主义的牴牾”,并以“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黎明中振翅:尼采”为小标题,指出尼采特立独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西方后结构主义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德勒兹以专著《尼采与哲学》(1962)阐发了他的众多题旨;德里达承认尼采对他的影响颇深;福柯则在临死前不久宣称:“我就是尼采式的人。”^①这些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都从尼采思想中获益匪浅。

后结构主义思潮继结构主义之后在西方崛起,其哲学思想范式也渐渐凸显。后结构主义并非完全抛弃它之前的各种哲学和美学观念。作为对结构主义思维的扬弃和反拨,后结构主义拒斥早期结构主义著述中常见的所谓科学

^①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pp. 62~9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的或客观的分析,它在强调差异的基础上,对结构主义通常所忽视的作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心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予以新的关注。

总而言之,后结构主义具有反基要主义、反中心论、反等级制的重要特征。这一思潮形成的重要标记之一,是德里达 1967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戏剧》。德里达在演讲中批判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概念,这宣告了后来影响极大的解构论思想的面世。他认为结构的观念基于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这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特产。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认为一个结构必须具有某个具有本质特性的中心或基础,但是,这种中心或基础在属性上却是结构之外的东西。例如,基督教神学中可视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源头或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但是这个伦理学结构的中心即上帝却是不受这个结构所限制的超验存在,他可以居高临下地降罪或赦免一切。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中渗透了这类悖谬。结构主义永远在通过不断接近这种源头并且在对某种基本结构加以阐释的过程中试图来解决这种悖论。而实际上,对外在于结构的所谓超验中心或基础的接近可以说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因此,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强调意义的“嬉戏”,并由此对西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一旦我们不再被迫去寻求某种中心或源泉,我们就从结构主义时代走向了“非中心化”的后结构主义时代,进入所谓的后现代语境。

德里达所肇始的这种从结构到解构的思想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后结构主义思潮。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德里达在哲学方面,克里斯蒂娃和拉康在精神分析方面,福柯和米歇尔·德塞都在历史方面,利奥塔和德勒兹在文化政治批判方面的著述,以及在文学和美学批评方面难以计数的其他人物的著述,都抛弃了基于二元对立的源头、秩序对意义的阐释,以及个体作为一种统一主体的概念。转而强调话语的冲突,强调历史的裂隙,强调意义的自由嬉戏,以及强调作为反中心的主体”^①。但是,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亦并非泾渭分明的:在某种意义上,罗兰·巴特和雅克·拉康的理论与批评实践都贯通了这两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p. 236~23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个“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显然与传统思想范畴相悖,尤其是在对主体加以重构的问题上。主体不再被视为拥有控制力量和生发功能的统一体,而是常常被视为话语实践的产物,没有万流归宗的本质或中心位置(例如福柯“人之死”的名言)。后结构主义认为,传统人性中“人”的概念本身就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福柯对疯癫与文明史、规训与惩罚、性话语等的分析堪为例证),而且人类主体或中心的观念规避了人类关系系统之外的任何意义。因此,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常常被描绘成为反人本主义倾向的。它厌弃任何宣称自己具有普遍合法性的理论体系。不同流派的后结构主义所共享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语言在意义实践中的作用。语言不仅在文本、阅读和话语等概念中扮演着建构意义的可能性的角色,而且对某些后结构主义者而言,甚至可以把这些可能性作为现实来加以体验。

二、德勒兹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

研究德勒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其后结构主义与所谓后现代语境的关系的棘手问题。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与后现代的关系这个比较复杂且颇有争议的问题,关涉到对德勒兹哲学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特质、定位与意义。

暂且简略地论述一下一般意义上的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语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数方面的含义:①后现代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②后现代主义也意味着某种世界观与生活观,即不再把世界视为统一的整体,而强调其走向多元、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③在文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衰落西方文学中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的挑战。④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和对某种精神分裂式的技法、文本和结构的崇尚,以断片式的叙述消解意义。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既可以用于西方

同时也可用于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阐释的符号代码。^⑥在文学批评领域,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衰落之后的各种批评风尚和阅读策略的总和。^①后现代性或后现代语境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宽泛用法。其核心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资料丰富,仅仅从网上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或北京大学图书馆,输入“postmodern”作为关键词,可以查到数百本相关论著。对后现代界说的自由宽泛的阐释空间可以从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隐喻略见一斑。伊格尔顿曾经说过: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与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后现代的景观。

约瑟夫·哈尔德斯在《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辞典》中认为:后结构主义常常被不确切地与后现代主义交互使用以意指当代关于美学与语言的构想。鉴于这两个词语皆意义宽泛且有点含混,因此,这种混用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两者在不少方面互相关联。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涵盖颇广的概念,包括从音乐、时尚到政治的一切东西;而后结构主义则指从结构主义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旨趣和批评实践,并对结构主义的信条加以反拨与修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后结构主义以多种形式对当代思想、文化和语言中悖谬的思维定式加以批判。^②L. E. Cahoon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论文集·导论》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后现代语境问题,认为近十年来,后现代一词日益成为20世纪终结的某种标志。它被用来指称当代思想运动,或各种思想运动中并不太幸福的一个家庭,犹如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后现代家庭成员不仅表达了相互冲突的观念,而且题旨互相交迭:涉及建筑、哲学、艺术、文化传媒、历史、经济、政治、伦理、宇宙论、神学、方法论、文学、教育等等。后现代既非对西方世界的拯救,亦非毁灭西方世界。当多数哲学家使用后现代一词时,他们意指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一场运动。更确切地说,这场运动应称为“后结构主义”。他们心目中的这场运动具有这些特征:否认关于真实世界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否认词语与文本具有“唯一”(单一的或首要的)意义;

① 王宁:《中国后现代性的发展轨迹》,载《疆界2》(Boundary 2, 24, 3, 1977, pp. 19~40)。转引自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3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3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否认人类的自我统一性……甚至否认真理本身的可能性。简言之,他们以此拒斥现代西方文明的大多数思想基石。他们还进一步把这种否定与政治运动,例如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单是政治性无法涵盖后现代概念,并非所有的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都赞同后现代,三者是互为交迭的现象。后现代是启蒙批判的最近一次思潮。由于后现代概念覆盖的领域太广泛,将其简化就是将其荒诞化。追求将后现代简缩成为一种单一的、基本的含义以用于所有的维度是错谬的。人们有给丰富复杂的事物贴上理论标签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它们是思想的仆人,而不是主人”。^① 文艺美学意义上所谓的“后主义”在本质上是拒绝进入定义的牢笼的。

鉴于上述的复杂性,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常被颇为灵活地归入各种以后现代主义为名的书籍中,但有时情况也相当耐人寻味。例如前面曾经提到,在国内,由《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结集出版的《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2001)中,将德勒兹与利奥塔、福柯、拉康、大卫·霍伊、布迪厄、萨伊德、理安·艾斯勒等后现代主义大师、社会学大师、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人类学大师辑于一书,加以评介。而刘禾教授在主持第一届“美国伯克利大学—清华大学高级理论研讨班”期间(2001,6),以“后结构主义与当代性”为主题,讨论了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德勒兹、斯皮瓦克等人的思想观念,却基本不提后现代主义之类的话语。

尽管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国外常常被作为后现代思想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来看待。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1991)中把他们与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一道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来加以论述;N. Lucy 在他的《后现代文学理论》(1998)中用一整章(“概念的创造”)来讨论他们的著述。H. Bertens 和 J. Natoli 合著的《后现代主义:关键人物》(2002)把德勒兹与加塔利视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为他们撰写了专门词条。但他们也认为:人们有很好的理由不把后现代的标签贴在德勒兹和加塔利身上。因为德

① L. E. Cahoone,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pp. 1 ~ 2,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勒兹几乎不提后现代一词,加塔利则在其《后现代绝境》(1996/1986)^①直截了当地对后现代主义提出严厉批评,将其描绘成“无非是现代主义的苟延残喘”。一些评论家如 Goodchild 也循此思路试图把德勒兹、加塔利从“后现代主义的非生产黑洞”中拔出来;1997 年 Murphy 提议将他俩视为反现代主义(amodernism)的拥护者。这种反现代主义并不接续后现代主义,而是在战后时期一直与后现代主义相对抗的一种思潮。

当然,问题在于后现代一直被人们以许多殊为不同且常常牴牾的方式加以运用着,以至于甚至那些已经接受了后现代标签的人士,相互之间也相距甚远。尽管没有某种单一的后现代定义适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但是为不同的定义所共同界定或认同的后现代的几个特征确也符合他们的思想特质。或许,我们应当把德勒兹与加塔利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后现代思维模式的首创者来看待。这种模式提供了在后现代状况下的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抉择和超越“后现代困境”的途径。例如,在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上,德勒兹与加塔利并未采取典型的后现代态度。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千高原、块茎、褶子、生成、逃逸线、解辖域化等等观念使他们在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自由移动而不在乎它们的区别。或许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作为哲学家的实践使他们最具后现代性,因为他们的著作系统而深刻地阐发和表现出以生成、异质、多元为特征的差异哲学思想。^②

自奥斯维辛之后和五月风暴以来,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一直处于一个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既有美学上“自恋”的飞地,又有画地为牢的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也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批判紧密结合的“西马”,还有 Rod Giblett 所描述的“后现代湿地”——湿地作为地球之肺或肾,既是包藏着黑暗、疾病、死亡、恐怖的“黑水”之地,又是肥沃的、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活水”之地;后结构主义大致生发在这种充满着活的黑水(the living black waters)的湿地。按照 J. P. Surber 的看法,20 世纪下

① 本书中,凡在书名之后出现两个年份的情况时,前者为英译本出版年份,后者为法文本出版年份。

②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半叶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上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嬗变，在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是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嬗变，而在后结构主义特定的批判策略上则出现了以福柯为代表的系谱学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后结构主义的崛起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解中心的产物，它承袭尼采的哲学思维特征和理论话语，对由索绪尔发展而来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概念发出了挑战，如对现象下面具有深层结构或意义的概念，对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等概念加以质疑。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时对主体进行了解中心；德里达以解构策略对文本进行了解中心；福柯以考古学与系谱学对历史进行了解中心。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表现出一种兼容解构与重构主体、文本和历史的努力，并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或概念来阐发他们的思想。例如，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否定了纯文本的维度，坚持认为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欲望”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性。^① 因此，他们提出了“欲望生产”的概念。

1968年，欧洲著名的五月风暴促进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思考，导致德勒兹对“笨拙的学术机器”的拒斥，他与实践心理学家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都是五月风暴影响下的产物。加塔利曾经是拉康指导的最早的实习生之一，但他从未真正地与拉康式的弗洛伊德学派建立联系。加塔利反等级制的倾向使他成为五月风暴的先锋，《反俄狄浦斯》是他与德勒兹合著的第一部著作。对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而言，五月风暴的亢奋激情先是转成了70年代中期的萎靡消沉，然后又回归宗教（《如实》）或政治保守主义。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从未宣布放弃他们的立场。他们耗7年心血写成《千高原》（1980），此书与《反俄狄浦斯》共享同一副标题“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是后者的续篇，但构思颇为不同，淡化了批评性而突出了“游牧思想”的实践。

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史的维度而言，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是与所谓的国家哲学（State Philosophy）相悖立的。国家哲学意指柏

^① 参见 J. P. Surber 《文化与批判——文化研究批评话语导论》第七章“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话语”，（Westview Press, 1998）。

拉图以来的富于特色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表达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受到德里达、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普遍抨击和拒斥。国家哲学包含着一种双重的实体：思维着的主体和主体所创造的概念。解构派的女性主义者西苏和伊丽格蕾皆对其冠以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 (phallogocentrism) 之名加以抨击。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中将其描绘为思维的树状模式 (arborescent model)，以块茎模式的游牧思维与之相对。

在拆解与创造并行不悖的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湿地”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哲学、美学思想中解辖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概念是与更为宏阔的后结构主义解中心的理论构想相联系的，指涉从人们所栖居于其中的或强制性社会 and 思想的结构中逃逸过程。这些结构借用地理学的意义可以理解为辖域。逃逸线 (a line of escape) 则是消解既定辖域的一条快乐之途。同时，他们又借鉴生物学中“树木”与“块茎”的对位、地理学中“高原”地貌、自然界及巴洛克艺术中“褶子”现象和文化中“游牧民族”等概念，引申出块茎 (rhizome)、千高原 (Mille plateaux, A Thousand Plateaus)、褶子 (fold) 和游牧 (nomadic) 等概念，提倡充满活力的差异、流变、生成、多元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图式进行再辖域化。

可以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创造了一种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认知世界的图式，一与多、同与异、静与动、能指与所指、男性与女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等二元对立在千高原与游牧之光的观照下皆消弭于无形。如果说有后现代哲学和美学存在的话，德勒兹与加塔利则标志了其特色斐然的一个维度。

三、德勒兹哲学、美学与当代语境：三个维度

从德勒兹研究的视角来看，20 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至少存在着三个对话的维度：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些维度生发演化出三类多层面、多视角的对话关系，进而交织成为 20 世纪西方思想界、文艺界纷纭多姿、变幻无定的理论景观。而德勒兹正是 20 世纪下半叶聚合了这三类对话关系的焦点。换言之，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在同时与语言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维度进行着深层次的对话。



首先,在语言符号学的维度上,德勒兹主要有《哲学中的表现论:斯宾诺莎》、《普鲁斯特与符号》和两部关于电影哲学和美学的著作。德勒兹的符号论构成颇为复杂,主要源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论(Semiotics)^①、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表现观、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非语言学符号观,以及奥斯丁(Austin)和塞尔(Searl)等人的思想。皮尔斯的符号论是一种超越语言而重视形象的多元符号论,对影视或文化传播领域影响重大。A. P. 柯伦巴特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牾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的全部著作皆拒斥由神学家(奥古斯丁)和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界定的符号概念,因为他们的符号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超验的法律、上帝之言、菲勒斯、阉割情结等等——的特殊秩序。德勒兹拒绝任何囿于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继而拒斥拉康主义及其黑格尔哲学基础。他将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亦显得颇具特色。在弗洛伊德乃至拉康看见符号、能指和所指——一种语言与句法——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绘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并不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对什么使语言成为可能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际遇、什么样的力量关系、什么样的事件被折叠和包含在符号之内。因此,毫不奇怪,德勒兹从不在语言学维度讨论文学文本。^②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德勒兹以后结构主义哲学话语与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一种对话和对法国结构主义的一种理论反拨。

其次,在精神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上,德勒兹最有影响的是他与加塔利合著的两部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他之前或大致同时,荣格、拉康、詹姆逊等人分别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个体无意识学说的对话,分别生成集体无意识、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等概

① 符号学的两个重要术语“Semiology”与“Semiotics”具有不同的渊源,前者与索绪尔相关,后者与皮尔斯相关,但它们也常常被混用。

②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4 ~ 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念,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内涵。伊格尔顿、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等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多维度对话,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发展。詹姆逊在其著名的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德勒兹他们试图在新的层面上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因此便得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但德勒兹的情况应该较詹姆逊所言显得更为复杂。像众多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一样,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与尼采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他与加塔利的理论结合是一个思想无羁的哲学家与关注政治的“反精神病学家”的结合,从他们的哲学和美学特质而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以尼采哲思对既有的两个辖域化的领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加以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理论努力。

若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差异哲学与流变思维,尤其是将其千高原、块茎、游牧等核心概念置于当代西方文艺美学的宏观背景中加以把握,更能凸显德勒兹哲学观、文艺观的特质、价值与意义。同时,反过来也会深化我们对当代西方尤其是西方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和文艺学观念的认识和理解。譬如,德勒兹的上述概念与瓦尔特·本雅明的星座化概念在精神实质上有相通之处。按照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的看法,本雅明通过“星座化”概念拒绝同一性和总体性的诱惑。星座化维护特殊性,它既拒绝独一无二的差异性,也拒绝无休无止的自我同一性,它典型地体现在现代寓言之中。星座化概念是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的最引人注目、最具独创性的努力,它给妄想式的总体性思想予致命的一击。^①换言之,星座化概念与千高原、块茎、游牧等概念皆具有消解树状中心或等级制结构的功能和特征,体现了当代哲学思维的性质。再如,乐黛云教授在为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高概(Jean-Claude Coquet)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话语符号学》中译本所写的序中指出:高概讲演的主旨聚焦于当代哲学和美学“从逻辑学范式到现象学范式的转换,非常清晰地分析了当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根本的转型。他指出逻辑学范式,即结构主义范式……将内容概括为最简约的形式,例如字典中的每一个词都被简

^① 参见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第十二章“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博士:瓦尔特·本雅明”,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名著提要》,72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约成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实质、没有时间的纯粹理想形式。从这种范式出发,一切叙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封闭的空间……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形式,而首先是‘身体’,一个活生生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现象学研究的空间是一个不断因自身的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的拓扑学空间。如果说第一种范式大部分用的是第三人称过去式,第二种范式却永远与第一人称的主体相连,时态也大部分是,而且只能是现在式”^①。高概不但与伊格尔顿一样都强调“身体”在当代哲学、美学中的重要性,而且他所阐发的现象学范式体现了一种鲜活的、动态的、开放的特征,既有与德勒兹的流变思维异曲同工的一面,又有巨大的理论差异。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既是富矿亦是坚果。从理论研究价值而言,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和文艺美学理论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德勒兹又是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从中国学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视角出发,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重镇的德勒兹哲学和美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① [法]高概:《话语符号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差异哲学

游牧美学

千高原

解辖域化

生成论

块茎

褶子

德勒兹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因其不同流俗、戛戛独造、思想深刻而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占据一席独特的地位。他的哲学名著《差异与重复》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蜚声国际学术领域,被认为是法国现当代哲学的精华,后现代思想的经典。他的声誉直追福柯、德里达、拉康等当代思想名流。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想大师们构成了当代思想领域风姿各异的千高原。他们的“绝活各有不同:德里达表演的语言冲浪(分延、补替、播散……),多是能指的运动;福柯展现的是历史泳式(考古学、谱系学、监狱、诊所、性意识……),一再把人送回到历史;德勒兹则撒出一朵朵比喻的浪花——欲望机器、块茎体、逃逸线、游牧思想……从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的中心概念,可以感受到后结构主义如何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中心向外播散”。^① 德勒兹涉猎的领域广袤多样,思想表现形态异彩纷呈,虽然体现出差异哲学和“生成”论美学的内核与特质,但同时又流溢嬗变,难于框定。

作为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德勒兹学术视野开阔,善于融会东西方思想资源,是站在古往今来世界哲学史的巨人们的肩上进行思想过滤和学术创新的大师。悠久深厚的西方哲学传统成为他思想寻绎的基础和理论反思的参照系,作为西方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创新也折射出欧洲奥斯维辛之后与五月风暴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学术氛围。“法国就是一个能产生大思想家的地方。那里有深厚的哲学积累,那里有思想的相对自由,那里有敢冒天下大不韪的智者,那里有洞察此岸彼岸的‘高原’,那里有一代代年轮相当的学术大树林。德勒兹是得天独厚者。生逢其时,生逢其地,生逢其俦。……他的《差异与重复》回避了辩证法,但是放生了差异性。他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几乎没有和传统的思想正面冲突,而揭示的却是历史和社会非常应该理解的欲望生产机制。《千高原》披露出了根茎的秘密,打开了新思想的武库,清点了高原的牧场,勘测了新学科起飞的跑道……德勒兹不止一次强调说他们的思想是生成哲学。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哲学十分重要。生成哲学集原生性、原创性和前瞻性于一身,聚探索性、冒险性和牺牲性于一体,熔他在性、彼岸性和去己性于一炉。德勒兹是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通过借鉴和同化,统领着广大

^① 张法:《德勒兹与思想重构》,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5)。



无边、层出不穷的思想和概念。”^①德勒兹对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斯宾诺莎、休谟、莱布尼茨、马克思、尼采、柏格森、阿多诺、海德格尔皆感兴趣，对他的法国当代同行福柯和德里达颇为欣赏，同时对东方思想智慧亦有所了解，他和加塔利曾经在《千高原》中广泛引证东方哲学、美学、宗教、文化等资源，借助中国结、印度曼荼罗、犹太教圣符、伊斯兰“心象”和基督教圣象阐发思想。据曾经拜会过德勒兹的栾栋先生说，德勒兹读过《论语》法译本，了解一点老子和庄子，更欣赏庄子。1988年10月在巴黎17区一家咖啡馆，德勒兹抱病与栾栋等四人晤谈了两个多小时。交谈虽然短暂，但是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才思，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从同访的阿迈尔那里得知栾栋先生用比较的方法参读其著作时，便问为什么要将他的著作与柏拉图、庄子、淮南子、圣经、涅槃经、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交替阅读。栾栋回答说，为了感受创造。^②这些著作包括德勒兹本人的著作都有突出的思想创新意味，具有开放性阐释和行文诡谲的特质。

德勒兹的基本学科领域是哲学。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有《反俄狄浦斯》、《千高原》、《什么是哲学？》、《差异与重复》、《柏格森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批评与诊疗》、《对话》、《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实践哲学》、《尼采与哲学》、《培根：感觉的逻辑》、《福柯》等等。从思想过滤与观念创新两个维度对西方哲学加以反思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对德勒兹与哲学关联的梳理和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关键概念的阐发，是德勒兹研究的基础。换言之，本书第一编是后面各编的基础。因为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和对文艺美学的看法，可以说都主要是从哲学视阈切入的，具有与众不同的理论品性，而德勒兹与当代性的关联域，也在于他特异的哲学观念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理解富于启迪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编第一章拟论析德勒兹与西方哲学的思想过滤关系；第二章拟有选择地阐发德勒兹独具特色的哲学和美学观念及其意义。而对德勒兹哲学思想观念其他维度的论析，将在其余两编各章节中继续拓展和深化。

^{①②}栾栋：《德勒兹及其哲学创造》，原载《世界哲学》，2006（4）。

第一章

过滤思想：德勒兹与西方哲学及美学

德勒兹作为学院制背景出身的法国的大学哲学教授，受过严格的学科训练，具有丰富而坚实的哲学史理论知识，但是，20 世纪法国思想界自由无羁、新见迭出的哲学和美学氛围，以及五月风暴叛逆式的政治刺激，引发了德勒兹偏重反常的理论个性。他对西方思想史上经典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加以思想过滤，对现当代思想家、理论家们如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福柯、拉康、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加以辨析和扬弃，并在与加塔利密切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创造了特色斐然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

第一节 德勒兹与西方哲学史

B. 玛苏弥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千高原·译者序：哲学的愉悦》中说：德勒兹是哲学科班出身，其最早的著作犹如哲学巨人的名录。他过滤伟人，发现那些孤儿般的思想家之间的脉传，并站在少数族的立场把他们链接起来，与居于正典的国家哲学(State Philosophy)相对峙。由此，德勒兹在卢克莱修、休姆、斯宾诺莎、尼采和柏格森之间找到了一条隐秘的连线。德勒兹的《重复与



差异》、《感觉的逻辑》是他最早将游牧思想与当代理论加以杂交(cross-fertilized)的主要阐述。因此,我们也可以循此思路,游牧式地挑选德勒兹一些重要著作加以简略介绍或论析。

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1988/1966)是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尽管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初叶最重要、最为人所广泛阅读的哲学家之一,但时至今日,他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柏格森主义已经被简缩成为哲学史的一个注脚,仅仅在研究“活力论”或“非理性主义”时偶尔露面。然而,在德勒兹看来,柏格森的意义不止于此,他构成了哲学“反历史”的一部分。柏格森与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姆或尼采类似,看起来属于哲学史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他们从某一方面却完全逃离了哲学史。在20世纪50~60年代,正是对这类哲学家的研究与著述,使得德勒兹与战后法国学院哲学分道扬镳。德勒兹从不同学科的众多作家那里汲取和转化了一系列观念,柏格森的著作就为德勒兹的工具箱提供了制造观念的材料。例如,柏格森的绵延主题(the theme of duration)与德勒兹生成、多元观念有着内在联系。德勒兹美学旨趣时期研究电影哲学,“运动”与“时间”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德勒兹“运动—形象”与“时间—形象”的电影学概念,是从对柏格森关于运动、形象、认知与时间的四种评论引申而出的。鉴于德勒兹与柏格森之间的亲和性,Gillian Rose把德勒兹论的著作称为“新柏格森主义”。^①

德勒兹《康德的批判哲学》(1984/1963)是一部“为论敌作书”的著作。这一本哲学引介性质的百来页的小册子,属法国大学出版社“哲学家”丛书。丛书的目的是向法国读者介绍重要的哲学家。德勒兹不仅在此书中总结了康德三大批判中各批判的基本主题,而且还富于原创性地阐释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德勒兹赋予《判断力批判》以超越其他两大批判的特权地位,把《判断力批判》回归康德给它的原来的位置,作为其批判大厦的基石。引人注目的是,德勒兹与康德在哲学思想上格格不入,“老康德是‘昆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佬’,而德勒兹则是游牧四方的巴黎艺术家。对德勒兹而言,这种对立恰是研讨问题的魅

^① Hugh Tomlinson,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pp. 7~9, Urzone, Inc., 1988.

力所在”。德勒兹后来把此书与其他的哲学史著作进行比较,饶有兴味地说:“我论康德的著作颇为不同,我极为喜欢它。我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谈论敌手的书来写。在书中我力图展示康德是如何工作的,他的机械论是怎么回事——理性法庭,诸感知力的测度和运用,一切都顺从于我们假设的所谓立法者。”^①德勒兹对康德的学术兴趣持续不减,1978年他在大学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的研讨班,一方面继续与康德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对康德作了新的读解。在他笔下,康德几乎成了一个尼采式的“概念创造者”。康德批判哲学中论审美与崇高的维度受到德勒兹的关注。在崇高的判断问题上,德勒兹认为“崇高与优美不同,是指在扭曲的形态、不定形的东西面前的感情。在崇高的判断中介入了理性。这个判断是通过构想力和理性的和谐来说明的。但这里的调和是伴随着痛苦的调和,即不和谐的和谐”^②。康德关于理性与构想力之间“不和谐的和谐”的审美思想,对德勒兹哲学和美学观念(如“无结构”之结构的千高原、块茎、褶子、无器官的身体等后现代观念)的创造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德勒兹哲学被认为是一种超验的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哲学。西方大多数超验哲学都有某种超验论的基点,用以阐释经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主体”,而最明显、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则是“真理”。而康德可以说是西方超验论哲学的枢轴人物之一。德勒兹颠倒了以超验论为基点的哲学传统,他的超验的经验主义认为任何基础、源头和外在的终极力量皆源于经验。

在这一点上,德勒兹与福柯是精神相通的。福柯把他所力图挣脱的西方思想传统描绘为一种“皈依超验论”。超验论(transcendence)与超验(the transcendental)殊为不同,传统的超验论或超验主义设定某种超验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赋予我们某种赖以立足的基础,福柯认为这导致了一种“知识伦理学”,我们由此追求和服从某种最终的真理。而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接受某种超验主义的基础——例如上帝、真理或人的本质——则我们会停止思考。与此相反,德勒兹超验的经验主义则强调内在性。内在性对于德勒兹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同时,内在性也是德勒兹的伦理学:不让经验为任何单一的形

① Gilles Deleuze,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Faculties*, xv~xvi, (translated by H. Tomlinson and B. Habberjam),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4.

② [日]篠原资明:《德勒兹:游牧民》,3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象所奴役。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他们两部重要著作《千高原》与《什么是哲学?》中突出地论述了内在性平台(planes of immanence)的概念,他们在这种平台上揭示一切遗传学的、地质学的、微观生物学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生成。他们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就在这种内在性平台的各种生成中展示出来。千高原就是力图攫住内在性的多元化平台,任何一个高原或平原都是很好的入口。

对于德勒兹关于超验主义、经验主义、主体、真理等看法的形成,康德哲学思想不啻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视阈中,如果我们在最广义的经验层面上接受生活皆是生成之流和互相作用的话,那么,哲学就是一种经验论。而如果哲学没有设定某种外在于经验的基础的话,那么,哲学就只能是一种超验的经验主义。经验不能以人类、主体、文化或语言为根基,而只能以生活的欲望之流来解释。西方思想倾向于将某种东西作为所有经验的阐释基础,如柏拉图的“理式”与“影子的影子”模仿说,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界”之分,德勒兹认为这是一种超验主义的幻想。他反对这种教条,认为经验是超越人类及其固定形象的。德勒兹认为反本质主义和反人类中心论是一项伦理学和实践的任务。他倡导的超验的经验主义将使我们摆脱常识的束缚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形象,引导我们面向未来。经验论思考的一种方式就是将所有生活皆视为“身体”之间或“欲望机器”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流变和联系。德勒兹在其早期著作《差异与重复》(1968)和后期与加塔利合作的《什么是哲学?》中都明确描述他的哲学是超验的经验主义,但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思想挑战。

德勒兹不懈地追求不受任何单一的基础或本原(例如上帝、逻各斯、主体、存在与真理等等)束缚的哲学,因为他认为生活是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去想象存在着某种意义或真理亟待我们去解释、揭示或总括。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疾病描绘成“阐释症”。正是这种超验主义幻象的真理观,导致了牧师(他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禁欲主义(使我们谴责自己的欲望,皈依想象中更高的理想)和虚无主义(当我们对想象中更高、更真实的隐蔽世界最终感到难以捉摸时,我们就会绝望)的产生。

德勒兹的经验论与他的“机器装配”概念密切相关。他和加塔利将身体之

间的联系称为“欲望机器”，这是根据其经验论而来的观念。欲望机器不是什么神秘难解的东西，它们只不过是欲望的联系与体验。从身体的联系或体验中，人类在心灵中形成概念。例如，儿童的嘴巴在吮吸母亲的乳房中体验到愉悦，因而把欲望与乳房联系起来。在这种欲望期待中，可以生产出一种形象或心理投射。

我们常常认为欲望是对我们所匮乏的东西的追求，德勒兹却认为欲望能够创造与生产。儿童吮吸乳汁的体验产生出一种愉悦的概念，乳房则成为进一步获得愉悦的一种形象。因此，乳房从实际的经验（身体的部分器官）变成了一种超验之物（愉悦的概念），附加上了一种虚幻的维度，成为幻象的、愉悦的和欲望的乳房。进而社会机器将这些“部分客体”发展成为有组织的体制，如母性、家庭和文化。正是这种在想象中期待、参与和拓展体验的能力生产出各种形式，似乎统治了人类生活，但实际上，它们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虚构文学”或衍生物。经验论从单一的、部分的或“分子”的体验开始形成，进而拓展和组构成为整体的“克分子”形式。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曾经将他们的方法描述为既是一种“克分子政治学”，也是一种“分裂分析”。前者由部分客体构成，后者则将宏大的社会形式碎裂成为它们单个的部分。^① 分裂分析既是超验的（康德），也是唯物论的、实践或经验的（马克思）分析。超验的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具有直接的政治蕴涵。它摧毁有机论的虚幻观念，以多元性的效应和强度使生活更为绵延多姿。提供了与意识形态论迥异的视阈和途径。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1994/1968）是他获得博士学位的主论文，《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同年出版，为副论文，而《感觉的逻辑》翌年出版。这三部互相联系的著作标志着德勒兹学术生涯两个阶段的分野。前者（博士学位主、副论文）是德勒兹的独著阶段，包括德勒兹早期关于非正典哲学史家的著述，后者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阶段，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德勒兹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是应制之作，那么，《差异与重复》则是他具有原创性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在其全部著作中占据一席独特的位置。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69~89, London: Routledge, 2002.



《差异与重复》是一部令人惊讶的概念创造的哲学著作。德勒兹从他早期对柏拉图、休姆、柏格森、尼采、康德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和过滤中激活了自己的思想,建构了一种差异哲学,对自柏拉图以来主导欧洲思想的“再现哲学”加以批判。德勒兹早期对不同形式的多元性、永恒回归本体论等的研讨,在此编织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差异哲学——这个系统仅仅基于差异的重复,而不是对原本、本质或基础的再现。因此,确切而言,这是一种非基要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德勒兹因此得到了福柯的赞誉而成为知名的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

从本体论的维度而言,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强调的不是康德式的物自体,而是差异本身(Difference in itself)。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英译本》“序”中说:“当我研究了休姆、斯宾诺莎、尼采和普鲁斯特(他们全都燃起了我的热情)之后,《差异与重复》是我尝试‘搞哲学’的第一部著作。”差异与重复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哲学史,尤其是当代哲学不断地涉及这个问题。然而,大多数哲学家恐怕都把差异从属于认同或同一性,归于相似性、对立性:他们把差异导入了概念的认同,把差异置入概念本身,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概念性的差异,而不是差异的概念。……易言之,我们并不思考差异本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能够显示出差异的有机再现;在莱布尼茨和黑格尔那里,则是差异的一种狂欢式的再现:他们都未能抵达差异本身”。此外,重复也同样被从认同、类似、等同或对立的维度来考虑。因此,德勒兹式的差异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开拓新的思想领域和视野的革命性意义。

德勒兹认为差异与重复的力量只有置入对传统思想形象的质疑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创建新的思想形象,或者毋宁说,把思想从囚禁它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德勒兹从哲学史上四个关键的契机中将差异剥离下来:第一是反亚里士多德,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范畴或者分类;第二是反黑格尔,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臆想,不能通过矛盾与综合的不断演绎拓展的过程最终抵达宏大叙事的终点;第三是反莱布尼茨,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无限微小的差异;第

四是反柏拉图,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从某种原本分衍出来的摹本。^①《差异与重复》第三章尤为具体细致地论述了在差异与重复的哲学基础上创造新的形象以表达新的思想的必要性。德勒兹在序言中接着说:这引导我们后来的一系列著作的思路,包括我与加塔利所倡导的“思想的植物模式:以块茎对峙树木,用块茎思维取代树根状思维”^②。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是他对后结构主义唯物论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其意义是将差异的概念回复到与同一概念相关的确切位置,并且将尼采哲学加以拓展,以反对柏拉图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所遵循的形而上的哲学传统。由于德勒兹坚持差异性与多元性是首要范畴,而认同或同一是其次的、依赖于前者的范畴,因此,“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具有本体论性质和革命性的意义。

在五月风暴如火如荼地蔓延欧洲的1968年,《差异与重复》的面世无异于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J.威廉斯认为德勒兹这部思想著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力作之一,通过对传统的价值重估,它引入了新的方法与概念,改变了我们的哲学观。《差异与重复》可以与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的著作相提并论。它是对现实结构的哲学描绘,早期的哲学结构与世界为它所深刻地震撼。正如其他具有原创性的伟大哲学著作一样,它既精深又重要。它不仅对哲学史的发展富于意义,而且也是德勒兹全部著作的思想基石。^③

第二节 德勒兹与加塔利

在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领域,德勒兹的名字是与加塔利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1969年当德勒兹与加塔利遇合之际,德勒兹已经是一位颇具声誉

① J.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p. 55,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xv~xvii, (translated by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J.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pp. 1~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的重要哲学家,而加塔利已经积十余年工夫尝试了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加以综合的工作。加塔利在欧洲反精神病学运动(the European anti-psychiatry movement)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早期加塔利对拉康感兴趣,1953年他曾经参加过拉康主持的为期两个月的研讨班。1969年他又参加了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并且成为精神分析学会会员。60年代他大量使用拉康的术语和概念,如想象界、菲勒斯等等,并撰写了关于学院制的精神分析与政治的一些论文。加塔利后来与拉康分道扬镳,成为反精神病学的重要人物和政治活动家。他与包括德勒兹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形成对话关系,其思想观念影响到后马克思主义。加塔利最重要的概念可能是横截线(transversality)。20世纪60年代加塔利提出横截线这一概念,并将其贯串于他毕生的著述之中。1972年德勒兹将此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应用于对“普鲁斯特与符号”的分析。^①加塔利对日本建筑与文化颇有兴趣。1985年加塔利访问东京,发表了他关于后现代的重要论述《后现代绝境》(1986)。而日本建筑家对横截线概念的接受则关涉到对德勒兹思想影响更为复杂的评价。

1972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第一个思想结晶《反俄狄浦斯》流行于世,这部著作既为他们带来了声誉,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德勒兹与加塔利由此成为反精神病学和五月风暴的精神象征。

Gary Genosko 主编的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2001)中,第一卷为“德勒兹”、第二卷为“加塔利”、第三卷为“德勒兹与加塔利”。编者在全书的导论中指出:其中最迷人的一卷可能是加塔利卷。

德勒兹与加塔利是两位富于挑战精神的思想家,他们的互补关系犹如和谐的交响乐,创造出特殊的思想效应。但是,两人的名字相连的方式却会引发复杂的问题。将两人的名字相连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德勒兹与加塔利;德勒兹(及加塔利);D+G. D/G. D-G. D(G.) DandG;Deleuzo Guattarian;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家/政治活动家;等等。但无论两人名字的缀合多么富有创造性,也无论对两人的区分与联系多么的狡黠或紊乱,都不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所产生的引人注目

① 参阅本书第三编第七章“普鲁斯特论:符号与文学机器”。

的成就,也不能标示出他们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德勒兹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装配”,既不是联合也不是并置。Gary Genosko 认为也不是选择“海洋”(加塔利)动荡的海面与“山峰”(德勒兹)内在的罕见的运动之类的事情,而是有点像“思想的渗透”(intellectual osmosis,——如同 R. Callois 与 G. 巴塔耶之间的关系那样)。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德勒兹与加塔利,而从来不说加塔利与德勒兹?诺曼·雅克布森认为这是一种“词序诗学”(a poetics of the order-word),似乎只是把德勒兹摆在加塔利之前更顺耳一点。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马泰效应”的话^①,那么这种词序诗学却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人们等级制的思维定式会看重和有利于第一作者,尽管排在其后的其他作者的重要性完全可能并不逊色于他。另一个问题是,人们还可以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用一种以部分代替总体的举隅法(synecdoch)来看待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缀名问题,即以“德勒兹”来代替“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表述。举隅法的德勒兹与前述的“词序诗学”的德勒兹类似,使用起来固然省事,但是却扭曲了两人之间的互相生成关系。对后结构主义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而言,“很容易想象德勒兹和加塔利之间有一种蜜蜂与兰花类型的互惠生成关系:德勒兹生成加塔利,加塔利生成德勒兹”^②。昆虫通过采花蜜以养育自己的家族,花卉却同时借助昆虫授粉而得以传宗接代。两位思想家在学术上的化生、耦合、互补、共振,促成了双方增殖性的“双赢”。可以说,哲学家德勒兹戏剧性地深化了加塔利的反精神病学姿态,将其植根于以尼采、斯宾诺莎、柏格森为代表的特立独行的哲学传统一脉,而不是柏拉图、笛卡儿、黑格尔的正典哲学传统;而同时加塔利则戏剧性地使德勒兹哲学的视角变得更为敏锐,将其引导到了西方精神分析和反精神病学的理论与机构斗争中,并与当时影响遍及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风暴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① 马泰效应(the“Matthew effect”)为 R. K. Merton(1968)所发展出来的概念,以描述把责任和荣誉归于多位作者中排在前面的第一作者的情况。

② Gary Genosko, *Deleuze and Guattar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pp. 1~13, London: Routledge, 2001.



第三节 德勒兹与尼采：权力意志与永恒回归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是一个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人物。一百余年来,尼采的幽灵一直在历史的长河游荡着,搅动着世界。这位宣称“上帝之死”的叛逆式的德国哲学家,很早就引起了德勒兹的共鸣与关注。1962年德勒兹出版了专著《尼采与哲学》,可以说这部著作在法国哲学史上标志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此前,尼采在法国很少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德勒兹对尼采的研究,是法国人第一次系统地把尼采作为一个重要哲学家来看待。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尼采已经成为对法国思想界影响重大的人物。德勒兹对尼采的解读所展示的一系列问题,后来成为尼采研究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中心题旨。

2001年,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中译本出版,其封底文字介绍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知识界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争论不休的时候,德勒兹却为尼采的思想所痴迷。他在1962年发表的专著《尼采与哲学》突然搅乱法国知识界的神经,开启了法国后现代主义之路。该书可以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三卷本巨著《尼采》相媲美,成为20世纪尼采研究的巅峰之作。”

《尼采与哲学》标志了德勒兹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德勒兹日后的许多重要题旨和关注点,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它们最初的声音。德勒兹眼中的尼采,并不只是一个狂想曲式的格言家,更是一个睿智的哲学家。尼采对哲学史有深刻理解,他在哲学上对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的回应,勾勒了现代思想的基本问题。德勒兹从尼采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和美学营养,他认为尼采的主要目标是颠覆柏拉图主义,创造一种基于强力特征的生成(becoming)哲学;尼采完善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并将其引向反抗西方传统的理性原则的方向;尼采厌弃黑格尔客观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肯定差异的哲学取代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思路。这些都是德勒兹众多著作所追求的目标。

在《千高原·导论》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尼采振聋发聩的警句将知识

的线性统一抖散,激起永恒回归的循环。^①德勒兹把尼采视为价值哲学的创建者,他在将尼采置于哲学史时,尤为注重深入论析尼采与黑格尔、康德的思想关联。他高度称赞尼采提倡差异和差异互动的系谱学概念,认为尼采将价值问题导入哲学思想,使价值批判成为一种新的系谱学的核心。

尼采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意义和价值的概念引入哲学。现代哲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从尼采那里汲取营养……尼采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指出康德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因为他未能从价值的角度提出批判问题。^②

康德之误在于将真正的价值从批判哲学中排除。康德假定了真、善、美的价值,其批判完全屈从于这些未经检验的价值。而尼采的系谱学强调价值评判必须从价值不同的起源开始,因而力图追溯价值的源流以评判它们。德勒兹指出:“尼采创造了系谱学的新概念。哲学家是系谱学家,而不是康德式的法官,也不是追求实利的技师。……系谱学既意指起源的价值,又意指价值的起源。”“系谱学意味着起源或出身,同时又意味着起源时的差异或距离。它意指起源中的高贵与卑微、高贵与粗俗、高贵与颓废、高贵与低等——这些是真正具有系谱学意义和批判意义的因素。”^③价值之源是差异,价值源于存在的方式,即那些评判者的生存模式。制造差异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肯定与否定。而高低贵贱的存在及评判模式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主人与奴隶的模式,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观。黑格尔将善与恶设置成一种互为矛盾的辩证关系:奴隶的基本公式是——你邪恶,因此我善良;主人的公式则是——我善良,因而你邪恶。在前者,否定成为本质与前提,肯定只有通过否定才能生存。在后者,肯定的前提“只是为了引出一个否定性的结论”。而尼采则是一种超越辩证关系的“肯定之肯定”的思维。主人的好与坏,实与奴仆的好与坏无关。

德勒兹认为,尼采对康德批判哲学加以完善的最终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形象。尼采在康德理性批判中所找到的缺失的一环是理性的系谱学,即关于“理性本身的发生学”的分析。而尼采在与黑格尔的客观历史主义辩证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6,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②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1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③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3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法的对话中,体现出一种新的、狂放不羁的反抗精神,挑战西方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否定思维。尼采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具有肯定精神的哲学家,他既是一个读解症状、开出药方的阐释者/医生,又是一个摧毁否定价值并创造新的价值的评判者/艺术家。^①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结论》中说:“在精神实质上,黑格尔和尼采绝不可能妥协。”“如果辩证法的思辨因素存在于对立与矛盾之中,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因素反映了差异的假象,像牛的眼睛一样反映了差异的颠倒形象。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确是对差异的反映,但却是颠倒的反映。它以对差异者的否定来替代对差异本身的肯定,以对他者的否定来替代对自我的肯定,以对否定的否定来替代对肯定的肯定。……双重否定才能产生肯定的幽灵。”“尼采的意义在于,多样性、生成和偶然是纯粹肯定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德勒兹认为:“辩证法出自康德的批判,出自错误的批判……尼采指责辩证法家们仅止于对普遍与特殊的抽象,他们是征候的囚徒,无法达到产生这些意义和价值的力量或意志。他们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限度内活动,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相矛盾的问题。尼采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这一方法是戏剧化、类型化和差异化的。他将哲学变成一门艺术,一门诠释和评价的艺术。他在每一场合都问‘那一个?’……作为弹性的系谱学原则的权力意志。”^②

德勒兹认为,在尼采成熟的哲学思想中居于核心的是“强力意志”和“永恒回归”的概念。而在德勒兹之前,几乎无人对它们加以特别的关注。当然,在描述尼采哲学思想时,德勒兹更多的是在阐发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他并非是尼采的信徒,而是在尼采哲学充满活力的思想平台上,选择性地创造新的观念。德勒兹对尼采哲学的关键概念“权力意志”作了独到的阐发。他认为这是一个难以捉摸且易于误解的概念,但又是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权力意志”是与“永恒回归”的概念一脉相承的。虽然要界说什么是权力意志并不容易,但是,要是说什么不是权力意志却很容易。第一,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志;第二,它不是欲望意志(desire for power)。德勒兹认为欲望意志只是权力意志的软弱无力的塑形而已。弱者渴望权力,以否定强者的力量;强者恰

① R.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p. 15~18, London: Routledge, 1989.

②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286~287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恰相反,只实践权力,而不渴望权力。在尼采那里,意识总是卑贱者关于高贵的意识。意识从来不是关于“我”的意识,而是一个自我关于另一个自我的意识。它不是主人的意识,而是奴隶关于主人的意识。德勒兹是通过力量和身体(force and the body)的概念切入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的。尼采认为,我们的力量与身体构成了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流变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实体能够保持静态的身份。自然世界是力量互相关联的多样性存在,所有力量要么占上风,要么落下风。“界定身体的正是这种支配力和被支配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力的关系都构成一个身体——无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身体。”^①力在本质上存在着量和质的差别。

德勒兹也试图对尼采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及永恒回归(the eternal return)概念作出界说:“权力意志就是力的系谱学因素,它既是差异性的,又是源生性的。”权力意志衍生出彼此关联的力在量和质两方面有差异,由此“揭示出它作为力的综合原则的本质。……永恒回归是以权力意志为原则的综合”。权力意志“本质上是一个可塑的原则……随着条件而改变自身,并且根据它决定的每一个情境来决定自身”。“它总是可塑的和变化无常的。”^②没有权力意志的概念,各种力量(forces)便处于非决定状态。权力意志从量与质的维度决定了力量之间的关系。权力意志是一种原则,但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原则。这种可塑性的原则可以从概念上与“力量”区分开来,但永远无法与它所决定的具体的力量分离开来。因此,权力意志既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意志(例如叔本华哲学意义上的“意志”),也不是个体的、自我认同的意志(例如传统精神分析的“意志”)。^③可塑的权力意志不能与它所决定的每一个情境分开,正如永恒回归是一种肯定生成的存在一样,权力意志是一种肯定多样性的综合原则。

“永恒回归”的概念则是与超越传统线性时间的概念相联系的。德勒兹阐发说,尼采对永恒回归的论述预设了他对最终状态和平衡状态的批判。尼采

①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59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74~75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③ R.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22, London: Routledge, 1989.



认为“往昔无限”，逝去的时间无穷无尽，这意味着生成不可能有一个起点，意味着生成不是已然形成的事物。回归即生成之道，既无开端又无终点。现在必须同时与过去和未来共存。永恒回归因此解答了时间流逝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永恒回归必须被当作一种综合：时间与它各个维度的综合，多样性与多样性的再现与综合，生成与在生成中得到肯定的存在的综合，以及双重肯定的综合。”循环假设无法解释同时并存的多样性存在，而永恒回归可以理解为“某种原则的表述，这一原则被用来解释多样性和多样性的再现以及差异与差异的重复。尼采把这一原则当作他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发现，他把它称为权力意志”。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在德勒兹—尼采生成哲学的观照下，构成永恒回归的共时共存。时间的永恒唯在于它不断的、无始无终的创新。其唯一的同一(the only “Same”)就是永远不停地留在同一之中的力量。德勒兹在他的《普鲁斯特与符号》中，用这种时间观对西方现代主义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作了独到的阐释。

尼采在《瞧哪，那人》中把“永恒回归”称为“肯定的最高形式”。“永恒回归”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关键概念。德勒兹强调尼采的永恒回归是综合的思想，是强调绝对差异的思想，“永恒回归不是‘同一’或‘一’的回归，而是属于多样性和差异的回归”^①。尼采的全部著作，都贯串着对回归“同一”和“一”的批判，体现出强烈的反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精神。“同一”意味着回归自我认同、本质和存在(being)，而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视野中尼采的“永恒回归”意味着回归一个流动、嬗变和生成(becoming)的世界。永恒回归的世界不仅是生成、流变、多元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机遇或混沌的世界。按照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法，参与这个宇宙“生成中的规律和必然中的游戏”的方式，是在“众神的大地桌子上掷骰子”。当骰子在大地的桌子上抛出时，大地“战栗着崩裂了”。因为掷骰子是多重的肯定，是对“多”的肯定。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在瞬间完成的。这种力量像火一样，它不是对多样性的压抑，而是对多样性瞬间的肯定。多样性与偶然性是唯一被煮好和烹调好的东西。烹煮并非意味

①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69～73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着取消偶然,或是寻找隐藏在多样性后面的统一性。^①

权力意志是永恒回归的综合原则,永恒回归是这一原则的表达。权力意志是将力加于关系之中的差异因素,永恒回归则是以多样性、生成和机遇的姿态对差异性的肯定。^② 因此,权力意志是一种生成的力量,永恒回归则是一种生成的综合。

James J. Winchester 在《尼采的美学转向:海德格尔、德勒兹和德里达之后阅读尼采》(1994)中指出,尼采自称是“戴面具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高贵的灵魂包含着许多矛盾,他们写作是为了隐藏自我。因此尼采的思想很难懂,可以容纳不同的解释范式。为力图把握尼采的思想,人们不得不转向那些著名的甚或臭名昭著的尼采概念,如权力意志、超人、永恒回归等。其中“权力意志”是尼采论及最多的概念,但是难以有唯一的和最终的解释。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不是学者的人要比专业哲学家更懂得尼采。从美学转向的维度来理解尼采的晚期著作是一条重要途径。美学无疑是尼采著作的一个主题,尼采以其特有的癖性对他所处的文化和思想语境作出了反应。他是抨击各种各样人物和文化现象的游牧侵袭者。尼采并不渴求失乐园,他通过质疑西方思想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而发起了革命。他与海德格尔皆相信,他们的思想标志着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向。^③ 确实,尼采对西方当代思想家,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方面可以寻绎出无数的例证。

第四节 德勒兹与福柯:德勒兹世纪?

福柯和德勒兹皆为 20 世纪西方一流哲学家,是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标志性人物。这两位法国的大学哲学教授之间交往颇深,虽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政见分歧而关系中断,但是他们都一直深切地关注着对方。1984 年福柯

① [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45 页,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 R.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p. 30~31, London: Routledge, 1989.

③ James J. Winchester, *Nietzsche's Aesthetic Turn: Reading Nietzsche after Heidegger, Deleuze, Derrida*, pp. x~xv,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因艾滋病逝世时,德勒兹带着重病在葬礼上致以感人至深的悼词。福柯曾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代表著作《反俄狄浦斯》作序,他关于“20世纪将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至今还颇受同行的嫉妒。德勒兹在退休前专门讲授福柯哲学,并出版了专著《福柯》(1986)。他们都曾受到尼采哲学的深刻影响。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后结构主义反启蒙思潮的主要代表,著名的同性恋者,1984年6月25日因艾滋病去世。他一生著作甚丰,重要的有:《疯癫与文明》(1961)、《诊所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话语史》三卷(1976, 1976, 1984)。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福柯以其《疯癫与文明》而突然跃上学术舞台。……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福柯以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方法、自我伦理学、话语权力论、显微技术等理论闻名于世。其主要研究课题包括疯癫、知识、话语、监狱、性本质等微观的边缘话语(他认为癫狂话语、医疗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都有独立的历史与制度,无法用宏观的、总体的国家与经济话语来解析)。与他相关的一些概念如“人之死”、“全景式监狱”等对当代思想具有特殊的影响。例如,回应着尼采“上帝之死”振聋发聩的呼声,福柯发出“人死了”的断言。

人之死在西方哲学和美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国哲学中,三H,即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在1960~1970年代之前影响过一代人,而新一代人则为另外影响很大的三巨头即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所吸引。在福柯的早期著作中,对尼采和当代法国哲学的三个基本主题——怀疑的阐释学、对语言性质的反思、人的终结——的联系作出了典范性的阐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讨论了人类理性感兴趣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做什么?在他的《逻辑学导论》中,这三个长期的哲学问题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关于这四个问题,康德评论道:“第一个问题由形而上学来回答,第二个由道德,第三个由宗教,第四个则由人类学来回答。不过,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置于人类学之下来考量,因为前三个问题均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康德因此促发了哲学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超人在尼采那里是与“最后的人”一同出现的,福柯的“人之死”就是那个“最后的人”之死,即

那个上帝的谋杀者之死。尼采由此宣告作为一种太严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准承载者的人的消失,被福柯称赞为开创了后现代的知识型,这种知识型将不再把人看作是享有思维与话语特权的中心。

20 世纪 60 年代,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维度在《词与物》中提出“人死了”的概念,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认为“人”的概念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话语,是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兴盛的产物,它是矛盾的,兼具两种职能: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这可以溯源于康德和胡塞尔的学说。但是 20 世纪各种新科学涌现,如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等使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因而“人”就随之死亡。

20 世纪 70 年代福柯以系谱学方法与其 60 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互补并深化思想探索。系谱学研究事物及观念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构成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主张抽象的综合和终极的历史目的,而是倡导差异以及差异之间特定的时空关系。这一点与德勒兹的以生成为核心的差异哲学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福柯认为,不同时代、时空对疯癫、性的不同看法,就构成了对它们的系谱学研究。知识和主体被构成的各种规则包括权力话语与物质机构两个层面:对现代性的研究,仅仅指出主体和人是现代知识型的话语机制的构造物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指出其中的权力机制,即人是如何在诸如监狱、学校、医院、车间和军队等制度中被权力机制规范和塑造成为主体的,规范的手段包括作息时间表、监视措施、规训和奖罚等。1980 年代福柯被认为进入自我伦理学阶段。他最初是热衷于对理论话语和知识型进行考古学研究;继而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系谱学研究,即主体是如何在主流话语实践中被构成和塑造的,其中有着什么样的话语权力机制;最后他转向了对个体同一性的塑造技术的伦理学研究,倡导适度伦理学(审美决定论,人=生活=艺术品)。

福柯在思想取向上与德勒兹、德里达那一代“1968 年思想家一样……深受尼采‘权力意志’影响,认为权力意志是永恒循环流变的,解构与结构是它的双刃。人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这一流变过程中是否存在由低到高的历史进步或



由上到下的倒退,而只能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解‘进步’、‘倒退’等内涵及其形成、变迁的过程”。^①因此,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知识、主体、启蒙和进步等观念与疯癫、独裁、罪恶等观念一样,都是各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并无永恒的抽象形式。

在巴塔耶的影响下,福柯对现代理性及其规范的霸道大加鞭挞,而对那些被理性规范排斥到现代社会边缘的疯子、犯人、移民、同性恋者等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如他的哲学博士论文、成名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5/1961)的意图是写成一部“沉默的考古学”,研讨癫狂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他探讨疯癫历史与文化生成、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世界的真理”。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第一章“愚人船”以中世纪末麻风病在西方世界消失为例,福柯说:“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继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文化)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罗兰·巴特曾经指出:“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②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

① [法]福柯:《性经验史·译者序》,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4~5页以及中译本“后记”,“封底”,刘北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思考现代权力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反对简单地把权力的本质规定成压制,也拒绝权力为国家机器所专属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代宏观理论,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阐发权力的生产性、内在性和微观层面。该书描述了从压抑权力模式向生产权力模式的历史转型。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这部著作的书名中的关键词“Discipline”在英法文中兼有规训和学科的双重意义。换言之,任何学科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因此,权力不止是一种用来惩罚的物质力量,更是一种规训和改造人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措施。规训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纪发生瘟疫的小镇上发展起来。最初是一种监督与隔离病人的方法,不久就迅速应用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一种规范制度。福柯借鉴边沁的概念,赋予“全景式监狱”以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蕴涵,表达这种规训(规驯)的话语与权力的微妙复杂的功能性结合。福柯的《性话语史》^①则试图在详细地引证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一部规训身体(性话语)的权力机制的历史。他对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进行宏观的探讨,剖析外在规训在微观层面被主体内在化的机制,认为权力不仅压抑性,而且还塑造出性和性欲主体来。

刘禾教授曾经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清华大学高级理论研讨班(2001,6)谈及福柯。她认为,福柯非常重视研究档案,他强调权力与知识的关联性。福柯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巨大。未读福柯而做学问有缺憾,可说截然不同。不读福柯则无法做一般思想史研究。他在科学史的具体层面上做,其《知识考古学》前20页排除研究史学的人的传统观念,认为权力绝非自上而下的压制性力量,而是与话语实践、话语事件、话语领域密切结合的东西。福柯的思想路数是:不做思想史研究而做知识考古学——回到原来的语境,解构现在的幻觉——是基于档案文献的理论,而不是空想。他感兴趣的是一种解释何以排除其他的解释,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皆有福柯的影子。福柯犹如一道门槛,跨过了就回不来。福柯在西方是一个学术分野,跨多个学科。说解构论或后结构主义主要研究文本或话语是误解,福柯关心机制形成,并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西方大学不少博士论文选他。就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① [法]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无人能及。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完全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路数：17、18 世纪东方学作为学科出现，构成话语场。学术的转型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无法按 19 世纪形而上学的路数，进行追溯源头、基点的研究，只能研究在何种语境下会发生什么情况，产生何种历史可能性。福柯强调历史的断裂只是一种策略，实欲语境还原。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差异的嬉戏，重视档案文献。档案文献与已经写成的、统一认识的历史不同，一般无统一性，如信件、护照、公文、报刊等等。而历史还原则意味着：①以文献恢复来矫正历史记忆；②文献本身成为关注对象。历史是人为组织和展开文献（记忆）的方式，渗入了权力话语。由此抹平记忆，将一切异己的声音转化为统一于自己的东西。尼采以系谱学反本原，哲学上开启后结构主义思潮。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抵制历史，以断裂、临界的历史语境的还原来质疑充满嫌疑的历史。研究历史排除什么，不排除什么（例如文明理性历史排除疯癫、麻风病人、囚徒）。福柯反基要主义的思维是：不问本质而是追问关于这个东西的知识何以出现，关心的是另一套东西。他不寻求现象掩盖下的真理和字里行间藏匿着的意义，例如，认为索绪尔例句“My name is lion”同时二义，皆明摆着在那儿。他认为词作为物是消失的，因此无法在词之后寻找物和意义。福柯的路数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完全不同，知道了福柯之后无法再做雷蒙·威廉斯式的关键词研究，因为要假设许多东西。索绪尔关注的是“说话的意义”（What is spoken?），而福柯则追问“谁在说话？在何处说话？”（Who is speaking? From where he is speaking?），福柯重视不同话语实践出现的制度性场所，档案本身构成知识的对象。

尽管通常人们都将德勒兹与福柯视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关键人物，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特征的同质与差异却是既显而易见又富有意义的。一方面，他们都质疑、反思正典或传统，致力于建构那些与惯例、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新的思想视界：福柯从权力与知识（话语）的维度，对文明和理性话语掩盖下的疯癫话语，对规训笼罩下的惩罚话语（如著名的“全景监狱”），对现代社会压抑下的“性话语”进行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追溯与考察，用“机构”联结“已说与未说、话语与非话语”；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用机器“装配”的概念表达异

质因素多元化的分衍和无限链接的思想,不同的块茎、褶子、高原不断地被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构成一幅变化多端、异彩纷呈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景观。另一方面,福柯与德勒兹强调的理论基点又颇为不同:福柯以“权力—话语”之论而名重于世,其独特的洞察力穿透重重迷雾,游刃于古希腊、中古、文艺复兴、维多利亚时代、现代诸时空;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欲望”置于“权力”之上,赋予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他们旁逸斜出的思绪比福柯悠游得更远——从地老天荒的原始社会体,漫长的专制宰制历史,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现状,到拟像时代和未来的控制社会,并且以一系列似乎艰涩难懂又富于穿透力的概念给予人们以全新的启迪。

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欲望凌驾于权力之上,坦承:“我们与福柯的唯一区别在于以下几点:①在我们看来,装配首先不是权力而是欲望,欲望总是处于装配状态,而权力则是装配的科层化维度。②图式(或装配的形式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逃逸线,装配中没有抵抗或反拨的现象,而是呈现创造与解辖域化的基点。”^①易言之,欲望之流是第一性的,它装配有机体与无机体、人类与自然、话语与社会,使之成为偶然而变化不定的联合体,并不断地突破这些联合体所建构的边界。其抵抗主流权力形式的倾向并不生发于这些形式本身,而是崛起于欲望超越自身(即解辖域化)的自然倾向。

从福柯与德勒兹、加塔利的关联与差异中,我们可以窥见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影响轨迹。福柯受尼采系谱学方法的启迪,将其与知识考古学结合,研究疯癫与文明史、规训与监狱、性话语等等,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德勒兹则从尼采那里读出了多元、差异、动态、生成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当代学术话语,并为他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大厦奠定了重要基石——尽管德勒兹与福柯都从尼采哲学思想中汲取了丰富营养,但是他们关于欲望与权力的看法构成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差异。

德勒兹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中试图给福柯勾勒一幅画像:他认为已经有了一个福柯中心,聚集着那些在与福柯相近的方向上或按照

^①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p. 8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与他相近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人们。福柯总是被双重性所缠,包括在双重性所特有的相异性之中。德勒兹说,我想摘录福柯赋予双重性一词的含义:“重复、里层、复归、难以察觉的差异、分成两份和注定的撕裂。”它以一种微观分析(福柯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加塔利称之为“欲望的微观政治学”)为前提。福柯曾经写道,他研究的总主题并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是人类主体化的方式。——可是福柯的哲学很难说就是关于主体的哲学。……在福柯的著作中,没有希腊人的回归,更没有主体的回归。福柯这种主观化的思想同他的权力和知识的思想同样独特,这三者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三维的奇异形象,也构成了最伟大的现代哲学(这是一个并无幽默成分的宣言)。

德勒兹认为,在福柯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形式与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他,而且对他的政治学概念乃至认识论概念和美学概念都至为重要。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主张的生命(态)意识或生机论在福柯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这是德勒兹与福柯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上的另一重大差别。

毫无疑问,论及德勒兹与福柯,则无法规避福柯关于德勒兹世纪的预言问题。福柯曾经满怀热情地预言说:“闪出一道光,这一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又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跳跃、舞动……有朝一日,这个世纪或许会成为德勒兹的世纪。”^①虽然我们可以把福柯关于20世纪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看作是“一个反讽式的玩笑,意在调侃德勒兹和煽动起读者的好奇心。然而时至今日,福柯的预言被证明是确切的,德勒兹哲学在应用性和实践方式上,对哲学学科和其他许多主导我们生活的学科、体系和思想习惯已经产生并持续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学科的新的思维方式可称为是德勒兹式的(Deleuzian)。德勒兹提供了原则与结构,教导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②。面对福柯的预言,考察一下当事人德勒兹的看法和德勒兹哲学思想中的未来维度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德勒兹本人的反应或看法。在《哲学与权力的谈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J.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p. 5,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判：德勒兹访谈录》中，采访者就福柯关于德勒兹的这个著名预言引出话题。采访者问：在20世纪60~70年代，米歇尔·福柯和您本人都曾是思想的导师，特别是对一代大学生来说，——尽管你们都不想如此，都竭力避免如此。一天您对福柯说：“您第一个教给我们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无资格代言。’那是1972年，是1968年五月风暴热度未消的年代……这种不代他人讲话的尊严应该属于知识分子。”“就我所知，您从未对福柯关于您的预言加以评论。”

德勒兹回答说：我不知道福柯这几句话的意思，我从未问过他。他有魔鬼般的幽默。也许他想说我是当代哲学家中最天真的哲学家。在我们所有人的著作中，人们都看到了诸如多样性、差异、重复这样一些主题。当人们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时，我却提出了一些近乎原始的概念。福柯经历了各方面的危机，有政治的，生命的，思想的。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总是在危机和动荡中得到发展，我需要他，远远胜过他需要我。我同费利克斯·加塔利的关系是全然不同的，我们长期共同工作，而我未曾与福柯一起工作过。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的工作有着许多共同点，只是由于方法乃至目标的巨大差异而保持了距离。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我处于某种对他迷恋的状态，我佩服他。^①

其次，需要考察的是福柯关于德勒兹世纪的预言牵涉到德勒兹哲学思想中潜在的未来维度问题。这方面，西方学者所谓的“德勒兹思想”的说法，以及德勒兹的亲密合作者加塔利的反应可资参照。Gary Genosko认为，1985年Charles Stivale首先提出“德勒兹思想”问题，意在抹掉或略而不论加塔利。对此，加塔利回应道：我很难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小小的现象后面，有某种矛盾因素。有一种负面意见，有人认为我与德勒兹的合作改变了他哲学思想的形态，将他引到了误入歧途的精神分析和政治的轨道。这些人颇为幼稚简单地否认我的存在，有时提到《反俄狄浦斯》或《千高原》时干脆把我略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恶意。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你会说，长远看来，“德勒兹”会变成一个普通名词。但这不仅是代表他和我的一个普通名词，而且也是代表了一群参与建构“德勒兹思想”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103~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的人,正如多年前我们说“毛思想”一样。“德勒兹思想”确实存在,福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这一点,他以一种颇为幽默的方式说这个世纪会是德勒兹世纪,我也希望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会与吉尔·德勒兹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是指这个世纪将会由某种理论活动的重新装配所构成,这种重新装配是与大学体制及一切形式的权力体制相对立的。尽管并非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福柯关于德勒兹世纪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仍然是一个嗡嗡鸣响的警语,是出版商已经印制好的书籍护封耳页广告(blurb),是代表思想富矿的一种印记,我们可以在现在块茎式和分裂式的互联网和赛博空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鲍德里亚场景”以及60年代麦克卢汉主义早期现象中寻觅到其踪迹。^①在未来正在快速变成现实的当今电子文化传媒时代,德勒兹的空间哲学思想和“无限延伸的褶子”新巴洛克美学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

福柯以其冷漠的思想体系对抗代表着启蒙思想文化遗产的潮流。但是在他洞见呈现的同时也衍生出他的盲点。一方面,福柯能够对现代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规训式的权力提供一种非凡而权威的解释,另一方面,他所勾勒的无所不在的统治权图式是如此的浑然一体和令人信服,以至于展示的是一种无可逃逸的前景。更重要的是,福柯主要关注权力的显微技术(micro-techniques),视之为现代世界中绝妙的社会行为方式,这种看法的排他性显然导致了他与人权、公民自由和生产力领域的潮流不协调。而正是这些潮流为人们作出具体的历史抉择开了伟大的先河。^②德勒兹哲学没有福柯思想那么阴郁,尽管他也对当今和未来的“控制社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忧虑,但是他的生产性欲望概念、不断生成与链接的思想,以及解辖域化与逃逸线等哲学观念都蕴涵着一种特殊的积极流变的精神。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论述^③,明显具有关注未来社会的特质及发展的政治哲学维度,是他关于野蛮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微观政治文化批判的延展。

① Gary Genosko, *Deleuze and Guattar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pp. 1~13,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② 参阅理查德·沃林:《福柯的审美决定论》。见麦永雄:《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3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③ 参见本书论德勒兹与鲍德里亚部分。

第二章

创造概念：德勒兹差异哲学与流变美学

在西方后现代哲学和美学的众声喧哗中，德勒兹是一个不断创造概念的思想游牧者。德勒兹极为重视思想观念史的研究，他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阅读哲学史，认为概念是一种碎片的总体(a fragmentary whole)，“概念的创造是哲学史的核心”。他在《什么是哲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 substance(物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cogito)、莱布尼茨的单子(monad)都是哲学家个人给总体意义上的哲学所作出的重要创新与贡献。德勒兹在论斯宾诺莎的专著《哲学中的表现论》(1968)中指出：“哲学的力量是由它所创造的概念，或它对哲学意义的改变来加以衡量的，概念的创造为我们审视世间事物与人类行为开拓了新的视野。”

如前所述，德勒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各领风骚的时代特立独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读和清算哲学史，与加塔利创造了一系列富于理论特色、内涵丰富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概念。例如生成、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块茎、褶子、分裂分析、欲望机器、文学机器、游牧、无器官的身体、自由间接话语、装配、社会体、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逃逸线、克分子和分子、运动—图像和时间—图像等。C. J. Stiale 在《德勒兹



与加塔利的双重思想》(1998)一书中指出,德勒兹的这些理论概念有如一套裂环(split rings),你可以任意把它们互相组合,产生出富于变化的、创造性的、多元化的结果。

观念的历史即是问题的历史,反之亦然。德勒兹对哲学和美学思想观念的创造不仅仅是提出一些特色斐然的新术语,更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不同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哲学范畴)众多问题的积极反应。哲学创造的概念颇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概念,不仅仅是以名附实或给事物打上一个标记,更是为思想的发展生成一个方向。创造一个新的概念,不只是给一种语言加上一个词,它还转化了语言乃至思想的整个形态。概念不是为现实贴标签或将现实系统化,因为生活本身并无秩序或固定的存在,是概念创造了秩序。因此,对德勒兹和尼采而言,概念应该是积极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词,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造。德勒兹对语言和概念这种颇为特殊的理解,与常人的观念和众多新近的文学理论大异其趣,甚至格格不入。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的阐释,却是一项勉为其难而且违背德勒兹精神特质的悖论式的工作。阅读他的著作既充满困难又富于挑战的意趣。霍兰德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1999)中对他们最负盛名的著作评述道:《反俄狄浦斯》并非易读之作,任何习惯于标准批评话语的人,如果想把一切都置于界说清晰的位置并加以盖棺定论的话,则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话语的形式与旨趣皆变动不居、纠缠不清,颇令人困惑。他们的著作中现代理论数学与原始神话共存,遗传密码的符号学与金融资本的级差计算携手并行。稀奇古怪的术语如无器官的身体(body-without-organs)和费解的形象如飞砖(flying bricks)突然出现却不加解释,然后又常常同样莫名其妙地倏忽而去。无怪乎不少英译者称此书为“谵妄的体验”。但实际上《反俄狄浦斯》却是精心构思的。德勒兹比德里达更善于使概念与隐喻互渗。例如其“欲望机器”不单是隐喻,它还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利比多”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联系起来。这种概念联系富于活力地贯串全书,是他们所倡导的分裂分

析的核心。^①

德勒兹与加塔利是有意挣脱和抵抗既有的或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的思想家,我们在试图阐释他们的思想观念时常常会感到一种悖论式的言说困窘,因为任何将他们的开放性和增殖性的思想观念缩减成为封闭和僵硬的系统的理论努力,都是违背他们的思想实质的。任何企图界定其关键术语的实践,都是与德勒兹差异哲学生成论的精髓相悖立的。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探索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的内涵以理解他们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特征。“人们不得不把德勒兹每一个术语和概念的解读作为差异思维的挑战。德勒兹的‘难点’在于他的著述力图攫住(而不是完成)生命之混沌。因为没有任何系统或词汇能够恰如其分地再现生活之流。”“德勒兹的著作之所以不易解读,还在于其术语无法脱离其总语境而加以界定。”但是“如果把德勒兹置于这种语境中——我们据此去解释他的概念是如何而来或是如何对抗某些主流概念的,那么这却是‘非德勒兹’(UnDeleuzian)的了”^②。在此悖论式的背景下,本章拟尝试性地择取德勒兹及加塔利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几个重要而富于特色的概念试着界定与阐发,以探讨其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节 “差异”论哲学图式:千高原、块茎、褶子和机器

一、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题旨的研究中,《千高原》和《反俄狄浦斯》是姐妹篇。《千高原》是总览德勒兹与加塔利思想观念的一条颇佳的途径,且在文化研究中亦具有重要性。

千高原中的原(plateau)一词出自乔治·巴特森(Gregory Bateson)一篇论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文化的论文,与性高潮有关。作者在巴厘文化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高潮式取向的一种利比多经济学。巴特森以此词描绘一种特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1,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4, 8, London: Routledge, 2002.



殊的状态:指避免臻于高潮点的一种强度的持续、自振动之域。在巴厘文化中,母与子的性游戏和男人之间的争吵都会注意保持这种奇特的强度稳态化。“某种持续的强度之‘原’取代了(性)高潮到来。”^①中国国内多将此书名译为“千高原”,强调其“强度的稳态化”的特质,但易引发关于“高潮”的联想,似乎多少有悖于此义。本书尊重语言约定俗成的惯例,从之。但认为这一关键词也可译为“千面原”,以图展现德勒兹和加塔利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强调“居间”(in-between)而非“高潮”的观念。不同于基要论的开端与高潮式的终结,“居间”是风姿多彩、变化生成的平台;“千面原”既可指高原,也可指平原,有参差不齐、气象万千之意趣,当更切近德勒兹/加塔利哲学和美学的要义。“平原”与“高潮”之分,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中,不仅是性取向之分,也是文化取向和思维模式之分。

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具有汪洋恣肆、放纵无羁的风格,是一部颇为特殊的著作——高低不同的千面高原之间隐伏着众多新颖的概念与崎岖的思路。千高原展示了一个充满差异与联系的大千世界,以供思想的骏马驰骋或游牧。这部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点令人惊讶,作者以地理学上的“原”(高原抑或平原)的概念取代一般书籍中“章节”概念,其目录设置颇为独特。全书15原(章)中,并无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排序,例如,第一“原”即导论介绍“块茎”观念,第2~14“原”分别是以某个年代(1914; 10000B. C.; 1923; 587B. C. — A. D. 70……)为标志,构成讨论问题的思想平台或供思想游牧的千面高原。各章之间犹如“块茎”,没有编年史和次第等级的轨迹可寻。因此《千高原》呈现出“高原的网络”,虽然标明了日期,但是这部著作中的15个“原”的聚合可以让读者从任何系列开始介入阅读(除了“结论”应该在最后读之外)。每一个原构成一个“一致性的平台”——这是一种异质因素共享的平台,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选言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关系,即对差异的非逻辑合并,从而保证了它们质量的而非数量的多元性。这些异质因素通过在此平台上的生成、嬗变或变形黏合在一起,其量或质的任何变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p. 22, 158,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化都会引起其多元性的质变。在每一个原内,各种概念在构形和拓展,并随着追溯它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话语的踪迹而变化。例如在14原,光滑而平行的条纹空间概念通过对布纹、音乐、海战兵法、数学、物理、艺术史的研讨而得到精致详尽的阐发。11原展示了音乐领域和动物生态学中的迭句(the refrain)概念。10原在恐怖电影、小说、萨满教、士兵的迷信、音乐、艺术和哲学的讨论中揭示生成(becomings)的蕴涵。不同的“原”互相交叉、巧合,并且一一分支发展,提供了多元互联的共振域。

更重要也更为特异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写作这部著作的运作模式(modus operandi),他们在《千高原》中对某一题旨或概念的论述具有兴之所至、随机生成的特点: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原”中或写一句,或写一段,或写一页,随机修改,但又到处留下文本生成的踪迹。德勒兹和加塔利《千高原·导论》在介绍“块茎”概念时把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描述成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多元生成的状态:“我们两人共同撰写《反俄狄浦斯》。鉴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几个人,因此已然是相当多的一帮人。……我们一直是互相帮助、互相鼓舞、互相多元化的。”^①“我们将此书《千高原》作为块茎来写作,它由原构成。虽然我们曾经要赋予它循环的形式,但那只是开玩笑。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各自都会问一下,今天打算对付哪一个原,这里写下五行,那里写下十行。我们曾经有过幻觉体验:看见一行行字离开一个原走向另一个原,犹如一列列小蚂蚁。”^②由此,该书的内容与形式皆呈现了真正的多元性,并非是单一主题的创作。其概念、谋篇布局、词汇、节奏、声调既是独特的,又是复合的,开放的,是一种可辨识的多元之声和思想,无法归纳成任一作家的个人风格或仅仅是两人的并置。既非德勒兹,亦非加塔利,而是糅合的,甚或是魔幻式的德勒兹和加塔利。^③这种千高原最适于思想者自由无羁的游牧。

德勒兹把《千高原》称为一部“概念的书”,“哲学研究概念,一个系统就是一整套概念”。《反俄狄浦斯》中的一些概念在此有了更丰富的拓展。德勒兹

① 本节凡以括号标明页码的皆属于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一书。

②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和加塔利还大量使用了一些与科学共鸣甚而相通的概念:黑洞、白壁、模糊总体、邻域、黎曼空间……他们借用现代物理学的黑洞概念,描述了一些吸入而不复吐出的空间。德勒兹认为有些科学概念同属于学者、哲学家、艺术家。比如说柏格森对精神病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一些概念同黎曼的数学空间和物理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德勒兹强调:“哲学总是注意概念,搞哲学就是试图发明和创造概念。概念应该说明事件,而非本质。这样就有可能将十分简单的小说的方法引入哲学。……这是一部哲学著作,既是一本难懂的书,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只要人们需要它,渴望它,它便是一个打开的工具箱。这本充满了科学、文学、音乐、人种学迭句的书,力图成为一部概念的著作。它在行动,在强有力地行动,这是押在将哲学回归为快乐的学问上的一个赌注。”^①阅读此书也犹如你听录音磁带,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快速略过其中一段。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思想认为,概念犹如砖块,可以用来建筑思想大厦。如果不合用,则可以扔出窗口。概念的砖块之喻挑战表达领域中的三种人为的区分,即主体、概念与存在。砖块跟环境有关,很难确定是主体抑或客体。概念既非主体亦非客体,它就是它自己,是运动。游牧思想以开放的表达式取代传统封闭的表达式:不再是“ $x=x=\text{not } y$ ”(我=我=非你),而是“ $\dots+y+z+a+\dots$ ”(…+手臂+砖块+窗户+…)。不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化成为某种秩序,不将多简化为一。千高原的开放性揭示了一种无限链接、变化多端的巴洛克美学图式。

二、块 茎(Rhizome)

翻开《千高原》,其“导论”开宗明义地对“块茎”的概念加以阐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概念与千高原概念有内在精神联系,它们都强调多元生成的后结构主义状态。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块茎是指在土壤浅表层匍匐状蔓延生长的平卧茎。在日常生活中,块茎令人联想到马铃薯或红薯之类的植物。但是,这一术语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中具有更为殊异的哲学和美学含义。尤其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9~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是在《千高原》中，块茎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隐喻。它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树状或根状(rootedness)模式。

块茎(如藤和草之茎)的生态学特征是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它们斜逸横出，变幻莫测。树状模式则具有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的特征。N. Lucy 在《后现代文论：导论》(1998)中认为，我们可以确认树的不同部分(如叶、枝、干、根)，但无法如此辨认块茎；原则上一粒草籽可以块茎式地蔓延生长，直至覆盖整个星球的莽原，而一棵树显然总是立足于一点。故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视块茎为“反中心系统”的象征，是“无结构”之结构的后现代观念的一个例子。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这种逃逸线(反对固定的原点)是典型的反中心或游牧思维的体现，与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恰成对照。^①在此意义上，块茎和树状模式不再是生物学概念或文学隐喻，而是一种思想挑战和哲学实践。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块茎”中论及三种类型的书，第一种是树根之书(root-book)，树是既有世界的意象，或者说，根是世界之树的意象。这是一种经典之书，高贵、富有意义，有主题的内在性(书的层次)。这种书模仿世界，犹如艺术模仿自然。其律则是反映论和一分为二论。“不管我们何时遇到这种一分为二的公式，甚至是毛(泽东)富于策略性地以最为‘辩证’的方式所阐述或理解的公式，我们面前的仍然是最经典、反映最佳、最古老、最软弱的思想形式。但是大自然却并不以这种方式运转：在大自然中，树根皆为带有多元性的主根，是一个斜逸旁出的分叉循环系统，而不是二元划分的系统。思想落后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种二元逻辑是根—树的精神现实。可以说思想从未抵达理解多元性的境地。自然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一生发出三、四或五……

第二种是胚根系统或簇根(radicle—system, or fascicular root)之书。这是现代性所服膺的形式。在现代，树根的原则夭折了，或者说，其末梢遭到了毁灭。第二性的根嫁接到其上，获得了繁荣发展。此时，虽然自然现实使原则

^① N.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 186,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性的树根夭折了,但是根的单元仍然存活了下来。簇根体系并未真正地与二元论决裂,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补充物。但是世界也失去了其单一性;主体(主题)甚至也不再能够二元划分,而是进入更高的统一性,即含混的或多元决定论的统一。

第三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集中讨论的块茎(rhizome)之书。块茎在地下匍匐衍生,既不同于树根也不同于簇根,它从多元性中排除唯一性($n-1$)。作为地下茎的块茎,是无法用树根的单一性加以一分为二的辩证逻辑分析的,也无法用簇根的多元决定论加以界定的,它本质上是不规则的、非决定性的、无法预料的。块茎普遍存在于世界:鳞茎、薯茎是块茎,“老鼠是块茎,洞穴也是块茎,它们表现出隐蔽、运用、侵入、外突等功能。块茎本身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分叉的层面向四面八方衍生,结出大小不等的鳞茎和球茎。群鼠奔突之际亦是互相挤压冲撞。块茎包括了最好和最差的东西:土豆和野草”。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概括出块茎的几个特征并加以讨论。简述如下:

第一和第二个特征——联系性和异质性的原则。块茎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其他的点联系起来。这与仅仅置入一个点并且固定住秩序的树木或树根极为不同。基于乔姆斯基模式的语言学之树仍然是以一个点S开始的二元划分过程。相反,块茎的所有特质未必与语言学特征相联系:其自然的符号链是与形形色色的符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模式)相联系的,不仅与不同的符号体制嬉戏,而且还表述了不同的情境中的事物。块茎具有“机器装配中直接的声音的集体装配功能”,“块茎持续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的组构与关涉艺术、科学、社会斗争的环境之间建立联系”。语言本质上是异质的现实。树根类型总是有系谱或中心论的蕴涵,而块茎类型则把语言去掉中心并且置入其他维度。

第三个特征——多元性原则。

第四个特征——反意义的裂变的原则。

第五和第六个特征——制图学与贴花的原则。这个特征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与任何关于发生轴和深层结构的思想观念区分开来。

树的所有逻辑都遵从轨迹追溯(tracing)与枢轴式的再生产的逻辑,可以采用从叶循树的等级制的追溯模式。块茎则与此殊异。它是图式而非轨迹追

溯。蜜蜂采蜜时为兰花授粉,但兰花并不再生产能够追溯的蜜蜂轨迹;兰花在块茎中建构了与蜜蜂相关的图式。图式与轨迹的区别在于图式与现实生活体验相关联,不再复制封闭的无意识,而是建构无意识。图式本身就是块茎的一部分,具有开放性,可以与多种维度相关联(兰花可以与蜜蜂、蝴蝶,甚至其他小昆虫相关联,同样形成图式),可以被撕裂、颠倒、修改。

块茎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总是有多元的入口,这与树状的追溯相对立。树状追溯总是回到同一。在此意义上,洞穴是动物的块茎,其中可以分出作为过道的逃逸线、储存仓库和生活层面(如麝鼠洞穴)。树(根)与块茎也可以互为生成。块茎与欲望的关系是:欲望在块茎中搅动不安,不断生成;而块茎一旦变成树木,则欲望死亡。逃逸线造成新的联系。因此,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图式—轨迹、茎—根的装配,带来变化多端的解辖域化维度。乔姆斯基的句法模式向任何方向开放,因此也构成块茎。荷兰的名城阿姆斯特丹纯粹是无根之城市,是个块茎之城,有发达的块茎状运河。从游击队的军事逻辑而言,战争也是块茎。我们已经厌倦了树,应该停止相信树、树根和簇根。思想与大脑亦非树状的,但是众多的人头脑中却长着树;大脑本身是多元性的,是草而不是树,记忆也复如此。长期记忆或有组织的记忆(家庭、种族、社会和文明)是树状的,具有中心化特征,激发起模仿等级制和主体化的令人悲哀的思想形象。短期记忆则是块茎或几何图式,不归连续性规律所管辖,可以远距离、长时间之后出现或回归,具有非连续性、断裂、多元的特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著名的“不由自主的记忆”就是这种记忆,它使得椴花茶、玛德莱纳甜点心与叙事者关于故乡索多姆的鲜活回忆刹那间融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创造性审美体验)。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实践都建立在无意识专制的概念上,将无意识归于树状结构和等级制图式,视之为记忆的重演,核心官能,菲勒斯中心或菲勒斯之树。精神分析总是有将军或领袖,如“弗洛伊德将军”(拉康的精神分析则表现出“能指的暴政”)。分裂分析则相反,视无意识为非中心的系统,即块茎。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西方与东方的思想文化模式的差异,也可以概括为树状模式与块茎模式。树状模式宰制了西方的全部思想与现实,西方与森林有特殊的联系。东方殊为不同,与平原、花园(或沙漠与绿洲)密切相关。树不



但植入了西方人的大脑中,也“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中,甚至把性别僵化和科层化。我们已经失去了块茎与青草”(18)。

块茎的概念可以总括如下:块茎是由“原”构成的。而“原”总是居于中间,既不在开端,也不在终点。块茎不像树木与树根,它将点与点任意相连接,也难免将不同的特性相联系。块茎激活极为不同的符号体系,甚至激活非符号状态。块茎既不能归结为多,也不能简缩为一。块茎不是一生二,或者一生三、四、五等等(反老子本原思想)。它不是源于一的多,或在多之上加上一($n+1$)。它不是由统一的单元所构成,而是由多维度或多方向的运动构成。既无开端又无终点的块茎居中而生长、播散,构成了网状的多元性,具有 n 个维度。块茎既无主体又无客体,可以衍生出一个一致性的平台,也可以从块茎的多元性中抽出($n-1$)。当多元性改变维度时,其特质亦改变,产生变形。块茎与结构不同,结构由一系列的点和位置构成,点与点之间,位置与位置之间具有二元对位关系。块茎则仅仅由线构成:其维度的环节与层面之线和逃逸线,可以使块茎达到最大限度的解辖域化——多元性由此而形变和质变。块茎是反系谱学的,是短暂的记忆或反记忆。块茎是生产机器,它通过变异、拓展、征服、捕获、分衍而运作。块茎图式永远可以分离、联系、颠倒、修改,是具有多种入口和出口及其逃逸线的图式。

树根和簇根模式是具有中心或多中心的等级制系统,有前设定的途径和交流方式。与此相反,块茎是反中心、非等级制、非意义的系统,没有领袖或将军,没有组织化的记忆或中心自控器。在块茎中,不仅性别关系受到置疑,而且所有的动物、植物、世界、政治、书籍、自然事物与人工制品关系都受到置疑——这一切都不同于树状关系:一切皆生成。(21)

树状逻辑宰制了近代西方几乎全部的思想与现实性。长期以来,主导我们认识世界、评判事物的思维模式是这种严谨整饬、主从有序(tree思维模式,我们围绕着树干或中心,将亟待理解和研究的对象加以辖域化或画地为牢,循序渐进地去把握它们。与此相反,德勒兹倡导的是一种块茎思维模式:不把事物看成是等级制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系统,而是把它们看作如植物的块茎或大自然的洞穴式的多元结构或可以让思想的骏马自由驰骋的千高原。德勒兹注意的不是辖域之间的边界,而是强调消解边界的逃逸线、解辖域

化。流变思维是其哲学和美学的核心。

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反基要主义和反中心主义的语境中,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千高原和块茎概念在精神实质上与鲍德里亚的拟像(simulacrum)概念相通。树木和原型形象是基要主义、中心主义和血统制的,而块茎和拟像则是逃逸的、离散的和联盟性的。树木强调系动词“to be”,而块茎的构架则依赖于连词“and...and...and...”。后者具有动摇和颠覆前者的力量。你往何处去?你从哪儿来?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因此成为完全无意义的问题。块茎所建立的是一种 AND(链接)的逻辑。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属于后现代主义一脉,他们抨击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切既有的概念与范畴,是一种反启蒙理性的极端的十字军东征。^①《千高原》的语用学实为语言政治学,块茎逻辑具有反基要主义的特质。块茎作为一种异于树根的思想文化隐喻,呼应着德勒兹和加塔利所颂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分裂症的游牧思想。

三、褶 子(Fold)

由德勒兹差异哲学所衍生的“褶子”(法文 pli,英文 fold)概念是德勒兹所著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1986;英译本,1993;中译本,2001)一书中所阐发的关键概念,也是德勒兹整个哲学体系中重要的概念之一。可以说,褶子思想贯穿着德勒兹的全部著作,尤其是在他关于福柯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对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了颇为精彩的阐发。

褶子既是一种无所不在但人们却熟视无睹的现象,又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思想传统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蕴涵着后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图式和审美范式,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总括而言,德勒兹的褶子思想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褶子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及其与巴洛克风格的关联性。褶子以及其丰富的形态出现在外部宇宙和内心世界之中。迷宫就是典型的褶子。书

^① N.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 190,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页、光谱、音阶、青丝华发、年轮、日本折扇、中国故宫、希腊神殿……是褶子，大脑也是皱褶式的。小到微粒，大到宇宙，无处没有褶子。其实，活生生的世界就是一个美丽而浩瀚的褶子。褶子象征着差异共处、普遍和谐与回转迭合。^①哲学家德勒兹认为“巴洛克风格由趋向无限的褶子来定义”^②，他通过独具一格的思想过滤，精彩地读解了莱布尼茨哲学“单子”论中蜿蜒曲折的褶子之谜，创造性地把褶子概念与欧洲文化中的巴洛克风格以及游牧美学联系起来。

从词源学来说，巴洛克(baroque)一词的来源是富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它来自意大利语“barocco”，意为奇崛、夸张；也有人认为它来自西班牙语“barrueco”或者葡萄牙语“barrocco”，意为形状不规则的、奇特的珍珠，引申为珍奇和奇妙的意思。传统上认为巴洛克代表着17世纪一种欧洲文化艺术风格，在当时欧洲的建筑、雕刻、绘画，乃至其音乐和文学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巴洛克在文艺上指奇崛夸张、繁艳的藻饰，花团锦簇的风格，以富丽繁复、精雕细刻为特点，意味着奇异、变幻，标志着被压抑的激情的异化，显示出动态、戏剧性、追求无限、虚实一体、色彩与光线的明暗反衬等艺术特色。例如凹凸不平的图形，富于装饰效果的涡旋，建筑上单柱变成双柱，园林中水花飞溅的喷泉，等等。

德勒兹《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一书的英译者认为，德勒兹的这部著作可能是研究巴洛克的最大胆的思想探求，它以褶子为特定意象，贯通艺术史、科技、服饰、数学、抒情诗、美学史、音乐诸领域。这部著作可能是德勒兹所有著述中最具个性、感性和原创性的著作之一，犹如作者毫无矫饰地与老朋友在咖啡桌边闲谈，同时它又不失于艰深，其潜在读者应是饱学之士。在德勒兹看来，“莱布尼茨恰好是当之无愧的巴洛克哲学家”，“巴洛克的体验蕴涵着褶子的体验”，极富于当代性的“莱布尼茨是思考关于重褶、涡旋和纽结表面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③

褶子的第二个特征是它能够从哲学、神学和美学等维度对一与多的命题

① [法]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37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 [法]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33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③ Gilles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xi, (“Translator’s Foreword” by Tom Conley), London: University Minnesota Press, 1993.

进行独特的阐发。在西方哲学和美学领域中,“一”与“多”是一个经典命题,而德勒兹的褶子论则是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对此命题的一种当代哲学和美学的反思。德勒兹在《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巴洛克风格与本质无关,而与运作功能、与特点相关。它不断地制作褶子。褶子这东西并不是巴洛克风格的发明:已有来自东方的各种褶子、希腊的褶子、罗马的褶子、罗曼式褶子、哥特式褶子、古典式褶子……但巴洛克风格使这些褶子弯来曲去,并使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直至无穷。”^①而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维度来说,从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到莱布尼茨,都曾经从数学、哲学、神学等维度来阐释“一”与“多”这个经典命题。例如,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无门无窗,与其说是粒子,不如说是斗室;单子是最简单的数,或者说是无穷的倒数 ∞ 。倒数的特性在于它是无穷大的或无穷小的,是世界之镜和上帝的反向形象。而上帝则是无穷倒数之上的唯一 $\frac{1}{\infty}$ 。^② 单子因此构成了一种美的和谐。身与心形成褶子,两者不断地折叠、展开、重折,构成一个皱褶式的双重世界。德勒兹认为“单子”是莱布尼茨对形而上学视点的灵魂或对主体的命名,是他从新柏拉图学派借来的概念,以表达包裹着“多”的“一”的状态。这个“多”将“一”以“级数”的形式展开。单子中的“一”具有包裹(打褶)和展开(解褶)的潜能,而“多”则既与其被包裹时所形成的褶子(fold)不可分,又与它在被展开时所呈现的解褶(unfold)不可分。每一个单子都将世界作为一个无穷小的无穷级数而包含着它。“单子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但是“世界不能离开表现它的单子而存在”,因此,“每个单子的深处是由无数个在各个方向不断自生又不断消亡的小褶子(弯曲)所构成的”,单子是世界的微知觉,“是这些在各个方向上的小褶子,是褶子中的褶子,褶子上的褶子,依据褶子的褶子,是昂塔依的一幅画,或者是克莱朗博的有毒幻觉。正是这些模糊、混乱的微弱

① [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4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 单子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印度文化中“因陀罗之网”的隐喻。因陀罗是古印度文学中的天神之王,因陀罗的网上缀满熠熠生辉的宝石。每一颗珍宝自身光华灿烂,同时又映射出其他宝石的绚丽光辉。而从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来说,世界由无穷单子(宝石)构成,但是任何一粒单子或宝石都映照出上帝唯一之像。从而构成“一”与“多”的既隔又通的微妙和谐关系。



知觉助成了我们的大知觉和我们有意识的、清晰明确的统觉……”^①德勒兹所论的褶子与巴洛克风格都是具有反复折叠的“复调”式特征的世界,充满着自律与互动,既有上帝式的、总体性的、全球化的统合,又有无限延展、流变和生成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是统一性与多元性共存的平台,是繁复多姿又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千高原,足以让思想的骏马游牧。

褶子的第三个特征是它蕴涵着全息论和活力论的思想,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褶子体现了类同于现代全息论的内涵:打褶与展开褶子(fold-unfold)已经不仅仅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拉紧一放松,挛缩一膨胀,而且还意味着生命意义上的进化一退化;生命被打褶进入一粒种子之中,种子之褶的展开可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动物都有异质和异形两重变化,比如蝴蝶折叠成毛虫,毛虫伸展为蝴蝶”^②。褶子的哲学概念特别地使得德勒兹对人类主体性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反思,并最终导致他思考主体性生产和非人类形式问题。褶子并不局限于人类世界,生态链、生态圈乃至宇宙万物皆充盈着生命与动态的褶子。德勒兹的差异哲学观念否定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实体的生命体悟或功能,蕴涵着活力论(生机论)的美学思想。

褶子的第四个特征是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关于异质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论与审美论图式。这有助于理解当今文艺美学理论建设中颇为重要的异质文化与美学之间的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问题。德勒兹在《褶子》中描述道:“由于物质的各个部分在不断地分解,它们必然在一个旋涡中又形成数个小旋涡……物质因而呈现为一种有无数个小微孔的、海绵状或有孔洞而非虚空的物体结构组织,总是一个洞里还有另一个洞;每个分离体,无论它有多小,都包含着一个世界……整个宇宙仿佛‘一汪物质的池塘,它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波浪和水纹’。……如同洞中有洞一样,总是褶子里还有褶子。物质的统一性,即迷宫的最小元素是褶子。”“莱布尼茨的单子屈从于两个条件:闭合与拣选”,“莱布尼茨的信徒博尔赫斯曾援引一个中国建筑学家崔朋的构想,创作了‘曲径分叉的花园’:一座巴洛克式的迷宫,其无穷级数或者收敛或者发散,构成了一个时

① [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279~28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 [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5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间脉络,它包含着一切可能性”,“而对怀特海(以及许多现代哲学家)来说,分叉、发散、不可共存性、不协调性均属于一个杂色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可以引申说,作为杂色褶子的大千世界是巴洛克式的迷宫,是充满孔洞的海绵,孔洞之间有可能贯通,也有可能闭合;不同的文化、美学、诗学、文学既是莱布尼茨式的单子,有自身的属性、空间与非通约性,同时又具有游牧、拣选、分叉、流变的可能性,具有褶子之间的可通约性。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论美学提倡异质事物之间的化生。例如,他们一个著名的例证是蜜蜂与兰花(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化生与共赢:繁殖后代的驱动力导致了两者的邂逅,蜜蜂采集花粉养育后代的同时为兰花授粉,由此孕育了勃勃生机,而这种化生却不能机械地追溯其生命的轨迹,而是有如中国诗学所追求的境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由此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代异质文化与美学之间的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问题。

褶子的第五个特征是其具有对主体性问题加以解辖域化的理论价值。事实上,褶子在某种层面上是对正典主体性理论阐述的一种批判,这种理论阐述简单地假设了某种主体与客体、内在性与外在性(现象与本质,或者表层与深层)关系,而褶子论则认为内部无非是外部的一种褶子而已(德勒兹称之为“将内部打褶的外部诸力量”,并认为“内部总是外部的衬里”)。德勒兹给我们提供了福柯关于这种关系的生动的例证,文艺复兴时期被用船放逐到海上的疯子变成了一个逆旅之客,或者是一个置身于外部的内部的一个囚徒——这是大海的褶子(他是“最自由最开放环境的囚徒”)。在德勒兹关于福柯的描述中,这种图式更趋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褶子模式:从我们物质自我的褶子到时间的褶子,或者简言之记忆的褶子。确实,我们可以把主体性理解为这些五花八门的褶子的一种拓扑学。拓扑空间使得最遥远的外部与最深层的内部发生联系。^②德勒兹认为,褶子一直贯串在福柯的著作之中。知识、权力和自我是福柯思想的三大本体论(我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什么?),可以与康德关于主体的三大问题相提并论。福柯“不研究私生活史,而研究私生活条件

① [法]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52~154,362,242,27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 A.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p. 10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1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史……他不研究主体史,而研究主体化的过程史,它处于褶皱之下,褶皱在本体论领域和在社会领域一样发生作用。……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福柯又重新提出”,知识技术、政治权力和伦理自我,在福柯思想里折叠。褶子就是差异与重复。“倘若褶子和展开不仅赋予福柯观念的活力,而且使其风格本身富有生机,这是因为它们构成一门思想考古学。”^①德勒兹在《福柯》一书中指出,人居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内部,其中时而是无限的褶子,时而是有限的褶皱。主体化由褶皱而产生,有四种主体化褶子:一是肉体与快感的褶子,二是势力关系的褶子,三是知识与真理的褶子,四是外部自身的褶子。^②主体不是单一的、固定的概念,而是多元交迭的、动态流变的游牧主体,其功能与意义随境而生。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德勒兹创造性地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褶子概念与巴洛克风格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了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特色的游牧美学。C. V. Boundas 和 D. Olkowski 编著的《吉尔·德勒兹与哲学戏剧》指出:褶子的特质在于它有三重套叠:①它是一个反外延的多元概念,一种迷宫式的复杂性的多元表达;②它是一种事件或一个反辩证的概念,是让思想与个性互相“分层”的操作者;③它是一个反笛卡儿(或反拉康)的主体概念,是绝对内在性的一种“传播”(交流)形象,既与世界等同,又是审视世界的一种视点。^③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攫住生活,强调活力论:生活本身既是整体的,又是富于差异的。德勒兹在《褶子》的最后一章以“新和谐”为题旨,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monadologie)进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思想过滤,提出以游牧论(nomadologie)取而代之。虽然这两个术语在法文中只是拼写上调换了m与n的位置,但是却意味着从“单子”的闭合与拣选的世界中延展出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德勒兹说,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折叠方法和新的包裹,但是我们依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信奉者,因为所涉及的仍然是折叠、解褶、再折叠。^④

① [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20,123,13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 [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1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③ C. V. Boundas & D. Olkowski, *Gilles Deleuze and the Theater of Philosophy*, p. 5 New York:Routledge, 1994.

④ [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36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数字化时代,传媒技术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导致超褶子与(新)巴洛克美学成为新的现象与前沿学术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德勒兹的褶子论不啻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德勒兹在关于福柯的著作“附录”中提出了超褶子(the superfold)的概念,将目光朝向了未来世界。德勒兹认为超褶子由三种未来褶子所促成:一是分子生物学的褶子,或者遗传学基因密码的发现;二是硅碳结合的褶子,或者第三代机器(电脑)的出现,即控制论与信息论技术的出现;三是语言的褶子,或者“语言内部的奇异语言的揭示”,这是一种存在于语言限度内的反类型、反意义的表达形式。这些褶子导致人类转向非人类的开放空间,从而生产出新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生产出新的生命体和新的主体性。譬如,哈拉维(Donna Harraway)所提出的赛博人(cyborgs,人机一体者),以及曾以“新的共产党宣言”之誉而轰动一时的《帝国》作者哈特与奈格里笔下的“新野蛮人”,都是政治哲学意义上新异的主体。^①在当今后地理、后历史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中,数字成像可以让已故的艺术大师和当红的流行歌星、画苑大腕甚或普通票友同台献艺,数字装配可以使本雅明关于艺术作品“祛魅”的文艺美学理论显得过时,因为充满着复制、类像与拟真的多媒体的电子传媒技术可以使作者、读者、观众、听众、网民、受众、分众之间实现真正的互动与艺术创造,从而让艺术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光韵”复现,将现代性空间的解魅化合乎逻辑地转换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数码美学的“复魅化”。^②

四、机器(Machine)

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机器的概念受到重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曾经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发展了列宁著名的“国家机器”的概念,而贯串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著作并且与他的时间哲学相联系的一个关键概念也是“机器”。在德勒兹看来,机器本身没有主体性或有机论的中心,它不过是一些装配、联系和生产,是解辖域化或生成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① A.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p. 105,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麦永雄:《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原载《文艺研究》,2006(6)。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力图摆脱正典的人本主义和有机论模式,他用机器的概念描绘一种内在性的生产图式:不是某人产生某物,而是生产链接生产,强调的是一种无根基的时间与生成。从德勒兹对文学、电影、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等论述中都可以看到机器概念的重要性。由机器衍生出来的文学机器、欲望机器、战争机器等概念,成为德勒兹及加塔利哲学和美学思想表述的一大特色。

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运用机器、装配、联系和生产等一套术语来分析问题。在《反俄狄浦斯》中,他们坚持认为,机器不是一种隐喻,而是一种生活之流和思想机制。机器的概念对于德勒兹伦理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否弃了基要主义的超验上帝和主体观念或评判标准,意味着事件的不断链接与生成的不断更新,凸现了链接(and)的内在性的经验逻辑。机器概念与有机论、机械论颇为不同:有机论意味着捆绑在一起的整体,有其身份认同与所追求的目的。机械论意味着一种封闭的机器,有着其特定的功能。而德勒兹式的机器除了它的联系以外什么也不是,它不由任何事物构成,也不为任何事物服务,它没有封闭性的身份。由此可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器观具有一种特殊的反传统的意义。以自行车为例,它本身显然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目的或意图。只有当它与其他机器(例如人类的身体)联系起来时,才能得到定位和发挥功用;而不同的机器只能通过相互联系才能导致生产(生成)。人体与自行车这种机器相关联时,人才变成骑自行车者,车轮才变成交通工具。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不同的联系产生不同的机器。当把自行车的车轮放在画廊中时,它则变成一种艺术品。人与其他机器的联系也一样:当骑车人的身体与画笔相关联时,人就变成了“艺术家”。^① 生活既是机器联系的一种不断增殖,生活也是一种时间之流或生成之流。

德勒兹由机器所衍生出来的“装配”的概念指涉一种多元性,它有很多异质的维度,不同维度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跨越不同的年龄、性别和辖域,又有自己的特质,因此,装配是一种复合功能的统一体,是一种共生和共振。它从来不是等级制的血统,而是不断链接的联姻、合金。机器装配一面涉及“层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2, London: Routledge, 2002.

面”，一面涉及“无器官身体”（关于“无器官身体”的概念，请参见下一节和第四章有关内容）。

在哲学维度，千高原、块茎、褶子、机器诸概念实际上从多方面构成了德勒兹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系列图式，它们充分展示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强调生成、差异、开放、多元、流变的思想特征，是他们对社会、历史、文化、主体、女性、心理、美学、语言符号学等既定辖域加以解辖域化及再辖域化的基础。

第二节 “生成”论美学意蕴：游牧、解辖域化、无器官身体

一、生成(Becoming)论

在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生成”论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甚至被认为具有后结构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德勒兹“生成”论的概念或主题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凸现，是与他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的。可以说，德勒兹的全部思想与著作，都贯串着对生成(becoming)而非对存在(being)的强调。生成的概念与德勒兹的其他关键词如差异性(difference)、活力论(vitalism)、多元性(multiplicity)等等有密切联系。它们反映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和流变美学的特质。P. 海顿著的《多元性与生成论》(1998)和约翰·马克斯的《德勒兹：活力论与多元性》(1998)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德勒兹的“生成”观念。马克斯认为：正如柏拉图创造理念(idea)的概念以回应雅典城邦的民主论争问题，柏各森创造直觉(intuition)的概念以对付那些难于分析的复杂情况那样，德勒兹则创造了生成(becoming)的概念以分析他所处时代的哲学、心理学、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电影美学等问题。

根据科尔布鲁克的看法，德勒兹所倡导的“生成”概念代表了20世纪末西方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时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并未有意识地形成群体。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对20世纪盛行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加以回应。现象学与德国两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相关联，主张拒斥知识的前体系存在，致力于以生活的呈现(现象)来考察生活。结构主义通常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相关联，是20世纪的另一思潮，它试图以某种科学而严谨的方式去研究语言和社会体制。这两种思潮皆否定人作为知识主体的观



念,皆努力寻求某种更为坚实的基础:现象学的基础是体验本身,而没有关于是谁或怎样实施这种体验的前提。对结构主义而言,知识不应该以体验而应该以结构来获得,因为是结构使得体验成为可能。结构主义者认为,没有本身就具有意义的事物;意义是由其与系统结构中其他因素的关系而被确定的,因此,一个词置于其语言体系之外便毫无意义可言。后结构主义则主张,不管是通过纯粹的体验(现象学)还是通过系统的结构(结构主义)都无法真正获得知识。德勒兹与许多其他的后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不可能为生活确定一个基础,也不能把生活置入封闭的结构中。这非但不是令人沮丧的结果,反而是值得庆幸和走向自由解放的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有机会进行发明创造和体验生活,去接受转化生活的挑战。

德勒兹的“活力论”认为,人类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倾向于建构自身的形象,如理性精神或主体的形象。对德勒兹而言,与现象学体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倾向于假设某种关于体验的正典或标准的体验模式,例如人类生命体的模式,而不得不忽略非人类的体验(如动植物、非有机体的体验,甚或那些我们至今尚无法形象描绘的未来体验)。而与结构主义将知识基于结构的相关问题是,任何对这类结构的描绘都必须假设立足于结构之外或居于结构之上(结构主义人类学者即是如此,他们审视其他文化以描绘它们的结构,但却从不去问他们自己的知识立场是如何建构的)。如果我们想去理解我们语言的结构,我们仍然需要使用某种语言去阐释它。甚至“语言”一词也有赖于某种分辨的结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某种文化,它没有关于语言的普遍术语,却可能有关涉符号或象征的概念。不仅结构主义,而且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基于存在与认同(being and identity),德勒兹则相反,他强调的是差异与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皆将差异与生成置于某种基础之上:或是语言结构,或是体验视点。后结构主义思潮通常是反基要主义的,拒斥以静态的差异结构作为认知世界的基点。后结构主义思潮关注的是结构何以出现和动态如何生成:例如像语言这样的系统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随着时空衍化而变异的?因此,德勒兹及其一代人力图把差异和生成加以概念化,但又并不是把它们固化成为某种存在。“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不仅

是当时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运动,而且也是整个西方思想史。”^①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论作为一种富于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意蕴的概念在众多层面或范畴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他们的生成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在于对柏拉图主义及模仿论传统的颠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情感流变来认知世界,永远无法看到事物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反对文学这种第二序列模仿的原因;我们的感觉已然离开了真实的事物,而文学艺术则只不过是表达了比感觉印象更远一步的拟象而已(影子的影子)。1990年德勒兹谈到他的法文版著作《感觉的逻辑》(1971)的主要构想是颠覆柏拉图主义。当代语境中后结构主义思潮对生成与拟像的肯定即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否定,即认为不再有某种源头或存在作为生成的基点,也没有需要经历的某种拟像过程。在颠覆柏拉图主义的同时,德勒兹拒斥了外在性原点存在的基础,倡导内在性的“生成”。他以无根基的类象否定柏拉图所预设的基要主义理念观,对其原本/摹本、真实/虚假的二元模仿论加以解辖域化。这不仅仅是对生成(becoming)的评价高于对存在(being)评价的问题,而是对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哲学观和等级制思想的消解。

其次,他们生成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表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逻各斯思想传统的解构与活力论重构。德勒兹的著作是反柏拉图主义的,也是反人本主义的,反启蒙的。德勒兹认为,我们错误地设想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隐匿在生成之流背后,那是一个稳定的存在(being)世界。但是,实际上大千世界除了生成之流以外别无他物。一切存在皆不过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之流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由此,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和主体中心论被后结构主义哲学视为妨碍生成思维的障碍,因为它们以人类或主体为生成的基础。德勒兹拒斥以人作为基本存在的观念,肯定大千世界各种存在都有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凸显了一种多元、动态的生成观。在“生成非感知”(becoming-imperceptible)意义上,我们所感知的现实(actual)世界是由虚幻(virtual)之流构成的。颜色是人将光线现实化的结果,音乐是人将声波现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3, London: Routledge, 2002.



实化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生物将光线和声波加以现实化的方式,例如人类眼中五彩斑斓的世界在响尾蛇眼中则是一幅红外线的单调图景;蝙蝠将声波视觉化,迥异于人类将声波听觉化的途径;雌雄蛾子之间、大海中鲸鱼、陆地上大象之间交流而发出的次声无法为人耳所接收,因为它们将声波现实化的途径或方式不同于人际交流。即使同样是人,色盲者、色弱者眼中的世界亦异于常人。因此,维度不同而“生成”殊异。一种植物,尽管我们把它看成是静态的事物,但实际上植物是对光线、热度、湿度、虫害等的接受体,是与其他 *becomings* 相关联的一种动态“生成”过程。人类的眼睛、大脑和心灵只对自身感兴趣的东西加以感知,把感觉的混沌世界缩减成为特定的客体,而自己成为观察这种客体的主体。在此意义上,德勒兹所倡导的 *becoming-imperceptible*(生成非感知)概念与由古希腊 *theoria*(意为 *to look*,即“观看”)一词而来的主体理论观形成对照,是以“活力论”的多元视角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阈的解辖域化。而文学则是这种自由解放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欣赏卡夫卡文学的原因:在卡夫卡创作的故事中把生命想象为甲虫、洞穴动物或机器。由此,我们可以从一种非人类的视角想象生活。”^①在当代哲学、美学以及人类学语境中,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一维度与巴赫金的“超视”、“外位”及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位”、“客位”视角之间有着交叉互补、互阐的理论空间。

再次,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还表现在文学层面的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的概念上。这方面尤其突出的体现在他们论卡夫卡的旨趣上。“生成他者”的思维的途径之一就是经由“生成动物”。生成动物并不是像某种动物一样或是某种动物,并不完全离开人类领域;这是一种 *becoming-animal* 而不是 *being-animal*,因为那是人兽杂交。我们从非动物出发,既不是动物,又不是人类,而是一种“横截线”,既链接又超越人与兽的视阈。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卡夫卡小说就是关于横截线式的生成的文学世界,其中“生成动物”——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 *becoming* 的问题。德勒兹认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25~128, London: Routledge, 2002.

为,横截线式的生成对于生活的开放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生活并不是由前给定的形式构成的,多种生成的线索与方式交汇并且互相作用,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新的生成状态或“逃逸线”。多元性生成是变幻多姿的。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的少数族文学特征,强调具有差异哲学特征的“生成”观,阐发卡夫卡小说中“生成动物”的“逃逸线”及其喜剧性质。由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现代主义关于卡夫卡的传统看法和阅读方式提出了挑战,否定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卡夫卡作为俄狄浦斯情结叙事者,作为孤寂、苦行、神秘、忧郁的作家,作为现代异化与焦虑的编年史记录者等形象。进而论证他是一个反个人的文学机器创造者,其作品充满了社会与政治的意蕴,渗透了愉悦与幽默。卡夫卡绝非退缩于世界,而是揭示了父性权威,揭露了“未来的恶魔式的权力”——奥匈帝国模式的法西斯、苏联和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权力。^① 同样,生成论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体观也有重要联系(参阅本书第九章)。

二、游牧(Nomad)论

德勒兹常常被视为“游牧思想家”,这并非空穴来风或者单纯的文学隐喻。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未给“游牧”以明确的界说,但是这一概念却几乎贯穿在他全部重要的著述之中。在《差异与重复》中,游牧意味着由差异与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分裂症的本质在于欲望的自由游牧。人们无法设定任何目的来拘囿欲望,因而欲望的游牧呈现非确定性和多元性。游牧意味着新的大地(new earth),精神分裂症者犹如游牧者外出巡游,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与外界产生联系,因此分裂症模式要好于作为分析对象并躺在精神分析家床上的精神病患者模式。^②

在《千高原》中,游牧与世界范围的文明迁徙中游牧民族制造的战争机器

^①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②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相关。在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中,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形成对位,分属游牧类型与辖域类型。两者的关系犹如游戏理论中围棋与象棋的关系。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围棋的“游牧”与象棋的“国家”相对峙,游牧战争与政治国家相对位。围棋属于“光滑”的流变空间,象棋属于“条纹”的固化空间。象棋中各个棋子皆身份明确,帝王将相兵炮马车后职责分明,其战争遵从机构化、编码化的规则,有前线,有后方,有作战机制;围棋中各个棋子则是匿名的、聚合的、单一的,具有第三人称功能,是非主体的机器装配,没有作战的等级制机构,只有情境联系或战略。^① 我们认为,体育竞赛和文艺节目表演也同样是典型的例证,它们分别代表着游牧类型与辖域类型的对位关系。体育竞赛充满着非确定性和可能性,其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千差万别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具有游牧韵味的魅力十足的光滑的空间;而文艺表演则是事先设计、排练、按部就班完成的,具有明显的预定结构与既定目的,因而是一种可掌控的辖域化的“条纹”的空间。相对国家机器与既定辖域而言,战争机器与游牧方式均有破除既有状态,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逃逸或生成新的状态的性质。

在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的维度,世界是如何被图式化和科层化的?德勒兹和加塔利从符号论框架中历史与文化的力量冲突的维度对此加以阐发,其中“游牧”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念,世界是由多个符号系统构成的。其中不少系统迥异于作为“特殊的欧洲疾病”的西方理性哲学超验传统。这些符号系统可以根据其意义和特征分为三种体制:①前意指的符号论(presignifying semiotic)——这是多元的、多声部的符号论,它规避普遍性的暴政;②反意指的符号论(countersignifying semiotic)——它以“游牧”为特征;③后意指的符号论(postsignifying semiotic)——它指向“主体化”过程,即建构主体性模式的具象化过程。这些符号论可以融为一体,可以与不同的“装配”相关联,但往往以其中一种符号系统为主导。

以世界文明中迁徙型的希伯来(犹太)文化为例,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前意指的符号论与以游牧为特征的反意指符号论曾经建构了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p. 352~353,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旧约》曾经描绘摩西率领犹太人走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文化迁徙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后来为上帝信仰模式的具象化过程或后意指符号论的一神论信仰所覆盖。上帝的超验主体观念就是这种一神论的高度极权主义的表达式。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把西方基督教传统解读为杂糅的符号学形式,它合并了激情主体形式和偏执专制形式,对其加以反拨的结果之一即是宗教改革。尤为重要的是,二希文化的结合导致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潮发展成为灵肉二元论,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cogito*)就是这种以理性为主体的二元论的典型形式。德勒兹于1962年解读尼采,把理性视为一种主要的“反动力”。理性/情感(灵/肉)固定的二元论与游牧的流散性质的多元论恰成对照。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取向显然看重的是多元流变的游牧论。

在此意义上,这种后意指符号论的超验主体模式是直接 with 游牧符号学相对立的。如前所述,游牧符号论是一种反意指的符号学。它抵抗希伯来一神教的极权体制以及其他的控制机器,例如国家机器和霸权主义。游牧论(*nomadism*)集中体现为“生成”状态,发挥着挣脱严谨、固定、独裁、等级制的符号体系藩篱的逃逸线的功能。类似地,其块茎的本质特征是宇宙混沌无序的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游牧论在定义上是与上帝无所不在的教义和笛卡儿主体理性中心主义 *cogito*(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普遍性相悖立的;反之,它与特殊性的表达式相关联,与具体的犹太民族相联系,因此也就与一个特殊的种族及其历史语境相关联。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主体化的极权主义过程最纯粹地体现在犹太民族的命运之中”,他们提倡游牧思想以对峙权威化、绝对化、普遍化的超验主体性,认为历史并非基因的叙事或进化的叙事,而是游牧的旅程图式。德勒兹曾经说尼采的思想就是游牧的思想。同样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也是游牧的思想,是一种游牧美学。

但是,这里似乎也存在某种悖论: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游牧”概念所建构的这种意义模式,一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基要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多元性、多声部的漫游与生成,恰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另一方面,生存与发展的欲望是游牧的主导内驱力;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构想的游牧“多声部”模式的背后,又掩盖了其游牧本质的基要主义性质。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符号论依赖于一种活力论的形式。这种活力论在历史



编纂的年鉴中是无法找到的。德勒兹认为游牧“没有历史”，“只有地理学”。^①因为历史是极权主义和权威叙事的产物，历史总是拒斥游牧者。游牧的“逃逸线”是试图从历史中逃遁的一种努力。^②德勒兹和加塔利由此在其多元符号论和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关于文化与力量取向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文化叙事。

三、解辖域化 (Deterritorialisation)

在德勒兹审视世界的差异哲学与流变思维中，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 (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 是其重要概念之一。

“辖域化”一词源自拉康的过程分析理论，拉康认为父母对婴儿的爱抚始于母亲的哺乳，由此画定了儿童的口欲区，使特定的器官与相应的对象（如嘴唇与乳房）之间产生了性欲的驱动力与价值关联。辖域化因此指一种将欲望与某种对象的关系加以稳定或固化的过程。广义的辖域化概念意指既定的、现存的、固化的疆域，疆域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中，辖域化的表现以西方文化模式为甚。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主要的模式就是将事物划分为条条块块以便于掌握。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化验、计算、量化等等手段达到掌控对象的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人文社会领域中则充斥着利益及其冲突的各种范畴，护卫与算计是两种基本形态或手段。从而形成了广袤的时间与空间内的各种辖域化。

德勒兹和加塔利分裂分析的“解辖域化”概念在心理学领域颠覆了拉康式的辖域化。德勒兹将欲望的自由流变与相对未定型的形式称为分裂分析——解辖域化因此指将欲望从已经建构而成的器官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例如，分裂分析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分裂症的欲望从核心家庭和俄狄浦斯模式中解放出来。在社会领域，解辖域化用来将劳动力从特定的生产工具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393,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② A. Edgar and P. Sedgwick,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Thinkers*, pp. 39~42, London: Routledge, 2002.

或方式中解放出来。^① 在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意义上,辖域化意味着某种等级制中心主义和静止的时空。因此,德勒兹强调解辖域化的概念。约瑟夫·恰尔德斯等所编的《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词典》中对“解辖域化”一词解释说:“此词源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解辖域化’一词是与更为宏阔的后结构主义解中心构想相联系的,指涉从所栖居的或强制性的社会和思想结构内逃逸而出的过程。这些结构在地理学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辖域。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精神分裂症是解辖域化的完美存在方式,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生存模式。但德勒兹和加塔利是有意摆脱和抵抗任何将他们增殖性的理论观念缩减成为僵硬的系统的努力的,因此,力图界定像‘解辖域化’这类术语有悖于他们的构想。”^②解辖域化的概念与逃逸线的概念可以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强调摆脱既定辖域或束缚的努力,旨在于创造新的流变、生成的可能性。解辖域化或向自由逃逸之后,往往伴随着某种重构或再辖域化。

与此紧密联系的术语编码(coding)、解编码(decoding)与再编码(recoding)表达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对社会与符码的看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偏执狂式的压迫机制无所不在,资本主义在体制上暗中破坏了既有的社会文化符码,用市场化的、公理化的金钱关系作为社会编码的基础而取代了它们。但另一方面,分裂症式的解编码也盛行于世,恰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所主张的分裂分析把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无限创造的符号学(症状学)并视之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趋向的原因所在。由于编码/解编码/再编码的不平衡性,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意义的无意义,因此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是分裂分析更为基本的分析范畴。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唯有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对将差异凌驾于认同之上的倾向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基点。综上所述,贯串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之中的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三联概念是理解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关键性概念。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19,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②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7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四、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

“无器官身体”(英文为 body without organs,其缩略形式为 BwO。法文为 corps sans organs;其缩略形式为 CsO)可能是德勒兹与加塔利最难以捉摸的概念。

德勒兹从阿尔托(Antonin Artaud)那里借用了“无器官身体”这一术语,原指一种生化介质,它也可以视为某种一致性平台(作为一种非构型的、非有机化的、非科层化或解科层化的身体或者术语)。该术语首先出现在德勒兹的著作《意义的逻辑》中,后来德勒兹在他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中对此进一步加以阐发。

“无器官身体”这一术语很容易因用词不当而引发歧义,从而使人望文生义地想象出一幅没有器官的身体的奇怪图像。实际上,在德勒兹与加塔利那里,无器官身体意味着一种从传统精神分析的漏洞或者辖域化状态中逃逸而出的方式,因为德勒兹与加塔利不赞同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欲望是基于俄狄浦斯匮乏的观念,而主张欲望是一种生产性的机器,具有多元性并且处于不断流变的状态。精神分析囿于封闭性的诠释,欲以其三个术语(有机论、意义论和主体论)有效地把我们组织和捆绑在一起,而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无器官身体”的概念对这三个术语批判和扬弃,提示我们能够创造出新经验模式的开放性空间。德勒兹与加塔利曾经把 X 女士作为他们的角色模式:她是一个疑病症患者,说自己没有胃、脑或内脏,只剩皮囊和骨架作为她没有器官的身体的支撑结构。通过这个例证,德勒兹与加塔利解释和强调说,无器官身体并不是在字面上意指“一种没有器官的身体”,它并不与器官为敌,而是与器官的组织化对立。

梅萨日(Kylie Message)认为关于“无器官身体”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无器官身体既存在于科层化的组织领域内,同时它又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存在模式或者经验模式(生成)。二是无器官身体在字面上并不等同于一种没有器官的身体(an organless body)。尽管无器官身体是一个以持续生成论为指向的过程,但是它却无法完全与其意欲逃逸而出的系统相断离。它的乖违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过程。其哲学与美学的取向是运动的过程,而不是任何完成态的目的论终点。易言之,无器官身体反对的是器官组织化的原则,这种原则作为器官、经验,或存在状态的聚合性装配(assemblage)的代表而进行

建构、界定和说话。德勒兹还煞费苦心地从德国生物学家魏塞曼(August Weismann)及其种胚理论(1893年发表)那儿寻求灵感。德勒兹认为,无器官身体犹如种胚那样,总是暂时与其主有机体(host organism)相关联并且具有独立性。魏塞曼认为,每一代由受精卵发展而来的胚胎不仅为了下一代而留存了一些胚质(保留遗传所需的特征),而且还生成了将来发展成为有机体的躯质或者身体的那些细胞。显而易见,这些躯质为胚质提供了居室,以保证两性胚质的保护、养育和传递,从而创造下一代生命。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魏塞曼会认为鸡是蛋为了下一代蛋的诞生而使用的工具,与此类似,德勒兹把无器官身体表现为蛋的等同物。无器官身体像蛋那样,并不前于有机体而存在,而是与有机体毗连,并且持续地处于建构自身的过程中。^① 德勒兹与加塔利主张摒弃两极对立思维模式而重视毗连形态。他们不像传统精神分析理论那样把欲望置于索绪尔语言学二元论的思维轨迹中,而是强调语境化的心理学美学,而无器官身体既提供了这种一致性、内在性的平台,同时又呈现出解科层化、解码化、解辖域化的异质特征,欲望机器由此通过无器官身体而不断地导致新的生成。

马克·伯恩塔等在《德勒兹与地理哲学》(2004)中指出:无器官身体概念更为确切但没有那么堂皇的表述应当是一种非有机组织论的身体(a no-organismic body)。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承认,无器官身体根本就不是 organs (器官或组织)的对立面。Organs 不是它的敌人,它的敌人是 organism (有机论)。无器官身体有其器官,只不过这些器官被从所设想的它们的有机论形式的习惯模式中解放了出来。就此而言,有机论是科层化的(一种中心化、等级化的)身体模式,而无器官身体则是解科层化(非中心化、非习惯化)的身体。^②

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到他们的《千高原》,无器官身体一词衍生出充盈的无器官身体(full BwO)与空虚的无器官身体(empty BwO),特定的无器官身体(the BwO)与单一的无器官身体(a singular BwO)等富有意

^① Adrian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pp. 32~34,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pp. 62~64,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义的嬗变,更增添了其潜在的歧义性。在《反俄狄浦斯》中,当无器官身体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症状态,意味着反生产的时刻,并且仅仅是一种让欲望机器启动及游牧主体移动的表面时,它是“充盈的”。作为这种表面,充盈的无器官身体可以用来记录欲望生产;在社会刻录方面,它是社会体。而在《千高原》中,充盈的无器官身体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必须规避的倒是“空虚”的无器官身体。充盈的无器官身体可以链接其他解科层化的身体,而空虚的无器官身体则是主体性的黑洞,在那里万籁俱寂。尽管有机论是一种强加在无器官身体之上的科层化,但同样确切的是,无器官身体也是一种建构的对象,是一种实践。它是“你带走一切之后所留下的东西”。它不再是内容的表达,亦即它不再作为功能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它生成了一致性的平台,是当下的一种向新链接、新创造和新生成开放的领域。换言之,无器官身体是一种离开了“平衡状态”的机制,即从一种静态或安逸域(comfort zone——某种自动平衡机制的功能设置和常规习惯)走向强烈危机的领域(产生出可变的、“亚稳态”的习惯)。特定的无器官身体是一致性的平台,是所有的身体与装配共享的虚拟领域,而单一的无器官身体则为“强度所栖居”。前者是零强度流的“大地”,在这个角斗场中一切链接皆有可能,一切伦理选择都会发生;而后者则是某个具有内在强度的身体的静态空间,是单一且固定的虚拟领域。^①

总括而言,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无器官身体美学,强调的是在本质上尚未编码的身体,这时的身体尚未屈从于各器官(各部分)的限定而成为某种单一的统一体,因此具有非确定性和无限发展生成的可能性和开放性:无器官身体“是一种必要的聚合性,可以装配各种因素、事物、植物、动物、工具、人类、权力,以及这一切的碎片”^②。从人类精神发展与文艺美学的会通维度而言,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无器官的身体与中国诗学的“大象无形”、“空纳万有”、“意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概念,以及佛禅的“色空”观等东方智慧存在着理论对话和再辖域化的可能性。

① 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pp. 153 ~ 54,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p. 161,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反俄狄浦斯

分裂分析

欲望生产

无器官的身体

德勒兹在西方学术界的声誉主要建立在与加塔利合作产生的一系列富有思想力度、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之上,尤其是他们的两部主要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皆聚焦于精神分裂症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主题,表现出一种以尼采哲学解构与重构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复杂取向。他们的《反俄狄浦斯》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一席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迄今仍然是他们最负盛名的著作。露西(N. Lucy)在其《后现代文学理论导论》中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与弗雷泽的名著《金枝》相提并论,认为弗雷泽的《金枝》乃是皇皇十二卷巨著,百科全书式地叙述了人类思想从象征到科学的发展史;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1977/1972)则对贯串西方文化史的欲望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作了丰富而精彩的表述,现在已经成为后现代学者们的经典参照系。《金枝》是老一代的文化资本,而《反俄狄浦斯》则是将现在与未来贯通的重要著作。^①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扬弃精神分析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利比多微观政治学,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史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独特的反思。

德勒兹曾经说《反俄狄浦斯》全书具有统一性:一方面是对俄狄浦斯情结说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关系的研究。这两方面密切相关。全书的统一性在于:精神分析学的缺陷与它紧密属于资本主义这一事实相关。^② 德勒兹和加塔利融合了哲学家和反精神病学家的视阈,他们的分裂分析从反精神分析欲望观出发,进而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因而有欲望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之称。

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微观政治学认为,政治文化意义和社会构成极为复杂,具有多种要素,因而难以仅仅从宏观政治的维度得到有效的揭示。宏观政治学是一种宏大叙事,通常倾向于以二元对立话语为命题,例如设置左/右、男/女、革命/反动、进步/落后、积极/消极、中心/边缘等对立概念,忽略了其他的维度与途径;而微观政治学关注和倡导在更加微小

^① N.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 88, 89, 214, 217,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②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的、未被框定或凝固的结构或范畴中发生的变革,力图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因此,微观政治学在实质上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反总体化、抵抗等级制、解辖域化等倾向。

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概念及其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反俄狄浦斯》的基本脉络。易言之,德勒兹和加塔利从他们的哲学与美学观念出发,运用分裂分析的思路与方法,在欲望微观政治哲学方面与弗洛伊德一脉的精神分析(核心家庭与俄狄浦斯模式)/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进行对话并且加以反拨;同时在宏观社会历史叙事方面与马克思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模式进行对话,提出自己后结构主义意蕴的社会体的系谱学叙事。按照霍兰德的观点,前者属于反俄狄浦斯的内在批判;后者属于反俄狄浦斯的外在批判。本编参照以上视点并且结合相关资料,第三章拟侧重从俄狄浦斯问题框架论述以下几个方面: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精神分析背景下的俄狄浦斯问题(弗洛伊德、拉康)、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第四章拟侧重从德勒兹和加塔利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维度阐述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题旨,对他们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历史叙事问题加以评价与论析。

第三章

反俄狄浦斯：精神分裂症与分裂分析

20 世纪中叶以来，欧洲社会文化中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富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理论家有巨大影响的至少有两大事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地对犹太人加以迫害的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人们反思和批判极权主义的一个标志。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阿多诺认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再也无法像往常那样思考问题了。二是 1968 年五月在巴黎爆发的反叛权力机构的学生运动，这在当时甚至可视为一种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抗议运动或思潮在欧洲的代表。^① 五月风暴过后，人们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原有的理论构想和批判话语遭遇到更多的困境和挑战。

① 与 1960 年代欧洲五月风暴大致时间相同的学生运动，在美国也有与抗议越战相关的学生运动与骚乱，亚洲东帝汶等地亦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与德勒兹长期合作的加塔利、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乔姆斯基等人皆与上述某些运动关系密切。福柯曾经悲哀地说：五月风暴之后，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参见周宪、许钧主编的“知识分子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权力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最后的知识分子》等）



第一节 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

首先,应当在奥斯维辛之后与五月风暴以来的欧洲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把《反俄狄浦斯》部分地理解为是对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反思。这场运动显而易见地激发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思考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关联性的灵感。《反俄狄浦斯》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其寻绎的那种反中心、小范围、即兴的微观政治学斗争,当年春天在巴黎不断发生,并且蔓延到整个法国,影响整个欧洲。

精神分裂症的生命体按照自身的规则或符码行事,逃逸出主流社会文化符码的桎梏,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在欧洲社会文化语境中,德勒兹及加塔利具有流变、规避、滑动、离心特质的分裂分析概念因此与罗兰·巴特、德里达、萨特、利奥塔、福柯等人形成思想共鸣。巴特曾经在1977年的就职演讲中描绘了人的定位不断滑动变化的图景;德里达的“异延”论宛如思想柔道,暗中破坏了静态的主体定位;萨特把个体视为偶然、意外、本质上无法理解的存在,表达了异化的文学主题和现代主义的恶心情绪;利奥塔倾情赞赏崇高,以之与理性主义的认知范式相抗衡;福柯则关注疯子、麻风病人、囚徒等遭到理性文明史、正典文化、主流社会及主流意识形态遗弃的边缘人,并且借此挖掘社会文化的本质。“由此可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症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绝对的社会局外人的形象,其异化的心灵不仅抗拒典型文明社会,而且也抵抗在理解人类心理方面最强大的理论之一,即精神分析。”^①

德勒兹在访谈录中坦承他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概念是五月风暴的一个产物。五月风暴激发了他们对欲望与权力(或法西斯主义)关系的思考,对精神分析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他们的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精神病学的,而前者不能简化为后者,后者也不能简化成前者”。他们在共同研究和合撰《反俄狄浦斯》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他们惊讶地发现:仅仅是从所选读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2,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的一些文本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荒谬绝伦,这就更加使我们坚信俄狄浦斯的谬误和精神分析学的可悲”。德勒兹认为,精神分析本身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从一开始就没走好。弗洛伊德发现了作为利比多的欲望、生成的欲望,而同时他又不断地使利比多在家庭的表现(俄狄浦斯模式)一再异化。这种“精神分析的唯心主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欲望生产被简化成为一套称作无意识的表现的系统,无意识工厂简化为一种戏剧舞台,简化为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简单的表现价值代替了无意识真正的生产力,“利比多的社会蕴涵被简化为家庭蕴涵;欲望被叠合在家庭的坐标上,叠合在俄狄浦斯上”,欲望机器被简化为制造幻觉,制造戏剧效果的机器,所有的欲望生产都被粉碎。精神分析家们“以俄狄浦斯的名义所说出的蠢话,首先是关于儿童的蠢话,都是一派胡言乱语”。因此有必要反俄狄浦斯,建构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将生产引入欲望之中,并且反过来将欲望引入生产之中”。“精神分析学家将精神病理理解为‘妄想狂’之线,这条线通向俄狄浦斯、阉割这类插入无意识之中的抑制器具。但是谵妄的精神分裂症的实质,这条画出非家庭图像的‘精神分裂症’之线,则完全被漏掉了。”因此,必须以“战斗的、经济利比多的、政治利比多的”精神分裂分析取代荒唐狭隘的精神分析。^①作为无意识表征的谵妄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父亲”无关,甚至与拉康式的“父亲之名”也无关,而是与历史之名相关。

其次,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意义上,《反俄狄浦斯》是一部反法西斯之书。福柯曾经为《反俄狄浦斯》写了一个简要的序言,文字不长,全文引证如下:

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得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而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尺度。

接踵而来的是五个短暂、激情、狂欢和谜一般的年头。在我们的世界的门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15~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口,是越战,当然也有对既有的权力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而在我们的院墙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种混合了革命与反压迫的政治综合体?一场在两条前线打仗的战争:一方面反对社会压制,一方面反对精神压制?一波为阶级斗争所调转的利比多浪潮?或许,无论如何,这种人们熟悉的、双重的解释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件自以为是地作出了阐发。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符咒般迷魅住欧洲的梦幻之都——威廉帝国的德国和超现实主义的法国——的那种梦幻,已经回归并且对现实本身纵火: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在同样熊熊的火光之中。

然而,这一切真正地发生了吗?是否30年代的那种乌托邦的构想重新复燃,这一次是在历史实践的范围内复燃?抑或相反,是一场走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所规定的模式不再和谐的政治斗争运动?走向的是一种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体验和技术。确实,旧的旗帜已经举起,但是战场却转移了,延伸到了新的领域。

《反俄狄浦斯》展示了众多领域是如何被覆盖的,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止于此。尽管它大量地取笑弗洛伊德,却是直截了当地对旧偶像加以质疑。最重要的是,它激励我们向前走得更远一点。

把《反俄狄浦斯》解读成一种新的理论参照可能会是一种错误(众所周知,颇为前卫的理论最终却是无所不包,最终总体化和重蹈旧路;我们被告知的最“迫切需要”的理论,在我们这个弥散化和专门化的时代里却是缺乏“希望”的)。人们不要在书中极为丰富的新观念和令人惊讶的概念中间寻找“哲学”:《反俄狄浦斯》并非是华而不实的黑格尔。我认为,最好是把《反俄狄浦斯》读成一种“艺术”,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它以“色情艺术”的术语表达了这一特征。通过对多元性、流、安排以及联系等看似抽象概念的阐发,它对欲望与现实、与资本主义“机器”的关系的分析回答了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再关注为什么(why)这样或那样,而是关注如何(how)去进行。人们如何将欲望引入思想,引入话语,引入行为?欲望如何在政治领域内展开其力量,如何在推翻既有的秩序的过程中变得更为强大?色情艺术、理论艺术、政治艺术。

《反俄狄浦斯》由此遭遇了三个敌手。三个敌手的力量不一样,它们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危险,本书以不同的方式与它们作战:

1. 政治苦行僧、忧心忡忡的斗士、理论的恐怖主义者。他们会保护政治和政治话语的纯粹秩序。他们是革命的官僚和真理的公仆。

2. 可怜的欲望技术员——精神分析家、一切符号与症状的符号学家——他们会把丰富多彩的欲望压制到结构与匮乏的双重律则之中。

3. 最后但不是最无足轻重的敌手,这个主要敌手,战略上的敌手是法西斯主义(而《反俄狄浦斯》所面对的其他敌手更多的是战术上的敌手)。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能够极为有效地激发和利用了芸芸众生的欲望,而且还是居于我们大家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宰制和剥削我们的那种东西。

我想说《反俄狄浦斯》(请其作者恕我直言)是一部伦理之书,是长久以来用法语撰写的第一部伦理学著作(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成功并不限于特定的读者群:因为反俄狄浦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和生活之道)。人们如何避免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尤其是)当你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时候?我们如何搜捕出我们行为中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基督教的道德家追寻居于我们灵魂深处的肉体之踪迹。德勒兹和加塔利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追索着身体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最轻微的蛛丝马迹。

在此谨向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①致以最谦恭的敬意,人们可以说,《反俄狄浦斯》是一部《非法西斯生活导论》。

这种反对一切形式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已经存在的还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具有一系列基本原则。倘若我要把这部杰作制作成一本手册或日常生活指南,则需要将这些原则概述如下:

◎ 将政治行为从所有整一的和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放出来。

◎ 通过增殖、并列和分离,而不是通过次第分层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化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

^①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是17世纪的牧师,日内瓦大主教,以其《虔诚生活导论》而著名。



◎ 不再效忠于否定式(法律、限制、阉割、匮乏、空隙)的陈旧范畴,西方思想长久以来把否定式奉若神灵,视之为力量的形式和现实的通道。要钟爱积极和多元的事物,差异性胜于一致性,流变胜于统一,动态协调胜于静态系统。相信生产性不在于固着不动,而在于游牧。

◎ 不要认为想成为斗士就得忧心忡忡,即便是人们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可恶的。唯有欲望与现实的联系(而不是退缩到其表达形式中)才拥有革命力量。

◎ 不要把思想作为政治实践的真理基础;也不要怀疑政治活动,将其仅仅作为推测,作为一种思路。要把政治实践作为思想的一种强化剂,把分析作为政治活动介入的形式和领域的倍增器(multiplier)。

◎ 不要求用政治去恢复个体的权利,因为哲学对个体作了界说。个体是权力的产物。要通过多元化、移植变形、异质合并的方式“解个体化”。群体不必是将等级制的诸个体统一起来的有机的束缚,而应是解个体化的永动机。

◎ 不要变得迷恋于权力。

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很少关注权力,他们甚至一直试图将与其话语相联系的权力影响中性化。故此本书中到处都是游戏和陷阱,对它的翻译需要真正超凡的才艺。而这些陷阱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修辞的陷阱;后者左右读者而不使其意识到被掌控,最终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取胜。《反俄狄浦斯》的陷阱是幽默的陷阱:众多的诱惑邀请你走出来,当你离开文本之际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本书常常引导你,使你相信全都是开玩笑和做游戏,而这时却出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极为严肃的东西:寻觅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的踪迹,从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①

福柯在“序言”中强调了20世纪中叶欧洲的思维方式、政治话语和道德伦理三个维度,以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符号系统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福柯提醒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xi~xiv,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读者“把《反俄狄浦斯》当作一种新的理论参照来读是一种错误”，他建议最好把《反俄狄浦斯》读解为“艺术”，把法西斯主义与伦理学的对立视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构想的一个组织原则。法西斯主义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到个体的无意识深处的微观欲望。因此，反俄狄浦斯不仅仅是反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能够极为有效地激发和利用了芸芸众生的欲望”，而且还是反对“居于我们大家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宰制和剥削我们的那种东西”。日常生活的法西斯主义因其隐蔽性而更具危险性，铲除掉它们的任务也更为艰巨。社会历史现象和语境侵扰着所有形式的思想运作，甚至哲学概念的创造亦非完全纯粹的。因此，德勒兹哲学不仅具有反理性主义、反形而上学、反基要主义的思想特质，而且也是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反法西斯既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维度，也有隐匿无形的伦理维度。从分裂分析和微观政治哲学的视角而言，反俄狄浦斯要超越历史维度的反法西斯及其权力，也就是超越政党或国家的斗争，而将其拓展到伦理的、文化的、家庭的、个人的和利比多的领域。卢梭曾经说，最有意义的法律不是镌刻在大理石碑或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同理，最可怕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已经变成我们内心欲望的“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

自马基亚维里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政治上（法西斯主义）对欲望的控制与哲学上（形而上学）对欲望的控制是一回事。他们认为“真”与“美”从来就不能离开权力和语用学而得到解释。H. Bertens 等人指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在把欲望与权力联系起来分析方面，他们的大多数分析都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7/1975）的微观政治学更先一步。他们对资本主义“堂皇叙事”既解构又重构，是后现代思想家通常所采用的一种策略。^① 福柯的“权力”概念与德勒

^①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概念类似,是弥散于一切社会关系、渗透到亚个体身体的东西。德勒兹和加塔利理论中精神分裂的世界,呈现为一种小型的“欲望机器”——嘴、手、胃、牙等——的聚合图式。这个世界充满了混杂、拮抗、离合的因素,变幻不定,宛如动态的马赛克或者肢解了的提线木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种幻象类同于加缪对荒诞的理解,所不同的是他们将存在的荒谬性提升到更高更强的程度,并与某种严重的精神疾患联系起来。^①在福柯看来,《反俄狄浦斯》中原始的、专制的、资本主义三种机器皆是权力的体制,是身体政治学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福柯与德勒兹/加塔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福柯把权力视为首要因素,而德勒兹与加塔利把欲望视为首要因素,权力是一种辖域化的限定形式,欲望则是一种解辖域化形式。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以欲望的分裂分析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历史文化批判,具有一种“欲望微观政治学”的意蕴。

再次,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的概念内蕴着德勒兹和加塔利长期的哲学和美学思考。1972年德勒兹与加塔利出版《反俄狄浦斯》之际轰动一时,引发了热烈的争议,继而在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引起不同强度的反响。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该书中对精神分析的信条,尤其是对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黎知识界盛行的拉康一脉的精神分析学说施以全面否定。人们在这部著作中看出了1968年5月学生运动即五月风暴精神的哲学表达——有些人认为该书在反结构主义的、尼采式的自由题旨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作了非凡的、反圣像崇拜的综合;另一些人看来该书表达了一种无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利比多自我放纵的政治学。这部著作大获成功,一时成为人们竞相争论的热点,一直被公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最负盛名的著作。《反俄狄浦斯》流行于世,似乎得益于其恰逢其时的猖獗激进之风格和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但《反俄狄浦斯》既非五月风暴反理性主义情感的自然流露,亦非机会主义式地利用拉康主义的迷信。确切而言,这部著作是其作者花了近20年的时间研讨哲学、精神分析和政治理论的结果。因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3,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此,《反俄狄浦斯》既是五月风暴的反应,更是对西方数十年来理论思潮的一种回应。它反击拉康式的“能指的暴政”,强化了对结构主义的抨击,其反理性主义的取向,与五月风暴所激发的大众情感无疑产生了共振效应。

最后,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思想批判还有一种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实践维度。他们认为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理论脱离实际,忽略了我们的世界的生产性方面,无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变化中的社会状况。精神分析过于理论化是一种缺憾,马克思曾言: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概言之,自由解放和实践性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旨趣的两个重要方面。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解放的理想和弗洛伊德关于利比多是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力量的观念,但他们否弃了马克思关于建立和谐完善、有机统一的社会体系的理想和弗洛伊德关于家庭单元作为核心理念。“在欲望本质的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几乎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所有理论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传统上——正如我们所知,叔本华、萨特就是如此,更无须再提及佛教和《奥义书》的众多版本——欲望被视为一种‘匮乏’或者一种亟待满足的需求……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另辟蹊径,他们将欲望视为生产性的(desire-as-productive)的概念,认为欲望就是一种力量的漫溢(energy-overflow),它能够不断地延展,总是‘想要更多’。”^①这种看法,显然也承惠于尼采哲学。

因此在如何阅读《反俄狄浦斯》的问题上,德勒兹曾经回答访谈者说:应当把它当作工具或机器来读。他提到,《反俄狄浦斯》不能说已经摆脱了知识工具的藩篱,它还是非常学院气,还相当圣贤气,这不是理想的大众哲学或理想的大众分析法。但是有一点使他感触良多:觉得此书特别难懂的人,恰是那些最有修养的、尤其是有精神分析修养的人。他们说,何谓无器官身体?何谓欲望?相反,那些懂得不多的人,那些未受精神分析腐蚀的人倒没有那么多问题,他们毫无顾忌地将不懂的东西丢到一边。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勒兹强调此书是面向15~20岁读者的,而阅读此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书与学问结合,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p. 273~274,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追根究底地在书中寻找能指或所指,“人们将随后的书视为装在前面匣子里或包容前面匣子的一个匣子,人们将进行评论、解释、要求解释,人们将撰写关于此书的书,如此这般,永不休止”;另一种读书的方式是将书视为一个非能指的小机器,问题只是:“这小机器灵不灵?运转得好不好?”如果不灵,运转得不好,那就另换一本书。这是一种快速阅读。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没什么可说明的,没什么可领悟的,没什么可解释的。这是一种电路的连接。德勒兹说,我认识一些修养不高的人,他们凭着自己的习惯,凭着他们的理解方式,立刻就理解了无器官身体。这第二种读书方式与前一种相异,因为它将书与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书是一部复杂得多的外界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写作是诸流中的一个流,同其他流相比,它没有任何特权。它同其他的流,诸如秽语流、精液流、讲话流、行动流、色情流、货币流、政治流等等,构成了潮流、反潮流或回流的关系。”^①按照德勒兹所提倡的第二种读书方式,深受等级机制所苦的人,在《反俄狄浦斯》中可以读出一种微观政治学干预;对那些身属激进团体又担忧五月风暴后的欧洲前景的人,此书可以有助于揭露微观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而对厌烦了精神分析,讨厌听到“爸爸、妈妈、俄狄浦斯、阉割”等白痴般话语的人(尤其是青年)而言,反俄狄浦斯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共鸣效应。但是,如果其中没有你关注的兴奋点,你完全可以把它扔到一边。正是因为《反俄狄浦斯》内容丰赡,思想深刻,同时又贴近大众,无所拘束,所以毫不奇怪,这样一部艰深玄奥之书,竟然成为五月风暴之后的学术热点和大众畅销书。

第二节 精神分析背景下的俄狄浦斯问题

20世纪,马克思在社会学,弗洛伊德在人类深层心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重大发现,日益使人类成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并开拓了广袤而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西方文论发展史的视阈中,弗洛伊德作为奠基人的“无意识”观念是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关键词之一,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精神分析批评在 20 世纪文艺美学领域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复杂对话关系,并且出现了众多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关于人类无意识精神分析的深层心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第一次把人类的注意力引向了深不可测的无意识领域——这个新领域甚至比邈远的宇宙天体更加广阔玄奥,因此,弗洛伊德对人类精神史、思想史的贡献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怎样评价他的贡献都不过分。精神分析学派关注人自身深层的、隐秘的、微妙的甚至病态的内心无意识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成为 20 世纪主要理论模式和思想领域之一。但是,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诊疗并不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方,人的精神病态和生存的特殊体验,还有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历史等原因值得去探讨,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特色斐然,但是也具有较明显的适用局限性。拉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重镇,从语言学维度将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拓展为文化无意识,深化了精神分析领域的问题研究。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无意识学说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学说中发挥着主要功能。因此,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所针对的对象,俄狄浦斯情结问题必须置入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背景之中加以论析。

一、弗洛伊德与俄狄浦斯情结

虽然弗洛伊德对人类无意识的发现与诠释曾经被誉为 20 世纪三大发现之一,与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物理的相对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学说相提并论,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弗洛伊德学说的绝对性不断地受到扬弃和质疑,不少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维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展开对话。例如荣格的“个体无意识”、拉康的“语言无意识”或“文化无意识”、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等在这一领域皆有里程碑的意义。E. 赖特的著作《精神分析批评:实践中的理论》分章论述了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后弗洛伊德批评(E. Kris/S. O. Lesser/N. N. Holland)、原型批评(荣格)、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结构心理学(拉康)、后结构心理学(德里达)、精神分析与意识形态——聚焦于性 与社会关系的精神分析话语(福柯关于性与权力、德勒兹及加塔利的分裂分析)等题旨。由此可见问题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西方精神分析奠基人弗洛伊德把表现“弑父娶母”题旨的古希腊神话与悲剧故事《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为一种潜在的、基本的人类戏剧符号,从中萃取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认为其代表了一种隐匿的、普遍性的人类欲望,一切梦幻、幻象、幻觉和文学都是这一神话的嬗变。无意识则以不同的形式重述这一故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由此获益匪浅)。无意识因此发挥着个人的和“无时间”的“戏剧”功能。在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儿童仇视异性的父母,由此产生与男孩相关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以及与女孩相关的伊莱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和阴茎忌妒。孩子、母亲和父亲共同构成一种家庭三角结构,这种结构在决定个性的形成与成人欲望的轨迹问题上,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是诊断许多病理学现象的参照点,并且启发了拉康关于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三维结构的构想。弗洛伊德在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三部伟大的世界名著——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找到共同的俄狄浦斯情结轨迹,似乎证实了他精神分析学说的正确性和普遍性。E. 琼斯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哈姆雷特踌躇之谜,曾经激发了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家们的热情。

德勒兹和加塔利从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出发,颠覆了弗洛伊德对神话与文学的阐释。他们认为,无意识远不是神话的、再现的或某种亟待解释的东西,而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生产性的。人类隐秘玄奥的无意识生产出各种奇怪的联系和形象,例如狼人对狼的迷恋,孩子对机器的浓厚兴趣,艺术家对颜色的痴迷,吸毒者对幻觉的快感联想,等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把欲望的联系和生产性加以临床诊疗般的索解,探求表面现象之下隐匿的深层蕴涵,把无意识欲望视为俄狄浦斯戏剧的能指。例如,认为狼即是狼人的父亲,梦幻是失却的欲望的补偿,孩子的玩具是母亲身体的替代物,等等。弗洛伊德之误在于把俄狄浦斯戏剧视为再现而非创造——欲望形象的创造。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死亡之间建构了联系;而这种父亲—母亲形象的联系在剧中直接提示了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维度:国王与王后。德勒兹和加塔利追随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本质不是个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出古希腊悲剧

演示的不是“无时间”的俄狄浦斯式的“人类家庭戏剧”原型,而是特定的国王和政治权力。现代关于“父亲”的概念是从集体的和政治的投注(investments)发展出来的。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现代父亲是从这种投注的男性政治领导者形象中衍生出来的。在男人或父亲的个人形象出现之前,社会机器(通过诸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事件)已经塑造了国王、暴君、银行家、警察或法西斯主义者形象。男人(man)是从社会角色中生成的,这种社会投注须得在集体观看中创造:从古代磨难仪式到现代电影和大众文学都是这种投注式的观看。这意味着文学不是再现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文学具有促发欲望、创造新的思想与情感效应的力量。“文学是一种超越任何既有的‘思想形象’或艺术规则的生成力量。经由文学而生成女性或摧毁俄狄浦斯男性,意味着政治和未来的开端。……文学因此不是屏蔽和再现无意识和无时间戏剧的工具。文学生产新的戏剧和强度。文学不能简缩成为男性的故事和解释;它永远拥有超越男性的力量:生成女性。”^①从反俄狄浦斯的思想立场出发,德勒兹从其生成哲学的维度阐发了无意识欲望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关联。

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扬弃并不是完全割断与它的关系,而是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一方面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观念如利比多、自由联系、原初压抑等仍然被保留下来,成为分裂分析的思想资源。例如,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是作为欲望之抽象的、主体本质的利比多概念,这种自由形态的利比多没有任何前决定的欲望对象,是一种流动的欲望,可以合乎情理地运用无意识的综合。但是,弗洛伊德却背叛了他自己最伟大的发现,给欲望设定了普遍性的、前决定的对象和目标:性欲驱动的杀父娶母(对母亲的性欲和对父亲身份的认同属俄狄浦斯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这就把流变的、生产性的欲望纳入僵死固定核心家庭范畴而忽略了复杂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网络关系,误解了欲望的本质。因此弗洛伊德将伟大的发现用于了荒谬狭隘的范畴。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一些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观念(如升华、移植、死亡本能、俄狄浦斯情结等)则被当作误导思想的靶子受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44~145, London: Routledge,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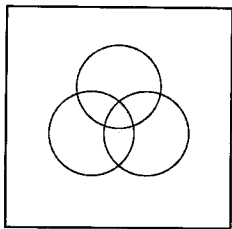


到严厉的批判。德勒兹和加塔利尤其不赞同精神分析把俄狄浦斯情结视为普遍性的模式,他们考察了原始社会家庭(部族)联姻与血统的关系和专制社会中家庭的社会角色,认为家庭无法与社会体分隔开来,从而强调了家庭的社会维度。俄狄浦斯模式无法在这两种社会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只有在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才内在化地凸现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父亲的形象外,几乎一切符号都被市场解编码。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欲望压抑的表达式,并非普遍性的、总体化的机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首先是从弗洛伊德学说中找到了理论思辨的切入点。

二、拉康与俄狄浦斯情结

拉康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复杂玄奥、影响重大的人物,一般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主要是从无意识话语、语言结构、宏观文化修辞等角度阅读弗洛伊德的,他将弗洛伊德神秘化的个体潜欲望和无意识学说加以历史化、政治化,并置诸宏阔的文化语境中,以意识形态结构消解人的主体中心位置。

在俄狄浦斯问题上,拉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传统精神分析话语的策略与表达式经由拉康的质疑和语言学拓展后,成为众多文艺美学思想观念和理论思考的参照点或生发点。拉康是从隐喻的维度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因为这牵涉到其关键的置换概念,以父亲之名(the Name-of-Father)的概念置换了弗洛伊德母



亲之欲(the desire of the mother)概念。拉康以三环相联互扣的新几何学“鲍罗密欧结”^①,即ISR(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个秩序置换了弗洛伊德关于核心家庭的“爹地—妈咪—我”俄狄浦斯三维结构。由此,俄狄浦斯情结被转

^① 鲍罗密欧结(The Borromean Knot)是一种由三个等大的圆环构成的几何图案或链接。它们互相扣结,各有一部分向心式的均衡地交迭在一起,若其中一环被离断,其他三环也被分开。它因鲍罗密欧家庭(the Borromeo family)用于臂徽而得名。拉康将其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之间的关系以此三环图式标示。参见 D.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18,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换成一种语言学现象和文化结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变成了文化无意识意义上的父亲之名(父亲的角色是母亲和法律地位的拥有者),并由此从想象秩序进入了象征秩序:在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重读的基础上,拉康在 20 世纪中叶把弗洛伊德式的个体精神分析领域拓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

拉康的镜像阶段标志着俄狄浦斯过程或父亲隐喻的一个高峰。父亲作为结构的第三维侵入了儿童与母亲的想象界二分体,代表了法律,导致了菲勒斯强力和阉割恐惧的象征秩序。接受了父亲的权威,儿童就在社会象征秩序内有了一个位置,一个名字,一个说话的立场。菲勒斯把不同性别的男孩和女孩都导向了象征秩序。拉康经常用父亲隐喻(paternal metaphor)来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相联系。这是社会象征意义上的父亲禁制,代表了父权制统辖下的社会性别。在弗洛伊德看来,阉割情结的焦点是身体的阴茎(the penis),在拉康看来,父亲隐喻的焦点是文化象征的菲勒斯(the phallus),它对男孩女孩都有权威,使女性屈从和被边缘化。菲勒斯既意指父权制秩序的统治和父亲的法则,同时又是幻象。在某种意义上,菲勒斯代表了人类欲望永远不能达到满足的困境。象征秩序就是以欲望不可满足性的认识为前提的。拉康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完满的统一体,而他者性(otherness)却具有存在的可能性。无意识对主体而言是未知的东西,与他或她异质,因此“无意识”的概念就导向了“他者”的观念。拉康赋予这种主体的符号是“\$”——其内部永远是分裂的。而由于主体是由某种缺失了的东西构成的,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欲望。欲望被主体体验成一种缺失(lack),欲望的满足则是对缺失的弥补,这就表现出一种动力学状态或动态。正是欲望使得人类不同于动物:动物体验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need,此词含缺乏/需要二义)而不是心理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要求(demand)的欲望。无意识在各种填补空缺的途径中展现了自身。拉康在性别与语言的联系上区分了需要和要求、阴茎和菲勒斯,从而刷新了弗洛伊德学说,他从语言学角度对主体加以定位,重写了经典的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拉康认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是“能指的宝库”。人类生活在一种由象征符号所创造的秩序之中,正是文化和话语使我们聚集成人类社会。因此文化是一种无意识规则、一种建构我们生命意



义的密码和结构。拉康将弗洛伊德的拓扑图模式置入了语言学维度,借用了索绪尔关于能指、所指的结构模式和雅克布森的“语言基轴”概念,在隐喻和转喻的结构中强调转喻,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强调能指的功能。他认为:正是修辞形象提供了无意识工作的方式,从而产生意义。孩子与母亲的分离(脱离哺乳期)意味着与一种身体或存在失去联系,这时人们就开始进入了象征秩序的意义与语言的领域。

三、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概念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思想是在欧洲 1968 年五月风暴的背景下形成的,1972 年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面世,旨在揭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法国知识界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弗洛伊德本人认为自己的精神分析方式是革命性、颠覆性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也确实影响深远,促进了多个学科或者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罗兰·巴特后来借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进行精神分析,拉康则认为弗洛伊德思想开拓了心灵解放的道路。拉康关于弗洛伊德的研讨和相关著作闻名遐迩。“因此,当德勒兹与加塔利著述之时,精神分析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社会批评家们乐于采用的理论方法。不仅在法国确实是这样,而且在德国也是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那里获得了灵感。……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认为,精神分析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相悖的,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本质上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学说——是一种支持‘资产阶级压制’的学说。”^①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流变思维反对固化的、压制性的力量和范畴,他们的反俄狄浦斯概念,就是反对同质异构的资本主义与核心家庭。鉴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心题旨的框架——俄狄浦斯情结——是以“爹地—妈咪—我”的核心家庭结构束缚人性的,忽略了更为宏阔、更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关联域,因此,有必要打破精神分析的模式,从而在思想、社会、人性等方面对固化的、压制性的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进行解辖域化。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0,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哲学上基于尼采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和对差异价值的张扬,对精神分析加以反拨或转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历史唯物论的改造。他们用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分裂分析方法勾勒出反俄狄浦斯的利比多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图式,批判了弗洛伊德俄狄浦斯的家庭模式和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图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弗洛伊德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情结忽视了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囿于一隅;拉康的鲍罗密欧结或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个“秩序”对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之名维度(象征界、菲勒斯、文化律则、权威)的强调和对能指的侧重具有结构性的等级制特征,是“能指的暴政”。而能指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属性,具有专横、恐怖、阉割的特性,是“专制超编码的法则”。因此,德勒兹说:“我们转向了叶尔姆斯列夫。他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流,内容和表达的流,不需要能指。语言作为内容和表达的持续流系统,被离散的、断续的辞格的机械搭配所切断。……我们纯属功能主义者,我们感兴趣的是某一事物如何运转,如何运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而能指尚属‘其为何意?’这一问题的范畴,甚至是一个被划掉的问题。”^①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与观念具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

在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语言问题上,德勒兹在其著作中一以贯之地批判将语言作为“能指”的索绪尔渊源的语言学概念。他认为这种概念提示了存在着一个外在的世界(参照系),我们给这个世界加上意义或从中寻找出意义(所指),然后我们再使用标记或声音将这些意义系统化(能指)。德勒兹从多元生成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对此从两方面予以回应:

第一,并非先有一个现存世界然后才有一个再现式的语言系统。世界是意义的一种内在平台,是联系和生成的链接,生活中充满了符号和编码,而决不仅止于语言。例如,基因密码,昆虫“阅读”植物,肠胃分析和吸纳营养,神话意象与仪式,电脑处理信息和资讯……存在着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人类的、动植物的、机器的)符号选择与反应之链。语言只是大千世界众多褶子或块茎之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4~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一,尽管它对人类而言极为重要。

第二,在符号被再现和拓展之前,它们是有强度的。强度先于语言系统。例如,原始部落欣赏和投注于某种形象(动物、身体某些部分,如生殖器或铭记),形象因而成为图腾,产生一种装配、联系、凝聚部落的功能,但不是再现功能。德勒兹和加塔利谓之辖域化或集体意识投注。当部落之人所欣赏的形象成为具有某种社会意义的符号,成为惩罚与崇敬的超编码时,原先自由漂浮的形象层面不复存在。最终这种超编码化过程导致了社会机器和“人”的产生。原先的情感性欣赏和心理投注变成了符号,符号隐含了某种前存在的现实和前语言系统的强度。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俄狄浦斯问题上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判,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加以整合和扬弃,将无意识欲望与更宏阔的社会生产联系起来,将俄狄浦斯情结模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及功能挂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两个维度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二是寻绎出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模式的局限性和荒谬性,从而颠覆俄狄浦斯模式。这方面关涉到他们的反俄狄浦斯概念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Object Relation School)之间密切的理论联系。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如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客体关系学派认为,应当赋予前俄狄浦斯阶段以更多的重要性,在此阶段,儿童与其母亲关系是更独特的。这一学派的拥护者力图把众多的病理学行为的形式追溯到这种儿童与母亲的关系的两相结构中,而不是归之于俄狄浦斯三角形。这种立场对女性主义理论家如 Nancy Chodorow 等人有着重大影响,她对母亲角色的论述引人注目。在这一流派中,可以把‘反精神病学’的拥护者置于其中,加塔利堪为代表。加塔利与哲学家德勒兹倡导分裂症式的前俄狄浦斯世界,将其作为取代俄狄浦斯情结的宰制的一种选择。他们把俄狄浦斯情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压制结构的同盟”^①。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俄狄浦斯模式的批驳相呼应,著名人类学家 B. 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近来 M. Cecile 和 E. Ortigues 等人都质疑俄狄浦斯情结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的普适性,他们试图描述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结构,其中一些社会并非是孩子、母亲、父亲构成的核心家庭文化模式,另一些社会结构中,父亲并未扮演规训、象征性禁制和压抑性的主导角色。这提示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拉康的象征秩序以偏概全的局限性和夸张特征,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复杂多元的特质。他们的研究结论,可以说与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解辖域化、块茎、分裂分析、褶子等概念殊途同归。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拉康凸现的是一种“能指的霸权和专制”,拉康把传统精神分析话语中的“俄狄浦斯”^①视为一种想象界,一种心理结构和动力学的表达式,并且设计了它的对位领域象征界,即一种以结构观念和语言学阐释欲望的符号学,但是,拉康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俄狄浦斯问题。

德勒兹与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第三章论述的社会生产的系谱学模式,揭示了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俄狄浦斯”拉康版本实际上也具有社会历史的渊源。母亲的身体作为失去的实体和存在领域,源自原始社会辖域的丧失,而部分客体的编码仍然内在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同样,父亲的阉割戒律来自专制者关于社会等级制的分封体制,父亲隐喻的角色(或能指的概念),则呼应着专制者的超编码。处于阉割阴影下的普通臣民的欲望成为超验他者(专制君王)欲望的工具式的欲望;专制者作为无限债务的债权人和主管欲望的超验他者在转喻的意义上以“父亲之名”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再编码,以取代与“部分客体”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中,欲望生产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的流变有两个主要倾向:解编码化(解辖域化)和再编码化(再辖域化)。前者与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相关,后者与精神分析偏执狂(父亲之名、能指霸权、大一统的独裁专制者)相关。而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三角则是一种精神偏执症的简略化、再编码化和再辖域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消极反动的无意识欲望投注。精神分裂症或分裂分析就是要颠覆这种专制

^① 俄狄浦斯(Oedipus)一词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中有多种变异的内涵。例如,它不仅指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和传统精神分析所界说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亦指俄狄浦斯机器、机制、过程、结构和模式。参见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第3页及英译者注解(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者和法西斯式的偏执狂力量,拆解俄狄浦斯三角,开拓和生成丰富多元的新领域。他们对俄狄浦斯机器加以驳难,在奥斯维辛之后至五月风暴的欧洲历史文化背景下,吸引了大批读者和拥护者。

在方法论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分裂分析是一种自由流变的微观分析模式,与宏观意味的俄狄浦斯化的精神分析等级制或能指暴政的无意识概念针锋相对。他们强调无意识的功能,而认为“无意识是一种微观无意识,它是分子的,精神分裂分析是微观分析”,“在微观复数、微观机器、欲望机器、分子组合的世界里,功能主义却是王者”,“唯一的问题是其如何与强感、流、过程、部分客体,与一切不想表明什么的东西一起运转”。^① 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医生在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引导患者自由联想,进入往昔的创伤性回忆,让患者无拘束地说出一切,但实际上,这是医者以俄狄浦斯禁制将无意识欲望加以规整,纳入俄狄浦斯化的频道。其中的律则告诉我们,要成为禁制性的权威(父亲、菲勒斯、老板、资本)宰制之下的温顺、驯服、禁欲主义的主体,不要杀父娶母,不要犯上作乱。引申而言,精神分析学家由此成为禁制欲望的独裁者和编码机制。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情结迎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制形式,是一种资本主义结构。俄狄浦斯化是资本主义挫败敌手的辖域化策略。他们反俄狄浦斯的分裂分析则强调无意识欲望的生产性,将利比多视为流动的欲望,可以进入不同于俄狄浦斯禁锢的多种多样的频道。欲望本身的解放不能仅仅视为性欲的解放,它还有着哲学和社会历史维度的意义。欲望诸流先于再现与生产。既有的一切被辖域化的国家、家庭、教会、学校、政党皆可以解辖域化。“无意识是个孤儿”,不囿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界定。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赞同并强调的 M. Klein 的“部分客体”是一种前语言学的体验,极为重要。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拉康。拉康认为欲望是继发的,在语言之前不存在无意识这类东西。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是始源的、生产性的。

就西方哲学语境而言,俄狄浦斯机器具有总体化(简略化)、本质主义或基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要主义的特征,弗洛伊德的性别斗争与家庭三角形模式、拉康的“父亲之名”的能指霸权,都具有原型、律则或真理的意蕴。德勒兹和加塔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两个维度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们所倡导的生产性的欲望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力量,具有机器式的装配结构和功能,“欲望之流在受阻、改道和转变之际,整个装配路径——可以想象是一种巨大的身体,内部没有任何系统决定论的器官(即没有任何有机统一体)——也随之改变。而由更小的机器形式(嘴、手、脚等)装配所构成的个体,则以一种任意的、非预见性的、非决定性的‘游牧’方式在这个巨大的装配体内外运动。这种游牧主体是装配性的,与系统的、必要的、有机的、完成的巨大社会体格格不入。而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聚合的、非系统和非必要的品质,由此抗衡着理性化和社会同质化。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维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抵抗着外部的力量,颇近于萨特所界说的绝对自由。这就把我们带向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社会批判的更为核心的对象,这种批判对象既不是弗洛伊德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阻碍自由之路的社会状况和态度”。^① 总而言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当时正试图与法西斯主义战斗——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恐怖、僵化、压迫和剥夺个人领域的力量。扩而广之,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压制欲望的主流社会体制是法西斯式的,甚而任何社会本质上都是压制性的。

莎拉帕(M. Sarup)指出:“近来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都对西方基本叙事的绝对主义或普世论的形态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那些与全球性社会构想、人类解放相关联的启蒙思想得以立足的形态提出了挑战。……在这个新的后现代主义世界里,关注的是外观、表面、文本性和自我商品化,再也没有与模仿对应的现实领域,没有‘原本’和摹本,只有同一层面的拟像。”“其要点是: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排斥真理维度的理论,它把真理维度缩减成为一种文本的‘真理效应’。这与拉康恰恰成为对照,拉康总是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真理体验。”^②从理论基点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反总体化、反基要主义的重要一翼。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4,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② Madan Sarup, *Jacques Lacan*, p. 161f.,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分裂分析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命题中,无意识欲望具有两极:一极是精神偏执症(paranoia),另一极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它们既是精神病学富于特征的症状类型,更是哲学和美学意义上互相对照的不同取向,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力量和运动方向。前者是顽固或执著地追求统一、秩序、类同、整体、身份认同和辖域化;后者则是弥散性的和游牧性的,具有如下特色:多元、增殖、生成、流变、片段、解辖域化,等等。在资本主义体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精神偏执狂类型与精神分裂症类型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全球性的体系、唯我独尊的控制力量、全景主义和中心主义,将个人置入其形象模子中加以重塑,因此是法西斯式的、恐怖主义的类型,是树状体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精神分裂式的方式则是块茎式的,没有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僵硬的结构。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一术语常常招致误解。此词最初借用于精神病学,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此来描绘资本经济、文化和利比多等的动态之流变。他们倡导分裂症的概念以抨击资本主义体系,把分裂症视为建设性、革命性的正常状态,而把偏执狂视为疯癫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把文学视为类似分裂症的革命机器:文学能够通过审美超越,打破现存体制,孕育新的视界。卡夫卡及其相关的少数族文学概念是他们的著名例证,其中蕴涵着反抗正典文学,反德国法西斯主义、反英美官僚技术机器、反奥匈帝国城堡、反西方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力量。同时,他们也期冀着相应的分裂分析型的读者出现,其任务是将文学文本转化成欲望机器和革命机器,^①以新视野读出文本的新的意义。“更确切地说,德勒兹和加塔利使用精神分裂症以意指精神与社会功能的一种特定模式,具有既为资本主义经济

^① E. Wrigh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pp. 159~165, London: Routledge, 1989. A. Edgar and P. Sedgwick,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Thinkers*, pp. 39~42, London: Routledge, 2002.

所压抑,又为资本主义经济所生产的特征。”^①霍兰德以爵士乐与交响乐的对比,以及美式足球与英式足球的对比,来对精神状态的这两极加以例说。交响乐队与英式足球队,爵士乐与美式足球显然都不是精神疾患,但却分属两种类型:交响乐队与英式足球队类似精神偏执症,因为它们分享某种组织和运作模式,明确地分派固定的角色,追求某种统一效应。而爵士乐与美式足球则近于精神分裂症,因为它们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群体中的人物互动更为自然随意、自由无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精神分裂症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的一种解辖域化的模式。

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一词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后结构主义重要概念,其前缀“schiz-”既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又指更具哲学普遍意义的裂变、划分、生成的过程,标示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拆解总体化思想的特征。^② 德勒兹在他的著作《对话》(*Dialogues*, 1977)中对这种分裂分析作了颇为详细的描述。德勒兹和加塔利把“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与作为医院临床实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区分开来”。他们把精神分析,尤其是其中标志性的俄狄浦斯情结,视为一种总体化的阐释范式和归纳模式,它如同频道,把欲望纳入适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中。而“分裂分析聚焦于亚个体的身体诸部分与超个体的社会联系,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领域整合成为单一的欲望生产领域”^③。分裂分析并不是回归弗洛伊德或马克思,而是尼采式地注重关系之中的差异因素,注重多样性、机遇与生成,是以无羁的思想和欲望之流取代索绪尔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能指霸权的一种积极、革命的逃逸线。可以说,分裂分析既是认识论—心理学批评,也是社会历史批评。

在西方思想史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倡以后结构主义的分裂分析替代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一切欲望皆属于社会而不囿于家庭。他们质疑精神分析关于利比多与匮乏论之间的关系,反思超越家庭的欲望在社会历史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x,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②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83,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中的位相,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分裂分析把欲望(精神分析)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两个体系转换成为“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的概念,否定了从柏拉图以来(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在内)将欲望视为“lack”(此词具有“匮乏”与“需要”双重含义)的概念,把欲望看成是第一重要的生产力,认为无意识欲望是一种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一种“欲望机器”。在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经典理论相关方面,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欲望视为基础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层建筑。分裂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利奥塔所说的“利比多经济学”相结合,拒绝两者中任何一者有优先权。在分裂分析的理论视阈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强化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马克思相反,将社会与个人分离。“欲望生产”则体现了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加以弥合的理论努力,《反俄狄浦斯》的核心章节区分了精神压抑(该书第二章主旨)与社会压制(该书第三章主旨),意在将弗洛伊德加以社会历史化。

从德勒兹和加塔利分裂分析的思路与方法而言,社会压制与个体心理压抑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社会压制的形式决定了心理压抑的形式,两者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总是站得住脚的。对分裂分析而言,精神分裂症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病状或精神错乱,相反,而是指在由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分裂式的动力学力量,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机构(包括精神病院、精神分析和核心家庭等结构)之间的不协调状态。因此之故,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皆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作为副标题。在此意义上,无法再以单纯而狭隘的心理学维度或病理学个人疾患来界定精神分裂症,而应将其作为一种过程哲学或动态美学,并且将其置入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阈。

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分析具有“唯物论精神病学”之称,有较为复杂的理论资源和唯物主义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起点是19世纪三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分裂分析从他们原创性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此外,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受惠于斯宾诺莎和柏格森,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例如混沌理论与分子生物学理论。W. 赖希(Wilhelm Reich)认为心理压抑依存于社会压制,他因此被德勒兹和加塔利视为“唯物论

精神病学”的真正的奠基人,是“提出欲望与社会领域相联系问题的第一人”^①。尤其是他突出了大众法西斯主义情结问题,而不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意识形态问题或虚假欺骗问题。这与福柯把《反俄狄浦斯》读解成为“反法西斯主义之书”的结论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从学理渊源上说,德勒兹的分裂分析哲学有两类思想资源:一是早期他钟情并浸润于斯宾诺莎、柏格森、尼采的思想中所汲取的反叛、差异的哲理,二是他后来与加塔利合作并密切接触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理论视野由此大为拓展。分裂分析的概念就在这两类皆颇具价值但又迥然不同的思想或著作之间激荡而生。

在尼采哲学的观照下,《反俄狄浦斯》所讨论的最基本关系是利比多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而扬弃了其他关系或问题,例如临床医学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界说,心理学视欲望为“匮乏”的定义,俄狄浦斯模式等都遭到他们的扬弃。但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纳入问题框架进行整合,德勒兹和加塔利并非始作俑者。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是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杂糅的佳例,W. 赖希的《性高潮的功能》亦颇为著名——它们都是《反俄狄浦斯》的前驱。马尔库塞实际上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历史概念、韦伯的宰制概念落实到弗洛伊德的表达模式上,把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标靶,由此改变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的历史观。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原始部落神话和原初弑父的母题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非真正的人类学,也不具真正的历史价值。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施行压迫与压抑的权威象征,在马尔库塞的神话—历史图式中第一次由家庭向外拓展到社会,从父亲形象延伸到头领、牧师、老板等形象。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明显地体现了融合马克思与尼采的旨趣:韦伯改革基督教心理学(尼采最喜爱的目标之一)以适于资本主义剩余生产的动力学(马克思分析的主要焦点)。韦伯的关键概念“理性化”既来自尼采《道德系谱学》对作为等价物的堕落文化的现代性分析,也与马克思关于作为资本主义普遍等价物的资本经济看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卢卡奇把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 London: Routledge, 1999.



韦伯的“理性化”移植成“具体化”(视之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直接效应),都接近于分裂分析对尼采与马克思的糅合。^① 德勒兹和加塔利与韦伯、霍克海姆、阿多诺、卢卡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效应:解编码与重新编码。他们避免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铁笼、霍克海姆/阿多诺关于单维度的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卢卡奇对前市场化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怀旧情感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抨击等片面的悲观主义倾向。

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他们与其他所有后结构主义明显不同的一点,在于其将尼采与马克思的唯物论结合在一起。尼采与马克思一方面都强调身体及其力量(权力意志、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身体能做什么”的历史延伸维度。他们都认为精神结构(如信仰)和社会结构阻碍或制约了人类力量的发展。尼采和马克思皆批判当代社会,只是分析的对象殊为不同:尼采侧重于心理与文化维度,马克思则是侧重于社会经济维度。他们的结论也不同:尼采认为要通过追求个体的自我改变而从虚无主义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则认为要通过追求集体的社会变革而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借用韦伯的观点来说,现代新教禁欲主义与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以对个体的压抑为特征,后者则以对社会集体的压制为基础,因此尼采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德勒兹和加塔利则更进一步从反精神分析的维度指出:严格地说,不是北欧的新教,而是核心家庭成为人类再生产(禁欲主义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精神分析聚焦于核心家庭,错误地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生产的普遍形式,从而使得弗洛伊德学说成为一种本质上与资本主义辖域化合谋的禁欲主义心理学。反精神分析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上,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必须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加以历史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反驳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关于“匮乏”形态的描述。他们追随巴塔耶,认为社会总是在生产某种剩余物——不管境况多么糟糕,剩余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ff., London: Routledge, 1999.

物多么微不足道。社会的组织安排围绕着如何决定和由谁分配这些剩余物而运作。将弗洛伊德历史化和加强对人为的匮乏性的社会管理,这两者对分裂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在关于弗洛伊德与尼采历史观的问题上,德勒兹/加塔利与布朗(N. O. Brown)的观点形成交织和对照关系。虽然他们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弗洛伊德与尼采认为西方文明社会不断地对人类犯罪,但是布朗倾向于借用弗洛伊德学说对此加以解释(尽管他在对弗洛伊德的修正中也乞援于尼采关于金钱的分析),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倾向于借用尼采思想对此进行阐发。布朗认为金钱的原初功能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创造与支付债务,由此既滋育又缓解了犯罪。在古代社会,债务被归于神,因此在原则上是可以清偿的,而且实际上也呈现周期性清偿的现象;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当债务归于他人并非归于神的现代来临时(新教世俗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债务便变得无限循环且不能清偿了。布朗认为,只有完全拒斥新教—资本主义罪与债的文化,将此理解成为精神病的一种形式,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德勒兹和加塔利钟情于尼采式的社会政治解释,在旨趣上迥异于布朗式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维度的解释。他们的历史观清楚地表明:历史绝非是精神病症,而是机遇和流变。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它建立在非个人市场联系的“现金关系”(cash nexus)的基础上。但布朗的看法也给予了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极大的思想启迪,他们由此看到尼采和弗洛伊德关于罪恶的分析对于马克思的剥削分析理论具有重要的互补性:金钱不再仅仅被设想为交换和积累的工具,而且也是制造和施加债务与罪恶的工具。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后现代探索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在社会文化层面,精神分裂症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揭示了其内在矛盾。总括而言,资本主义孕育了精神分裂症,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主导世界历史的重要社会文化模式和流变力量,不断地在扩张。但是,无论是地理上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还是心理上利益驱动的扩张(欲望的市场竞争),都消弭了现存的意义与信仰,因此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资本主义的另一极“精神偏执症”则倾向于建立绝对的信仰系统,企图将一切意义



加以固定。尽管“偏执狂”与“分裂症”两个术语皆有精神病学的渊源,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主要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规律和组织原则。前者古老、传统,以信仰为中心,以辖域化为特征;后者生气勃勃、自由无羁,具有革命的或积极的潜力,呈现出解辖域化的趋向。

总括而言,作为一种历史向度的唯物论精神病学,分裂分析从现代三种唯物论中汲取了养分:《反俄狄浦斯》的专门术语及其运用不仅融合了弗洛伊德利比多概念和马克思劳动力的概念,而且正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成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欲望生产)的基石。但是,若把分裂分析理解成为这三种唯物论的大杂烩却是错误的,因为对这三种分离的视角进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合几乎不太可能。确切而言,它们之间不是总括或补充的关系,而是交互干扰或矫正的关系。而对《反俄狄浦斯》而言,分裂分析的核心问题不是“它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能够做什么”和“它如何做”的问题。^① 与其说分裂分析是理论问题,毋宁说它是实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① E. W. 霍兰德在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分小节论述了分裂分析“如何做”的三个批判性运作机制,分别与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相关。

第四章

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 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

如前所述,霍兰德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俄狄浦斯批判分为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两方面:内在批判旨在于阐发欲望生产,外在批判旨在于阐发社会生产。

在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核心论旨集中在欲望生产的概念阐发上。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微观政治哲学阐发反映了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一代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理论加以整合和扬弃的努力。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与经典精神分析学派俄狄浦斯学说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颇为不同的欲望观和生产观。他们的分裂分析将欲望(精神分析)和劳动(政治经济学)两大体系转化成为“欲望生产”的概念,开辟了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的新领域。

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分裂分析的思路在精神分析层面对俄狄浦斯情结解辖域化,以系谱学方法探究在社会历史层面俄狄浦斯由何而来,在前社会中它是什么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如何通过核心家庭再生产的私人化而转化和实现的,进而分析原始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三者在生产、刻录和消费方式上的性质与差异。以下主要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资本主



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的题旨,结合霍兰德的《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1999)与 R. 博格的《德勒兹和加塔利》(1996)的相关阐述,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概念及其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的维度的历史叙事问题试加论析。

第一节 欲望生产的三种综合与构型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理论具有复杂丰富的内涵:在精神病学层面,精神病患者常常体验到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是分离的实体,有时感到它们像是侵犯和迫害人的机器。精神分裂症发作时患者似乎可以看到体内没有器官;有些患者则看到影踪不定、多种形象的人物,并在臆想中认为自己是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如拿破仑、耶稣等等。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以精神病学的经验为基础,从心理学维度提出欲望生产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将精神疾患浪漫化,而是力图由此揭示在当代哲学和美学语境中颇为重要的无意识问题的核心症结,并且将其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史联系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在学理上,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欲望生产是一种持续不断且似乎无所不在的创造流和强烈情感流,并以多元和弥散的方式体现出来。无意识没有提出意义问题,而只提出使用的问题。欲望问题不是“欲望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而是“它是如何工作的”问题。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皆将欲望等同于缺失,德勒兹和加塔利则扬弃了这种传统的欲望观,而将欲望视为第一重要的生产力,并试图将无意识欲望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起来。

鉴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是从精神分析的维度切入而展开论旨的,因此他们的欲望生产观念具有对人的精微复杂的心理机制加以深入探究的微观特性。根据霍兰德的看法,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题旨下的反俄狄浦斯的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皆直接来自对心理情综的分裂分析理解。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

研究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① 他们对欲望生产的心理情综(the psyche)的分裂分析模式是一种机器模式,或机制模式——欲望机器的模式。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生产与三种逻辑综合和三种无意识构型密切相关。德勒兹曾经在他的《意义的逻辑》中阐发了三种逻辑综合:链接综合、选言综合和联言综合。而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它们分别与不同社会体(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维度——生产、刻录和消费——联系起来,构成与欲望机器相关的三种无意识综合。

反俄狄浦斯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揭示欲望生产的这三种综合机制:生产的链接综合,刻录的选言综合,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因为欲望机器是根据这三种综合而运作的。与这三种综合相应,R. 博格认为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是精神(病)体验的三种构型(霍兰德则认为无意识的三种构型),它们构成了欲望生产的基础。^② 德勒兹和加塔利从精神分析和社会生产的层面把这些情综的功能模式称为综合(synthesis),部分原因是为了引起与康德统觉的综合(syntheses of apperception)相类似的联想。正如康德的统觉综合是建构知识的方式一样,这些综合是对过程加以把握的方式或建构经验的方式。从欲望生产概念的主要脉络中,可以梳理出三种综合与构成类型。以下试分述之:

一、欲望机器的“生产的链接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机器(desiring-machines)概念属于分裂分析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学隐喻。他们否定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利比多欲望观,而认为无意识欲望是一种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而且欲望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异质的、流变的和多元性的;由于不同的社会对欲望流的编码和辖域化的方式不同,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欲望机器生产的链接综合(the connective synthesis of production)。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25,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②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95f.,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本书关于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的阐发主要参考此书。



在逻辑学意义上,“链接综合”意指可连接的选择项(命题)。欲望生产的概念促使德勒兹和加塔利将一切都看作机器与装配,认为身体是由各种各样的机器构成的,其中具有纷繁复杂的可连接性。欲望机器的概念提示无意识不是一个剧场而是一个工厂,不是宗教的或拟人的修辞比喻,而是生产性的机制。欲望机器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机器的不同在于:技术机器把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零件)合成一个整体,要么有效地工作,要么垮掉,而欲望机器将异质的、独立的各个部分搅和在一起,“欲望机器只在它们垮掉并且不断地垮掉时才工作”(《反俄狄浦斯》,8页),从而呈现出一种无意识欲望的动力学机制,因此欲望机器具有无限链接“部分客体”的功能,但是避免指向僵化的目标、效应或系统的统一性。

欲望生产的“链接综合”与本能或内驱力相关,它赋予客体以价值或情欲,大致与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注情(libidinal investment or cathexis)的概念相当,具有西方爱欲之神厄洛斯(Eros)或生命本能的功能。生产性链接综合的主要驱动方式是:生产性的欲望在客体之间构成联系,例如婴儿的嘴与母亲的乳房。它具有三个特征:其一,生产的链接综合与弗洛伊德式的内驱力相关,并且构成唯物论的模式的基础。其二,它联系的仅仅是英国精神分析家克莱因(Melanie Klein)术语意义上的“部分客体”,而不是整体性的个人,也不是把器官与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其三,生产性综合产生的联系是多元的、异质的和连续的。例如婴儿眼睛看到母亲头发后又看到脸,然后看到乳房、膝盖;他的嘴巴与乳房联系,然后与空气联系,然后又与手指头联系。其联系模式是一系列非定向的递进联系(即“and...and then...and then...”),力量之流通过这类链接而生成,并将情感灌注于作为“部分客体”的器官。

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题旨下,并非是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作出了同样的发现,欲望与劳动也并非同一事物,但是,这两大发现皆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有关。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欲望机器”的概念将利比多与劳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具有思想上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挑战性。《反俄狄浦斯》第二章聚焦于对“神圣家庭”的俄狄浦斯三角结构“爹地—妈咪—我”(daddy-mommy-me)的批判,第三章将俄狄浦斯问题与“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的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讨论联系起来,强调它们体制上的联系与区别,重构了欲望与生产的关

系,使欲望机器的概念与其他的分裂分析概念如解辖域化、再辖域化、解编码、再编码和欲望生产一道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辞典中的重要术语。

二、无器官身体的“刻录的选言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无器官身体的“刻录的选言综合”(the disjunctive synthesis of recording)涉及无器官身体、刻录和选言综合三个概念。

在逻辑学意义上,“选言综合”意味着可分离或分隔的选择项(命题)。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在意义或意指系统产生之前,有众多刻录系统(systems of inscription),它们具有潜在的可选择性。由此,他们坚持一种前历史的视阈,认为人类语言和意义是从原始的、身体的联系中诞生的。原始部落通过刻录、铭记、文身、在身体上切口凿孔,或在岩壁上绘画而创造了许多符号。最初这些符号标记或身体疤痕仅仅是一种初民的个人装饰或装配,并无额外的意义。但是,生活在一定时空之中的原始部落渐渐开始了辖域化的文化符号的认同历程,在“这种装配的事件被辖域化之后,这些铭记可以‘读解’成为某种普遍的身份认同的符号。当某个人的身体凌驾于部落之上,把他自己作为社会秩序的再现(这些铭记现在被作为再现之用)之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一个专制独裁者从部落中冒出来,自命为法律和天授神权的代表人物。这时,这些铭记变成所有权的符号,与某种外在的参照点(独裁者的身体)联系起来。原来的辖域由此被解辖域化。这时不再是单纯的诸身体的装配。一个身体已经‘跳出了链条之外’,把自己作为源头、意义和装配之法律的代表。……语言随着铭记的解辖域化而产生。铭记不再直接意指发出或承载它们的身体个体;铭记已成为我们共享的感觉符号……不再是单一的刻录。语言从根本上是解辖域化的、集合的、部族的……解辖域化通过将符号从单一的源头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以说话;我们可以交流,并成为集体装配中的说话者。当我们想象有一个主体始终是语言之源时,再辖域化就发生了。我们认为是‘人’发明了语言,而不是语言的结果之一”。^①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提供了一种关于表达式的系谱学历史,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符号编码、解编码、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116, London: Routledge, 2002.



再编码的历史。符号作为社会形态的功能要素,调节着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无器官身体就是不同符号的系谱学刻录前最初的空白载体。

德勒兹和加塔利把部分客体和无器官身体作为分裂症深渊(schizophrenic depths)的两个因素。分裂症深渊是一个蛮荒之地,人们总是面临着坠入这个深渊的危险,但却可以在思想的形而上学表面安全地思考其“反映”。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深渊与表面的对立以及无器官身体固有的吊诡性和威胁性消逝了,但关涉到观念与问题的超验表面的核心特色却浮现出来,成为无器官身体的特质。在《千高原》中,无器官身体被描绘成“欲望的内在领域,欲望的一致性平台”,其上流动着“纯强度的、自由的、前物质的、前有机的单一性(singularities)”。无器官身体在一个本身是强度的、未拓展的空间中生产并且分配强度。这是一个具有强度的未形之物,没有科层化,是强度的母胎,在那儿强度等于零。无器官身体基本上是部分客体的一种聚合,它阻断“有器官身体”的三大组织原则:有机论、意义论和主体性。

在欲望生产过程中,当欲望机器被冻结并成为“一个巨大的无差异的客体”时,无器官身体阶段开始了。——这个无差异的客体就是无器官身体,即零强度的欲望机器,它标志着一个反生产的阶段出现,不断地对生产过程发挥反作用(故此,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机器只有在其垮掉时才能发挥功能)。因此,欲望机器和无器官身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面是功能的多样性,另一面是纯粹的、未拓展的零强度实体。这两种状态作为分裂的实体共存,处于不断的动摇之中。两者之间呈现出排斥与吸引的关系。

无器官身体的概念最好是在其与更宏阔的社会无器官身体的联系中加以理解。德勒兹和加塔利把零强度的社会无器官身体的(再)辖域化的形式称为社会体(socius,或译为“聚落”)①。社会体的观念对社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每一种社会都会生产出一种社会体,成为生产的自然前提或神圣前提。社会体的三种基本类型为:原始社会的大地身体,野蛮社会的专制身体,资本主义

① 此词并无现成的中译文,为了论述和理解的简便,暂且译为“社会体”。但是,2001年孟夏刘禾教授在北京主持清华大学—美国伯克莱大学第一届高级理论研讨班时曾经强调,德勒兹在概念创造方面力图不落窠臼,颠覆传统,因此将 socius 译“社会体”会令人联想到“社会”的概念,有违德勒兹本意。当时大家讨论热烈,多数人倾向于用“聚落”之类的词来移译。

社会的资本身体。原始人建构了人类原住民(土著)起源的神话;野蛮的专制体制播散了统治者绝对权力的神圣起源神话;而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所展示的那样,它将资本拜物教化,建构了颠倒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神话。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神话的准因果律(quasi-causality)推衍到所有的社会,并且归结成为欲望机器与无器官身体的神化(miraculating)关系。神化就是一种魅化、辖域化或编码化,与解魅、解辖域化或解编码化相对位。

当欲望机器被神化之后,它们便作为众多互不相连的点粘连到无器官身体上面,编织起新的逻辑综合的网络。因此欲望机器与无器官身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坐标网络,出现横截线效应。例如,一个欲望机器可以在数个不同的网络线上发挥功用(嘴巴机器可以是饮食机器,可以是呼吸机器、说话机器等等),但不是共时性的发挥功用。欲望机器由此在网络上循着不同线索与这个或那个机器结合。而重要的是,无器官身体扮演着选言综合的角色。在传统逻辑学中,选言综合是矛盾的,因为选言意味着分裂,而综合意味着统一。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倡导的是一种“肯定的、非限制性的、包含一切的”多元开放的选言形式:既区分差异性本身,又肯定差异性的差异。

刻录的“选言综合”比较复杂,它关涉心理情综中愉悦、记忆和符号刻录的功能,与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Thanatos)相关。心理情综包含着刻录机器的概念并非德勒兹和加塔利首创,弗洛伊德神秘的书写便笺(a mystic writing pad)就是一种心理情综模式,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使自己得到满足的东西时,内驱力的注情就会在心中刻录下先前曾引起满足欲望的特定东西的形象。或者说,由于儿童的欲望难以自主实现,无法获得期待中的东西时,其情综中的刻录机器往往会臆造出虚幻的替代性(可选择性)形象来满足自己。

弗洛伊德对这种关联性颇感兴趣,视为“重复”的问题。他从形而上的角度出发认为重复是情综的核心,但是他所谓的重复是对同一性的重复,而不是差异的重复。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基于的是死亡本能——“回归生命开始前事物的无机状态”,是机械性地、线性地,回归同一与静态,而不是生成和创造,不是趋向于差异与动态。而德勒兹具有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的“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强调的重复是差异的重复,并认为这种重复在多元变化和不断



分衍中展示积极的力量。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精神层面上的刻录以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在阐释情综的刻录过程方面,借用了阿尔托的“无器官身体”概念,将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概念作了戏剧性的转化。他们更喜欢用“反生产”一词来取代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说法。他们的分裂分析把刻录的表面称为无器官身体,把身体视为器官的装配,不仅包括性器官和五官,还包括身体的所有部分。无器官身体的系统构成不是线性的,不同于拉康式的“意义链”,不由“欲望的转喻”制导,而是可以具有共时发展的众多意义链,具有复杂多元的符号关系,是符号中自由联系的不确定模式。它甚至不属于任何符号系统(如拉康认为无意识属于语言系统),而是具有突出的异质性。人类的语言常常窘于表达人类的身体,故而言不尽意可以改成“言不尽体”。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无器官身体恰如身体与意识之间的一个屏幕。当反生产的力量把由生产的欲望所造成的积极联系加以解性欲化或中性化时,无器官身体就构成了一种刻录的表面。在器官机器和无器官身体之间,欲望生产和反生产构成交互节律。反生产的效应之一就是已从既已建构的联系和满足模式中解放出来,生成一种好像亟待刻录的空白纸版(*tabula rasa*)的“无器官身体”——欲望驱力的轨迹可以在上面生成多元性与差异性。

三、游牧主体的“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的“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the conjunctive synthesis of consumption-consummation)除了本身具有独特的内涵外,还涉及社会体中主体、消费、债务与义务等维度及其相互关系。

主体是伴随着“上帝之死”而来的一种现代哲学观念。如果我们不再设想有某种神圣的力量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时,我们就会从新的维度把我们的世界阐释为一个有规律和秩序的整体。从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观念到20世纪阐释学的解释,都把作为阐释经验世界的主体,力图以理性去解释或怀疑一切。笛卡儿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即是一种关于主体的宣言。显而易见,大多数20世纪和21世纪的理论都接受了这种主体原则。这种原则已经超越了哲学的范畴,而进入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的概念指涉的却是一

种后结构主义多元生成的主体观。他们把游牧主体描绘成巡游于无器官身体网络的纯粹强度的点,标示着不同的欲望机器在主体身份上混合生成的轨迹。游牧主体追溯的是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过程,即追溯主体生成植物、动物和矿物,生成“种族、文化及其诸神”的过程。这种生成过程以历史的名义跨越了自然和社会的无器官身体的世界。辖域化的社会符码是一种排外的、限制的、否定的选言综合。它们犹如频道,把欲望生产导入指定的渠道。而一旦重大的社会变革使得这些符码被解辖域化,那么,涵盖一切的无器官身体便成为可能,欲望生产的第三种因素——游牧主体也因此产生。

尽管我们承认人作为主体是由文化、阶级和性别所决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又认为世界就摆在那儿,等待着彼此分离的、观察着的主体去体验。今日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常常设定,我们的世界是由人类依据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去建构的一个主体性的世界。尽管我们不再有外在的基础(例如上帝和真理),但是我们仍然在创造思想形象作为某种最终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哲学具有重要性的原因。而在当代学术语境和后结构主义哲学视界中,主体概念遭到了重大的思想挑战。例如,德勒兹认为主体论只是超验论的一种形式。传统的超验哲学错误地颠倒了差异与认同的关系,以认同作为统合差异与多元性的基础,而不是从差异中萃取共同点。譬如,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是基因遗传的始基,而不是基因遗传之流中的一个“事件”。我们认为语言是说话者的工具,而不是生成说话立场的一种差异力量。正是差异与生成的哲学及美学观导致了德勒兹“游牧主体”概念的诞生:人作为主体不再是固定的、单数的(实践或阐释事物的)基点,而是生产性的欲望之流的一种多元联系和开放性语境生成的结晶。

从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这三个因素出发,可以把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无意识欲望生产的概念设想为一个巨大的蛋,上面覆盖着纵横交错的线与游走不定的强度点:无器官身体就是这个世界之蛋,是宇宙的胚胎;其区域、斜坡、强度及潜在的裂缝与刻录在其表面上的运动轨迹互相呼应;这些互相交叉的轨迹之线代表着欲望机器和它漫游的点即游牧主体。此图式实际上是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单一性平台模式的修订版:一系列单一的点与欲望机器相呼应,所有单一的点构成的平台与无器官身体相呼应,而任意的点



则与游牧主体相呼应。从霍兰德关于俄狄浦斯外在批判的角度而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生产的上述三个因素与其说是心理学模式、逻辑学模式,毋宁说是欲望的社会文化模式。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有体制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分子和(衡量分子的)克分子之间的差异。社会体不是根据交换而是根据刻录(inscription)加以定义的。无器官身体即是这种刻录的表面。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维度,用系谱学的方法对欲望模式的历史生成作了大量的阐述,其焦点在于社会体与欲望机器的联系,他们的哲学观念具体体现在:从反生产、刻录、编码和债务多个层面,对原始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

在反俄狄浦斯复杂的概念系统中,社会体、反生产与债务是三个基本的或更为抽象的范畴,需要先作梳理。为了表明剩余价值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具有与原始社会、专制社会极为不同的特点,必须在这三个范畴的观照下分析上述三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其中编码的形式、反生产关系和刻录系统具有特殊意义,精神分析中的俄狄浦斯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①,而分裂分析则旨在揭露其中的差异与悖谬。

正如欲望生产是由无器官身体所组织的那样,社会生产是由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言的“社会体”所组织的:大地身体与原始社会,独裁者身体与野蛮体制,资本身体与资本主义。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联系的本质在于,社会体不仅仅是生产性欲望投注的社会焦点,而且还具有“反生产”的历史性变化,并且在消费问题上表现出两种基本模式: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

由此出发,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反生产(anti-production)概念,把消费命题加以凸显。他们认为反生产在组织社会体的社会生产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类似于“欲望机器”一词,反生产的概念不仅为分裂分析提供了欲望生产领域与社会生产领域之间的重要联系,而且社会生产与反生产的关系使我们能够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0f., London: Routledge, 1999.

评价记录过程的结果。

在逻辑学意义上,“联言综合”意指可联系或可结合的选择项(命题)。联言推理的组合式,即根据一个联言命题的各个联言肢为真而推出该联言命题为真。大致说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消费方式: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而从消费维度而言,这两种消费的方式和结果都是真实的、可联系或可结合的选择项。只不过传统上人们主要关注前者(生产性消费),而忽略了后者(非生产性消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贡献之一就是对反生产和非生产性消费维度的理论阐释。

需要指出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反生产”的社会意义与巴塔耶具有心理学和人类学意义的耗费(dépense or expenditure)概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巴塔耶就没有德勒兹和加塔利分裂分析的“反生产”概念。生产性的消费以攫取与贮存为特征,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占有和积攒。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则以耗费为特征,是一种奢华消费,从不权衡利弊或要求有目的性回报。巴塔耶认为,资产阶级属于前者,他们拒斥非生产性消费,千方百计获取最大的利润,并且将财富藏在禁闭的大门内,其伪善的消费法则导致“慷慨与高贵”消释了,剩下的“只有富人与穷人的强烈对照”。巴塔耶反感资本主义消费方式,认为非生产性耗费(包括奢华排场、夸富宴席、战争、哀悼、宗教膜拜、豪华墓碑、仪式、游戏、奇观、艺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等等)是人类获得的最初动力。巴塔耶甚至认为任何社会都不会真正地围绕着生活需要和使用价值组织自身,社会组织总是以“过剩消费”为基础的。他从普遍经济的观念出发,认为“耗费”经济犹如太阳慷慨地普照和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一样,因此过量的阳光或利润应当被挥霍掉,以避免引起失去平衡的危险。因此“过剩消费”是巴塔耶普遍经济的规律。^①

巴塔耶的思想在三个方面启迪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其一,坚定了他们对“缺失论形而上学”的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瘟疫般毒害从柏拉图到拉康的西方哲学、美学与心理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不基于某种原初的缺失或需要,相反,欲望与巴塔耶普遍的、利比多过剩经济学有关,欲望本身就是生产

^① 参阅汪民安:《巴塔耶的神圣世界》,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4)。



和社会性组织的反生产。其二,分裂分析的反生产概念将权力问题导入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模式,德勒兹和加塔利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总是第一位的思想,仍然保持其自主的动力学作为欲望的基点和表达式,但是他们赋予生产力以反生产的形式与目的,认为正是这种反生产关系组织了剩余物的社会消费,并与各种权力关系的体制联系了起来。对于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二元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加上了更为丰富的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增殖成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反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之间的选择关系得到拓展,包括了新的领域即反生产领域在内。其三,反生产作为社会体的物质与力量之流的组织形式,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提供了矫正列维—施特劳斯交换论(exchangism)的债务(debt)概念。他们认为任何象征秩序最终的基础不是施特劳斯所言的平衡状态的等价物的交换,而是非平衡的、差异的或权力的债务关系(详见下面关于三种社会体的分析)。

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三类社会体与欲望微观(反)历史哲学刻录

R. 博格认为:“《反俄狄浦斯》中最重要的不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也不是其革命政治学观念,而是其关于欲望生产的历史论析——欲望生产的历史可以视为欲望与权力互相作用关系的社会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论的历史,是尼采《道德系谱学》关于权力的历史、巴塔耶关于普遍的、利比多过剩经济史的延续。”^①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共分四个部分:①欲望机器。②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庭。③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④分裂分析导论。其中第三个部分的主要论旨是将社会生产对欲望生产的压制加以历史化,以展示俄狄浦斯是一种与其他模式颇为不同的特殊资本主义模式。实际上,社会生产方式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不能简缩成为仅仅是权力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即使是设想一种理想的分析模式也要更为复杂。每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中,社会的组织和压制、生产与反生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105,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产都还要牵涉到下列要素:①作为欲望的社会投注(the social investment of desire)的焦点或支撑的社会体;②反生产的具体运作方式,它与下列具体形式相关,即剩余价值、债务、编码的具体形式、刻录系统。上列要素构成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复杂联系。

在社会生产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勾勒了三种类型的社会机器:前国家机器(原始的辖域机器),国家机器(野蛮的专制机器)和后国家机器(文明化的资本主义机器)。它们大致吻合于马克思提出的三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霍兰德提示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这三种模式——原始模式、专制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的描述,最好是从俄狄浦斯系谱学维度而不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维度来加以理解。“系谱学”一词,在福柯从尼采哲学萃取而来的意义上说,其所基于的前提是:历史机构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并非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顺畅、持续、渐进地展示它们的潜力和实施其现实化社会进程的,所谓线性发展的大一统历史其实充满了话语权力的运作和非连续性的断裂,因此社会历史必须从差异的维度而不是连续性的维度加以理解。^① 同属后结构主义哲学一脉的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微观历史叙事在精神实质上与福柯相通,但他们建立在分裂分析方法论基础上的(反)历史哲学刻录的思路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线性发展或编年史观念颇为不同。

社会生产和反生产与不同的社会体的剩余价值模式及编码方式密切相关。生产与反生产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之流变构成了特定的组织形式,按照霍兰德的看法,这类组织最终是以两种方式完成的:质量的或数量的,象征性的或经济性的。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分别是经由编码和超编码(codes and over-codes)象征性地组织起来的;而资本主义则是经由公理(axioms)经济性地组织起来的。以下分别予以简述:

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系统主要是对特定商品的剩余价值加以临时的积累,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编码决定了什么东西具有价值,例如牲畜、薯块、贝

^①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58, London: Routledge, 1999.



壳之类的东西在整个部落看来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会把它们积累起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编码的剩余价值”。原始社会体常见的挥霍浪费的狂欢仪式具有阻滞积累的功能,通过毁弃或分散所积累的物品使每一个部族保持其在象征秩序中的合适位置并且承担其义务。因此原始社会体反生产系统中的债务是零星的、交互的,它们仍然内在于由血缘系谱和婚姻联盟构成原始社会组织的亲属体制之中,具有将权力与(任何一个家庭或部族的)利益相分离的编码功能。

在专制社会体的权力结构中,反生产的功能颇为不同,它不是以血缘系谱和婚姻联盟的网络来连接债务与责任义务,而是将一切义务都集中地导向专制者本人——人们必须对独裁统治者效忠,从而把原始社会体零星的、交互的反生产关系转化成为向“超编码”的独裁统治者(例如封建社会的国王)履行的一种无限的、单向的债务。比较而言,专制主义的精神偏执症(paranoia)特征,不仅可以同原始社会体精神反常症(perversion)的特点形成对照,而且还可以同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及核心家庭症(neuroses of the nuclear family)构成对比。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金钱公理化的出现打破了以货易货和物物交换的社会生产流通状态,标志着以抽象价值对社会编码和文化意义的一次宏大的解辖域化。资本主义与其他任何以编码和超编码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公理化(axiomatization)过程的基础之上的。公理化不仅脱离了意义、信仰和习俗,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蔑视和颠覆它们。可以说公理化把具有特异性质的活力论和现代主义赋予给资本主义。与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质量”的社会组织不同,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社会组织机制是“数量”的、严拒意义的。例如在资本市场上无名无姓(性)的工人只有作为抽象而可测量的劳动力数量才具有价值,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不再存在与性质相关的区别。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称为流(flow)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编码与超编码。它在生产厂家(包括消费生产)投资的金钱之流(劳动、物资、技术、市场开发)与生产—消费循环的末端回笼的金钱之流之间构成了一种可计数量的差异。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的,不再支撑原始社会体本土性组织的动态债务关系,也不再为了反生产的超验实体(如

专制者)的原因而组织等级制的生产,而是为了剩余价值本身进行不断地生产。资本本身成为它自己反生产的例证,剩余价值变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公理化通过抽象价值对编码和意义进行第二次宏大的解辖域化(专制独裁的分配是第一次宏大的解辖域化),金钱(资本)及其公理化原则取代了编码和意义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公理而不是用编码和超编码来将流动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与其他社会体区分出来的理由之一。

原始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分别与社会生产/欲望生产/反生产的三种模式密切相关,而俄狄浦斯化则是其中一个漫长的故事——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述中,欲望的俄狄浦斯刻录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尤其具有特殊的形态和意义。

一、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与辖域刻录

原始社会体是一种前国家机器,近似于原始共产主义,其社会组织形式是前种姓、前阶级的,权力弥散于整个群体,并未集中在某一个集团或个人手上。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缺场,原始社会体大致由行为、信仰和意义的符码所统制——原始机器的社会体是大地的躯体。由社会体这个准原因(quasi-cause)衍生出人际关系、经济交换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

在原始社会体中,生产和反生产的力量是通过亲属关系而运作的,核心家庭和再生产功能皆由亲属关系衍生出来。婚姻的功能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合与生育育女的个人行为,而且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由整个社会秩序加以掌控。在原始社会,乱伦禁忌的功能除了人们逐渐认识到的生物遗传禁忌的因素外,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阻止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关系,而是鼓励人们通过向外联姻而促进社会领域的联系。而把乱伦禁忌作为一种禁制和前刻录(proscription,此词亦有“驱逐、禁制”之意)的观念,是把现代俄狄浦斯视角强加于原始社会组织之上。家庭内部的禁制意味着驱使家庭中的青年成员向外拓展社会联系,促使他们在家族或部族之外结亲,由此强化家庭联盟与社会活力。反之,将俄狄浦斯视为情结,则是将核心家庭作为再生产的机构,并且与其他社会关系分隔开来,从而阻碍了生存空间的拓展,削弱了乱伦禁忌与外婚



制的极为重大的社会价值与意义的联系。

严格地说,原始机器是唯一的辖域化的机器。鉴于原始社会的大多数社会关系是由亲属关系决定的,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辖域机器的原始功能界定为“衰落的联盟与血统”的功能,意指它与大地躯体的血脉关系趋于衰落。亲属体制是网络式的,它通过血缘关系的组织与合作(血统)和婚姻关系(联盟)对商品、人、特权和声誉的流变加以沟通、限制和编码。其中,血统(filiation)是机构性的、等级制的;联盟(alliance)则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血统与联盟(联姻)犹如原始资本的两种形式:一是固定住资本或确立血统的根基,一是促进资本流通或推动债务无阻碍地循环。

债务—义务网络构成了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的结构。乱伦禁忌实质上是更大的社会生产/反生产组织的禁忌范畴中的一个亚范畴。原始部落的猎手们被禁止消费他们自己的猎物,恰如父母被禁止与他们的孩子生育后代一样。原始社会的普遍律则是:一切生活方式皆须循环,不管是子宫还是物品。原始社会的债务—义务和消费体制的建构,是为了防止直接接近和获取其作为生活方式或生命的对象。由于这种欲望与其直接目的是相悖的,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原始社会的组织视为反常的社会体。欲望与原初对象的关系、生活本身的源泉——大地(食物、衣物和蔽所等等)以及母亲(乳房、胎盘、子宫等等)——都必须以社会组织的律则作为中介。生产的链接综合与大地及母亲具有直接而多元的联系,因此被刻录的选言综合所分离。

这种分裂式的综合建构了原始社会秩序的反生产关系网络。当然,这是选言综合的一种排除性运用,因为原始社会组织积极地鼓励某些关系,而排斥另外一些关系。因此可以说,原始社会组织的普遍法则是由亲属关系的联姻和血统,或共时性与历时性所组构的。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的血缘关系通常仅仅涉及两代(或最多三代)脉传,而联姻关系仅止于法律姻亲关系(in-law)层面。原始社会则不同,其成员的历时性血脉则可以计算出许多代,而共时性的联姻则贯串于整个社会。^① 列维—施特劳斯曾经论述过原始社会亲属制度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8., London: Routledge, 1999.

中不同部落之间的婚姻具有债务功能。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债务并不是像列维-施特劳斯等交换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互惠交换的稳定体制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而是一种非平衡性:非平衡方能够促进赠礼与还礼的循环(不同于商品交换,那是互惠和完全交换的抽象而理想的体系,而非平衡和特权问题则导致这个系统的不断衍化与循环)。每一次礼物交换皆预设了一种赠礼方所建立的债务或义务,以及受礼方的某种声誉和特权(即一种“符号的剩余价值”)。每一个人在最初进入部落之时,他或她都在礼物交换的社群网络中被设定了自己的位置,设定了他或她与长者特权的债务联系。因此,可以说债务关系和“符号剩余价值”(特权/声誉)的链接是通过这种加入仪式的机制而产生的。在这类仪式中,初加入者的身体作为大地躯体的一部分,被(以刻绘图腾、文身等方式)刻录上联盟和血统的符号。

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组织是由刻录系统所实施的,它属于一种辖域刻录(territorial inscription)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刻录系统称为“残酷的系统”。它强烈地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原始社会反生产律——外婚制,排斥直接消费——则直接在肉体打上了烙印。这种刻录模式是原始社会体的表达方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德里达的说法,即原始人的书写方式意味着:“大地上的舞蹈,墙壁上的勾画,身体上的标记都是一种书写系统,一种地理文字学,一种地理学。”但是这种书写系统不是能指与所指的原始语言,因为这种书写系统“并不与声音结合,也不从属于声音”,而是与声音相链接,与声音相等同,具有多元性。^① 加入者的庆典是与牺牲仪式相交织的。这种场合中的声音“犹如联盟的声音”,刻录在初加入者身体上的标记则犹如“拓展的血统”的图案。虽然这时所发出的声音和初加入者身体上所留下的印记并无相同之处,但是却以一种复线的方式互相作用。每一个词语和每一个标记皆有多元的蕴涵和一种具有预期效应的力量,因为原始符号是置于场景中的,不能完全与特定的身体、场所、仪式、姿态及故事等因素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对它们之间这一因素与那一因素的关系加以固定。因此,这种刻录通过多元的符号对个体的身体加以编码,给身体打上亲属系统的印记,并且在债务的普遍经济学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p. 95~97,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和符号的剩余价值内部给其指定一个位置。

这种符号与赠礼的经济学同时也是一种痛苦与愉悦的利比多经济学。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中曾经指出债主与欠债者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当欠债者未能归还债务时，债主获得补偿的一般实践方式是痛苦地折磨欠债者，但这只有在欠债者的痛苦能够使得债主感到愉悦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牺牲者的痛苦与观看者的愉悦相等同的观念在初加入者仪式中是可操作的，每一笔债都是一种痛苦；每一种符号剩余价值的单元都是一种愉悦的单元。这种制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债务制度或辖域表达：一种说出或吟唱的声音，一种标记在肉身之上的符号，一种从痛苦中抽取愉悦的眼睛；这些是一个野蛮三角形的三条边，构成了一个共鸣与记忆的辖域，一出‘残酷的戏剧’，意指着三位一体并各具独立性质的发音之声，画图之手和欣赏之眼。”^①

原始社会生活中有大量稀奇古怪的文身、穿鼻、凿耳、饰唇的现象和充满痛苦体验的残酷仪式。受到尼采《道德系谱学》的启迪，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为了造成强大到足以克服个人直接消费的生活欲望的集体记忆，需要施行大量的痛苦和残酷行为。反生产力建构了原始社会组织，原始社会体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乱伦，而是来自可能会脱离反生产力掌控的物流和人力之流；残酷的仪式和刻录的系统被用来为一切物资与力量之流编码，以便它们能够在社会中循环不已，无法脱离社会掌控。原始编码因此同时在债务—义务及消费的系统与特定的书写形式之间建立起联系。它强化前者并且使之成为可能，又使后者为原始部族创造和刻录了一种集体记忆。

原始书写作作为一种刻录形式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身体（人体与大地之体）上，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声音与图画构成了刻录系统的两个独立的亚系统，它们之间不是索绪尔式的能指/所指关系。原始宗教文化的仪式在部族生活的土地上进行辖域化刻录，声音与图画最终会在公众的仪式中和集体凝视下汇聚在一起，变成刻录的原始法律。德勒兹和加塔利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edipus*, p. 89,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描述了一场联姻仪式：年轻丈夫在妻子身体上刻录下类似子宫的葫芦形图案，以标示和确认他们联姻的合法性并且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原始仪式的公众凝视功能使得每一个人都由此知道这个身体的子宫从此属于谁，更确切地说，仪式给了它在社会联姻和血统系谱的网络中的一个定位，从而确定了这个子宫的生产果实（未来的孩子）属于谁，并且将其纳入债务与消费的循环之途。

原始社会体有几个特征值得与专制社会体、资本主义社会体进行比较：其一，原始债务是开放式结尾的模式，亲属系统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而是一种实践，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策略；其二，声音与图画构成了两个独立的体系，由仪式以一种反意义的方式在集体凝视下将它们汇聚在一起。原始书写并不代表说话。残酷的仪式通过对身体或身体某些部分的标记刻录，为特定器官设定了社会位置和文化功能。生殖仪式设定了子宫在生产/反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再生产的器官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群体。德勒兹和加塔利因此认为，俄狄浦斯在组织化的原始社会中扮演不了任何角色：俄狄浦斯乱伦只不过是实际上组织原始社会的律则的一种摄影负片的后像(negative after-image)而已。这里凸现了后结构主义式的对再现论的三重符号学批判：第一，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联姻—债务系统作为“欲望的压抑性再现”；第二，把对乱伦的禁忌视为这种“压抑性再现”所生产出来的“欲望的置换性再现”；第三，将前两者与作为生活本身或生活方式的“欲望的再现”^①（欲望的直接对象）区分开来。欲望在原始社会确实是被严苛地压抑着，但是由于欲望被刻录在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再现系统之中，因此实际上并不是乱伦的欲望而是生活的欲望遭到了压制。俄狄浦斯在这种压制体系中绝非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只是作为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后像”标志着一种内在化的局限。原始社会体的再现系统是对尚未编码的生活之流加以编码，显然针对的是作为欲望生产的生活本身，而不是对乱伦的俄狄浦斯编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思想由此在对原始社会体的分析中得到了颇具说服力的体现。

① 这三种欲望的“再现”对应的英文分别为 *the repressing representation of desire / the displaced represented of desire / the representative of desire*。中译不能完全表达其含义。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73, London: Routledge, 1999.



二、专制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与帝国刻录

在专制社会体中,反生产的力量是通过不加掩饰的政治宰制而运作的。专制主义是征服与建立帝国的结果,其反生产的模式表现为征服者将权力关系强加于被征服者现存的社会动力学机制上,征服者或战胜国的基本行为是创造了一种再刻录体制。

专制社会体与原始社会体形成对照。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保证劳动果实的共享;而帝国式的反生产则是为了独裁统治者的奢华消费(如封建帝王宏大精美的宫殿和花枝招展的嫔妃),强力从其臣民中抽取财富。专制社会组织的普遍法律不同于原始法律:在原始社会体的法律中一切价值物都必须纳入债务与义务的循环,而专制社会体的法律则将一切都归于某个专制者。独裁统治者的形象取代了作为社会体和一切血脉系谱的始基的大地,并且将自己的高贵血统富于特征地与一神教意义上的天神建立了新的联姻(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天子,古埃及的法老),将其自上而下地强加于原始社会体的联姻与血统关系网络之上,其臣民则成为彼此毫无区别的芸芸众生。为了建立身份金字塔与社会等级制,在专制社会体中,行为、信仰和意义的不同符码都被人为地纳入为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服务的频道,专制主义成为国家机器。专制机器社会体的独裁统治者“强力建构了一种新的联盟体制,并且直接把他自己与神的血统接续起来”,以他自己的维度将一切关系都加以超编码化,剥夺了原始社会体的联盟和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独裁统治者以他自己身体为象征,建立了野蛮社会体和专制独裁的法律。而对大众而言,法律的处罚不再是原始机器时代节庆式的消费处罚,而是暴戾的惩戒式的处罚。

原始债务也产生了质的改变:在专制社会体中不再有互惠的、可卸脱的债务,人们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的权利,都属于独裁者。通过金钱的发明,原始的债务嬗变成为无所不在的东西,最终成为“存在的债务,主体自身存在的一种债务”(《反俄狄浦斯》,179页)。“皇恩浩荡”下的无限的债务当然也包括子宫和拥有子宫的女性在内;奢侈糜烂的帝王在生活中可以无视任何女人原先的血统与联姻而加以攫取,其中凸现出处女情结。在文化象征意义上,独裁者原则上已经成为父亲,同时也是儿子、兄弟和连襟,从而成为乱伦交迭的形象。

原始社会体中仅仅作作为心理学“后像”的俄狄浦斯幻象现在变成无处不在、无可规避的现实具象,独裁者乱伦的权力使他完全脱离了普通的道德伦理。但是,专制帝王的乱伦仍然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一般人的乱伦,因为其形式并不是对乱伦的普遍禁制,而是仅仅让独裁者个人合法化享用的等级制金字塔上的权力。

而与此相应,原始社会体的辖域刻录体系在专制社会体中也变成了帝国刻录(imperial inscription)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恐怖的体系”。独裁者创造了新的书写或刻录方式:“立法、官僚制度、计算、敛集税费、国家垄断、帝王旨意、官方行为、历史图式——所有一切都书写在独裁者的群像身上。”(《反俄狄浦斯》202页)原始刻录中声音与图画具有独立性的特征消逝了,书写与声音结盟。于是声音犹如太上皇般隐退,成为一种基本缺席了的声音(恰如德里达所表明的,这可适于一切书写)。因为帝国的幅员辽阔,无法以个人的声音统治,于是由国家机构撰写条文治理天下。原始刻录体系中声音与书写的两个独立的亚范畴变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书写进入可视的实践领域,但是也屈从于缺席的声音(帝王的旨意)。将口耳相传的民族与使用文字的民族区别开来的不在于图案系统的缺场,而在于在说话的声音与刻录之手之间一种固定联系的缺场。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原始表达式是一种内蕴的秩序(order of connotation),其所说之词语是一种多声符号,而所指涉的事物同样也是多元符号,声音与绘写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之相反,独裁的表达式则以一种屈从的秩序(order of subordination)取而代之:原始的图形符号被加以解辖域化,剥夺了其多元的内蕴,变成单维声音的副本;最后声音被一种超验的权威赋予意义,从而强化了语言规律,一种固定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建立了起来。文字图形系统屈从于声音系统,从声音中萃取出一种解辖域化的抽象之流,从高处招来一种“沉默的声音”。R. 博格认为:“这种来自高处的沉默的声音是独裁者一神论的法律,而这种解辖域化之流则是索绪尔的能指。”^①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索绪尔语言学是彻头彻尾地基于独裁专制的表达式。索绪尔符号理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99,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论是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并且主宰着所指；能指与所指的配对是符号的竖式关系，而所指的相关意义或价值是由能指之间横向的差异关系决定的。通常结构主义认为任意性的能指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导致了意义的产生，但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对结构的阐释预设了两种因素：一种是强调任意性能指的力量，另一种是固定住能指与所指的联结的力量（即强制出一种语言的超验律则）。索绪尔及其追随者因此将能指与高高在上的权力、法律联系起来，因为在他们的符号理论中，能指明显具有独裁专制的功用。能指不仅是一种任意性的实体，而且还是一种声音的形象（sound-image），是“来自高处的沉默的声音”的回响。

在专制社会体中，专制帝国的臣民始终笼罩在灾祸与死亡的阴影下，需要蠡测统治者的好恶。由于自上而下的神秘的、沉默的、写好的声音（独裁者能指）需要阐释，书写不再直接设定欲望的价值对象，阅读者和接受者亟待通过书写揣摸某个缺席的他者的意图和需要，欲望变成了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是权力社会具有特征性的欲望形式。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专制主义仍然不属于俄狄浦斯情结领域，因为俄狄浦斯乱伦并未成为欲望本身的表达式——这只有在资本主义才得以生成。俄狄浦斯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未完成状态：它从原始社会的置换表达式开始迁移，进入专制主义社会的压抑表达式，继而变成资本主义的欲望表达式。资本主义体系涵盖了这三种观念。

三、资本主义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与资本刻录

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形成对照，它是唯一大量生产的社会生产体系，但是也有自身反生产的深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反生产的力量是通过市场来运作的；反生产关系是经济的而不是个人的：人际联姻和血缘系谱不再经由人们而是经由金钱所决定。犹如在专制社会中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债务仍然是无限的，但是其作为基础的社会体却不再是独裁者的形象，而是资本，尤其是工业资本。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看法，专制主义完全属于一种权力社会，而不是经济社会。资本主义是以权力与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体，其权力与经济之间无休止地冲突着。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生

产不断加强,故而能够普遍地丰富人类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却只适于个人化,或为了自身的原因而采取禁欲主义对待不断增长的生产。这就构成了其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仍然没有消失,但它不再代表凌驾一切的、超验的、君权神授的独裁者,而是内在于社会力量领域,作为解编码和公理化之流的调控者。因此,其反生产的功能不再是对社会消费的外部阻遏和限制,而是一种内在的消费刺激,以试图避免过度生产所导致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债务一方面仍然像专制社会那样归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单维的实体,但是这个实体不再是专制者而是资本。另一方面,在反生产的机制下,债务已经从外在性变成内在性。消费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为的是保证在社会生产的下一个循环中流动资本的再投入。

在生产与反生产的关系上,资本主义是一种“后国家机器”——资本主义机器的社会体是资本自身。而资本主义反生产机器不再是反生产的超验实体(专制者),而是对生产机器运作的一种实现其剩余价值的调节机制。因此,资本主义反生产并非呈现在帝王将相的豪华宫殿和巍峨陵墓的耗费或挥霍之中,而是表现出一种病态式的贪婪——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政治—军事—工业情结”。资本主义有一个巨大的反生产系统处于生产的核心,以吸收过度生产和保持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20世纪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策略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核武器竞赛都蕴涵了这种有意图的效应。

资本主义社会体的刻录因此也有其不同于前两个社会体的一些特质。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刻录体系称为“犬儒主义体系”,尽管这个体系也掺和着某种程度的“虔诚”(多数是虚假的)。人们继续假装去相信“进步”、“技术”、“生活方式的选择”、“历史的目的”等等,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信仰的东西了。

霍兰德指出,犬儒主义与虔诚表达了资本主义编码形式的两种要素:解编码与再编码。它们与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相呼应,构成了资本主义公理化的基本韵律。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解编码是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积极要素,因为它把欲望从扭曲的樊篱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持续扩张的两种情况的描述,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观念在学理上是相通的:其一是一种新的、更具生产性的资本流,是“生产方式的



持续革命”，它转化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机器，对现存的劳动和资本解辖域化，这种解编码过程遍及整个社会；其二是这种进步运动突然被中止，一切都被再辖域化，把生产与消费关系套上剩余价值私人占用的辘头。^①再辖域化使资本主义的权力要素现实化，以一种倒退的力量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因为不愿再投资进行消费生产而拒斥消费；而解辖域化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则代表着“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把生产力和消费从它们现存的对象和局限中解放出来。权力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差异，揭示了资本主义两种要素之间的矛盾。

解编码与再编码之间的联系也与此类似。它们都源于资本主义的公理化进程：解编码代表着积极的方面，将欲望生产从固定的编码中释放出来，而再编码则相反，它在为再辖域化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的人为编码中重新攫住欲望。但是解编码或解辖域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是更强大的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基本上是无意义的，而且持续不断地释放出超过再编码力量的解编码流。再编码作为一种反动的力量，试图以固定的编码重新攫住和压制欲望，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体是以可计量性而不是以符码流组织起来的，因而一切传媒的符号系统最多扮演一种二流角色。资本主义刻录体系因此不源于书写与声音的关系（这与原始社会、专制社会都不同），而是源于公理化的动力学，源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解编码和再编码。

资本主义社会体以解编码/再编码取代了原始社会体的编码和专制社会体的超编码，一切社会关系皆衍生于作为它们准原因的资本。资本主义的表达式不再是脉络清晰的稳定系统，不再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等级制的符码结构，而是非意义的符号，点符号（non-signifying signs, point-signs），具有多个维度、断流和裂变。一种流（flow）进入另一种流，它们不是以能指/所指构成意义，而是以内容/表达构成“非意义的点符号”：若非作为内容，就是作为表达。流与流的交融导致变形。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一个经济过程中作为中介而发挥作用。这种中介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中各个因素加以转码和协调，譬如电流——电流可以统合词语流、视频流（形象流）、声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0, London: Routledge, 1999.

频流(音乐流)、数码流,可以控制无数的技术机器,但是这种统合之流并未特别地意味什么东西,各种流只是以它为频道通向四面八方。这些解辖域化之流不时地逸出资本主义生产僵硬的循环,由此,过分丰富的常规的商品的符号便生成了欲望的分裂与流动的符号。

如果独裁机器的力量来自外部,那么资本主义机器的力量则来自内部。资本主义趋向于用一种抽象的等价物替代原始机器和专制机器关于人与物之间的固定、局限的关系,从而使自由交换成为可能。这种等价物使得一切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换,不仅与开放性市场的货物建立起了等价交换的关系,而且身体、行为、观念、知识、幻想、形象等都可以起着商品的功能,并且能够转化成其他商品。资本主义商品化犹如解辖域化的分裂症的流变,消解了前资本主义既有的社会编码和各种辖域。但是,资本主义机器并不简单地是解构之流,它同时也是不断地再辖域化之流:资本主义机器按照自身的原理取代旧的编码,组织起一切解构之流,包括科技符码之流,生产资本主义体系的利润。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机器把劳动之流加以抽象(对工人解辖域化),把资本之流加以抽象(对金钱解辖域化),又把这两种流(flows)以形形色色的关系交融起来。工人和资本家(以及类似的一切变体)都是资本的功能而已,都不过是抽象的数量的具体化。原始社会体的联盟与血统,专制社会体所更新的超编码化的联盟与血统,都为资本主义社会体工业资本的“新新血统”(金钱能够生产金钱)和商业金融资本的新新联盟(new-new alliance)所取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最终在全球化的层面取得了胜利。

但是也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体的符号并未完全取代专制的、索绪尔式的符号。资本主义机器消解并且吸收了专制符号,赋予其新的经济功能,使之成为再辖域化的因素。实际上,这加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的两极——偏执狂和分裂症——的摇摆性。社会被引向两个方向: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伪拟古主义与超未来主义。资本主义所强化的专制主义代表了欲望的偏执狂、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企图以克分子(molar)聚合的方式强行建构一种中心化的、统一的组织,而资本主义所促发的解辖域化之流则代表了欲望的分裂症、革命的倾向;建构异质因素分子(molecular)的非系统联系。在化学中,分子是独立存在而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分子有一定的大小和质量;分



子间有一定的间隔；分子在不停地运动；分子间有一定的作用力；分子可以构成物质，分子在化学变化中还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微粒：原子。德勒兹与加塔利把“克分子”与“分子”欲望的对比贯串于《反俄狄浦斯》全书，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们是不同的聚合模式。前者是等级制和总体化的，后者则是非等级制和解中心的。

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对欲望生产中精神分裂症的解辖域化概念与偏执狂的再辖域化概念进行思辨，反对弗洛伊德一脉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而用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分裂分析方法扬弃其家庭化、个体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将欲望与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展示了宏阔的思想视野。他们对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观念的综合与扬弃，创造性地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欲望与政治相结合，开创欲望微观政治学批判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欲望生产呈现出两极分流的发展态势：一极是解辖域化的精神分裂症运动——对固定的编码加以解编码，使已规范的权力关系断裂；另一极是再辖域化的精神偏执狂运动——将离散的符码和权力关系以有机的、严格的、互相作用的循环方式加以重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历史就是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不断加以解辖域化的历史，它解构亲属体制、宗教实践、阶级等级制、文明禁忌等等——通过颠覆现存世界中的编码和不可通约的因素，把它们变为商品，商品能够在一个无区别、非决定的交换系统内互相替换。但是，商品也持续地对社会关系再辖域化，确立其自身的常规性运作，对以往实践加以犬儒主义的戏仿，以重新激活死亡了的符码和体制。

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特征常常被视为是后现代的特征——普遍性的商品化，拟像与类像凌驾于一切之上，生产服务于消费，情感衰颓——这一切显然是资本主义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共时发生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所致。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面对在消费社会的商品文化中拟像的增殖现象，欲望生产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解辖域化，整个社会领域都有失衡点，不稳定的区域剧增，并且导致这些区域的创造性转化。内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解编码和释放权力的趋势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如同对后现代状况下众多理论家一样，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理解资本主义的机制与运作是理解当代世界的核心。但他们并未像鲍德里亚那样，把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导向对拟像游戏的

被动接受;也不像利奥塔那样,摒弃集体性的政治行动。

资本主义市场使家庭彻底遭到贬黜,它全面接管了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而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这种功能大致是属于家庭事务和国家直接的政治统治范畴。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家庭、亲属与社会关系是直接吻合的。即使是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大多数社会等级划分,依然与家庭密切相关,只不过专制者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政治性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曾经凌驾一切的国家政体变成了“解编码流的调控者”,基本社会关系不再是从家庭、人际、政治维度编织起来的,而是由市场构筑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皆通过金钱流和资本流而产生。而家庭则被颇为特异地划分为私人领域,与社会生产、再生产的公共领域或经济领域分隔开来。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马克思的看法,认为伟大的变革发生于伴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抽象劳动实现之后。他们认为,当资本不再是联姻资本之后,资本主义机器就开始生成血统资本(filiative capital)了。当钱生钱,或者价值生产剩余价值之时,资本就变成血统资本了。唯有在此条件下,资本才变成占用一切劳动力的新社会体。由此,血统资本实际上取代了专制者的位置而成为社会生产投资的焦点和基础,成为一切债务之源。这种社会体直接变成了作为金融资本的经济。它所刻录的也不再是生产者和反生产者,而是作为抽象计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反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反生产关系……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最终一个环节落实在资本主义与核心家庭的关系上。鉴于联姻与血统不再经由人而是经由金钱得以决定,因而家庭变成了一个缩微宇宙,父亲、母亲和孩子全都变成了资本形象的拟像(资本先生、大地太太及其工人孩子)。家庭的决定性变成了社会公理的应用,家庭变成适应整个社会的亚聚合体。如果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角色业已是经济功能的形象,那么家庭角色只不过是这些形象的形象,是衍生物的衍生物。当然,资本主义家庭也复现其他社会形式的压制的基本因素:与生活方式的分离,遭禁制母亲形象的肉身化,对专制法律的服从,禁制者父亲形象的肉身化。作为情结的俄狄浦斯已经来临。随着资本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公理化,核心家庭中的人类再生产也分离出来,俄狄浦斯情结随之完全渗透了乱伦禁忌的三重表达式:不仅是乱伦的压抑表达和置换表达,而且变成了真正的欲望表



达。欲望在原始社会体中是生活方式的直接应用,在专制社会体中是通过反抗政治统治获取自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尽管欲望仍然采用诸如此类的形式,如保全生活方式,终止政治宰制,但是,这时核心家庭的有形的机构却以一种“客观”形式弥补了其表达的缺陷,设定了欲望生产的陷阱:俄狄浦斯。德勒兹和加塔利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是一种诱捕欲望的形象,而且还指出俄狄浦斯与死亡本能的关系:在专制社会首先引发的死亡本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更为弥散开来,但是它不再是来自专制者的高高翱翔于众人头上的恐怖威胁,而是变成了内在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死亡威胁。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的金钱养家糊口,担忧失业,担忧失去市场份额……正像资本主义其他的禁欲主义因素一样,这种基于市场的死亡本能的形式由核心家庭的动力学所折射和强化,父母之爱是作为金钱而发挥功能的。如果孩子被剥夺了父母之爱,如果他们破坏了“父亲的法律”并且无法获得母亲的支持,他们就会夭折,因为他们是被有效地与其他养护之源相分隔的柔弱的孩子。死亡本能就这样逼迫欲望不断地妥协和作出反应,从而把他者的欲望作为自己的欲望——只不过现在不是专制者的欲望,而是老板或父亲的欲望。^①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俄狄浦斯情结才真正地变成现实,而反俄狄浦斯是一项艰巨而具有现实性的任务。尽管资本主义核心家庭与社会相分隔,但它绝不是自主的或独立于社会的。恰恰相反,通过生产方式,核心家庭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角色——再编码、禁欲主义主体的塑造、欲望的妥协和非个人化。显而易见,在所述的三种社会体中,俄狄浦斯从来就不是原因,它依赖于某种类型的社会结构,是欲望的社会投注。

在欲望的家庭投注与欲望的社会投注之间,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后者以首要地位,并以此揭示出反俄狄浦斯题目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化政治意义。他们坚持认为,现代精神分析的主旨早就被俄狄浦斯化了,精神分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俄狄浦斯化运动。弗洛伊德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发现——移植——反过来成为他最致命的东西。现在,俄狄浦斯情结在屈从偏执狂式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5, London: Routledge, 1999.

的再辖域化方面是以核心家庭结构中个人心理内化的形态出现的。人们从小就在核心家庭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传媒有效地默移潜化下,被规训成为服从父亲法律与市场法律的主体:要自我克制、认同、遵从和工作,否则就完蛋!实际上,家庭从未完全与社会解编码分隔开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和公理化进程日益削弱了家庭再编码和父母权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更多的是基于金钱而不是父母之爱。这时精神分析站出来加固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是欢迎欲望的解编码,为的是压抑生产性、解辖域化的欲望之流。核心家庭是与资本主义之前的血亲与联姻社会体不同的缩微结构,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和理论皆围绕着核心家庭、移植和俄狄浦斯情结,去掉了其社会功能,因此与资本主义再辖域化的精神偏执症同构同谋。

四、关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资本主义主旨的评价

如前所述,德勒兹和加塔利以解辖域化为核心的哲学概念来叙述资本主义的生成与特质。资本主义的生成有消极和积极两面性。在消极的层面,它有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特征:资本主义倾向于将一切都纳入同一性之中,纳入统一的量化之中,以资本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固定住一切生成。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能够把丰富复杂、异彩纷呈的生活都纳入某种单一的交换系统之中。而在积极的层面,资本主义表现出解辖域化的特征:它以交换之流消解了一切既有的物质形式,是什么东西在交换中循环并不重要——无论是金钱、货物、信息还是商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不断交换的流变运动的力量。这是一种积极的资本主义倾向,它渗透到全部生活,促进了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进程。这种解辖域化的流向打开了各种交换互动的系统。“然而解辖域化不仅有赖于最初的辖域化,同样也伴随着再辖域化。通过量化资本之流的所有交换,资本攫住了它的流向,生产并打开了流变之门。在资本主义中一切都变得可以用金钱或数量来衡量——甚至艺术的商品价值和概念的信息价值。”^①值得指出的是,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论析与批判并不是企图回到资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5, London: Routledge, 1999.



本主义之前的所谓“黄金时代”中去,他的非时间概念和空间解辖域化概念,都是从微观欲望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维度强调社会领域的生成与流变。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时期,它既意味着最大开放程度的解辖域化,也意味着最大限度封闭的再辖域化。

德勒兹和加塔利这类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抱有完全不同于经典哲学家的目的,他们无意于写出伟大的真理和演绎哲学的最终形式,而是想写出有趣而又激动人心的东西。恰如詹姆逊所言,他们“不是致力于冥思苦想构筑坚固的哲学大厦,他们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论述,一种商品,就像玩具一样,你喜欢就玩它,不喜欢就可以换一个”^①。可以说,对他们《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不同的视角和受众完全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詹姆逊侧重对反俄狄浦斯作出符号学的解读,他在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从社会发展理论的维度将德勒兹与马克思以及摩尔根加以比较,列表如下:

马克思:(生产方式)

原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摩尔根:《(古代社会)》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

符码化—超符码化—解符码化(再符码化)

詹姆逊认为:“德勒兹的理论基本上是将前两种说法转译成了一种信息理论,和语言学有联系的信息理论。”^②詹姆斯还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论析的资本主义大致对应于摩尔根的“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使一切解符码化。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以对宗教批判为起始的,是使宗教和一切神圣的东西解符码化。马克斯·韦伯使用过的德语解符码化

①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2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1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此处詹姆逊“符码”(code)等词,与本书使用的“编码”、“超编码”、“解编码”、“再编码化”等词相通,为中译名的差异。

(Entzauberung)一词的意思是神圣化(desacralization),意即神秘或神圣性消失,也就是“祛魅”。“世界失去其魔力和神圣性,现在的空间并不是一个中心人化的空间,而是几何形式,栅格化的空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解符码化,“在西方文学史上,解符码化的第一部小说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其核心手法是现实主义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的急剧扩张,以及神圣感的失去,“诗人眼中的世界变成了一片《荒原》,没有水,没有生命,一切已经死亡。艺术家诗人们于是创造了另一种宗教。……在一片干涸的荒原上创造新的神圣的东西,创造新的神秘。这种艺术就是一种再符码化,是个人而不再是集体完成的事情。……这一切现象,从符码化到再符码化,形成了历史,而要摆脱超越这一切是很困难的。德勒兹在他《反俄狄浦斯》一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出路,那就是精神分裂”^①。从詹姆逊的思路引申开来,在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领域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神圣化辖域最终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们解魅化和现实化的对象。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微观政治哲学的剖析下,浪漫主义虚构的“爹地—妈咪—我”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核心家庭的罗曼司”,已经不再是公理性的、无所不在的精神分析恒定的三角模式,而是资本主义欲望生产的特殊表现形式——分裂分析导致了俄狄浦斯帝国大厦的崩溃。

B. 玛苏弥、罗纳德·博格、克莱·科尔布鲁克和霍兰德从德勒兹与尼采系谱学的思想关联出发,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视为综合了系谱学、地质学等多学科性质的微观政治学反历史哲学叙事。

从哲学方法论而言,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方法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分析颇为不同的批评模式或视角。他认为我们无法假定真实的利益,也无法假定可以发现在权力和形象掩盖下的某种前社会的基本个体。其后结构主义的生成哲学鄙弃是什么(being what)的问题,而关注如何生成(how becoming)的问题。他的超验方法首先致力于“展示个人与利益是如何从欲望的混沌之

^①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1~25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流中生产出来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此称为‘微观政治学’^①。这种微观政治学展示出个人欲望与利益是如何被编码成为政治、社会、文化的延展性范畴的,而不仅仅是“核心家庭的罗曼司”。反俄狄浦斯旨在于以系谱学方法探究在社会历史层面俄狄浦斯由何而来,在不同的社会体中它是什么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如何通过核心家庭再生产的私人化而转化和实现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俄狄浦斯的系谱学批判的主要实质是打破核心家庭令人窒息的樊篱,让欲望回归其完整的社会历史语境,揭示隐匿在这种家庭简化模式后面的无意识社会投注的本质。分裂分析的任务是考察资本主义公理化、解编码化和再编码化是如何对欲望加以确定的,探索在什么条件下精神分裂症的欲望能够集结成为一种力量,以反拨和驱除社会中的精神偏执症的力量。^②

《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它们都聚焦于资本主义分析这个题旨,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五月风暴是它们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B.玛苏弥在《千高原》英文版译者序中指出: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在五月风暴之后都由激昂亢进转向颓丧怠惰,然后又皈依宗教或政治保守主义,但德勒兹和加塔利却从未放弃反叛精神。《千高原》是他们耗费7年心血所写出的著作,是他们否定“笨重的学术机器”的新成果。其游牧思想的空间不同于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国家哲学传统空间:前者是光滑的、开放的、块茎的、反中心化、非等级制的,而后者是“条纹”的、封闭的、树状的、中心化、等级制的。《千高原》与《反俄狄浦斯》的构思颇为不同:批判性减少而积极的游牧思想和实践变得更为突出。

尽管德勒兹和加塔利这两部著作共享着“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切入点:《反俄狄浦斯》从批判精神分析入手,而《千高原》则倡导一种多元生成的哲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题旨主要体现在《反俄狄浦斯》中,而《千高原》更重要的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哲学性质的“微观政治学”反历史叙事。在总体上,《千高原》给人以反系统、反历史哲学的印象。其反系统的结论来自它碎片化的形式,非编年史却标明日期的叙事结构,跨学科的多样性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2,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②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91, London: Routledge, 1999.

与丰富性,借自那些五花八门、看似光怪陆离的理论的概念。这使人感到它“不是竖起一座山,而是生出千条路,这些路四通八达,与海德格尔的路相反。彻底的反系统,拼贴连缀的布片,绝对的散佚,这就是《千高原》”^①。这两部著作综合起来,构成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微观反历史哲学叙事。

这种反历史哲学叙事的取向体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对哲学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的描述特点。因为他们不把历史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序列,具有反历史的或反历史哲学的韵味。德勒兹实际上是以空间哲学、地质学和系谱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审视历史的。他以空间化思维创造千高原的图式,以系谱学辨析社会体的差异,追溯事件如真似幻的起源——例如人(男人)(man)这个政治概念就是将独裁者或统治者的暴君形象缩减成为普通公民形象的结果。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地质学的维度展示生活和时间是如何生成多样性的层面的:遗传学、化学、地理学和文化事件共同建构了生活的不同层面或“原”。任何单一的历史都不能将全部生活安排妥当。地质学的概念提示有一个差异平台——构成生活的一系列平台或“原”,而这一系列平台或千高原无法放入一个主题的单元之中。^② 时间是一个差异生成的过程,生成意味着不断生产新的事件。唯一真正的重复是差异的重复。

总括而言,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用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的理论方法反拨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偏执症式的精神分析的偏颇,以欲望微观政治哲学解读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种社会体,凸现出反俄狄浦斯的资本主义批评论旨,表现出反历史哲学叙事的特征。这是与他们独树一帜的多元生成、差异与流变、逆向思维的哲学观念以及批判意识分不开的。他们反对僵死、固定、专制、大一统、褊狭的事物的哲学叛逆精神,与奥斯维辛和五月风暴背景下的欧洲现实密切相关,因此,毫不奇怪,《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共鸣。德勒兹和加塔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联性入手建构他们自成体系的欲望微观政治哲学批判,丰富和深化了对资本主义这一近代以来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和研究。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58,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符号理论
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机器
施虐—受虐癖

本编主要论述德勒兹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的关联域,侧重评介德勒兹与文学的关系。除了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相关论述之外,分别以三章篇幅论析德勒兹(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三部文学研究专著中所展现出来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概念和美学题旨:卡夫卡与少数族文学,普鲁斯特与符号,马佐赫与受虐癖。

文学研究在德勒兹哲学思想的表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I. 布坎兰和J. 马克斯在他们合编的《德勒兹与文学·导论》(2000)中说,文学对于德勒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①在文学个案研究方面,德勒兹著有《普鲁斯特与符号》(1972/1964)、《受虐癖》^②(1989/1967)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1986/1975)等三部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其中关于卡夫卡的论析最具思想启发性。德勒兹的其他哲学和美学著述中也包含着不少有关文学的重要论述。例如,《千高原》中用很长的一段文字论“生成”哲学观念,并对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代表作《白鲸》作了解读与阐发,在德勒兹辞世后出版的论文集《批判与诊断》(1997)中,也牵涉到很多文学问题。

德勒兹作为思想领域的游牧者在文化与文学、电影艺术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等千高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西方文艺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奠定了把哲学、美学思想与文学艺术现象(如史诗、悲剧等等)融合并作出理论归纳总结或观念阐发的传统,他关于悲剧的著名界说就是一个范例。亚里士多德关于发现与突转、怜悯与恐惧、卡塔西斯、悲剧过失、情综模式等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悲剧研究领域的经典阐释。20 世纪的德勒兹不仅继承了这种诗学传统,而且在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的维度进行了富于特色的新的拓展。他不仅从理论层面阐释文学现象,而且进一步把文学视为创造新的思想形象的领域。

德勒兹和加塔利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以文学为基点的文艺批评家,他们基本上是从哲学的立场出发,在文学作家与文本研究中阐发他们别开生面的后

①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 1,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受虐癖》法文版 1967 年原本的题名为“冷酷与残暴”,载《马佐赫的表达》一书(“Le Froid et le Cruel” in *Pre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



结构主义美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因而他们的文艺思想要较一般文论家更为深刻。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标志性作家卡夫卡的研究中,颠覆了传统看法,将卡夫卡重新定位,以反俄狄浦斯的分裂分析方法揭示出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家庭三角模式的局限性,描述了欲望与权力的多元社会文化网络图式,展示出他们块茎或褶子哲学观念和政治话语分析的特色。爱尔兰出生的法国作家贝克特,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这位以荒诞剧名世的作家还创作了诸多当代西方小说经典——富于先锋实验精神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后现代叙事风格与特色,甚至具有超越其戏剧的丰赡内涵与重要性,并且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及美学旨趣密切相关。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诗学观念互渗交迭,互阐互证,共同构成了当代离散性美学的居间性和气象万千、变化生成的千面平台,具有理解与诠释上的丰富可能性。贝克特的小说不仅仅是属于文学,它们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触媒与哲学和美学范式。德勒兹在普鲁斯特的著名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发现了不同于索绪尔渊源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拓扑符号,并据此阐发了他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力图揭示差异的美学特质。德勒兹在对奥地利小说家马佐赫《穿皮裘的维纳斯》的评介中,对病态心理学的“施虐癖—受虐癖情结”加以解辖域化,将问题还原到文学文本,重新从法律、心理和文学等维度对此加以哲学思辨。在展开下面各章的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概略地评介一下德勒兹文学观的特质。

首先,对德勒兹而言,文学与其说是与语言和文本相关的再现问题,毋宁说是创造的问题。德勒兹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思想形式——艺术、科学和哲学,它们是转化生活的主要力量。文学不应基于某种大家共享的体验,表达一些共识或常识,文学应当令人震惊、战栗,唤起新的生活体验。文学是虚构本身的一种力量,它的价值不在于描述生活是怎么回事,而在于唤起对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想象。我们通过文学想象力把生活扩展到其最大的限度,却又往往悖论似地运用思想创造的某些形式——逻辑和语法——囚禁住生活与思想。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中明晰地描述了艺术、科学和哲学三者的特质:艺术是情感的创造,科学是功用的创造,哲学是概念的创造。而文学艺术与哲学都以精神探索为特征,超越庸常的思想与现实。对德勒兹而言,哲学史

和文学皆不应把文本置于它们原来的语境之中以再现社会历史。例如,人们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的任务不是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回纳到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不是把它们作为对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质疑,而是要看到艺术与哲学是超越时空和别具一格的,因为它们具有创造全新的时空领域或“逃逸线”的力量。莎翁的艺术力量不仅在于再现了他的时代,更在于构想了异质的时空。他的历史剧、悲剧不只是勾画、再现、质疑历史中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开拓了一种新的历史体验和美学价值。它们所表达的不是时间之内的事件,而是将时间作为表演,作为向未来开放的时间,时间是戏剧,不是命运。倘若我们今日重述莎士比亚,例如好莱坞电影《莎翁情史》,那么艺术的力量不在于重复他的人物与事件,而在于通过重复以攫住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情感效应。从德勒兹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来说,差异赋予重复以新的生命力,而重复莎翁即是不断地通过重复以生成新的差异,在重复中超越莎翁时代语境。这是一个文学事件不断生成和变异的过程。

其次,德勒兹的文学观与其关于空间、褶子、生成、流、逃逸线、机器装配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颇有关联。文学人物是生活和差异的产物,可以视为随意汇聚的效果装配。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塑造常常使人们产生颇感诧异的效果。奇特的句子、怪异的身体抽搐、非理性的欲望和情感,以及碎片化的叙事构成了狄更斯这位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常遭到忽视的一面。在他的名著《伟大的期望》中,哈维萨姆小姐这个人物形象是由憎恨男人,腐烂的婚礼蛋糕,衰颓的身体,阴暗的房间和复仇的欲望装配并烘托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历史塑造出文学人物,装配或创造出情感效应,我们都是生活的事件。德勒兹的文论专著《普鲁斯特与符号》即分为两大部分,前者论符号问题,后者论文学机器问题。1987年德勒兹的访谈录《论英美文学的优点》是一篇富于德勒兹诗学特质的文学论文,他将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两相对照,其关系如下简表所述:



法国文学	英美文学
想象与象征贫乏,总是将现实延迟到明天	逃逸线
国王们:土地,遗产,婚姻,诉讼,诡计,欺骗	国王们:解辖域化运动,漫游,弃权,背叛,迅捷通过
发明资产阶级权力机器以阻遏和贬斥英国人	释放资本主义的涌流
航行	飞行
内敛性	外联性
追寻作为始源点和支撑点的开端与终结	英语的“零”总是在中间
乔木树	蟹状草
过度的人性:个人,主体	集体性,捆束,感觉的聚合
众神:固定的属性,特征,功能辖域,编码,栏杆,疆界	群魔:间歇式跳跃
欺骗,骗子(盗窃)	出卖,反叛(创造性窃贼)
秘密	鬼祟
俄狄浦斯	该隐,约拿
.....	旧约
旧世界,美国东海岸	新世界,美国西海岸,印第安人
牧师,预言者,政客,朝臣,法国小说人物	体验者,战争的人(并非元帅或将军)
家庭生活	反常者,局外人,恐怖
包法利夫人,“这是我”	生成女人
诠释	体验
幻象,俯瞰	节目
简缩为个人的生活,个性冲突,完美中的完美,神经过敏的谄媚,自恋癖的裁决	严格的非个人性,个性是一个空虚的范畴
历史,编年史	地理,图式
过度地关注历史与未来,因此不懂如何生成	知道如何生成
血统	联姻
革命的未来	革命的生成
通过艺术拯救	生活中的拯救

K. 舒林将上述对照视为德勒兹的“地缘文学的想象”,认为其与地缘哲学相关:英美文学的优点来自三种哲学运动,即英国经验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德勒兹心目中的英美正典作家包括这样一些似乎形形色色的人

物,如夏绿蒂·勃朗蒂和爱米丽·勃朗蒂姐妹、哈代、麦尔维尔、史蒂文森、惠特曼、刘易斯·卡洛尔、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维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D. H. 劳伦斯、T. E. 劳伦斯、M. 洛利、拉夫克莱弗特、菲茨杰拉德、亨利·米勒、贝克特、W. 泰西格、爱德蒙·卡彭特、亚瑟·米勒、巴勒斯和克鲁亚克等。同时,德勒兹还清楚地表明,具有以作品创造装配效应的并不限于那些碰巧以英语写作的作家,甚至还包括世界文学的“第一部小说”《圣经》(德勒兹视《圣经》为类同于英美文学作品的原型)和非英语作家,如荷尔德林、G. 卢卡、阿尔托、热奈特、F. 维伦和图尔纳等。德勒兹在与加塔利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谈话中说:“我们在英美小说家的作品所发现的,是那种法国作品中很少有的东西:强感、流、机器书籍、实用书籍、精神分裂书籍。”^①

由此可见,德勒兹关于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范畴的划分,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国别文学的概念,而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哲学思维和美学取向的分野。所以,按照德勒兹的文学批评标准,英国作家特洛罗普或司各特更近于法国左拉或法朗士;异类的法国作家阿尔托和热奈特在原则上更应属于英美而不是法国。德语文学的克莱斯特和卡夫卡被归于杰出的英美作家之列。德勒兹“地缘文学想象”的目的是颠覆与圣·佩甫、丹纳及兰森相关的传统地域概念和僵硬的树状文学分类系统,建构不同于法国模式的反传统的文学块茎或星丛。

在哲学、美学、伦理和政治诸层面,英美文学有自己的印记,并且与法国相区分。德勒兹认为英美文学是块茎原则的范例,它知道“如何在事物之间运动,建立一种动态的链接的逻辑,推翻本体论,清除基础,消解终端与开端”。他以一大群英美作家为例,认为装配使“人口、多元性、辖域、生成、情感、事件”互相关联,英美文学由“伍尔夫装配”、“哈代装配”、“福克纳装配”等汇聚成为特殊的哲学装配、美学装配、伦理装配和政治装配。英国经验主义强调过程或功能,而不是强调原则,能够以发展的“AND”(链接)取代权威式的、静态的“IS”(是)或盖棺论定的界说。“休姆装配”强调反常与例外。德勒兹的英美文学概念也从斯宾诺莎和斯多葛那里汲取了类似的装配思想:以链接的动力学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反对静态的僵化模式,不断地体验、遭遇和延展。“德勒兹哲学的反传统是由链接斯多葛、斯宾诺莎、休姆,以及司各特主义、尼采和柏格森装配(莱布尼茨后来才对德勒兹重要)而形成的,每一个装配都与生成(becoming)的脉络史相关,聚集在一起而建构了不同于存在史(the history of being)的选择。而这种存在史的发展轨迹从柏拉图和黑格尔蜿蜒至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也被包括在其中作为持异见成员。……就德勒兹而言,唯有这种斯多葛—司各特主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姆—尼采—柏格森的‘超级装配’能够赋予这种‘外位’之思以资质,这是情感之思。”^①综上所述,德勒兹的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之分,实际上并不拘泥于国别与语言的限定,而在于强调一种能够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产生思想共振的文学观念。这种区分虽然有重蹈二元对立覆辙和悖反混乱之嫌,但与德勒兹关于少数族/多数族的思想观念类似,德勒兹哲学一旦生成二元对立态势,便很快会对这种二元论解辖域化,对峙的双方的边界开始消融、互叠、贯通。而德勒兹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得以表达的,这就是由地缘哲学所衍生的地缘诗学和地缘文学的概念。

德勒兹曾经在《什么是哲学?》中以专章论述地缘哲学,认为有三个主要的再辖域化哲学领域:往昔的希腊哲学,现在(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即cogito为基本工具)的现代国别哲学,未来的新人与大地的哲学。在所有的国别哲学中,唯独英国哲学没有摒弃地缘哲学所追求的内在性平台,地缘哲学以未来新人和新大地的名义寻求恢复这种内在性平台,并通过“自由的、狂野的概念创造”开展伦理学和政治的构想。

由此,德勒兹超验的经验论或隐或显地在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真正的文学与平庸的文学。他对普鲁斯特、卡夫卡、马佐赫、梅尔维尔、狄更斯、维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丁都作过精彩的论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勒兹倡导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哲学“想象”的文艺美学。

再次,在文学领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积极倡导一种富于后结构主义诗学特色的“少数族文学”观念。少数族(minoritarian)与多数族(majoritarian)是

^① Kenneth Surin, *The Deleuzian Imagination of Geoliterature*, in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67~19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贯串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重要著作《千高原》中的两个不同概念。少数族观念在他们论卡夫卡的著作中有精彩的阐发,它与德勒兹“一事物折叠于另一事物之内”的感觉逻辑及莱布尼茨的“褶子”论相通。

德勒兹和加塔利所使用的少数族文学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理解不太相同,并不是指那些相对不重要的文学或亚文学,也不是指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而是指既用多数族性的语言来创作,但又暗中对其加以异质化或解辖域化的具有少数族性的文学。少数族文学作家往往有着多重文化身份,他们的作品具有流散文学的特质,卡夫卡堪为代表性的例证。因为卡夫卡虽然用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语言德语来写作,但是作为犹太人出身并且居住在捷克布拉格的作家,他还具有犹太文化、意第绪语、捷克语等复杂的异质语言文化背景。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悟出了迥异于传统文学模式的少数族文学的新意蕴。

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有的“区别”那样,多数族与少数族这两个概念看似构成简单的二元对立,但实际上关系颇为复杂。例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多数族模式要表达的是既定的、基于特权的、等级制的,以及用源头式术语描述的二元对立。man(男人、人类)就是这样一个多数族的术语:我们想象首先要有某种作为主体的、普遍的生命——man——然后才有由其衍生的自然变异或社会文化变异。例如在性别问题上,首先要有第一性的男人(亚当),然后才有其所衍生的第二性的女人(用亚当肋骨所创造的夏娃)。因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划分和对立是多数族的概念,它导致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从而把女性看成是低于男性并且是男性的他者。同理,在种族等问题上,白人中心主义的产生也属于多数族话语的范畴。但少数族的差异模式并不以享有特权的术语作为界定差异的基础,也不把这种差异看成是既定的秩序。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女性或“生成女性”视为少数族的理论范畴,这是因为对女性而言没有一个享有特权的标准或规范。如果我们真正地承认生成女性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类的生活不是被关于理性、力量、优势和行动的男性的理想所界定的。对作为少数族话语的女性的强调,是一种能够拓展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社会文化界面的视野,具有开辟人类新的思想领域的可能性。女性只有保持其生成状态的开放维度(恰如早期女性主义运动为女性所奋争的



那样),才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词语。一旦一个术语变成了表达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那么它也就摇身一变成为多数族的了。一旦女性诉诸一种新的标准,作为爱抚、养育、被动、怜悯的具象时,这一标准就变成多数族的了:它就能以此排除那些不满足这些评判标准的人了。

从德勒兹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来看,少数族与多数族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分子与克分子之间的区别。少数族政治学、美学没有以前给定的(或超验的)尺度或标准来囊括一切,进行认同。加在群体之上的每一点东西都会改变该群体的原状。例如,当第三世界或黑人妇女参与和汇入欧美女性主义运动时,原先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和特征也因之改变。少数族文学通过续写、重写、逆写、改写和戏仿多数族文学经典,从而重复过去、介入现在以创造未来。例如,女性主义文本、后殖民文本常常重复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加以逆写,从而创造新的维度。譬如,英国当代女作家琼·里斯(Jean Rhys)的中篇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1966)“重写”了夏绿蒂·勃朗蒂的《简·爱》(1847),创造性地改写了这个经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之口讲述出来的前妻故事,即“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故事,使之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对买卖婚姻与男权统治的有力控诉,揭示了罗切斯特作为压迫者、欺骗者的形象以及冷酷、生活放荡、道德责任缺失等人格缺陷。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琼·里斯的《藻海无边》都是对《简·爱》进行抗拒性批判解读的经典文本。此外,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 M. Coetzee)的《敌人》(*Foe*, 1986)“重写”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彼得·格林纳威(P. Greenaway)的电影《彼罗斯彼洛的魔典》(*Prospero's Books*, 1991)“重写”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1623);等等。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少数族的概念上,这类女性主义文本和后殖民文本的续写、重写、逆写、改写和戏仿是差异与重复的佳例。重复传统文学的声音与律则是为了寻求新颖而特殊的维度,拓展新的文学世界,创造异质的美学体验。

少数族和少数族文学的概念中的重复与差异问题是与尼采—德勒兹“永恒回归”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正伟大的文学实际上都是少数族文学。在“永恒回归”思想的观照下,唯一重复或回归的是差异本身。自然界没有两

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生中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瞬间。时光之流中,任何事件的重复必然是有差异的。生活的力量在于差异与重复,在于差异的永恒回归。文学中的每一事件都会改变文学整体。例如,在我们读过 T. S. 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情歌》和《荒原》之后,便无法再以原来的方式阅读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了。

总体而言,德勒兹和加塔利拒绝把语言视为再现的方式。他们认为并非先有一个怠惰呆滞的世界,而后再通过符号将其整理编序,加以再现。相反,一切生活都是创造差异的过程或亟待辩读和反应的符号学,语言流是生活和差异之流的一种模式。在文学中,我们不把语言视为世界的图画,而视为一种体现差异的维度,它能够生成不同的世界。在多数族模式中,文学再现传统、原文本、普适性的人类精神,强调身份认同,致力于阐释超验的根基。多数族文学重复既往的形式,具有趋同的特征。在少数族文学中,我们把语言视为积极的形式,可以用来创造新的风格样式和言说的可能性。少数族文学创造集体装配,建构新的领域,不断地挣脱普遍性主体的形象。它重视经验的、单一的、特异的事件,重复单一事件就是重复整体,导向差异。“它的生成是不合时宜的,而不是趋炎附势的。差异并非不同形式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源于某种原初模式的差异;差异是持续不断地生成新形式的力量。”^①受尼采哲学和美学的启迪,德勒兹所倡导的少数族文学具有永恒回归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的文学观是反语境的。他认为文本(text)没有“语境”(context),因为语境意味着限定或框架,窒息活力。真正的文学改变其语境,表达差异的力量,拓展新的语境。差异因此不是时间之内的力量,而是时间本身的力量。唯一不变的是时间本身:永恒的差异。

生成动物与少数族文学的关系在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和流变美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维度,卡夫卡及麦尔维尔的作品堪为例证。卡夫卡与麦尔维尔一直都被认为是令人困惑的作家,他们所创造的形象或符号意义甚至可能是永远无法索解的,如卡夫卡的“大甲虫”,麦尔维尔的“白鲸”。卡夫卡的《审判》(1925)通常被解读为关于难以捉摸的法律的一个隐喻,小说主人公从一扇门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123, London: Routledge, 2002.



走到另一扇门,但永远无法抵达法律。按照否定的和传统的阅读,我们看到的是卡夫卡的法律永远隐匿着,我们只能塑造法律的形象和对法律的阐释,永远不能探究法律本身。卡夫卡小说是异化的象征,让我们失却了对上帝和法律的感觉。《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变成大甲虫,是人类生活为非人的生活所置换,是象征或寓意。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曾经被解读为“寻找人类意义的小说”,一些文学批评家以阐释学和拉康式的理论方法将白鲸视为“漂浮的能指”,认为这种能指在理解人类的意义链上不断地滑动。

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对这类阐释方法,认为这是将文学超编码化,其基本理论取向是致力于在文本表面之下寻求深匿的意义。文学关涉的不是意义的表达,而是感觉的生成,关涉情感效应和强度,使新的感知与新的世界成为可能,因此,应该从文学所产生的效应和转化功能阅读文学。德勒兹和加塔利拒斥追索文学深层意义的旨趣,他们不是把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视为象征,不把法律视为永远是他者的隐喻。相反,他们把文学中的“生成动物”视为开拓了一种新的感知方式,提供了差异的视野。卡夫卡不是历来所认为的否定的、抑郁的作家,而是肯定的、充满乐观精神的作家,卡夫卡小说是一种生成文学——少数族文学的代表。

卡夫卡小说充满着对运动本身的欣赏,表现出一种强度。他笔下的人物和动物不耽于固定的空间,往往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从一条通道走向另一通道,没有完成式。西方思想文化的痼疾“阐释症”会习惯地人为加上某种律则,如认为这种从此门到彼门的游走不休一定是有什么目的,人变成动物就一定是失去人性的异化。德勒兹却认为,在卡夫卡小说中没有某种最初的源头和最终的目的作为驱动力,一切律则或意义都被凸现为居间(in-between)或毗邻性运动的效应。卡夫卡小说中的“大甲虫、鼹鼠、饥饿艺术家,以及城堡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它们生成新的感知样式。作为一种动物,作为走向乌有之邦(going nowhere)的一系列通道,或者从一个衰竭的身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着迷于动物就是着迷于审视世界,不是从一种已经组构好的视点出发,而是要从一个新视点来看世界”^①。把人描写成为动物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28~139, London: Routledge, 2002.

种文类,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类“生成动物”的叙事表达了文学的一种打破人类中心论窠臼的力量,能够把情感从人类旨趣的戏剧或泥沼中拯救出来。“生成动物”并不意味着像动物一样行动,而是意味着以变化多端的非人类(动物)的方式审视世界,而不带上人类主体预定的意图或目的。一言以蔽之,“生成动物”与少数族文学意味着从任何僵硬的人类规范和静态的多数族文学解放出来,因而强调运动、嬗变与生成,在永恒回归的意义上走向未来。

哲学家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学家兼政治活动家加塔利一直被认为是跻身于他们那一代中最重要的事物之列的思想家。“近十几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法国精神生活中已经成为主要人物,在后结构主义中占据了富有意义的地位。《尼采》和《反俄狄浦斯》尤其标志了法国当代思想的转折点。”从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到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裂分析的欲望哲学”,他们的观念跨越了广泛的学科——从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到符号学、美学和语言学。他们以尼采式的生成美学为基石,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对德里达、福柯和拉康等法国理论家加以补充和挑战。他们的思想复杂难懂,读他们的著作有时会遇上一大堆令人困惑的术语。但是在实践层面,他们对卡夫卡、普鲁斯特和马佐赫三人的小说的分析,展示了其诗学理论是如何影响批评实践的。“如果文学批评可以简单地界说为文学作品的研究的话,那么,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和《受虐癖》(作为马佐赫《穿皮裘的维纳斯》的一个拓展性的导论)都可以归为文学批评著作。但是,如果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对情节、人物、主题、风格之类事物的分析的话,那么,德勒兹的这些研究必须置于另一个范畴。尽管德勒兹在这些著作中触及了传统的文学问题,但是他首先关注的是对构成普鲁斯特和马佐赫作品主体的思想体系的勾勒。”^①德勒兹认为文学与哲学皆属于思想领域,不能简单地用虚构与真实、客观与主观分开,文学、哲学和科学一样,都创造了生活新的巨大可能性。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35,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第五章

走向少数族文学： “褶子”论与卡夫卡的诗学解读

走向少数族文学的表述源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1975)一书。该书1986年译成英文,进入英美文学理论视野。1993年,作为“文学与文化研究”选题,被收入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理论与文学史丛书”,与托多罗夫的《诗学导论》、姚斯的《接受美学》、普罗普的《理论与民俗史》、杰·阿莱克等的《耶鲁批评学派:解构在美国》、保罗·德曼的《盲视与洞见》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等三十余部文艺美学名著辑为一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该书中以卡夫卡为研究个案,阐发了他们独到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美学观念。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部文学研究专著是他们把后结构主义的哲学观念和分裂分析的理论方法最为详细、广泛地用于文学批评的范例。他们以卡夫卡的全部著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迥异于西方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树状模式的“块茎或洞穴”,是非中心、迂回曲折的生长的“蟹状草”,具有平原上鼠穴或兽径式的复杂多变的“逃逸线”。卡夫卡作为少数族文学的喜剧性代表作家,揭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与文化模式。

少数族文学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言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对卡夫卡的研究,对少数族文学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它的三大特征。他们认为,少数族文学不是用少数族语言写作的文学,而是在主流语言中建构出来的少数族性(minority)。“少数族文学”的概念因此可界定为: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文化的文学。当今世界许多人都生活在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中,如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海外华人,美国黑人等等,尽管他们生活在异质的社会语境之中,用主流语言写作,但是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完全可能是与所在国主流意识形态及主导文化相异的精神产物。德勒兹和加塔利为现代读者所阐发的少数族文学概念,对旧有的传统范畴(文类、模式、风格等)加以质疑,对人们熟视无睹或习焉不察的文化正典和学术范式提出了挑战,为文艺美学研究和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以下侧重从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言的少数族文学三大特征并结合卡夫卡的个案进行论述,以期揭示卡夫卡研究在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领域的发展态势,探讨走向少数族文学的理论内涵与特征,揭示少数族文学与当代性的关联及德勒兹诗学的意义。

第一节 语言的“褶子”问题: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

德勒兹认为语言的解辖域化是少数族文学的第一个特征。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是德勒兹审视世界的差异哲学与流变思维的关键概念之一。当把这一套术语用于语言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论转向”问题上富于特色的表述。如果说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质的隐喻关系,拉康突出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转喻关系的话,那么,德勒兹则展示了他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褶子哲学或块茎思维的特征。

少数族文学的语言问题可以从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褶子”论的维度理解为高度复合的语言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之“三折屏”式的展开。每一



种语言都是一个单子世界,是一种褶子。每一褶子皆具相对确定的边界,都是一个辖域,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又具有绝对流变的可能,褶子可以无限地展开(unfold)和重新折叠(refold):我们的世界既是相对确定的,又是绝对变幻多姿的。

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解辖域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认为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生成动物(the becoming-animal)——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生成(becoming)的问题,其容纳了最大的差异。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没有表层现象,也没有深度模式,是反意义的。因此在文本阐释上要运用以关注裂隙、异质和嬗变为特征的后结构主义美学方法来加以把握。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块茎式的褶子世界,而不是等级制的树状世界:

我们如何进入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著作是块茎,是洞穴。这个城堡有着多个入口,它们的用途和位置不太为人所知。《美国》中的饭店有无数的主门和副门,有无数的看守在守卫着,甚至还有没有门的入口和出口。……我们只能试图发现我们的入口与其他点有什么关联,所经过的十字路与走廊与其他两个点有什么联系,这幅块茎之图是什么形状以及如果人们从另一个点进来时,这一图式又会如何改变。只有多元性入口的原理能够防止敌人的入侵,防止能指和那些企图诠释实际上完全是开放性实验的著作的人的入侵。^①

德勒兹式的“褶子”论是殊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机械论、辩证思维等)的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和美学思维方式。在这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少数族文学的双语或多语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等层面。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戈巴尔(Henri Gobard)的四种语言学模式来研讨这些问题。这四种语言模式是:方言(母语或地域语,农村社群使用或具有农村渊源),媒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3,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3.

介语(城市、政府、商务语言,是一种解辖域化的语言),参照语(文化与感觉的语言,限定文化的再辖域化),神话语言(在文化的视界中将精神或宗教再辖域化)。这四种语言学模式的空间范畴颇为不同:方言在“此”(here),媒介语在“四面八方”(everywhere),参照语在“彼”(there),神话语言在“上”(above)。这些语言的属性变动不居,一个时代不同于另一个时代,具有模棱的边缘和正在嬗变的界域。例如,拉丁语在变成参照语、进而变成神话语言之前,曾经作为一种媒介语长期流行于欧洲;英语已经变成了今日世界的媒介语;等等。我们可以用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概念对这些语言加以评估。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也是一个解辖域化的历史、语言、文化过程。卡夫卡是布拉格少数几位会说捷克语的作家之一。德语扮演了媒介语和文化语言(参照语)的双重角色,歌德总是在这一视界上(卡夫卡还懂得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希伯来语是他后来才学习的拥有梦幻般活力的神话语言。卡夫卡把意第绪语视为重写德语的解辖域化的游牧运动,把这种大众口语性质的语言改造成为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推动了布拉格德语解辖域化的进程。因此在语言上卡夫卡的作品是革命性的,是对已辖域化的主流语言的解辖域化。“布拉格德语是一种解辖域化语言,具有陌生的、少数民族的用途”,今天许多人都生活在不属于他们的语言圈子中,“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面临的难题,少数民族的难题,少数民族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① 德勒兹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强调具有差异哲学和流变思维性质的逃逸线(the line of escape),力图揭示卡夫卡文学语言在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之间复杂的“褶子”关系中解辖域化以及再辖域化的特征。

德勒兹论卡夫卡的上述四种语言模式和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为我们思考当代国际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褶子”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对全球化、后殖民批评语境下“流散写作”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启迪意义。例如,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寒冬心灵》(1984)中曾经指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p. 16~27,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种多重视野产生的一种觉知……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他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①在德勒兹少数族美学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我们可以看到，曾以“东方主义”概念蜚声一时的萨义德本人就是一个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文化与语言迁徙与折叠的范例，他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东方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又是入籍美国的西方学院体制内人士。他的博士论文选择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为论题，因而也有特殊的含义。康拉德可说是又一个典型的褶子。萨义德深谙知识分子流亡者或文化迁徙者的特质与要旨，指出康拉德是一个“自觉的外国人，以异国的语言（英文其实是康拉德的第三语言）撰写隐晦的经验，而他太了解这一点了”。^②在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有多种交迭身份的著名人士，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他们的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种身份皆影响与作用于其他身份，因而充满着各种张力与矛盾。德勒兹的差异哲学观念，有助于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等等），在认同与差异的不同取向中强调开放、生成与增殖不已的差异维度。

第二节 精神分析与政治视阈： 反俄狄浦斯与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

德勒兹认为少数族文学第二个特征是：这种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或具有政治的屈折形式(a political inflection)。比较而言，在主流文学中，对个人的关注（家庭、婚姻，等等）是与其他的类似的个人关注相联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只是一种环境或背景而已；俄狄浦斯情结因此能够得逞。少数族文学则完全不同，它把个人空间与政治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这有点类似詹姆斯关于一切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观点。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文学，尤其是少数族文学不是象牙塔和避难所，文学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与语

①·[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中译本“扉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言、权力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是从他们反俄狄浦斯的思路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哲学和美学方法。

反俄狄浦斯可释读为一种(反)精神分析的系谱学。首先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精神分析层面。卡夫卡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传记批评家历来颇为关注卡夫卡生平和创作中父与子的冲突和母题。例如索克尔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可称之为由隐喻伪装起来的精神自传。”^①他指出,卡夫卡笔下的父与子的冲突是一个重大的主题:人完全屈服于以父亲为标志的某种存在或强力的权威统治之下,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仔细研究卡夫卡全部作品中所有权威代表(无论其多么一般化和抽象化)的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从《判决》和《变形记》里父亲的特征派生出来的。”^②

卡夫卡笔下父亲的形象和父与子冲突的主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从古希腊悲剧中抽绎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从精神分析维度研究卡夫卡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课题。卡夫卡和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许多关联点:两人都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现在属于捷克(卡夫卡在布拉格,弗洛伊德在弗赖堡)的犹太人家庭;两人都有温柔的母亲和冷漠粗暴的父亲。据称卡夫卡曾经详细读过并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具有比较特殊的生活体验,而“卡夫卡1919年的《给父亲的信》是弗洛伊德分析父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著名例证……父亲似乎成为他想象中的敌人”,卡夫卡“惧怕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因此‘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常病态就是父权社会的病态反映”。^③因此,卡夫卡文学世界里的父亲形象是弗洛伊德学说中“超我”概念的绝佳注脚。

其次是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阈。弗洛伊德的“父亲”角色基本上属于个体无意识范畴和家庭关系范畴,其重点在于生物意义上的阳物(penis)而不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菲勒斯(phallus)。拉康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语言与符号学维度重读了弗洛伊德,把个体无意识领域拓展到文化无意识领域。拉康的“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而成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的名

①② 叶廷芳:《论卡夫卡》,6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③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32~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言,揭示了“父亲”作为文化规则和社会法律的性质。“父亲”成为“父亲之名”,“阳物”崇拜成为“菲勒斯”象征。在拉康关于主体心理发展的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中,镜像阶段(婴儿0~18个月,亦称前语言阶段或前俄狄浦斯阶段)是以婴儿与母亲二元对立的符号结构为特征的。而俄狄浦斯阶段源于“第三者”父亲的出现。拉康阅读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两兄弟弑父夺母、争斗无休、重订社会契约以和平相处的故事,论证了虽然“父亲”肉身被杀但精神统治却并不消亡的理论,重新阐释了“杀不死的父亲”作为文化规则、菲勒斯象征和法律的意义。“拉康的‘父亲’只是‘父名’,它是语法规则。”^①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汲取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思想,创建了他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观念。超我、“父亲”、菲勒斯和意识形态等作为先在性的文化和政治结构,消弭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关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观念。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就有一个“父亲”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之网在等待着他,决定了他在世界中的存在和思想行为方式。拉康“鲍罗密欧结”ISR中的象征界对西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具有块茎或褶子意味的反俄狄浦斯和分裂分析的观念。如前所述,“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是他俩作为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重要代表人物的原创性概念之一,其前缀“schizo-”既指精神分裂症本身,又在哲学和美学意义上指具有普遍意义的裂变、分离的过程,标示了他们拆解总体化思维的特征和解中心的哲学趋向。他们把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总体归纳的阐释模式,它如同频道一样把欲望纳入安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例如俄狄浦斯情结。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倡导自由流变的概念和碎片式的主体,把精神分裂症视为解辖域化的完美存在方式,并将其作为一种模式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存策略服务。^②他们著名的反俄狄浦斯思想导致他们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对弗洛伊德关于两性与家庭恒定的三角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反讽式的解构,将弗洛伊德这一最具影响的概念讥讽为“爹地—妈咪—我”的模式。他们的这些思想观念,拓展、深化乃至颠覆了弗洛

①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② J. C.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伊德个体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

德勒兹与加塔利都反对神话—原型批评寻找总体性的“原型”的理论方法、反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以及精神分析的追溯深层隐匿的无意识批评模式——如认为城堡即是上帝,即是父性原则的世界,即是无法捉摸的权力;蟑螂或甲虫即是焦虑,是阉割、梦界及其各种变异等等。他们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进行了解家庭化(defamiliarize)的理论努力,并指出:在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家庭三角关系之外还活跃着很多更有意义的千高原或块茎式的三角关系,构成分裂式的流变和差异,如《审判》等小说中“法官—律师—疑犯”三角、“叔父—律师—布洛克”三角、“银行雇员—警察—法官”三角,《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妹妹(母亲)—父亲”家庭三角、“秘书主任—父亲—三个官僚房客”三角,卡夫卡本人的“德国人—捷克人—犹太人”三角(卡夫卡运用的是主流语言德语,文化背景是边缘民族犹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写作),等等。家庭三角是与其他众多三角——商业三角、经济三角、官僚三角、法律三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决定了家庭三角的价值。^① 仅以《变形记》中妹妹的形象而言,她本身就是“姐妹—侍女—妓女”三位一体的三角。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有两种乱伦:俄狄浦斯乱伦(Oedipal incest)与分裂乱伦(schizeincest)。前者是与母亲乱伦,母亲是一种辖域,一种再辖域化;后者是与姐妹乱伦,这是一种解辖域化的乱伦。精神分析常常混淆这两种乱伦,把姐妹作为母亲的替代物,把侍女作为母亲的偏移,把妓女作为一种逆转形式。事实上,姐妹不是母亲的替代物,而是阶级斗争或社会存在的另一个方面,即侍女和妓女方面。家庭容不下妓女,妓女链接的是社会。俄狄浦斯乱伦是与图像、画像及虚假的童年记忆相联系的。与此相反,分裂乱伦是与声音及声音所飘逸的方式相联系的,其中并无童年的记忆的障碍;分裂乱伦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关联,是一种多元的拓展,它以侍女和妓女为中介,把她们置于社会的系列中而不是与之相反的精神病态的家庭乱伦中。这两种乱伦的对比在《变形记》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一方面是作为俄狄浦斯乱伦对象的穿皮裘大衣、裹着脖子的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1f.,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女士肖像(格里高尔在妹妹和母亲搬他房间里的家具的场景中趴在这幅肖像镜画上,“他那火热的肚子顿时觉得惬意多了”);另一方面是裸露着脖子的妹妹,她演奏着小提琴,是一种分裂乱伦的对象。^① 妹妹演奏音乐,不是自娱自乐,而是想愉悦三个官僚房客,因为他们的房租,是一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有两种误释卡夫卡的方式:一种是生物自然的方式,一种是神学超自然的方式。无论是前者的精神分析还是后者的神学分析都偏离了卡夫卡诠释的基点。前者将卡夫卡置于幼儿园——将他俄狄浦斯化,使之进入母一父之联系;后者将卡夫卡局限于神学的形而上学思考,损害了贯串卡夫卡全部著作并在文学史上占特殊位置的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维度。

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开放的多维世界,它拒绝僵化固定的能指与所指。德勒兹等所提倡的差异哲学和流变美学,力图将无意识欲望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器结合起来,打通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学理联系,提出解辖域化、欲望机器等概念,阐发了一种精致的微观政治学批判(如论证法西斯就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欲望之中)。卡夫卡研究正是他们阐发自己的哲学和美学观念的一个符号学版本。

本雅明论述的终点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论卡夫卡的起点。卡夫卡之于现代性犹如古典神话之于传统社会。对卡夫卡而言,官僚社会与父亲社会是同一个东西。卡夫卡的世界比神话世界更为古老,神话世界有救赎,而卡夫卡的世界没有救赎。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的政治学“既非想象的,亦非象征的”,卡夫卡有意杀死一切隐喻和一切象征。以对《变形记》的分析为例,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的是解辖域化的“生成动物”、“解家庭化”和“逃逸线”。在《审判》中,无可辨认的法律总是在办公室的另一扇门,或在门的后面,直至永远无法捉摸;第一章中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下一扇门的房间”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在文本中寻求原型和俄狄浦斯情结是画地为牢,是对精神的辖域化或再辖域化;而“生成动物”则与之相反,解构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是解辖域化的表现,但这不是走向自由,而是一种逃逸。在儿子对父亲的反叛中既有悲剧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66f.,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也有喜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的素材。生成动物与恋母情结和无意识神话原型无关。

因此,卡夫卡的父子冲突主题和家庭三角不是俄狄浦斯幻象问题,而是政治事项。卡夫卡笔下父亲的形象包含着犹太人所有的尴尬的文化历史处境和存在的暧昧状态——父亲离开捷克乡村进入德国城镇,进入了解辖域化过程。但是他从未在家庭里、在事业中、在他所屈从的系统和他的权威系统中停止再辖域化的努力。法官、专员、官员等并能不取代父亲,相反,父亲是所有这些力量的压缩,他屈从于它,也试图让儿子屈从于它。使卡夫卡直接感受到痛苦压抑或快乐逃逸的不是父亲,或超我,或某种能指,而是美国技术统治机器,或俄国官僚制度,或法西斯主义机制。

马克思和西方精神分析理论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一些特征,并且有一些交迭点,如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和现代病态心理学的“恋物癖”都可以用英文“fetishism”^①一词表示,等等。但是,马克思忽视了欲望的维度而弗洛伊德主义则将欲望纳入核心家庭,忽视了社会力量或阶级斗争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们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欲望的无意识的渗透要比国家体制更为强大。欲望并不为权力所束缚,它们不断地运动,总是寻求逃逸线或出路(Ausweg 是卡夫卡作品中的关键词),总是拒绝权力机器的最终具象化。它们扭转资本主义偏执狂式的表达式,而呈现出分裂症式的生成、流变:卡夫卡的逃逸线是文学创作,他描写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人在他的笔下变成大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鼯鼠,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但却不是变成官僚、警察或法官等权力机器。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充满着从俄狄浦斯权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写,这是对宏大的权力机器进行拆解:无论是技术机器(《美国》),还是法律机器(《审判》),或是官僚机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对象。例如法律机器由厅室、法官、书籍、色情

^① “恋物”一词于18世纪用于研究“原始宗教”客体崇拜的语境中流布开来。马克思在19世纪借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事物之间的幻象形式。Krafft-Ebing于19世纪末首次用Fetishism一词来描述性行为(性倒错),由此弗洛伊德和后来的大多数作家都采用这种意义。参见D.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63,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式的法律构成,欲望居于法律之内。洗衣妇在法庭的门道内与大学生做爱;一个女人把 K 从辩护律师房内引诱出来——这个女人部分是姐妹,部分是女仆,部分是妓女,处于反婚姻、反家庭、反俄狄浦斯的位置。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妈咪—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会的、司法的、人际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视为对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的解辖域化的大胆尝试。他们拒绝相信欲望从一开始就是被禁锢的,他们力图将文本阅读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政治行为,发现其中的省略、断裂、牴牾之处,但是又不是止于解构分析,而是加以重新装配。他们比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更进一步,将患者视为一种无器官身体(即本质上未经分析者编码的身体)而不是亟待辩读的文本。欲望变成了一种逃逸线,一种解辖域化运动。卡夫卡的文本因之变成了一种异于文学传统批评的新形式。^① 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的分裂分析范本。

第三节 文学“机器”与声音的集体装配

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少数族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它所蕴涵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或具有集体的屈折形式(a collective inflection)。少数族文学的政治性使得这一领域的一切陈述都染上了集体的色彩,因而少数族文学普遍缺少主流文学的众多的天才和文学大师。而这一点似乎恰与人们对卡夫卡的传统看法相悖。

人们通常认为卡夫卡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中描写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最出色的作家之一,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在隐喻的意义上,西方现代主义的关键词是加缪所言的“西绪福斯”。卡夫卡是 20 世纪西方现代寓言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中独树一帜,有强烈的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韵味,出色地展示了一个充满悖论和困惑的现代西绪福斯式的生存世界。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出色地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

^① E. Wrigh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pp. 159~165, London: Routledge, 1989.

德勒兹则认为,传统对卡夫卡的阅读将卡夫卡视为俄狄浦斯化症候的例子,误导读者,使卡夫卡晦涩难解,使人们认为卡夫卡对人类黯淡前景和荒诞存在作了阴郁的描述。但实际上,卡夫卡是一个快乐者,一个有着生之欢乐(*joie de vivre*)的作家(从《审判》的开端起,一切都指向笑),一个激进政治的倡导者,他坚决抵制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文学领域僵化的等级制。卡夫卡《变形记》中俄狄浦斯模式的喜剧性扩展,出色地表现了家庭三角与官僚三角的交织和孤儿般的生成动物者格里高尔的逃逸路线,他变成大甲虫是一种解辖域化。情节是在官僚三角和家庭三角所构成的块茎式的联系和在逃逸线的嬗变中展开的。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中从对卡夫卡的传统阅读(误)读中拈出论题。他们认为少数族文学中任何个体皆是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卡夫卡并非孤独的、受折磨的艺术家,而是一个集体的、政治的作家。卡夫卡有意识地把他的父亲的俄狄浦斯化形象夸大到宇宙般的范围,因此,传统的精神分析将卡夫卡的生平与作品相关联的释读并不能令人满意。父亲只不过是20世纪曾经统治社会的巨大的官僚机器、军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已。父亲形象浓缩了法官、专员、官僚等形象。卡夫卡的作品为反抒情主义和反审美原则所驱动。卡夫卡是用德语创作的布拉格犹太人,是少数族文学的代表,不是背负地球的神话力士阿特拉斯的后代。少数族文学不是一种审美选择,而是对少数族作家存在境况的窘迫性的一种反应。

德勒兹和加塔利是第一次强调卡夫卡著作中欲望力量的人。他们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进行了激进的批判性综合与扬弃,以图理解卡夫卡的意义。他们将法律与欲望相联系,因为法律起源于对欲望的制约。他们的分析最终把卡夫卡的著作视为一种生产效果的机器,一种表达机器或文学机器。他们认为卡夫卡小说是一种集体声音的装配,《城堡》和《审判》具有像机器装配一样的功能(卡夫卡把生活中围绕他的官僚主义碎片组装成为一部奇特的、预言的机器,如《城堡》)。这种装配的目的不是阐释超验的法律机器,而是启动抽象的欲望机器。因为卡夫卡眼中的法律公正只是欲望的产物,活跃在每个人内心世界里的是欲望而不是法律。

马克思主义尽管敏感于被压迫的少数族问题,但是也忽略了欲望的革命



性维度。用阿尔都塞的理论来说,存在着一个“召唤体系”:在“伟大文学”停工时,少数族文学才充分发挥作用。故此,少数族文学是反俄狄浦斯的理想文本,是分裂分析的例证。少数族文学是“精神分裂”文学,具有逃逸线和亚原子式的性质,可以对文学的“强度”加以自我解构。德勒兹将卡夫卡从主流文学剥离开来,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质自然地与边缘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和主流文化价值的霸权问题结合了起来。这正是一种理论观念上对既定的辖域化世界进行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努力。

在此意义上,卡夫卡小说是弱势的、少数族的声音的“集体”装配,具有明显的预言性,预告了未来“恶魔式”的力量: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来临。^① 德勒兹认为卡夫卡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它能让我们得以描绘我们与世界、身体、欲望以及生与死的结构的真实的联系状况。《审判》中,权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线性与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权力,皆是机器。事件总是在隔壁房间发生的毗邻性(contiguity)取代了法律的等级制,这种延误是完美的、积极的,它拆解机器,不断装配,永远由此到彼地嬗变着。

德勒兹和加塔利开拓了文学研究新空间。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美学视阈中,卡夫卡是文学“新大陆”——少数族文学的新大陆的创造者。通过解读卡夫卡,德勒兹犹如在等级制的、正典化的文本和理论中发现一颗定时炸弹。可以说卡夫卡引入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方式。卡夫卡的多形态著作抵抗僵化的精神分析,卡夫卡文学并非“影响的焦虑”,而是创造了新领域。德勒兹的少数族文学概念不仅仅是对文学进行简单的再辖域化的价值重估,而且使文学在文类上的等级制秩序的整体中心结构完全改观。文学不再源于普遍的人类(性),而是始于具体的男男女女或不同群体的相互生成。

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征——语言文化的解辖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体价值——都突出地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他身为犹太人,在布拉格写作,用主要语言德语来实现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的“逃逸线之旅”。在主流语言与文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p. 6, 125, 136~137,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化框架内运作的所有批评话语和此前存在的范畴与文类在卡夫卡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卡夫卡的创作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的文学,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可以用这种模式来重新审视和理解所有的批评话语。

因此,后结构主义式的少数族文学和诗学观念,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批评和比较文学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六章

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

2006 年是爱尔兰出生的法国作家贝克特的百年诞辰。贝克特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这位以荒诞剧名世的作家富于先锋实验精神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后现代叙事风格与特色，甚至具有超越其戏剧的丰赡内涵与重要性。从西方文艺美学维度来看，贝克特又是在从现代主义诗学向后现代主义诗学转型中具有重要而特殊意义的人物，他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创新实践，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及美学旨趣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在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关联域中进行思想游牧，探索其相关意义。

第一节 戏剧光辉所掩盖的小说大师：贝克特小说三部曲

作为 20 世纪西方荒诞剧的标志性人物，贝克特以《等待戈多》等名剧蜚声世界文坛，并且为中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界和翻译出版界所重视。1969 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戏剧《等待戈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位 20 世纪极富独创精神的作家却是一个被他的戏剧

光辉所掩盖了的小说大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他小说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

贝克特小说在数量上远远大于其戏剧作品。贝克特正式的文学生涯,是从小说创作和写诗开始的,也终结于亦可称作小说的文本上。通常将贝克特的长篇小说《莫洛伊》(*Molloy*, 1951)、《马龙之死》(*Malone Dies*, 1951)和《无法称呼的人》(*The Unnamable*, 1954)称为其小说三部曲。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除了三部曲外,还包括《莫菲》、《瓦特》等。贝克特小说三部曲是20世纪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小说里,贝克特思维的触须得以无限延伸。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在这里达到了更为玄奥、复杂、彻底的境界。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余中先等人翻译的贝克特作品选集(多卷本),这为中国读者乃至中国研究者欣赏与理解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国外对贝克特小说的重视则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C.赖利在其主编的多卷本《当代文学批评》(1973)中就指出:贝克特的“荒诞喜剧聚焦于孤独、沉默、无意义与绝望。尽管作为戏剧家的贝克特往往比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受到更多的关注,但他在其六部小说中展示了才华,那些戏剧只不过是为其小说而添加的注脚而已,贝克特的小说所指更为宏阔,更具力度,《等待戈多》、《终局》等都是小说的片段,是更大的语境的插曲”^①。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与传统小说叙事颇有不同,既没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个性突出、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乍读之下,读者宛如进入叙事的迷宫,甚至颇感枯燥乏味,难以卒读,但其中却蕴涵着“对人类内心景致一种炽热而执著的探索”,“咬紧牙关准备接受理解力考验的读者……会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恰如爱尔兰驻法国大使安妮·安德森(Anne Anderson)在贝克特百年诞辰仪式上的致辞所言:“贝克特是一位打开了无情的大灯,照射着人类生存状态的作家,如此直接,又如此勇敢,让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最深处无助的自我。”时至今日,贝克特小说三部曲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美国耶鲁大学教授H.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的百卷本《现代批评诠释》(*Modern Critical*

^① C. Riley 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CLC)* vol. 1, p. 20,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73.



Interpretations, 1988)将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和名剧《等待戈多》分别单独成卷,收入该书系,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英国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勃朗蒂的《呼啸山庄》、华兹华斯的《序曲》、麦尔维尔的《白鲸》、艾略特的《荒原》、奥维尔的《1984年》、卡夫卡的《审判》等名著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学流光溢彩的长廊。该书系所强调的宗旨是:“以最佳的前沿文学批评来诠释最为人所广泛阅读和研究的西方诗歌、小说、戏剧,从《约伯记》和《伊利亚特》到诸如福克纳的《喧嚣与愤怒》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现当代作品……为西方文学传统中最富有生命力和最具影响的作品提供易于理解的批评导读。”^①哈里斯(L. L. Harris)的《20世纪文学人物》(1990)则概述了贝克特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说三部曲和名剧《等待戈多》、《终局》等。^②

第二节 文学与哲学:贝克特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关联性

贝克特文学特质与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在很多方面耦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贝克特与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关系就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两者的共同点是以差异、开放、流变、游牧的思想观念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传统加以解辖域化。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和德里达解构论的审美旨趣皆颠覆柏拉图主义诗学传统所凭依的一些基本原则或者特征,如辖域化的二元论等级制模式、中心主义认同倾向、线性结构、历时性、内在关联性、理性逻辑等等,而强调解辖域化的多元论、差异性、边缘性活力、共时性、居间性、异延、含混性、非确定性等等,贝克特充满后现代诗学意味的小说实验则成为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上的佳例。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加塔利等当代有影响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思想家都从贝克特那里得到过很多教益。

安东尼·乌尔曼的著作《贝克特与后结构主义》(1999)性质上属于“既是

① Harold Bloom ed., *Samuel Beckett's Molloy, Malone Dies, The Unnamable*, head page,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 1988.

② Laurie Lanzen Harris, *Characters in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pp. 24~25,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0.

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一种思想史片段,强调了贝克特的批判性思考”。它侧重论述了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列维纳斯、德里达等人哲学思想的关联域,认为文学与哲学是交迭互生的,它们互相构型与解型,殊途同归,共同邂逅和面对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①同时,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后现代叙事美学特质,提示了贝克特对西方小说传统的革命性创新实验。众所周知,贝克特因为“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荣获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说,贝克特以表现内心世界的飘忽和细腻见长,小说作为一种个性化更强的形式,更适合贝克特。他用法语写就的小说三部曲……打破传统,淡化情节人物,只有絮絮叨叨的内心独白。这种写法直接导致了法国新小说派的文学实验。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个三部曲比《等待戈多》更强有力、更重要,很少有哪部现代文学作品对于人类经验的理解如此深刻。贝克特健在时,国际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贝克特是存世的三位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代表了小说领域的现代主义诗学向后现代诗学旨趣的转型。福柯曾经说过:“我属于那一代人,当他们还是学生时,都被囊括在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为标志的视阈内……我像那时所有其他的哲学学生一样,而对我而言,裂变是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块来临的,那是一出令人激动的场景。”^②

就德勒兹差异哲学、德里达的解构论与贝克特小说的契合性而言,乌尔曼在《贝克特与后结构主义》中认为,德勒兹与贝克特两人实际上并不相融。贝克特以漫画式的笔调,多写否定的事物,表现虚无感、挫败感和存在之悲,体现出批判性的特征;而德勒兹如同斯宾诺莎那样,被视为崇尚肯定、揄扬快乐、揭示存在的积极意义的哲学家。尽管如此,贝克特作品中一些具有否定倾向的关键概念与德勒兹以肯定为取向的关键概念密切相关。简言之,这些相互关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head pa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8 ~ 1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联的概念包括存在的内在性,某种反柏拉图主义和对运动(变化、生成)的强调。^① 德勒兹曾经写过两篇论贝克特的文章《最杰出的爱尔兰电影》(*The Greatest Irish Film*)和《穷尽》(*The Exhausted*),并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把贝克特与卡夫卡、戈达尔等人一道,置于他们最钟爱的作家之列。德勒兹与加塔利常常借助贝克特的作品去阐发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概念。德勒兹强调生成,贝克特强调变化。例如,德勒兹认为贝克特力图强调声部变化多端的合唱(ensembles)而不是大一统的“整体”(the Whole),注重寓杂多于一的一致性平台而非单维的有机整体,因为“整体”(意味着一切皆被揭示和完成)恰如《无法称呼的人》那样,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的。德勒兹哲学与贝克特小说三部曲都体现出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促发运动,我认为从贝克特文本中两个关键词得到了反映:继续(on)和或许(perhaps,该词在三部曲中使用了589次)”^②。德里达的解构论则迥异其趣,他是从内部颠覆柏拉图主义的,如揭示柏拉图的“Pharmakon”一词兼具“毒药”和“救赎”两义,因此导致其自我解构。

贝克特与上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之间,构成了文学与哲学的关联域。作为学科,文学与哲学各有其确定的辖域与特征,文学从特殊到一般;哲学则从一般到特殊。借用福柯的术语,哲学是一种讲求理性逻辑的规训,强调明晰的确定性,而文学则追求富于情感蕴藉的秘响旁通,注重多义共生的非确定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艺术作品通过有限抵达无限,而哲学则通过一般进入特殊。贝克特在《但丁、布鲁诺、维科、乔伊斯》中也说了类似的意思:“诗歌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对位。”^③ 尽管文学不能抽绎成为哲学,哲学也不能弥散成为文学,但是从德勒兹的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美学思想来说,贝克特文学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在面战战后法国乃至西方现实存在进行思想反思时,都致力于打破文学与哲学之间僵硬的学科界限,进行解辖域化,目的是开拓新的一致性平台,进行建设性的再辖域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贝克特的文学以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on Literature*, p. 205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②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 2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5 ~ 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其别开生面的特质滋育或者促生了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一代人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诗学观念,为我们从后结构主义离散性而不是连续性的思想维度审视和欣赏异于传统文学的高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提供了新的艺术空间。

第三节 辖域化与解辖域化: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叙事特质

在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审视世界万象的流变思维和游牧思想中,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是其重要的差异哲学和美学概念。

如前所述,德勒兹的辖域化一词源自拉康的过程分析理论,广义的辖域化概念意指既定的、现存的、固化的疆域,疆域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中,辖域化的表现以西方文化模式为甚。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主要的模式就是将事物划分为条条块块以便于掌握。自然科学通过分析、化验、计算、量化等手段达到掌控对象的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人文社会领域中则充斥着利益及其冲突的各种范畴,有着科层化的特征,护卫与算计是两种基本形态或手段。从而形成了广袤的时间与空间内的各种辖域化。在德勒兹差异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上,辖域化意味着某种等级制中心主义和静止的时空。因此,富于哲学叛逆精神的德勒兹强调解辖域化的概念。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对将差异凌驾于认同之上的倾向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基点。贯串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之中的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三联概念是理解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关键性概念。

逃逸线(a line of escape)概念与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密切相关。解辖域化的概念与逃逸线的概念可以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强调摆脱既定辖域的束缚的努力,旨在创造新的流变、生成的可能性。对既有的辖域进行解辖域化或向自由逃逸之后,往往伴随着某种时空重构或再辖域化。这种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固定静止的。以此观照贝克特小说三部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四个主要叙事者——莫洛伊、莫朗、马龙和“无法称呼的人”——构成了独特的后现代叙事视野,小说家通过他们对既有的西方叙



事文学传统模式或者现代主义诗学辖域进行解辖域化,不断地探索与构筑具有冒险开拓精神的快乐的逃逸线,从而促成叙事领域的后现代诗学和后结构主义美学旨趣的再辖域化。

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莫洛伊》开篇叙事主人公在床上写作的意象犹如主旋律,在三部曲中一再浮现,贯串始终。三部曲不重情节而重语言,尤其是对语言、意义和认知可能性的嬉戏,构成了小说的基石。可以说,在叙事艺术上,贝克特小说三部曲是对20世纪之前的西方辖域化的叙事传统的解辖域化,其快乐的“逃逸线”在下面的情节梗概中清晰可见。

小说《莫洛伊》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莫洛伊自述寻找母亲之旅。与传统文学“追寻”母题清晰的叙事逻辑不同,莫洛伊一路上险遇重重,意外不断,枝节横生。开篇时他坐在已故母亲的床上,等待死亡。他清点自己所失去的东西:脚指头、自行车、无法移动的双腿。无名的力量把他拯救回这个房间。莫洛伊关于自己旅程的描绘充满着不确定性,一种荒诞、含混和自我否定的氛围笼罩着小说叙事,使读者无法卒读,心生疑惑。

莫朗是《莫洛伊》第二部分的叙事者,他延续了“追寻”的母题:他接受任务去寻找莫洛伊。他同样也骑着自行车,与儿子一道。同样也像莫洛伊那样,回到家里时身体糟糕透顶。莫朗叙事的开端是名句:“现在是午夜,天下着雨。”而在叙事结尾则说:“那时不是午夜,天没有下雨。”这种悖论式的叙述,引起的是类同《等待戈多》那样的不确定感。《莫洛伊》的结局不是终结式的,而是循环式的。

在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马龙之死》中,可以看见马龙如同莫洛伊及莫朗一样,在床上写作。他记述的是自己走向死亡之旅,并虚构小说中的小说,讽刺写作本身,讽刺艺术模仿现实的观念。马龙小说中的人物麦戈曼呼应了三部曲的主人公们。可以说马龙是与麦戈曼同时死去的,因为马龙当时正在叙述其小说人物的故事。马龙与那些伙伴一般的主人公一样,经受挫败,几近于放弃,但是他仍然继续努力。除了写作之外,他无法做任何事情。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无法称呼的人》中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是具象之人,而只是一种声音。他也在写作,但是其写作的地方却交代得含糊不清。小说开场时“无法称呼的人”的感叹:“现在在哪?现在是谁?现在是何时?”(where

now? who now? when now?)为整部小说的叙事提供了一种不稳定的叙事视角,故而读者无法确定谁在说话,何许人物在控制文本叙事。碎片式的句法构成了小说的特征,反映了“无法称呼的人”自身的困惑,启迪读者的接受反应。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人物和他的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被带到这部小说中,而新的人物马霍德、巴西、沃姆也登场亮相。

哈里斯认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在叙事上“可称为一个系列性的四重独白,贝克特以此探索语言、意义和创作活动。荒诞的存在在这些作品中既使人遭受磨难又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出来”,日渐年衰、趋于空冥的主人公们以叙事创造了他们自身,他们表达了对人类存在的厌恶,尽管如此,他们也体现了“贝克特笔下原型人物不屈不挠的精神”^①。而仅仅从小说主人公或者叙述者的属性而言,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从具象的人(莫洛伊、莫朗、马龙)发展成为一种难以捉摸的声音(“无法称呼的人”),无疑是一种对已经辖域化的主流叙事传统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是一种叙事艺术的后现代实验与创新。

第四节 规训与逃逸:

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后结构主义诗学意蕴

虽然福柯在其名著《规训与惩罚》中强调了景观社会与监视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and the society of surveillance)之间关键性的二元对位,然而这种二分法并不绝对,而是互渗关系。边沁式的全景监狱蕴涵着秩序的悖论:隐蔽的监看与公开的秘密。这些构成了存在的疑惑(aporia)与惊恐。卡夫卡与贝克特同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性作家,乌尔曼对他们加以比较: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具有目的的一致性,情节推进清晰平稳,官僚机器的威胁和主人公的疑惑与惊恐寓于形式之中,而贝克特笔下的主人公宛如碎片,其疑惑与惊恐寓于形式之外,而非形式之中。

《莫洛伊》形式上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由两个第一人称叙事构成:莫洛伊和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 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莫朗。莫洛伊的叙事是一个流浪者外在于社会的叙事，在他身上无知、混乱处于上风，展示出某种无序或者混沌中的存在。莫洛伊的无知与无能相伴而行，他的无知使得压迫性的权力归于无效。例如，他首次遇见警察时无法恰如其分地回答警察的询问；他无法遵循指令并完成寻找母亲的任务。他的无知乃至使得他无视他人的监视（警察、Losse 和农夫的监看）。

关于监视社会的描绘，在莫朗的叙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莫朗的叙事是一个中产阶级侦探的故事，表达了一种秩序、合法统治的规训社会的存在。不同于莫洛伊，他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莫朗居于其中的监视世界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制世界，即使是其等级制本质隐蔽在视线之外。”^①在这个等级制系统中，居于顶端的是如同上帝或者戈多一般的全知全能的约蒂（Youdi）。约蒂是唯一拥有绝对权力者，他宛如全景式监狱的运作者，似乎在洞察一切、监看一切而不为人所见。他体现了权力话语的“隐蔽的监看”属性，读者只能感其影，猜其形。约蒂的信使加伯尔（Gaber）是直接和莫朗联系的人，他的到来很快打破了莫朗的平静生活。加伯尔指示莫朗去寻找莫洛伊，从而颇为微妙地将等级制权力因素带入我们所关注的视野。其他人只有相对权力，莫朗与厨师玛莎（Martha）互相监看，也与儿子互相监看（例如关于他手淫的时候儿子闯进来的描写）。莫朗为这个系统在工作，但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除了加伯尔之外他不认识这个系统中的其他任何人。莫朗只被告知他需要知道的最少的信息，他服从命令而无知，成为执行命令的工具。

福柯认为，权力首先不是毁坏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权力生产个人，生产灵魂，其名著《规训与惩罚》精彩地描述了从对犯人肉体外在的痛苦惩罚到体制性的内在规训的历史性转型过程，展示了全景式的监视体制如何对被规训的身体进行规训实践，其生产出来的主体是如何通过习惯、责任和观念将压制性机构的监管加以自觉地内化的。但是，与福柯所描绘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制和全景监视相异，贝克特在《莫洛伊》的叙事中突出的不是令人悒郁悲观的、笼罩一切的规训体制，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和可能存在的快乐逃逸。恰如德勒兹与加塔利所指出的那样，《莫洛伊》描述了一个从监视社会的逃逸过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 5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程。它是一种描绘不稳定性、变形的叙事。莫洛伊基于无序,而莫朗主要是体现秩序。莫洛伊和莫朗的叙事摇摆于铁板一块的秩序社会和逃逸性的无序欲望之间,或者可以用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所借用的自然科学术语来说,这两种叙事摇摆于克分子(molar)与分子(molecular)体系之间。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们是不同的聚合模式。前者是等级制和总体化的,后者则是非等级制和解中心的。前者属于社会、机构、历史话语、政党、工会、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等级制、乔木式的辖域化的结构,后者则千变万化、摇曳多姿,是千高原式的、游牧式、块茎式的后结构主义范式,呈现出革命性、多元性、流变性、开放性的意蕴。这两极在贝克特小说叙事里交缠互动,具有复杂多变的可能性。在《莫洛伊》中,克分子现象从属于分子现象。没有滴水不漏的克分子系统,而分子则有如水从茶杯之洞的逃逸线溜走,或漫溢而出,又如医生找到青霉素治病,但细菌却永远在变异!^①《莫洛伊》著名的结尾堪为这种非确定性审美旨趣的佳例:“然后我回到房间,开始写作,这是午夜。雨打着窗棂。这不是午夜。天没有下雨。”

《马龙之死》丰富了三部曲关于秩序与混乱的叙事,其结构显然不同于《莫洛伊》,它由一个叙事者站在社会之外讲述他人的故事,而后者则是让两个叙事者讲述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贝克特创作于战后的法国,敏锐地感受到了事物的混乱本质,并且热切地希望以艺术加以补救。《马龙之死》的核心事件一是写作,二是濒死。相关的一系列事件都呈现出后结构主义诗学纯粹的疑惑(pure aporia)的韵味。这部生命之书充满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联系与离散、秩序与混乱等对位关系,但是贝克特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也不是简单地互相否定的,而是常常从一个递进或者嬗变成为另一个。生进入死,光明渗入黑暗,混乱进入秩序,离散进入统一,反之亦然。他的美学思想促使他强调这些两极之间的空间,他对黑与白、光与影之间的灰色区域颇为感兴趣,这一点十分著名。马龙的世界是灰色的,充盈着变动不居的现状,常常体验到“个体内在性存在的感觉”。有时他感到自己大如须弥世界,有时又缩微如芥子,甚至会消失于针眼,有时他又感到自己变成液体,化为泥浆。在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71 ~ 8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这部小说中,马龙、萨珀和麦戈曼等人物并不是有着不朽灵魂的固定不变的我,而是呈现出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言的寓杂多为一(haecceity)、生成(becoming)和无器官的身体(bodies without organs)的动态。他们不在时光如矢的维度上活动,而是在时间如圈的意义上演变。例如,马龙失去了萨珀,但是然后又发现他变形为另一个人,即麦戈曼。这种关于游牧主体或者身份变形的描述与叙事,抵制总体性的规训和固定不变的判断,充满着从秩序、辖域化存在中逃逸的可能性。恰如德勒兹在论贝克特的《电影》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在贝克特身上一切皆无终结……”^①在福柯看到权力话语与社会规训的地方,德勒兹发现并且强调了逃逸的、解辖域化的审美意趣。

《无法称呼的人》是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传统上把它视为一种死后叙事(an after-death narrative)并不适宜,乌尔曼认为这部作品的核心是门槛叙事(a narrative of the threshold),即充满着非确定性的居间叙事,它链接着生与死、光与影、内在与外在等不同的叙事空间,缠绕着当代法国哲学的核心主题——同一(same)与“他者”(other)。E. 列维纳斯是战后法国研究这一主题最深入的哲学家。德里达以“异延”的解构论来阐发同一与他者之间的联系。他曾经提到自己的著作在精神气质上与贝克特、列维纳斯的著作相契合。

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一个令人困惑的主题是内在声音的多元性,^②而《无法称呼的人》则是以声音为主人公的一部后现代实验小说。德勒兹认为,贝克特的全部作品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与语言的斗争。尽管语言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删除”,但语言却可以撕裂,可以在语言上面“打孔”,语言千疮百孔之后就会显露出某些东西或者空无一物。

探讨贝克特晚期小说与电视剧之间的联系是德勒兹的论文杰作《穷尽》(*The Exhausted*)的主题之一。该文以贝克特为论析对象,提出贝克特作品中的三种语言及穷尽可能性的问题。这三种语言即是贝克特借以解构普通语言并穷尽其可能性的方式:第一种方式(语言 I)是元语言的创造,这是文辞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91 ~ 13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D. Albright, *Beckett and Aesthetics*, p. 4,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的、客观的语言,它可以计数、列表,进行排列组合的游戏。它以枚举取代命题,以合并关系取代句法关系,是一种“原子般的、选言式的、破碎的、变动不居的”语言,是一种名词的语言。第二种方式(语言 II)不是名词的语言,而是声音的语言,是一种带有特殊音色的主体性的传播之流(a transmitting flow),是言词表面裂开或被侵蚀之后留下的孔洞。如果语言 I 的词语是非联系的粒子,那么语言 II 的声音则是“波浪或流水,引导和分派着语言的微粒”。第三种方式(语言 III)则是意象的语言。德勒兹认为贝克特的文学旨趣从文学语言转向了电视化的意象,旨在于通过一种视觉形象的语言来补偿口语和文词语言的不足。语言 I 和语言 II 在贝克特的小说、戏剧和广播剧中大行其道,而语言 III 只在电视剧里显山露水。^① 其中语言 I 的例子是《莫洛伊》中关于“舔石”排列组合以穷尽可能性的描写。而关于语言 II 即声音的语言方面,德勒兹曾经指出:在贝克特的作品中,“总是有一个大写的他者在说话”。语言的他者性(Otherness)在《无法称呼的人》中得到了强调,在同一与他者之间,讲述故事的声音飘忽游移,难以捉摸,无法确定。这就是一种居间(in-between)叙事,是一种门槛叙事。《马龙之死》描写了濒死过程,主人公居于生与死之间,无法固定界域。这是一种“后”主义反复强调的疑惑(aporia)。在贝克特的《无法称呼的人》中,语言 III 即意象语言主要表现为外位意象与内部意象,两者互相开放,互为表里。由此,无法称呼的人居于沉默与语音、同一与他者、内在与外在之间,下面这段名句常常为人们所引证:

或许这是我的感觉,一个外在,一个内在,而我在中间,或许这就是我,是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东西。一边在外,一边在内,可以薄如蝉翼,我既不是这一边,也不是另一边,我在中间,我是间隔,我有两副面孔而没有厚度,或许这是我的感觉,我自己在悸动,我是鼓膜,一面是心灵,一面是世界,我不属于任何一边。^②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on Literature*, pp. 177~182,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and D. Albright, *Beckett and Aesthetics*, pp. 132~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中译文根据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 176,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年译出。



玛丽·伯莱顿曾经引证这段话,认为“无法称呼的人”与德勒兹和加塔利著名的哲学概念“无器官的身体”类似(Mary Bryden 1993:60)。乌尔曼则借贝克特的居间叙事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思维特征提出领袖叙事(the narrative of the leader)与译者叙事(the narrative of the translator)的对位概念,他说: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领袖叙事,以总体化、确定性、同质性为特征,具有强加的形式与内容,是一种宏大叙事。另一种是译者叙事,以非确定性、异质性、居间性为特征,是一种反叙事。犹如无器官的身体,译者的居间性使其成为一种无结构的结构,虚而实有,空纳万境,是一种去中心的主体。译者涉猎并超越两种声音。译者是声音的媒介却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叙事,因此是一种可以传输任何信息的频道而非源泉。“他者、差异、变动不居,是分裂的、非确定的自我的必然组成部分;而这种‘自我’或许在以其典范的(即绝对无限的)形式出现时,就是贝克特的无法称呼的人。”^①德勒兹与加塔利承认无器官的身体并不是针对器官(organs)的,它的敌人是有机论(organism)。因为有机论是一种中心化、等级制的科层化模式,而无器官的身体则是解科层化的结构,是一种非中心化、非习惯化的身体。由此可见,在居间叙事、译者叙事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具有哲理上、美学上的契合性,故而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充满着后结构主义诗学的丰富意蕴。

综上所述,在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关联域中,文学与哲学互渗交迭,互阐互证,共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诗学与当代离散性美学的居间性,展示出一种多姿多彩、气象万千、变化生成的千面平台,具有理解与诠释上的丰富可能性。贝克特的小说不仅仅是属于文学,它们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触媒与哲学和美学范式。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137 ~ 15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七章

普鲁斯特论:符号与文学机器

在 20 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无疑是标志性的作家之一。普鲁斯特的皇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分为 7 部,即《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旁》、《盖尔芒特家那边》、《索多姆和戈摩尔》、《女囚》、《女逃亡者》及《重现的时光》,中译本 300 余万字。L. L. 哈里斯在《20 世纪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中指出:普鲁斯特的小说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持续而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众多作家。在这部多卷本的小说中,普鲁斯特探索时间、记忆和艺术的本质。通过其叙事主人公马塞尔,普鲁斯特考察了世纪之交法国巴黎的一群资产者和上流社会人士,其焦点是叙事者对爱情、社会和他的艺术灵感的实现的探讨。普鲁斯特有意让读者把《追忆似水年华》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因为只有在此语境下,小说的主题性共振才能得以理解。这部文学著作包含着类似于音乐作品的结构因素,其母题、主旋律和人物类型一再回旋变奏,随着作品的展开,深刻的意义逐渐凸现。人们普遍认为普鲁斯特的这部经典作品是世界小说领域中的杰作,展



示了他的文学天才。^① 我们可以用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的话来高度概括这部小说的叙事轴线：“马塞尔成了一名作家。”叙事者“主要通过调动无意识记忆的手段，通过大段大段并无内在逻辑联系的回忆片段的拼贴与组合，通过冗长而蔓枝四射的内心独白与心理分析，向读者展示了叙事者意识中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幅幅风景。叙事者从世事无常、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中悟出时间是生命的敌人，而唯有文学艺术的创作才能战胜那不可逆转的客观时间，才能在文学作品中重建一种具有持续不灭的艺术生命力的心理时间”。^② 法国作家莫洛亚反对某些批评家关于普鲁斯特作品没有大纲的说法，认为《追忆似水年华》整部巨著的结构犹如一部交响乐，甚或像瓦格纳的一部歌剧：“开头几页是一个序曲，主要题材已经点明：时间，斯万先生的铃声，文学爱好，小玛德莱纳点心。然后，从斯万到盖尔芒特一家之间搭起了巨大的拱桥；结尾，所有的题材又重新聚在一起，在谈到台阶和粗糙的毛巾时再次忆起小玛德莱纳点心；斯万先生的铃声又像在开头几页那样响起，作品就在‘时间’这个字上结束，时间是本书的中心议题。”^③

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家不同，作为哲学家的德勒兹从其独特的美学观念和当代符号理论出发，对文学作了许多重要的阐述。《普鲁斯特与符号》^④ (1972/1964) 是他的第一部文论专著，这部著作主要从符号与文学机器两个维度对普鲁斯特作了独特的读解。他的读解在关于普鲁斯特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 德勒兹的符号论渊源与特征

在当代西方文艺美学领域，最有影响的符号学理论当推瑞士语言学家索

① Laurie Lanzén Harris, *Characters in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pp. 326~327,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0.

② 柳鸣九主编：《意识流经典小说选》，166 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③ 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萨特》，袁树仁译，21 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④ 本书依据的版本为 G. Deleuze,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绪尔基于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性联系的语言符号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盛行一时,索绪尔一脉的二元论符号学大行其道,并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崛起作了铺垫。符号学不仅是研究文学文本的有用方法,批评家借以对作品中意义系统加以解编码,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对神话的结构分析,而且还让罗兰·巴特等文化批评家成功地将其原则用于五花八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例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说,福柯对医疗诊断史的研究,拉康将无意识作为一种语言结构的观念,都使用了符号学的许多重要原则作为其著述的支撑。^①

然而,与传统的或索绪尔语言符号学(Semiology)迥异的是,德勒兹的符号论具有比较复杂的渊源与特征。一般认为,德勒兹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所代表的符号论(Semiotics)^②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尤其在他两部关于电影哲学和美学的著作中作了出色的运用。皮尔斯的符号论是一种超越语言而重视形象的多元符号论,对影视或文化传播领域影响重大。皮尔斯将符号科学视为一种普泛化的系统和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他区分了 Icon、Index 和 Symbol 三种类型的符号。第一种 Icon 意为“形象”、“图像”,其联系基于类似性或共享特征之上,例如,图片与图片主题之间的关系;第二种 Index 意为“索引”、“引得”,涉及因果关系,例如晴雨表(气压计)与大气压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种 Symbol 意为“象征”、“标志”,指涉的是传统的(因袭的)联系,因此是一种任意的联系,例如,以某种旗帜标志一个国家(如以星条旗象征美国)是赋予象征以意义的行为。

德勒兹超越索绪尔渊源的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对符号作了丰富多彩的非语言学界说。A. P. 柯伦巴特在《德勒兹与符号》^③一文中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牾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的全部著作皆拒斥由神学家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d., pp. 272~27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关于符号的两个重要术语“Semiology”与“Semiotics”具有不同的渊源,并且常常被混用。

③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4~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奥古斯丁)和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界定的符号概念,因为他们的符号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超验的法律、上帝之言、菲勒斯、阉割情结等等——的特殊秩序。德勒兹与其同时代的众多的结构主义者不同,他拒绝任何囿于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德勒兹与加塔利一道,继而拒斥拉康主义及其黑格尔哲学基础。德勒兹以自己的符号系统取代了索绪尔的 *Semiology*, 他的符号论构成颇为复杂,主要源于皮尔斯的 *Semiotics*、斯宾诺莎的表现观、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非语言学符号观,以及奥斯丁和塞尔等人的思想。德勒兹在与加塔利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访谈中抨击索绪尔式能指的“专横、恐怖、阉割的特性”,认为这种符号学能指“简直就是专制的超编码的法则”,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转向了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以流代替能指的思想,指出:“叶尔姆斯列夫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流,内容与表达的流,不需要能指。”^①德勒兹将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论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亦显得颇具特色。在弗洛伊德乃至拉康看见符号、能指和所指——一种语言与句法——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绘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他们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也颇具特色:通常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着什么”这类问题,被他们换成“这个符号如何影响我的情感”、“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与什么具体的社会、政治、情感或情欲的安排相关联”、“什么使我极悦或极悲”之类的提问。这种新型的符号论衍生于德勒兹超验的经验主义的核心。德勒兹常常提到,一个木匠在他工作之前首先必须对木材的符号敏于感受,才能将木头变成木屋。这种符号即是一种表现——在特定的安排之内某一块木头能够做成什么部件。这类表现是一场肯定力量与否定力量的战争,木匠用这些力量来对木材的取舍进行评价、联系与安排,合用的木头得到肯定与采用,不合用的木头则遭到否弃。同理,阅读一位作家,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变得敏感于他或她的文学世界、符号与风格;德勒兹在阅读普鲁斯特中贯串始终的是这种观念:超验产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生于经验,智慧总是在体验之后才获得的。而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充满着亟待辨读、感受和体验的符号。

概言之,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并不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对什么使语言成为可能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际遇、什么样的力量关系、什么样的事件被折叠和包含在符号之内。因此,毫不奇怪,德勒兹从不在语言学维度讨论文学文本。“世界并非文本,而是力量的网络,其中符号乃是力量的征候。……综观德勒兹的著述,力量、身体、物质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归于语言的。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尼采的研究上。”^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德勒兹以其差异哲学和生成美学的话语与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一种对话,也是对法国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的一种反拨。

第二节 译名之辩与艺徒小说:“追忆”的界说

普鲁斯特的小说代表作“*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译名为“追忆似水年华”,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部关于过去的小说,其叙事者马塞尔通过对回忆相关的各种模式的探究,企图重新攫住过去。从英译名来看,原来提供给英语界读者的标准英译名是《往事追忆》(*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而不是更具字面对应义的《追寻逝去的时间》(*In Search of Lost Time*),这无疑会使英语读者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将回忆与过去相结合的阅读模式。然而德勒兹却并不满意这类传统的阐发,他认为《追忆似水年华》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的作品。据说,当普鲁斯特知道英译本书名为《往事追忆》(*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时,他非常失望,因为这个书名像回忆录。而后来由英赖特(D. J. Enright)根据七星版修订的新版英译,已将书名改译为“*In Search of Lost Time*”。

再从中译名来看,《追忆似水年华》的“年华如逝水”隐喻中蕴涵的关于时间与逝水的联想,或来自孔夫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喟叹,或来自希腊哲人赫拉克立特“在同一水流中,不能涉足两次”的说法,两者强调的都是时光

^① R.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34, London: Routledge, 1989.



如水流,不可倒逆,但是这却与普鲁斯特时间可藉由无意识回忆复得的时间观相睽违的。据此,台湾学者刘俐指出:普鲁斯特写的不是一部怀旧之作。中译书名中的“追忆”,可能来自原书名中的“*A la recherche*”,是“追寻”之意。但“追忆”与“追寻”,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一向后看,一向前看;一消极、一积极。普鲁斯特有严重的哮喘和气管炎,怕见阳光、怕吹风,把自己囚禁在斗室,与世隔绝,小说似乎只能是“一个自愿活埋在坟墓中的人,在寂静的坟墓中回想生前种种经历与感受的抒情记录”(中译本代序)。也许就是因为对这部作品做这样一种理解和定位,因而有了《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充满怀旧的、抒情意味的书名。但从各个角度来看,《追忆似水年华》这个中译名都不曾忠于原著精神。《追忆似水年华》的媚俗倾向,常见于影片译名。影片有其商业考虑,需要软性或刺激的名称。面对一部严肃的文学经典,面对普鲁斯特这样一位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似应有更慎重的态度。事实上,普鲁斯特在他的病床上,写下两百万言的巨著,表现了惊人的、强悍的活动力和创造力。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回忆录,重点也不在追忆往事,书中主人翁马塞尔的一生,并没有传奇的故事、起伏的情节。普鲁斯特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对外在世界做文字的重构,他认为,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世界如何反映在主观意念中。他随手拾得的题材:一个病人的失眠夜、佣人的闲话、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都通过他的感觉,通过他特殊的叙事风格,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人世界;故事、情节只是借口,所以他的叙述时时中断,夹杂了大量的议论、联想、心理分析,一个三小时的聚会,可以用190页的篇幅,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也可以随意压缩,心理时间取代了物理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迭、相互渗透,再作多重的复合变化,时而在倒序中展望未来,时而在展望未来之际回忆过往,时序变化的繁复与扑朔迷离,无疑是普鲁斯特对现代文学最大的启示。通过记忆与文学创作,能够找回逝去的时光和创造新的审美体验。时间是小说真正的主角。

符号、时间与真理的关系是德勒兹阅读普鲁斯特时反复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似水年华不仅指往昔时光,亦指耗费了的时间,更是指尼采式“永恒循环”的时间。普鲁斯特作品的基础不是追忆,而是符号。追寻的本质不是记忆与时间,而是符号与真理;不在于记忆,而在于学习。目的乃是揭示不同的符号

世界。因为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诗学视阈中,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视为一部充盈着丰富多彩的符号的艺徒小说(a novel of apprenticeship)。小说中,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占了极重要的分量:音乐家凡德伊(Vinteuil)、画家艾尔斯蒂(Elstir)、作家贝哥特(Bergotte)都是主人翁的精神导师。“真正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叙事者马塞尔如何成为一位作家及这部作品如何诞生的过程。这是法国史上第一部以小说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为主题的小说。……马塞尔并非从小立定清楚的志向,献身写作,年轻时,他忙于社交周旋与感情纠葛,对自己的写作天分也毫无信心。写作,开始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潜藏在心底,但每隔或长或短的时间,就会在心灵深处向他召唤。夕阳下的钟楼、石子上反射的阳光、一条小径的气味都会触动他的心弦,引发他用文字去捕捉印象、去探索事物本质的欲望。经过迟疑、寻觅、考验,到这部作品结束时,这种懵懂的欲念终于变成坚定的信仰。……普鲁斯特的宗教是艺术,他甚至认为,艺术创作的生命,比真实度过的生命更真实。他曾有意将全书命名为《永恒的膜拜》(Adoration Eternelle)。他膜拜的对象,不是神祇,而是艺术。”马塞尔庞大的写作计划要完成的正是《追忆似水年华》这部杰作。

德勒兹认为,任何学习活动都是对符号的一种诠释。马塞尔在艺徒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禀赋,学会了去辩读各种符号:爱情的符号、社会现实世界的符号、感性经验的符号和艺术的符号。最终他发现艺术是真理和本质的中介,艺术阐明了符号的本质,揭示了最纯粹的时间形式:时间的重获。艺徒特征表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的取向不是追寻过去与记忆,而是指向未来和艺徒的研习过程。主人公在最初时并不懂某些确定的事物,而是渐渐地学会了它们,最终彻悟。在此过程中他必然要体验失望和幻景。平庸之爱远比伟大友谊更有价值,因为爱情符号更为丰富;艺术作品远比哲学著作更具价值,因其符号更为丰赡;同理,在符号意义上,暴力胜于善良意志,嫉妒胜于纯洁爱情。有爱情就会有嫉妒。嫉妒者运用所有的记忆之源,以诠释爱情符号——爱人的谎言。失望是追寻或研习的强大动力和基本因素。在符号的每一个领域,当对象不给我们解答所祈望的秘密时,我们都会失望和沮丧。例如,第一次听见凡德伊奏鸣曲,第一次遇见贝克特,第一次看见巴洛克教堂时即是这样。每一条艺徒线索都会经历两个时刻:尝试客观解释带来的失望和



随后想用主观解释对这种失望加以补救的努力。符号的意义无疑要比客观和主观的解释更为丰富深刻。世俗符号、爱情符号,甚至感觉符号都不能给予我们本质,尽管它们把我们带近本质,但是我们总是跌回到客体的陷阱里,进入主体性的圈套里。唯有在艺术层面,本质才能得到揭示。德勒兹认为马塞尔的艺徒生涯有两个维度:一是他逐渐地在各种训练中成为一个艺术家,一是这一教育过程将马塞尔导向真理。而要成为艺术家则必须学会辩读符号,但只有通过追寻(recherche, or the Search)真理才能理解符号。德勒兹认为,追寻的概念关涉到符号、意义与本质;可界说为艺徒过程的连续性与揭示的断裂性或突然性。因此,这部名著的关键是求真,即追寻真理(truth),揭示的是不同的符号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与时间的各种结构相互缠绕,形成充满“差异与重复”的多点互扣的循环。

第三节 普鲁斯特的四个符号世界

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现在已成为西方文论的经典著作。这是德勒兹首次在文学语境中对符号加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并不对语言学符号或符码感兴趣(例如像罗兰·巴特那样),而是从皮尔斯式的超语言维度和哲学实用论的角度对普鲁斯特的符号论感兴趣,关注其多元性、异质性和动态生成。德勒兹认为符号并不是交流的工具,而是亟待辩读的象形文字和谜团。据此,《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所有人物都可以作为不同的符号来看待,或者,他们各自对同样的符号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反应方式。普鲁斯特文学世界大致是由四类符号构成的:

(1)世俗符号(worldly signs)——这是最简单的符号,实际上它们是定型的和空虚的,具有“仪式般的完美”,只简单地在我们浪费与失去时间之际代替着行动。追忆的第一个世界乃是世俗的世界。

(2)爱情符号(signs of love)——它们较世俗符号复杂,标示着爱情对象所包含的多元世界。小说描写各种爱情的变调,恋爱者必须通过爱情来探索和展开这种多元世界。但是这种世界却是不可避免地排斥恋爱者的,它们的符号引发的是嫉妒之痛苦,它们以谎言和欺骗的形式呈现在恋爱者的面前。

从符号维度而言,爱情是从茫茫人海的纷繁的爱情符号中找出一个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对象,去恋爱即是去努力探索一个未知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易于爱上一个与我们不同类型的异性的原因。坠入某人的情网意味着对这位心上人所代表的未知世界变得敏感,需要不断阐释其爱情世界的符号。

普鲁斯特式爱情的第一律则是主观性,在诠释和理解符号方面,从主观性出发的嫉妒要远比爱情更为深刻。嫉妒蕴涵着爱之真,是爱情的目的与终结。与空虚的世俗符号世界不同,爱情符号意味着思想与行动。爱情符号的诠释者必然是谎言的诠释者。

普鲁斯特式爱情的第二律则是与第一律则相联系的,即同性恋远比异性恋更具深刻蕴涵。小说第五卷《索多姆与戈摩尔》(*Sodome et Gomorrhe*)以《圣经》中遭神诅咒的两个城来影射一批被社会迫害的同性恋者,他们承载着诅咒,只能活在谎言和伪誓中,他们的情欲见不得天日,他们的爱难以启齿。德勒兹认为普鲁斯特笔下的同性恋有两个分支:索多姆系列与戈摩尔系列,两者的性格互补,其渊源则是双性同体(Hermaphrodite)。可以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整个爱情世界都是从揭示欺骗的符号向隐匿的索多姆和戈摩尔符号的延展。

(3)感性体验符号(signs of sense experience)或感觉符号——是不由自主追忆的符号,充满感性印象和品性。德勒兹在分析普鲁斯特时把记忆分为两种:自主(有意)记忆(the voluntary memory)与不由自主(无意)记忆(the involuntary memory)。与爱情符号相互交织的记忆属于前者,不由自主的记忆主要是介入一种颇为特殊的类型:感觉符号。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重获的时光”有许多关涉不由自主的记忆与感觉符号的著名例证,如叙事者在品尝浸泡在椴花茶中的玛德莱纳甜点心与他童年时代在贡布雷生活的回忆的链接,凹凸不平的鹅卵石路与昔日威尼斯市生活的链接,都是复杂的感性体验符号,它们在叙事者的心灵深处倏然地唤醒沉睡已久的童年记忆或特殊体验,激发出一种不由自主的意识流的顿悟。在普鲁斯特的感觉符号中,椴花茶中的玛德莱纳甜点心可能是最著名的例子。这种法式甜点心是用扇贝壳式的模子做出来的,它特殊形式和与茶融合的滋味引发了叙事者尘封多年的个人体验:



回忆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每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玛德莱纳”的滋味,我到莱奥妮姑姑的房内去请安,她总是要把一块“小玛德莱纳”浸泡到椴花茶之后送给我吃。……贡布雷的往事被抛却在记忆之外太久,已经陈迹依稀,影消形散……但是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是人亡物毁……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姑姑住过的那座临街灰楼像舞台布景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们家花园里的各色鲜花,斯万先生家园的姹紫嫣红,以及维福纳池塘里漂浮着的睡莲,善良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还有教堂,还有贡布雷镇内外的一切,全都显出形迹,并且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扇贝壳状的小玛德莱纳甜点心不仅链接叙事者往昔的体验和幽思,而且还激发出一种无可名状的关于人生与未来的情思:

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发现我心中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了全身,我感到超然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虚幻一场;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茶杯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①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这个例证不断地为研究者们所引用和津津乐道,但是德勒兹的分析似乎最具哲学思辨的力度。他认为普鲁斯特的“重现的时光”是由多元性符号——玛德莱纳甜点心、尖塔、树木、鹅卵石、餐巾、汤勺与吸管的嘈杂声音——所一再触发的。符号的意义由此显现,把我们引向隐匿的客体:甜点心与贡布雷、青春少女与教堂尖塔、威尼斯与鹅卵石就这样链接起来。

^① 柳鸣九主编:《意识流经典小说选》,217~22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讨论了两种感觉符号:追忆与发现。感觉符号接近于艺术想象力。记忆符号是决定性的,它建构了艺术作品。回忆具有复杂机制:联想机制——接续现在与过去。贡布雷随着玛德莱纳甜点的味道冉冉而出。自主记忆的过程是从实际上的现在到“曾经”之现在,落到某种曾经有过而今天不再存在的事物。显然,某种重要的东西从自主记忆中逃逸了:过去就是过去。自主记忆使得时间的本质逃逸了。柏格森与普鲁斯特的时间观的类似点不在于时间的绵延层面,而在于这种记忆层面。梦是纯粹记忆的腐烂,成为扭曲记忆的表象。在玛德莱纳甜点的例子中,只要我们仍然停留在自主记忆的层面上,贡布雷就会停留在玛德莱纳甜点之外,成为过去感觉的一种可分离的语境。而不由自主记忆的特征在于:它内化了这种语境,从而使过去的语境与现在的感觉不可分离。不由自主记忆的本质不是事物的相似,甚至也不是认同——那只是条件而已,而是内化了的差异。它在现在与过去的链接中揭示了记忆的本质和原初的时间所延展出来的各种系列与维度。这就是时间在其内在本质及其与实体相认同问题上的复杂性。因此当我们谈论在艺术作品中“重获时间”之时,我们关注的是原初时间(它与用掉的、发展了的时间相对立)与延续的、“正在过去的”时间(通常是浪费掉的时间)的关系。记忆的感觉符号是生命的符号,而不是艺术符号。学习即是记忆,追忆因此与艺徒过程链接起来。

(4) 艺术符号(signs of art)——德勒兹认为艺术符号是最高符号,它们使事物变幻,表达出本质的意义。艺术符号是诸符号的最终世界,它不仅与感性体验符号形成对照,而且还能对所有的物质符号进行解物质化(dematerialized),能够揭示本质范畴与时间的纯粹形式。艺术符号代表着追寻真理的高峰,并对其他三种符号的真正本质进行追溯性的阐发。艺术作品的本质犹如上帝和大自然,包蕴了整个多元化的世界。虽然感觉符号能在感性世界里重新发现过去的时间,带来真正的愉悦,但易倏忽而逝。唯有第四种符号,即艺术符号,能够带来恒久的愉悦。艺术符号能够转化其他所有符号,揭示本质和纯粹的时间。感性体验符号即不由自主地追忆的符号,则最近于艺术符号,它超越了单纯的观念联想,因为过去与现在的体验并不简单地彼此相似,而是分享着共同的品质,其本身在不同的时间中共存。当叙事者品尝玛



玛德莱纳甜点心时,其味觉与往昔他在贡布雷吃的玛德莱纳甜点心相同。而重要的是在往昔的玛德莱纳甜点心与作为该甜点心语境的往昔的贡布雷之间的差异,在往昔玛德莱纳甜点心一贡布雷体验与现在玛德莱纳甜点心体验之间的差异,都被建构成为现在体验的内在性。最终,玛德莱纳甜点心从意识中消逝了,而贡布雷的本质跃然而出,这是一种现实世界里从未存在过的贡布雷。不由自主地追忆的体验对理解时间有着重要意义,而艺术则赋予世界以审美意义。

普鲁斯特的四大类型符号构筑了不同的世界:世俗的空虚符号,爱情的骗人符号,感性的物质符号,最后是艺术的本质符号。艺术符号能够转化所有其他的符号,带来恒久的审美愉悦。

第四节 永恒的回归:真理、符号与时间的四种结构

德勒兹在阅读普鲁斯特中作出的具有原创性的诗学贡献之一,就是他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出发,把普鲁斯特文学世界的本质诠释为绝对的内在于差异。可以把这种普鲁斯特式的本质视为一种原初的、复杂的混沌宇宙,由其所蕴涵的不同的差异符号所阐明,符号的展现即是这些差异的纷繁多姿的重复。德勒兹认为普鲁斯特与尼采一样,都具有永恒回归的主题,而其中的主导概念则是差异与重复的概念。R. 博格指出:“从永恒的回归的视角看,这种宇宙可视为充满差异且重复不已的多元性的混沌世界。简言之,普鲁斯特的本质即是永恒的回归……在复杂时间的本质意义上,过去、现在、未来共存。……这些时间三维的共存,实为‘纯粹过去’(a pure past)的存在方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普鲁斯特的本质纯粹是永恒的回归的理念。”^①与尼采一样,普鲁斯特是哲学上传统的思想形象之敌,《追忆似水年华》追寻的是真理——本质之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无法凭借思想家善良的意愿、话语交流和友谊获得。对普鲁斯特而言,思想总是以一种撞击文学人物心灵的力量所激发出来的——关于夏吕斯(M. de Charlus)的令人烦恼的议论,使阿尔贝蒂娜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p. 36~44,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Albertine)满怀嫉妒的一瞥,玛德莱纳甜点的味道,凡德伊奏鸣曲的主旋律,都是如此。我们错误地相信事实,其实没有事实而只有符号。传统哲学的真理是随意的、抽象的,是思想家自由意志和方法的产物,而普鲁斯特之真理是与符号偶遇的产物。符号迫使主体思考,或者说驱使思想家去思考的是符号。

实际上追寻似水年华即是求真。真理与时间有着本质的联系。求真就是去解释、辨认符号,分清是非,这正是符号发展的过程。德勒兹用尼采式“永恒回归”的观念来看待追忆中的时间问题,认为符号的追寻总是一个时间过程,真理总是时间的真理。时间是多元的。德勒兹认为与普鲁斯特的四种符号类型相应,《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时间有四种结构,每一种时间结构都各有其真理。世俗符号主要回应着耗费的时间(a time wasted);爱情符号主要包含着逝去的时间(a time lost);感觉符号通常为我们提供重获时间(regaining time)的途径,它们攫住逝去的时间之核心,将其复归于我们;艺术符号最终赋予我们重获的时间(a time regained),这是一种原初的绝对时间,包蕴和转化了其他所有的时间。四种符号中,唯有艺术符号是非物质的。艺术给予我们真正的统一——非物质符号与纯粹精神意义之统一。艺术作品的本质是差异——绝对的、最终的差异。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徒然追寻的东西,艺术却能够单独将其给予我们。

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里,每一种符号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时间维度,亦与其他的时间维度交织互渗。耗费的时间伸展到爱情符号甚至感觉符号之中。逝去的时间甚至出现在世俗符号和感觉符号之中。重获的时间反过来呼应着耗费的时间与逝去的时间。世俗符号是轻佻的,爱情和嫉妒的符号是痛苦的。最轻佻的世俗符号指向法律,最痛苦的爱情符号意指着重复。我们所爱之人驱使我们遭受苦难。与真理相关的思想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有多种伪装:回忆、欲望、想象、智力等等。尽管时间在耗失,但是时间也会复得和重现。而正是在艺术作品的绝对时间中,所有其他的维度被结合起来,找到与它们相应的真理。普鲁斯特的符号世界——追寻的循环由此依照时间诸线索(实为艺徒之线)而展现。逝去的时间不仅是往昔的时光,而且也是人们浪费了的时间(例如,人们在世俗的意义上耗费在爱情中的时间)。重获的时间首先是以逝去的时间为核心的时光重现,它由此给予我们的不仅是一种永恒的意象,而且也是



一种绝对、原初的时间,是艺术所实际确定的永恒性。每一种符号都有一种特定的时间线索与之相应,同时也有多种融合方式构成的多元性。每一种符号皆参与几条时间线索,每一条时间线索都融合了数种符号。例如,小说中主人公因靴子所激发的对故世的奶奶的不由自主地追忆,在原则上与玛德莱纳甜点心、鹅卵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靴子却使我们感到一种痛苦的失落,构筑了一种永逝的时间。

A. P. 柯伦巴特在《德勒兹与符号》^①一文中指出,尽管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中从未提及皮尔斯,但是,他曾经通过德拉戴尔(G. Deledalle)的法语翻译与阐释阅读了皮尔斯,了解并且对皮尔斯以形象为基础的符号论感兴趣,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启迪,并将其与斯宾诺莎等人的观念融合。他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后来的电影哲学和美学研究中超越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梅茨(Metz)的电影语言学模式。A. P. 柯伦巴特对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中不同的符号类型及时间结构作了如下总结:

重获的时间 (纯粹的时间)	恢复的时间 (凭借身体或记忆)	失去的时间 (再也无法重获的时间)	耗掉的时间 (浪费了的时间)
艺术世界	感性世界	爱情世界	世俗世界
艺术符号	感觉符号	谎言符号	空虚符号

在这种新的符号论批评体系中,不同的符号类型呈现于不同的世界、思想或存在的模式之中,每一种皆呼应着不同的时间和维度。在德勒兹的文学批评中,哲学与文学是不可分的。德勒兹曾经著书研讨过“感觉的逻辑”——某一事物折叠于另一事物之内,这一点清晰地贯串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之中。普鲁斯特与尼采的思想主题中皆有永恒回归的特征。从永恒回归的视角审视世界万象,宇宙是充满差异的多元性的混沌,在复杂的时间本质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共生共存。差异与重复的本质力量,使得人们能够抚古今于一瞬,以芥

^①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4 ~ 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子纳须弥,观沧海桑田之剧变。

第五节 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论

德勒兹颇为喜欢用“机器”一词,其《普鲁斯特与符号》的第二部分即以文学机器(The Literary Machine)为题,主要论及情综(pathos,帕托斯)世界与理综(logos,逻各斯)世界的对位、分隔的连续性(开放的盒子与封闭的脉管、风格与横截线等)、三种机器、蛛网理论等问题。德勒兹由此进一步研讨了普鲁斯特与符号的复杂关系,阐发了他独特的诗学观念。

“文学机器”的观念与德勒兹美学思想中“块茎”、“装配”等概念相关,在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爱德伽等在《文化理论:关键思想家》(2002)中指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历史与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符号体制内的权力冲突的维度才能加以理解。《千高原》在从不同的符号体制的维度尝试将语言系统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方面提供了佳例。尤为重要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抨击一切直接清晰的逻辑分析模式,倡导以块茎结构审视现象世界的视角:块茎结构可以视为一种半有机的机器,它没有起源,宛如一条“既无开端又无终点的河流”,其内在结构只能从与其他力量相联系的维度勾勒出来。现象界因此是开放性的,可以作为一种非目的性的装配来加以分析。这种装配可以用无限可能的方式整合或链接在一起。无论何种机器装配(作为某种“有机论”),都建构了一系列的权力联系。与此类似,德勒兹认为文本并无源生的主题,书籍皆是机器。它们唯有通过与其他权力的交汇并相互作用才产生意义。因此,文学应作为装配的一种形式,其意义不能简化成意识形态问题。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观念,只存在多条线索的权力,这些权力之线既合且分,构成层面化且缺乏恒久性的块茎总体。因此,最好是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立场:他们既摒弃意识形态分析,又拒斥辩证思维。对他们而言,这两者皆与块茎式的多元性相悖。以辩证法为中介的语言因此被摒弃,而聚焦于斗争、捕获、接受之题旨的理论方法受到青睐。他们还以“逃逸线”的概念取代康德式的超验的批判。“逃逸线”构成了从封闭的、科层化的权威等级制思想体系(这种体系勾画出了社会与文化的



“现实”中逃逸而出的途径。^① 德勒兹用差异哲学的符号论和症状学视角审视《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坚持其一以贯之的机器、装配、块茎、褶子、千高原等多元生成的哲学思维方法和美学观念,融会了尼采关于真理是解释与创造的主题以及“永恒回归”的思想,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巴洛克风格的“褶子”结构,最终展示出普鲁斯特的“文学机器”的装配与生成:一个产生符号的碎片化世界,一种块茎式的总体性。

德勒兹认为,普鲁斯特随时随地都将符号或症候的世界与属性的世界相对照,将情综世界与理综世界相对照,将象形文字和表意符号的世界与分析性表达、语音书写和理性思想的世界相对照。这是从古希腊人继承而来的伟大主题,可以溯源到“philos”、“sophia”、“dialogue”、“logos”、“phone”等关键词^②。在古希腊世界里,例如在柏拉图的伟大的三重奏——疯狂、爱情与死亡——中,可以找到这些符号。古希腊世界不仅在逻各斯中表现出总体性,而且还在格言、象征、神谕的符号、预言者的疯狂或谵妄之中呈现出片段性。符号在古希腊世界中是多元的系统,是逻各斯的变化多端、富于欺骗性的碎片。当一个符号出现时,它有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希腊方式是微观中见宏观,普鲁斯特式的是一种无序的、不可交流的方式。要想在普鲁斯特那儿找到老生常谈的“有机整体”的艺术作品是徒劳的。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反逻各斯风格和方式。围绕着“追忆”,德勒兹进而论述道:

——追忆是一个碎片化的宇宙,无法用逻各斯凝聚起所有的碎片。可以用开放的盒子与封闭的脉管(the open boxes and the closed vessels)与横截线(transversality)等概念来描述记忆、无意识分隔的连续性问题。

——追忆有两种基本的形象:第一种是开放的盒子的形象(容器与内容),具有投注、蕴涵和意指的属性。人物、事物和名字皆是盒子,我们从中拿出不同的内容。第二种是封闭的脉管的形象(部分与整体),是非对称、不可交流的部分的共存,犹如彩票的转轮,它移动甚至混合了那些固定的奖金点。就功能而论,不由自主记忆是开放的盒子,它打开隐匿的盒子,展示内容;而在与之相

^① A. Edgar and P. Sedgwich,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Thinkers*, pp. 39~42,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② 这些词语分别具有哲思、诡辩、对话、逻各斯和声音诸义。

反的另一端,欲望仍然沉睡着,犹如封闭的脉管。在玛德莱纳甜点的例子中,真正的容器不是杯子,而是感觉属性,即味道。其内容也不是与此味道相联系的贡布雷人物与事件的链条,而是作为本质的贡布雷和作为纯粹视点的贡布雷。因此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两种追寻的方式:盖尔芒特的方式与梅塞格里斯^①的方式。可以有千条封闭的脉管,十个阿尔贝蒂娜,或阿尔贝蒂娜有多重面孔。每一条脉管有自己的生命、感觉、欲望和记忆,它们或醒或睡,死亡、自杀并且在突如其来的震惊中复生,对应着自我的多元性。在封闭的脉管之中没有哲学意义上的总体性,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总体性。嫉妒是爱情多元性的横截线(transversality),旅游是空间多元性的横截线,睡眠是时间多元性的横截线。封闭的脉管与此类似,是分离的各部分的组织,有时是以对立的方式组织,有时是以循环的方式组织。在一群姑娘之中选择某一位姑娘,是对复杂性加以反应的行为。开放的盒子是亟待阐明的对象,封闭的脉管则是亟待选择的对象。时间实际上是所有可能性空间的横截线,包括时间的空间在内。

在分隔的连续性问题,普鲁斯特对嫉妒与爱情的关系有特殊的看法——嫉妒的逻辑就是开放的盒子与封闭的脉管的逻辑。分隔、观淫癖和渎神是普鲁斯特的三重奏。分隔是防止连续性的方方面面的贯通,爱情中的嫉妒使得斯万分离和囚禁所爱的奥德特,杜绝她在感情世界里的其他所有可能性。囚禁就是将某人置于被窥看而看不到别人的位置。他窥看阿尔贝蒂娜的睡姿就是如此。普鲁斯特钟爱渎神的主题:M. 凡德伊在她的性狂欢中带着父亲的照片,叙事者将家庭用具置于妓院,描述阿尔贝蒂娜在他母亲房间的隔壁拥抱他,从而使他将母亲与阿尔贝蒂娜的身体相联系;在一场梦中,他渎神般地将父母像受伤的耗子似的关在笼子里(分隔),迫使他们跳跃。分隔、窥看和渎神

^① 梅塞格里斯(Meseglise),普鲁斯特的家乡伊利耶-贡布雷现在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其西南的梅瑞格里斯 Mereglise(亦即小说中的梅塞格里斯 Meseglise,又称斯万之路 The Swann's Way),小说里梅塞格里斯方向长满粉红山楂花,尽头是具有文艺修养的犹太富商斯万的豪宅东崧维尔之紫丁香花园,这个原型来自其姑丈的郊区美丽休憩花园“卡特隆绿地”,而这条路是通往童年纯真之爱与欢愉的象征,山楂花丛边,他与吉尔伯特(Gilberte)初识并初恋,触发他少年的悸动,另一次偷窥到作曲家凡德伊女儿的同性恋及无情,更促使他跨出童稚。



三者,总结了爱情的全部律则。追忆的工具是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望远镜的律则统治着分隔的宇宙之诸碎片。

——风格与横截线。风格是符号的诠释。普鲁斯特作品风格的基点是追寻各部分呈现为分隔的碎片状态,由开放的盒子与封闭的脉管共同组成,时间掠之而过,却未建立某种整体。当普鲁斯特将他的作品比喻为一座大教堂或一袭长袍时,并不是将其与作为宏大的总体性之逻各斯相认同,恰恰相反,他是在强调未完成、缝隙与补丁。意义链条是破碎的,让位于居高临下的视角。德勒兹指出:莱布尼茨是第一个提出由封闭的部分或从不可交流的事物中进行交流的问题的哲学家。我们如何想象既无门又无窗的“单子”之间的交流?莱布尼茨似是而非的回答是:这些单子都拥有同样的基础,都处于它们属性的无限的序列中,蕴涵和表达着同样的世界(如众信徒对上帝的信仰)。同时每一个单子都有自己的表达领域,与其他单子的领域不同,因此它们对上帝让它们面对的同样的世界有着不同的视点。横截线的维度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正是横截线使得我们犹如在火车上观景那样,不是把风景的各视角统一起来,而是根据风景自身的维度把这些视角带入交流状态,同时,它们又根据自己的维度仍然让自身保留着非交流状态。正是横截线建构了盖尔芒特方式与梅塞格里斯方式之间的单一性和总体性,同时又没有压制它们的差异与距离。正是横截线建构了由蜜蜂所引发的渎神——这种横截线式的昆虫引起分隔的两性进行交流(蜜蜂为花授粉从而实现动物与植物的“食、色”双赢)。正是横截线保证了光线从一个宇宙转移到另一个宇宙,它们之间的差异犹如天文学意义上的世界。新的语言习惯和作品的形式结构因此也是横截线,它贯通所有句子,构成整部作品,甚至还把普鲁斯特的作品与他所喜爱的奈尔瓦尔(Gérard de Nerval)、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的作品联系起来。横截线的维度使得奥迪特与斯万、母亲与叙事者、阿尔贝蒂娜与叙事者、老奥迪特与盖尔芒特这些关系呈现共性:每一例皆是爱情的俘虏,同时又全都在进行横截线式的交流。

德勒兹论述了普鲁斯特符号世界中的三种机器。他认为,追寻是用精神的望远镜观照“情感天文学”。追寻不仅是工具,也是机器。现代艺术品可以是视野中的任何东西,我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多元决定。现代艺术品是

机器,亦像机器一样发挥功能。在追寻中不仅有奏鸣曲或者七重唱,追寻本身也是奏鸣曲和七重唱,是一出歌剧。普鲁斯特甚至还补充说,追寻就是大教堂,是长袍;追寻是性与政治警告的预言,它们从德雷福斯案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隐秘的深处而来,抵达我们的世界;追寻是密码,它对我们所有的社会、外交、策略、性欲以及审美语言、怪诞喜剧、形而上学论文、符号或嫉妒的谵妄……加以解编码与重新编码。现代艺术品没有意义问题,只有用途问题。为什么艺术品是机器?因为它本质上是生产性的——生产某种真理。没有人比普鲁斯特更加坚持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普鲁斯特是如何使柏拉图的创造与记忆的等价观念复活的,因为记忆与创造实为生产这枚硬币的两面。所有的生产始于符号。正是精神等值的观念在回忆与创造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而且是在艺术品的生产过程中建立起这种联系的。追寻是求索真理的产物。尽管没有真理,但是却有真理的秩序。与之相应的有三种机器:第一种机器生产部分客体——无总体性的碎片,无交流的脉管,分隔的场景。第二种机器生产共鸣或共振效应。最著名的是普鲁斯特不由自主的记忆所导致的共振效应。欲望同样也有共振效应,因此马丁维尔(Martinville)的尖塔不属于回忆。艺术在两个距离遥远的客体之间建构共鸣。失去的时间与重获的时间之间有着相同的碎片结构或分野。玛德莱纳甜点的永恒意义的构成,正是文学机器产生的聚集效应。在盖尔芒特,追寻之末是一种多元性的共鸣,宛如文学机器显示出它最大的效应。甜点的味道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追忆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求证。思想既是被生产出来的,又是生产性的。第三种机器生产力量运动,由此产生死亡观。全部的追寻都驱使这三种机器在小说中发挥生产作用:这些机器是部分客体的机器(impulses,生命冲动)、共鸣的机器(eros,爱之本能)和力量运动的机器(thanatos,死亡本能)。

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之末提到了具有后结构主义小说诗学韵味的蜘蛛叙事理论。他认为,普鲁斯特作品中艺术与疯癫的问题一直没有人提起。疯癫以不同形态体现在两个主角身上:查鲁斯与阿尔贝蒂娜。实际上,查鲁斯作为个体是一个帝国、一个星座,掩盖或包含了许多未知的事物。查鲁斯是逻各斯大师,他的三次讲话都有一个共同结构。首先是否认,其次是距离,再次是其逻各斯意外地变成狂乱。暴力与疯癫构成了某种情综。开放的盒子是动



物主题,封闭的脉管是植物的主题。逻各斯(理综)是以原则或主导观念将部分统合成为整体的巨兽;帕托斯(情综)是一个植物国度,由蜂窝状的因素构成,只能间接地、边缘性地交流,因此没有总体化,没有统一性能够统一这个最终是片段的世界。这是封闭的脉管、蜂窝状辖域的分裂式的宇宙,在那儿,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距离:单性的世界(the world of sex)。不同个体之间两性的多种因素交汇成银河式或星座式的结构。在此,德勒兹多元生成的美学观念与皮尔斯等人的符号论的复杂关系展现了出来。他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中提出有8种因素的10种融合方式:某一个体的男性或女性因素与另一个体的男性或女性因素相交汇。这就产生了:一个男子的男性因素与一个女子的女性因素的融合,一个女子的男性因素与一个男子的女性因素的融合,一个男子的男性因素与另一个男子的女性因素的融合,一个男子的男性因素与另一个男子的男性因素的融合,等等。在追寻中,《普鲁斯特与符号》的这种蛛网式或星座式的构造随处可辨。阿尔贝蒂娜的故事就是例子:阿尔贝蒂娜从星座式的姑娘群体中渐渐抽绎出来;接踵而来的是嫉妒的两条线索;最后是所有盒子的共存——阿尔贝蒂娜用谎言将自己囚禁在这些盒子里,同样也被叙事者囚禁。爱情的结局宛如回归了原初的姑娘群体的不可分割状态。阿尔贝蒂娜的故事和查鲁斯的故事遵循着同样的规则,但是两人的疯癫在功能与形式上颇为不同。具体表现在个人、话语和谵妄三个方面。叙事者实际上是追忆的机器,是一个巨大的“无器官的身体”。当叙事者将初吻给予阿尔贝蒂娜时,他注意到并且抱怨我们没有合适的器官去实施充盈我们的嘴唇、充塞我们的鼻子、关闭我们的眼睛的行为。她从来没有他想要的器官。“无器官的身体”的概念是德勒兹最艰涩的概念之一。在关于《普鲁斯特与符号》的诗学思考中,德勒兹以蜘蛛为例:蜘蛛看不见、感觉不到、记不到任何东西,它只是在蛛网的边缘接收到最轻微的震动,这纤细的震动传导到它的体内却变成强烈的波涛,驱使它奔向合适的位置去捕获猎物。蜘蛛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它仅仅回应符号,并由此追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追寻并不是像大教堂或者长袍一样结构而成的,而是像一张蛛网。这个“蜘蛛—叙事者”(The spider-Narrator)的蛛网就是追寻的纺织物,由一个符号或者另一个符号所扰动的一条条丝线交织而成。蛛网与蜘蛛、蛛网与身体是同一个机器。正是这种身体,

这种蛛网打开或者关闭使追寻的黏丝碰巧触及并链接到一个个叙事小盒子。叙事者具有奇异的可塑性:正是叙事者所具有的这种蜘蛛身体、间谍、警察、嫉妒的情人、阐释者、疯子、精神分裂者的多重身份,使得他向偏执狂查鲁斯发出一根黏丝,向色情狂阿尔贝蒂娜扔出另一根粘丝,为的是使他们成为他的谵妄中的多种提线木偶,成为他无器官身体的多种力量,成为他自己疯癫状态的多种肖像。因此,普鲁斯特的世界是一种后结构主义诗学的碎片世界:碎片中包含另外的世界。这些世界中又充满碎片。普鲁斯特的时间并非柏格森的绵延时间,而是空间化的时间。

爱情是小说和德勒兹论生活与文学的著作的一个突出的母题。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使其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把爱情及其追寻变成一个由姿态、服饰、气味和记忆构成的“世界”。这一切都打开了一个全新并且隐匿的生成空间,令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认为,我们凭借语言的符号系统或能指建构了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或寻求到相应的所指。而对德勒兹而言,全部生活都是符号之流变。没有最终的参照系或所指。我们任何一点体验都通过其特定的生成而拓展,通向整个世界。文学是对他者的形形色色世界的探索,尤其是普鲁斯特小说,更是将爱情表述成为爱者与被爱者的丰富多彩的各个世界之间的际遇。^① 德勒兹对普鲁斯特的阅读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主要在于他从差异哲学出发,把普鲁斯特的本质诠释为绝对的内在差异性,并在差异与重复的命题下,以后结构主义诗学的多元符号论和文学机器论观念阐发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及其蕴涵。在这种美学之光的烛照下,我们应当感谢创造与生成的文学艺术,它使我们超越现实世界的负累,超越有限生命的自我世界,看到一个多元多姿的无量的大千世界。这些世界彼此殊异,激发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和精神上的审美愉悦。

^① G. Deleuze,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p. 175,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第八章

穿皮裘的维纳斯： 施虐—受虐癖的解辖域化

德勒兹美学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即心理学与文学相结合的领域，对“施虐—受虐癖”问题的传统思路进行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与重构。

这是一个特异而复杂的研究领域。德勒兹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著述是《受虐癖：冷酷与残暴的阐释》(1967)。这一学术著作以 19 世纪奥地利作家马佐赫的长篇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为主要论析对象，牵涉到西方文学史和心理学术史上两个重要的概念——施虐癖(sadism)和受虐癖(masochism)，以及传统上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融合概念施虐—受虐癖(sado-masochism)。在关注疯癫、性、监狱、施虐癖、受虐癖等边缘话语方面，德勒兹与福柯有些类似。他们都关注不同话语实践形成的机制，重视文字档案和语境的还原，善于颠覆渗透着权力话语的历史或者正典的解释。

第一节 心理学与文学:关于“施虐—受虐癖”的正典观念

西方文学史和心理学史上有两个专有名词形成微妙的对位关系,这就是施虐癖与受虐癖。从语境还原的维度而言,它们分别与两位小说家密切相关:萨德与马佐赫。

一、萨德与施虐癖(Sade and Sadism)

从词源来说,施虐癖一词来自萨德之名。按照《微软英卡特百科全书》(光盘版,2002)相关词条的介绍,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是法国文学史上颇具争议性的一位贵族小说家、戏剧家和哲学论文的撰写者,尤以色情文学作家的褒名而为世人所知。萨德生于巴黎,法国七年战争期间曾经入伍参战。萨德本人在生活中曾因多次对妇女施行性虐待和性犯罪,于1772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萨德曾经逃往意大利,但1777年他返回巴黎时再次被逮捕,关押在温森斯(Vincennes)达6年之久,之后被长期监禁于著名的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曾经被从监狱转送到精神病院关押。1790年从精神病院获释,但1801年又遭逮捕,辗转关押于多个监狱,最终死于狱中。

萨德的著名作品包括《朱丽叶的故事》(6卷,1797,英译本 *The Story of Juliette*, 1958~1959)、《卧室哲学家》(1795,英译本 *The Bedroom Philosophers*, 1953)等。在萨德的笔下,人类心理与行为的一种特异状况——性虐待癖得到热情而细腻的描绘,他把自己所实践的五花八门的性行为转换为文学的细节描写,因而源于萨德名字的施虐癖(sadism)一词,被精神病学家用来指称那些通过把痛苦施于他人而获得性满足的精神病形态。在萨德的哲学中,犯罪和性异常行为皆被视为自然,因而他的作品成为猥亵海淫的标志,直至20世纪仍然遭到禁毁。^① 中译本《激情的罪恶》(《情之罪》)的译者序亦谈到萨德的作品当时在法国遭到法庭的明令查禁的史实,认为在对萨德的

^①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Standard 2002 (disc). 1993~2002,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关于“施虐—受虐癖”及萨德、马佐赫的正典观念主要依据于此来源。



评价上历来有针锋相对的两大观点:抨击萨德作品者认为其鼓吹埋藏在心灵隐秘深处的邪恶力量,宣扬本能的放纵,迹近犯罪,应当严厉查禁,以正世风。褒扬萨德作品者则认为其大胆地表现了人的欲望的宣泄与满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勇敢战士。正因为如此,萨德作品顽强的生命力并不因为遭到查禁而消亡,而是“始终在社会上蔓延、传播……特别进入20世纪之后,萨德的地位竟在多国文化领域中被确立起来,其作品甚至被称为标志着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①。萨德的作品在20世纪中叶引起法国知识界极大的兴趣,在当代理论论争中有重要影响的西蒙·德·波伏娃、乔治·巴塔耶、毛利斯·布朗肖特、皮埃尔·克罗索斯基等人对萨德和施虐癖的题旨都颇为关注,他们转而又引起美国学界对此的兴趣。

施虐癖从施行于他人的痛苦和屈辱中获得亢奋与快感。《微软英卡特百科全书》对施虐癖的解释是:“施虐癖是一种性倒乱(sexual disorder),表现为在对他人施行肉体的或精神的痛苦折磨中获得色欲的兴奋或满足感。……施虐癖常常涉及捆绑、体罚、鞭笞等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残害和谋杀的现象。关于施虐癖原因的众多理论中有一种解释:施虐者大多为男性,他们从童年起就有自卑感,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惩罚他人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施虐癖这一术语得名于萨德,也用来在非性欲的、一般的意义上泛指那些从残暴行为中感到愉快的人。”^②对弗洛伊德一脉的精神分析家们而言,施虐癖被理解为一种基本冲动,从个体生命最初数月的心理情综中就表现出来;而且,施虐癖还被视为受虐癖的预设的对位。弗洛伊德后来在介绍死亡本能的观念时,把施虐癖描述为死亡本能中的一个最明晰的表现形式。

二、马佐赫与受虐癖(Masoch and Masochism)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阈中,马佐赫与萨德的情况形成微妙的对位关系:受虐癖一词源于马佐赫之名。

马佐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 1836~1895)生平的大多数情况都

① [法]萨德著,《萨德文集·情之罪》,尔利编译,1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② “Sadism” i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Standard 2002(disc)*. 1993~2002,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来自其秘书 Schlichtegroll 的《马佐赫与受虐癖》以及马佐赫的第一任妻子宛达(Wanda)的《我的生平之忏悔》。宛达与马佐赫《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女主人公同名。马佐赫生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伦伯格(现为乌克兰的 Lviv),具有斯拉夫、西班牙和波希米亚世系的血统。他曾先后就读于布拉格和格拉兹大学,当过教师。其祖先在奥匈帝国为官,父亲曾任伦伯格警察局局长。马佐赫还在孩提时就目睹了监狱情景和暴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深受民族性、少数民族群和革命运动等问题的影响。由此他创作了一些关于加利西亚、犹太、匈牙利和普鲁士的故事。马佐赫曾经是格拉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以撰写历史小说走上文坛并很快获得成功。他具有斯拉夫人的精神气质,善于从历史与民俗中获取灵感。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离婚的妇女》(1870)甚至在美国也引发了读者的兴趣。马佐赫崇拜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小俄罗斯的屠格涅夫”自诩。他的语言和作品中紧密地交织着民俗、历史、政治、神秘主义、民族主义、性欲主义和性倒错等因素,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受虐癖的文学描绘。

在生活和文学中马佐赫都以受虐式的爱情旨趣而闻名。他的小说中充满了自我鞭笞的文学形象和场景。他喜欢佯装成笨手笨脚的仆人或逃犯,让女人追捕、捆绑、污辱、惩罚,尤其喜欢让雍容华贵的穿皮裘的女人鞭挞,从中体验到由肉体痛苦所带来的强烈的精神快感。他喜用各种各样的具有恋物癖意味的小玩意和小装饰,为达到受虐的目的,甚至会在报刊上登广告、与感情生活中的女人签订契约,以便让她们进行施虐式的性发泄。马佐赫与 Anna von Kottowitz 的情爱促成了《离婚的女人》一书;与 Fanny von Pistor 的情爱促成了他的小说代表作《穿皮裘的维纳斯》。

《微软英卡特百科全书》对马佐赫的描述是:“奥地利作家,其名为受虐癖一语之来源。受虐癖为心理学术语,意为对施于己身的肉体或精神的痛苦之享受。这一特点源于性欲,为马佐赫众多长篇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所共享。……他沉迷于在其作品中表现肉欲主义,反映了他自己在性方面的旨趣。马佐赫创作了许多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加利西亚故事》(*Eine Galizische Geschichte*, 1846),《科罗米亚来的唐璜》(*Der Don Juan von Kolomea*, 1866),《该隐的遗产》(*Das Vermaechtnis Kains*, 1870~1877),其



中有著名的《穿皮裘的维纳斯》(*Venus im Pelz*, 1874), 以及《犹太故事集》(*Judengeschichten*, 1878)。”

受虐癖的正典含义是:“在变态心理学中,受虐癖是一种性倒乱,受虐者通过接受肉体上的痛苦或猥亵式的虐待而获得满足感。此术语来自奥地利小说家马佐赫的名字。他所塑造的好几个人物形象都表现为从受鞭打中获得性满足。在精神分析中,受虐癖这一术语被更广泛地用来指某些人的心理倾向,这类人喜欢从他人对自己的施虐中获得快感。与此相反的倾向称为施虐癖,得名于法国作家萨德,指从对他人的施虐中获得满足。”^①

三、施虐—受虐癖(sado-masochism)的联结

综上所述,萨德和马佐赫分别代表了施虐癖与受虐癖,或者说,是这两个术语的名祖(the eponymous exemplar,即以其名为某种事物命名)。由于施虐癖与受虐癖在心理学上趋于两个反常的极端并且似乎具有互补性,因而在一般理解上,“施虐—受虐癖”(虐恋)被想当然地视为施虐癖与受虐癖的合一。这一看法可以在众多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工具书的“sadomasochism”词条和一般的变态心理学著作中找到例证。例如 D. 伊文思《拉康精神分析导论辞典》指出:“施虐癖”与“受虐癖”术语为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Ebing 1840.08~1902.12)于 1893 年首先创造出来,与萨德和马佐赫相关。克拉夫特—埃宾是在颇为特殊的意义上联用这两个术语的,指一种性倒错——在这种性倒错中,性满足或者有赖于把痛苦施加于他人(施虐癖),或者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体验上(受虐癖)。当弗洛伊德

^① “Masochism”, i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Standard 2002* (disc). 1993~2002,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See also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1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05年在《性理论三论文》中采用它们时,秉承的是克拉夫特-埃宾的说法。^①弗洛伊德在施虐癖与受虐癖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认为它们是一种单一的心理倒错的积极和消极的两面。^②弗洛伊德在《经由俄狄浦斯情结》(The Passing of Oedipus Complex)一文中对这两种性倒乱的关系所持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积极的施虐癖意味着男孩子对父亲的认同;而在被动的受虐癖中则是男孩子取代了母亲的位置,怀着被父亲所爱的欲望。两种性心理取向可以共存,成为一个实体。弗洛伊德还以狼人为例说:“在他的施虐癖中,维系着他与父亲的认同;但在其受虐癖中,他把自己选择成为性对象。”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受虐癖被理解成为施虐癖的对位,并且将其解释为死亡本能直接反对自我的一种状况,与利比多相融合。弗洛伊德后来认识到受虐癖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保留在施虐癖-受虐癖的问题框架内。

拉康也认为施虐癖与受虐癖是密切关联的,两者都与特定的乞灵驱力(the invocatory drive)有联系(拉康也称之为“施虐-受虐癖驱力”)。施虐者和受虐者都把自身作为这种内驱力的对象。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认为施虐癖是第一性的,而拉康认为受虐癖是第一性的,施虐癖来自受虐癖:

① 克拉夫特-埃宾是德国出生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的创始人,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性心理病态》(1886)被看成是现代性科学的肇始之作,标志着医学对人类性生活的干预的开始,打破了基督教会在该方面的垄断训导地位。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样,人们对正常的性生活持有一种固定观念,即青年男女相爱结婚,幸福地生活,结婚是为了生育后代而过性生活,丈夫可以体味性高潮,而妻子是没有性高潮的。克拉夫特-埃宾将脱离这种正常类型的性行为,诸如施虐症、受虐症、动物恋、自恋、女性色情狂、男子同性恋、男子性欲亢进症等通称为性倒错,认为这些性倒错是疾病,而不是犯罪,并要求废除处罚同性恋者的德国刑法。他在本书中阐述了异常性行为的心理,收集了许多病例,介绍了虐恋(sadomasochism,简写为SM、S-M、S/M或S&M)。这一概念最早是他创造的,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佐赫(Masoch,另译为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克拉夫特-埃宾是第一个将性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家。他将性的诸问题与进化论、遗传学、精神医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相关联综合研究。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性开始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主题。他一生著述400余种,包括八部大型教科书,甚至在1901年退休之时,他还带了两万份病案回到格拉茨继续进行研究。他的著作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产生影响。(可参阅李银河等学者的相关著作。)

② D.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167,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施虐癖仅仅是受虐癖的否定。”^①因此,受虐癖者偏爱在自己身体上体验存在的痛苦,而施虐癖者拒斥这种痛苦,从而强迫他人去承受这种痛苦。在施虐—受虐癖问题上,弗洛伊德认为:Sadomasochism 不仅指两人相遇的外部事件,而且也是同一个人内在实体的对立性的本能冲动。一个施虐癖者总是同时又是一个受虐癖者。施虐癖者与受虐癖者之间有着经验认同的关系。最初他认为施虐前于受虐,但后来他又区分了两种施虐癖——纯粹侵略性的和享乐主义的——继而认为,如果施虐癖者不事先经历过痛苦与欢乐相联系的受虐体验,则永远无法成为施虐癖者。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感的原则》中区分了生命本能(Eros)和死亡本能(Thanatos),在《自我与本我》中认为爱与恨分别依赖于这两种不同的本能。快感—痛苦情结(the pleasure-pain complex)被认为是施虐癖与受虐癖所分享的一种中性的共同实体。^②

① D.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168,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② 类似的观点如李银河《虐恋亚文化:SM成因》指出:很早人们就发现了疼痛与快感之间的联系。从17世纪起就有研究者将痛感与快感联系起来对虐恋倾向做出解释。第一位将鞭笞与性刺激联系在一起的是位生于16世纪末期的德国医生梅柏(Meibom,1590~1655)。当男性被鞭笞时,常常会伏在鞭笞者的膝头,鞭笞过程中对生殖器的摩擦刺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学家沃芬(E. Fulffen)在1913年提出:简单看起来,鞭笞当然是不舒服的,但如果鞭笞持续一段时间,而且是通过某种仪式施行的,就会产生奇特的效果。艾宾(Krafft-Ebing)也指出过,对臀部的鞭笞可以起到纯粹的对勃起的生理刺激作用。他还指出,由于他的许多有鞭笞幻想的病人从未有过鞭笞经历,所以鞭笞幻想必定是与生俱来的。他的一位35岁的女病人说:“我从6~8岁起就有被鞭打的欲望,由于我从未被鞭打过,也从未看到过别人被鞭打的情景,所以我不理解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欲望。我只以为它是天生的。”艾利斯(Havelock Ellis)对痛感在性关系中的作用极为关注。他将虐恋倾向与动物本能联系起来,并因此认为它是自然的。他指出灵长类中的雄性总是通过暴力手段赢得雌性的,施加疼痛往往是行使权力的间接结果。在动物中,在性交时雄性咬雌性的现象也很多,经常会因雌性的拒绝合作发生打斗。相反,如果雌性过于顺从,完全没有抵抗,有些雄性反而会丧失性交的欲望。在灵长类动物中,暴烈的攻击性动作成为性行为的正常因素。在一些人类社会中,性交活动也伴以有规律地施加疼痛的动作,疼痛可以提高性兴奋程度,在人类性行为中,有些人在性唤起时会抓咬伴侣,还有少数人会因轻微的疼痛感到性的兴奋,施加疼痛令人惊异地与性活动联系在一起。在一些原始部落中,性活动中有大量的抓咬动作,抓咬脖子、前额、肩膀和胸部。因此性活动过后,人们的身上脸上经常带伤,人们还会引以为自豪。文化人类学的观察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证据: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将疼痛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如鞭打、赤脚走炭火等等。在中国语言中,把“痛”和“快”连在一起合成了一个词“痛快”,用以表达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虐恋是对人类获得狂喜经验的性能力的探索活动,对于参与这类活动的人来说,它带来放松感和救赎感。在虐恋中,人类灵魂的动物性一面被重新发现并释放出来。

但把萨德(施虐癖)与马佐赫(受虐癖)视为同谋或互补性力量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施虐—受虐癖实体并非弗洛伊德的发明,我们在克拉夫特—埃宾、艾利斯(H. Ellis)和菲拉(Féré)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个概念。施虐癖与受虐癖之间具有亲和性,在萨德和马佐赫的作品中皆可以看到两者的“相遇”。萨德笔下的人物有某种受虐癖。同样,马佐赫笔下的人物也有某种施虐癖:《穿皮裘的维纳斯》中的男主人公塞弗林(Severin)在其受虐磨难的情节结尾,因受女主人公另有希腊情人的事实的刺激而宣称自愈,转向鞭打和折磨女人,他决心不再做“砧子”,而要做“锤子”。

德勒兹从分裂分析的立场出发,认为实际上施虐癖者和受虐癖者完全可以扮演不同的戏剧角色,分别自成一体,互不交流——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交流。信奉施虐—受虐癖的统一体(unity)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和轻率。马佐赫或许是比萨德更伟大的临床医生,他提供了大量的解释和直觉知识,有助于解构这种伪造的施虐—受虐癖统一体。德勒兹指出:施虐癖与受虐癖似乎命定要相遇,似乎具有互补性。但这不现实,因为一个真正的施虐癖者从来不会折磨一个受虐癖的牺牲者。也没有那个受虐者能够忍受真正的施虐折磨者。“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一个施虐者与一个受虐者相遇,受虐者说:‘伤害我’。而施虐者则回答:‘不!’”

第二节 “受虐癖”语境还原:以《穿皮裘的维纳斯》为中心

德勒兹于1967年在法国出版文论专著《受虐癖:冷酷与残暴的阐释》,1971年Jean McNeil将其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美学术界。1988年的英文版《受虐癖》一书中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文本:德勒兹的学术论著《受虐癖:冷酷与残暴》和马佐赫的小说名著《穿皮裘的维纳斯》,两者之间构成对照性阅读的特殊效果。

从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视角出发,德勒兹质疑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施虐癖—受虐癖二元对立观念的经典描述,力图把马佐赫及其所衍生的受虐癖概念作为一个意义自足且内涵丰富的“褶子”世界来探究,同时,把萨德及其相关的施虐癖概念作为另一个参照式的“褶子”世界进行比较研



究。其理论立足点是对传统上关于施虐—受虐癖浑然不分的辖域化概念进行后结构主义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强调受虐癖作为一种创造性颠覆仪式的价值与意义。换言之,以后结构主义思想观念对人们历来颇为忽视的马佐赫及其小说代表作《穿皮裘的维纳斯》进行深入的研究,构成了德勒兹《受虐癖》这一论著的诗学基础。这是一项开拓型的学术研究。

德勒兹在《受虐癖》中分章讨论了“萨德与马佐赫的语言”、“描写的作用”、“萨德与马佐赫是否互补”、“马佐赫的三种女人”、“父亲与母亲”、“马佐赫的艺术”、“幽默、讽刺与法律”、“从契约到仪式”、“精神分析与受虐癖问题”、“死亡本能”、“施虐的超我与受虐的自我”等问题。

一、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三类女性

马佐赫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具有共同点:皆为女性,发育良好,身材健美,天性高傲,是专横残暴的人物形象,甚至在她们温情流露的天真时刻亦是如此。东方高级艺妓、令人敬畏的女沙皇、匈牙利或波兰的女革命者、颇有姿色的女仆、东欧萨马尔提亚村姑、冷酷的神秘女人、貌似文雅的少女等等,全都具有同样的特征:“不管她是公主还是村姑,不管她穿的是貂皮还是羊皮,她总是同一个女性——她身穿皮裘,手执皮鞭,把男人当作奴隶对待。”这就是所谓的“穿皮裘的维纳斯”。

在这些共同点之下,马佐赫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1)希腊女性(the Grecian woman)类型——德勒兹所界说的这类女性仿佛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注脚,她是异教徒、名妓或阿佛罗狄忒、无序的制造者。她一生献给爱与美,为及时行乐而生活,敏感而多情,随遇而安,相信女性的独立性,她的爱变幻莫测。她是雌雄同体者(hermaphrodite),似乎视男女两性是平等的,但是她追求的真正胜利是阿佛罗狄忒——女性原则——的胜利。她像古代希腊神话中吕狄娅女王翁法勒(Omphale)一样,使大力士赫拉

克勒斯失去阳刚之气。^① 她所谓的平等就意味着凌驾于男性头上,因为“一旦女人得到平等,男人就会颤抖”。她又是现代的女强人,她把婚姻、道德、教会、国家都拒斥为男性的创造物,必须毁掉。她在马佐赫小说中是如梦似幻的人物形象,出现在《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开端;我们在《离婚女人》的开头又与她相遇,她在那儿长篇大论地谈论忠贞;在《塞壬女妖》中,她是“暴戾而风骚”的Zenobia,她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制造大混乱,激励妇女出人头地,制伏父亲,在奇异的洗礼仪式中剪掉儿子的头发,迫使人人都穿异性的衣服。

(2)施虐癖女性(the sadistic woman)类型——我们在另一个极端发现了她。虽然她喜欢伤害和折磨别人,但是有意思的是,她的行为是由男人所促发的,否则她会与男人琴瑟和谐,为男人献身。她的施虐冲动是男性诱导的结果。《穿皮裘的维纳斯》中的受虐癖的男主人公就是不断地诱导和教育自己所爱恋的女主人公羞辱和折磨自己,以获得受异性虐待的快感。此外,马佐赫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引介一个他称为“希腊人”的形象,或者直接命名为“阿波罗”,他作为第三者,怂恿女人的施虐行为。

(3)中介性的女性类型(the intermediate feminine type)——显然,上述的两种类型(雌雄同体型和施虐型)皆非马佐赫的理想,在希腊女性与施虐女性两者之间还有一种中介性的女性类型。这类形象出现在马佐赫众多小说中,有点类似于荣格精神分析学派意义上的“大母神”形象。她兼具冷酷与温情,犹如大自然之谜:自然本身是冷酷、母性和严峻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是马佐赫梦境的关键词。

马佐赫的同时代人巴霍芬(Bachofen)区分了两性进化的三个时代:①阿佛洛狄忒时代(Aphroditic era)或古代艺妓时代——阿佛洛狄忒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神,代表着原始沼泽般的色欲混沌:这类女性与男子有多种联系且水性杨花。这是个女性原则占主导的时代,父亲是无人(nobody)的存在状态。这一阶段以女权统治为表征,其制度遗存于神庙妓女制度中。②得墨忒

① 希腊传说中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曾卖身给吕狄娅女王翁法勒(Omphale)为奴。翁法勒得知他是宙斯的儿子,恢复他为自由民,又嫁给他。赫拉克勒斯在东方宫廷中享受豪奢生活,渐渐忘却他的责任。翁法勒便开始瞧不起他,自己穿上赫拉克勒斯的狮皮,让丈夫穿上女人的丝袍,戴上发饰、项链和手镯,要赫拉克勒斯坐在她脚边纺羊毛。



尔时代(Demetrian era)——得墨忒尔是希腊神话中的农神,是主神宙斯的姐姐。这一时代以亚马逊人为开端,严格的女性制度和农业秩序已经建立;原始沼泽已干涸;父亲或丈夫有了一席之地,但女性仍然是主宰。③阿波罗体制(Apollonian system)或父权制时代——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理性之神,是新一代的男性之神。这一时代母权制以衰颓的亚马逊体制或酒神狄俄尼索斯(感性之神)的形式遗存下来。德勒兹认为,马佐赫的三种女性类型可以清晰地在这三个历史时代辨认出来。第一和第三个时代皆有局限,唯有其间的第二个时代以其辉煌与完美而摇曳生姿。马佐赫的受虐癖的文学幻想在此得其所哉,即获得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从而把文学幻想转化成为人类的本质和世界历史的普遍概念。

鉴于此,“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女性文学形象在马佐赫笔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皮裘的温暖御寒功能与高雅女性的冷美人赤裸的胴体在这一形象中奇妙地融为一体。德勒兹指出,在马佐赫的文学幻想中,皮裘具有防治感冒的实用功能,“维纳斯必须将自己裹在硕大的皮裘中,以免在我们捉摸不定的北方气候和基督教的冰雪国度中受寒感冒”。马佐赫的女主人公形象充满着寒冷的暗示:大理石般的女性胴体、石雕女像、冰晶式的维纳斯都是马佐赫最喜欢的表达式,他的男性人物常常在清冷的月光下服侍冷冰冰的女性雕像。

萨德的施虐癖是以自我凌驾于他者之上,以意志强加于感情,以人为统御自然。如同萨德,马佐赫也区分两种自然但是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特点:人为的第二自然为个体的随意性所统治,是一种粗暴的自然,展示出狡猾与暴戾、仇恨与毁灭、无序与色欲。马佐赫所赞赏的是超越于此的第一自然:非个人化而具有自我意识,富有感情但又超越感性,它具有三重面孔——冷酷、母性与严峻。马佐赫笔下所出色描写的大原野之美实为第一自然的具象。由此,马佐赫的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是与三种基本的母亲形象相呼应的:第一是沼泽之母(mother of the cloaca and the swamps)或子宫母亲(uterine mother),她是原始的、同母异父的、艺妓式的母亲;第二是俄狄浦斯之母(Oedipal mother),她是被爱的对象,她被与作为牺牲品或作为同谋的施虐的父亲联系起来;在这两者之间则是口述之母(oral mother),原野之母,她既滋养生命又带来死亡,既口述又沉默,我们称之为中介者。她是冷酷、关切和死亡的理想化身,居于

沼泽之母和俄狄浦斯之母中间。弗洛伊德在《三匣之主题》(*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中对她进行了阐述。口述之母的题旨与众多的神话学、民俗学主题相一致。马佐赫笔下的三类女性、三种母亲的世界与萨德的男性主宰的世界并无真正的关涉。

二、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父亲与母亲

在施虐癖和受虐癖中，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扮演了核心角色？德勒兹认为，这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无疑，父亲形象在施虐癖中是决定性因素，父权制的主题在施虐癖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萨德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人物皆模仿男性行事，从中享受快感。萨德雌雄同体(*androgynous*)的创造具有父亲—女儿的结构。尽管弑父和弑母一样在萨德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这两种犯罪形式却不一样。萨德把父亲视为创造、保存和再生产的律则，是第一自然的表征，由狂野和撕裂的分子构成。母亲则是屈从于父权制的第二自然，由“柔软”的分子构成。父亲遭谋杀，是因为他离开了他真正的本质与功能；母亲遭谋杀，则因为她忠于其本性与功能。正如克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曾经富有洞见地指出的那样，萨德的幻想最终落实在父亲毁坏自己家庭的主题上，他怂恿女儿去折磨和谋杀母亲。施虐癖中塑造的是俄狄浦斯之母形象：母亲是完美的牺牲品，而女儿则成为乱伦的同谋。施虐癖在其全部意义上是对母亲的积极的否定和对超越一切法律的父亲之颂扬。

马佐赫的受虐癖则不同，这是一个母亲扮演核心角色的世界。三种母亲的形象中富有意义的一点是，父亲的全部功能象征性地转换变形，被重新分配给这种三重性的女性形象：父亲由此被拒斥并且完全泯灭。马佐赫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包含一个充满了细节描写的狩猎场景：理想女性猎熊或狼，剥其皮裘。这可以象征性地诠释为女性反抗男性的斗争，而且是女性获胜。皮裘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女性意义。受虐癖中的母亲具有孤雌生殖的意味，其中没有父亲的地位。马佐赫笔下的口述母亲是他的“好”母亲的理想形象，而子宫母亲和俄狄浦斯母亲则是“坏”母亲(她们分别构成两个极端)。马佐赫的全部趋向都在于把坏母亲的功能理想化，把她们转换成好母亲。马佐赫的艺术是幻想的艺术，其幻想在两个系列或两个对立母亲的“边缘”之间嬉戏。在受虐



癖中,这两个坏母亲之间,口述母亲处于钟摆式的中心地位,是幻想的核心。口述之母必须从子宫母亲身上夺取她的艺妓功能(prostitution);从俄狄浦斯母亲那儿夺取她的施虐功能或惩罚(punishment)功能。简言之,德勒兹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他说:“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最睿智的精神分析作家也把象征秩序与‘父亲之名’相联系。”^①不少精神分析批评家皆努力在马佐赫的理想中发现一个伪装的父亲形象,探究女性折磨者背后的父亲的在场。瑞克(T. Reik)认为女性折磨者本质上是父亲,母亲的形象是伪装的父亲形象。但是德勒兹认为马佐赫的三种女性建构了一种废黜父亲的象征秩序,“母亲的三重分野实际上把父亲逐出了马佐赫的世界”,“母亲的这种永恒的、无时间性的最高权力只可能用神话的语言来表达,这对于马佐赫至关重要”。

《穿皮裘的维纳斯》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男主人公塞弗林因为女主人公宛达有希腊男性情人而大受刺激,弃受虐癖而转向施虐癖——决心不再做“砧子”,而要做“锤子”。因此似乎可说,父亲虽然被从象征秩序中驱逐,但仍然在真实秩序或经验秩序中活动。真实具有其幻象形式:父亲的回归。在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上,德勒兹总结说:施虐癖体验基于的是父亲与女儿之间的联盟,其词源构成是“androgynous”,表现为对母亲的强烈否定和父亲形象的膨胀(将父亲置于法律之上);受虐癖的体验则是基于儿子与母亲的联盟,其词源构成是“hermaphrodite”^②,表现为一种双重否定:对母亲加以积极的、理想化的否定(把她与法律相认同),同时又对父亲进行废弃式的否定(把父亲驱逐出象征秩序)。因此,施虐癖与受虐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各自自成一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互相混杂。

① G. Deleuze, *Masochism*, p. 63, translated by J. McNeil, Urzone, Inc., New York: 1989.

② “Androgynous”和“Hermaphrodite”皆具有“雌雄同体”之义。前者具有雄性控制或男性中心的词义;后者则具有女性主导的词义,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男女同体神 Hermaphroditus,他是赫尔墨斯和阿佛洛狄忒之子,当他洗澡时,被山林水泽的仙女看中,爱恋并拥抱他,两人合为一体。

三、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艺术特征

以审美(亚)文化涵盖和超越生理及生物层面的肉欲是马佐赫的一个基本艺术特征。马佐赫曾经自称他所信奉的教义是超肉欲主义(supersensualism),旨在于表现变态色欲的文化状态。萨德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通常没有亲密的情感关系,而马佐赫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情侣。《穿皮裘的维纳斯》的背景是意大利画家提香(Verocchio Titian,约1490~1576)的画作,里面带有肉体、皮裘和镜子神秘嬉戏的韵味,与清冷、残酷和情感体味相联系。与萨德动态场景迥异,马佐赫的描写是静态的,其场景凝练如画。等待与悬搁是受虐癖体验的主要特征,受虐癖就是一种等待状态。这种等待有两种共时的形态:永恒的延异和期待。它们有特殊的构成,充盈着快感与痛苦。否认、悬搁、等待、恋物癖和幻梦共同构成了马佐赫的艺术星座。

德勒兹在介绍了瑞克所归纳的受虐癖的四个基本特征^①之后,特别强调了“契约”在马佐赫的受虐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马佐赫以契约抗击现实和幻想中父亲的回归,抵达神秘而永恒的国度:三个母亲所居之地。契约形式链接受虐关系,贯串马佐赫的生平与文学创作。

马佐赫的“文化主义”有两个层面:审美层面与司法层面。而正是契约表达了受虐癖的理想的情爱的关系模式,同时又具有引入法律的象征力量——母亲形象——的功能。没有契约,受虐癖者将一事无成。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马佐赫的文化主义与萨德的自然主义相对立。两者皆区分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只是看法不同而已。马佐赫从契约(contract)的维度思考(契约具有悬搁和审美的特征),萨德则是从机构(institution)的维度思考(萨德的秘密社会和浪子社会是一种社会机构)。两者的区分极有意义,皆与法律有关。从政治维度而言,萨德生活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语境中,他反对法律与契约,把法律视为暴政与独裁,而把与法律、契约相对立的“机构”视为革命共和国。但是

① 即①特定的幻想意义(场景梦幻化、戏剧化、仪式化);②悬搁的因素(等待、异延、影响性张力和性癖好的焦虑之情的表达);③展示、尤其是劝说(受虐癖者力图说服情侣施虐,以此来展示自己的磨难、尴尬和屈辱的一种特殊方式);④煽动性的恐惧(受虐癖者主动要求受惩罚,以缓解焦虑,享用遭禁之乐)。



萨德的机构概念又是反讽的,因为它是性欲和性欲化(sexual and sexualized)的。而马佐赫则生活在1948年奥匈帝国革命语境之中,他的契约与法律相联系的概念具有幽默的性质。可以说,萨德与马佐赫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戏拟了历史哲学。

四、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从契约到仪式

法律总是倾向于忘记自己的欲望或文化的起源。受虐癖中契约常常被漫画化以强调其含混的目的。受虐癖契约不仅是一种法律形式,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联系的类型,它所联系的双方,一方是人为的、阿波罗的男性世界;另一方则是自然的、神秘的女性世界。它涉及主—仆关系。在受虐癖中,女性是主人和折磨者。受虐癖中的契约直接导向文化仪式。

马佐赫的小说中有三大仪式类型:狩猎仪式、农耕仪式和再生仪式。它们反映了三大因素:①寒冷——严酷的寒冷需要用皮裘来征服,皮裘是狩猎的战利品;②被埋藏的情感与被掩盖的沃土——需要进行农业式的耕耘和严密的组织工作;③严酷的因素——人类的传宗接代和生命再生需要经历某种严酷。这三种仪式的共存与相互作用,总括了马佐赫受虐癖的神秘情结。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类型和因素的多种表现形态:理想女性追猎熊或狼,她组织或主持农业社会,她使男人经历再生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再生仪式,其他两个仪式皆在再生仪式中达到高潮,获得它们在神话总体性中的功能。例如,在马佐赫的《狼与女狼人》中,女主人公把她的追求者缝进狼皮里,像狼一样生活、号叫并被追猎。男性角色通过被追猎、凌辱和受虐获得满足和新的活力。仪式性追猎是获得再生的途径,口述母亲通过拥有原始的子宫母亲的战利品而获得再生的力量。这种再生不依赖于父亲和子宫母亲,而是一种孤雌生殖。《穿皮裘的维纳斯》中则有关于农耕仪式的详细描述:三个女黑奴把“我”引向花园南苑的葡萄园,那儿间种着玉米;一张犁搁在地上。这些黑肤色的摩尔人把我绑在柱子上,用金簪刺我取乐;不久,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穿皮裘的女主人公宛达出现,吩咐给我松绑。她把軛架在我的双肩,驱使我去犁地。那三个黑肤色的魔鬼把我推搡到田地里,一个扶犁,一个用绳索牵着我,还有一个用鞭子抽打我,这时穿皮裘的维纳斯就在一旁看着这一场景。

德勒兹根据他关于三个母亲的概念对此场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三个女黑奴代表着三个母亲的形象。口述母亲僭用和移植了其他女性的所有功能,为再生主题服务。一切都指向孤雌生殖:葡萄、玉米的联姻暗示着死而复生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因素与女性的农耕社会;犁,表达的是与母亲的结合;发簪刺和皮鞭打,属于单性生殖的刺激;绳索的拖曳,象征着儿子的新生。在此,我们再次有了在三个母亲之间选择的主题。口述母亲在此是分裂的,她出现两次:一次是三个女黑奴中的一个,另一次是此三人之外穿皮裘的宛达。穿皮裘的维纳斯作为口述母亲的形象,同化了子宫母亲和俄狄浦斯母亲,她是法律的女主人,将狩猎、农耕和母权制因素完全统一。三个母亲与上述三大仪式类型构成呼应关系:子宫母亲是猎手,但是她自己已经被猎取;俄狄浦斯母亲早已为父权制所统一(作为牺牲品或同谋)或献祭,唯有口述母亲存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她具有狩猎、农耕、母权制和再生的共同本质。

马佐赫作品中两个最主要的男性人物形象是该隐和基督。他们拥有相同的文化符号:十字架(X或+)。马佐赫以“该隐的遗产”为其系列小说之名。在《圣经》中,该隐因杀死他的兄弟亚伯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者。在马佐赫笔下,该隐象征着在自然与历史中无所不在的罪恶,象征着无边无际的人类的磨难。该隐是农耕者,为母亲夏娃所钟爱;亚伯则是“羊群的守护者”,站在父亲一边,为母亲所厌恶。该隐杀死了父亲的相似者亚伯,切断了父亲与其他儿子的联盟,他被惩罚永远流浪,表现了父亲挑衅性的、幻象式的回归。在马佐赫的作品中基督是父亲的相似者,是遭废黜的形象。母亲对儿子加以磨难以使其生成男人(becoming man)是其基本模式,圣母将基督送上十字架,这是马佐赫“上帝之死”的版本。十字架体现了死亡的形象,圣母则是伟大的口述之母。

概言之,女性通过折磨男性以重塑男性的生命(再生)是马佐赫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例如《塞壬》和《离婚的女人》就是如此,马佐赫另外两部重要小说《灵魂的钓者》和《上帝之母》,也具有颠覆基督教神学的题旨。马佐赫实践了三种否定形式以表现这一主题:其一是否定关于女性的传统观念,通过溢美母亲,赋予她菲勒斯式的再生功能和属性;其二是否弃父亲,将父亲驱逐出去,剥夺其在再生中的地位;其三是否定两性结合的性快感,强调孤雌生殖与



这种再生的联系。马佐赫的该隐和基督的神话最终目的在于表明：基督不是父权制的上帝之子，而是口述之母重塑生命的新男人；他与父亲的相似性被废黜，他是“十字架上的人”，不懂性爱，没有财富，没有祖国……

从契约到神话是以法律为中介的，因为法律贯通并超越了契约—仪式世界，将我们直接导入了神话领域。通过契约，父亲的功能转换给了母亲，建立了马佐赫受虐癖的象征秩序。德勒兹论述说：马佐赫的现代契约订立于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卧室，与在沼泽莽原上所订立的最古老的仪式相呼应。他的小说反映了这种双重的历史，使最现代的形式与最古老的形式互相认同。

“受虐癖”的文学语境还原，有利于对既定的施虐—受虐癖模式或者观念发起挑战，这种研究路数，在精神实质上与“新一代的档案保管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相通。

第三节 德勒兹关于萨德(施虐癖)与 马佐赫(受虐癖)的分裂分析

德勒兹在《受虐癖》中，从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高度，跨越变态心理学与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范畴，对广为接受的施虐—受虐癖(sado-masochism，以下简作SM)聚合概念进行解辖域化的理论努力，表述了一种后结构主义诗学概念。

日本学者篠原资明在《德勒兹：游牧民》(2001)一书中认为，德勒兹是“悖论思想家”，其特征之一就是关注反常。通常认为：“萨德与马佐赫，或者说施虐狂和受虐狂，虽然水火不相容但却又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情侣。”弗洛伊德和萨特都赞同这种传统的关于变态心理学的看法，而德勒兹对此则有自己的观念。在对马佐赫的论旨上，“如实地反映了德勒兹特征的一面，那就是对反常的关心和对小说的精辟读解。……在历史上的哲学家之中，德勒兹哲学本身就有悖论性格，与此同时，反常小说、电影等这些与众不同的哲学研究对象，也同德勒兹哲学本身的悖论性格一样引人注目”。在马佐赫与反常的问题

上,德勒兹表现出“文学批评与临床医学的罕见结合”。^① 前述的克拉夫特-埃宾、弗洛伊德和拉康对“施虐—受虐癖”的认同性看法,在德勒兹这里遭到了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质疑和挑战。

德勒兹的论析策略是从文学原点出发,进而探讨文学描绘与临床医学乃至哲学传统的关联。他区分和辨析萨德(施虐癖)与马佐赫(受虐癖)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文学层面的分裂分析

1. 语言上的差异性

德勒兹认为,暴力与性是萨德和马佐赫语言中远较其他作家丰富的因素。而暴力和性都是人们不说或少说的东西。在萨德和马佐赫之间,两人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施虐癖和受虐癖的语境中,有折磨者(torturer)和受难者(victim)两类人物。德勒兹引证乔治·巴塔耶的话说:萨德的语言在本质上是受难者的语言,只有受难者才能描述受折磨的痛苦;折磨者则必须使用已经确立的秩序与力量的假设语言。巴塔耶的说法使得所有企图将萨德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理论归于无效。萨德的语言具有命令和描绘的功能、纯粹展示和机构性占有的功能。马佐赫的语言则具有辩证、神秘和说服功能。在马佐赫小说里,折磨者取代了受难者而凸现出来。他笔下的折磨者需要受难者(受虐者)的教育、说服和订立契约以实现最怪异的受虐计划。而把女人塑造成专制暴君是男性受虐者的基点。在马佐赫所有的小说中,男主人公从根本上说是个教育者,他极力说服女人对他施虐;而女人尽管被说服,但从根本上说却是迟疑不决、心怀恐惧的。可以说她被迫扮演她的角色。西方中古时期开始区分两种与魔鬼交往的方式:占有和订约。萨德是机构性的占有,马佐赫则是契约式的订盟。占有是施虐者疯狂的特殊形式,恰如契约之于受虐者。

2. 描写上的差异性

萨德主要是展示性描述,马佐赫则是辩证式描述。马佐赫的许多故事皆

^① [日]篠原真明:《德勒兹:游牧民》,“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8,5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有民俗的韵味,或如儿童之游戏,它们构成马佐赫小说的幻景。例如《萨福之鞋》(*Sappho's Slipper*)描写在某个令人兴奋的宴会上,男人们追寻古代习俗,以女人的鞋子为酒杯,开怀畅饮。《灵魂的钓者》(*The Fisher of Souls*)中姑娘们要她们的心上人扮作熊或狗,驱使他们拖车而行。与萨德的小说不同,我们在马佐赫的小说中从未看见女性折磨者的裸体,她们总是包裹在皮裘里。在弗洛伊德对恋物癖的分析中,恋物癖是对女性的一种否定,意味着女性阴茎缺失,因而所恋之物是女性菲勒斯的形象或替代物。而在对恋物癖的描写上,两位作家也颇为不同。萨德展示性的施虐癖描写中的恋物癖仅仅有次要的和扭曲的意义(许多施虐的谋杀者皆伴有仪式,因为他们的牺牲者常常有衣服被撕破而无挣扎的证据)。在德勒兹看来,恋物癖基本上属于马佐赫式的受虐癖。在原初的意义上,没有不带恋物癖的受虐癖。马佐赫的生活和创作中主要的恋物癖对象是皮裘、鞋子、皮鞭、奇异的头饰(他喜欢用来装扮女性)。马佐赫的否定是延异的,以致影响到性快感本身;快感被尽可能地延迟而被否定。马佐赫可以说是把悬搁作为浪漫小说的一种基本要素来运用的第一位小说家。“图像式的”场景也是马佐赫创造性的小说贡献之一。如果说萨德的艺术是一种展示艺术和理性化的否定的过程,体现为一种机械的、渐增的并具有死亡本能意味的重复,那么马佐赫的艺术则是一种否认和悬搁的过程,体现为审美的、神秘的、辩证的、想象的和戏剧性的延异。萨德式聚焦式的重复将读者驱向折磨者一方,与施虐主角认同;而马佐赫的悬搁式艺术总是把我们置于受难者一方,与受虐角色认同。

3. 施虐癖与受虐癖之辩: 反讽与幽默

德勒兹认为反讽与幽默是我们理解法律的两种基本形式。追溯哲学史,柏拉图关于法律的经典概念认为善是第一性的,而法是第二性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不再把法看成依赖于善,而是善依赖于法。康德是与传统法律概念决裂并且给予我们真正的现代概念的第一人。其《纯粹理性批判》把知识视为围绕着主体的客体,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其《实践理性批判》把善设定为围绕着法律的构想,更具有革命意义。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认识到意识极端悖反的人,他把客体的本质与母亲相联系,把欲望和法律的本质与父亲相联系,因此法律有其俄狄浦斯起源。拉康认为法律是被压抑的欲望,法律和欲望的对

象是同一样东西。欲望是动态的,因此,法律具有不确定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康德和卡夫卡分别代表了现代法律观的两个维度。卡夫卡出色地描绘了这个世界:罪与罚并不能告诉我们法律是什么,只留存一个不确定状态。他赋予了幽默与反讽以完满的现代意义,展示了法律变幻不定的特征。卡夫卡的密友勃洛德(Max Brod)曾经回忆说,当卡夫卡朗读《审判》时,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卡夫卡自己,都不禁笑了起来。在卡夫卡看来,喜剧是构想法律的唯一可能的模式,是反讽与幽默的一种特殊的融合。在现代思维中,反讽与幽默具有颠覆法律的功能,萨德与马佐赫分别以这两种形式展现了颠覆法律的尝试。在现代,恶的理念取代了善的理念成为最高原则,善不再是法律的基础,传统的柏拉图主义法律观遭到颠覆。萨德把法律与暴君相认同,他笔下的主人公以非凡的激情反抗暴君。而马佐赫则以幽默来反对法律。例如,受虐癖者受到的鞭笞并不是为了惩罚和防止性勃起,相反,是激励和确保性兴奋,这是法律的荒唐性的体现。他从法律的禁忌和惩罚中获得快感。马佐赫的幽默的本质正在于此。德勒兹援引瑞克的观点说,受虐癖者在痛苦与惩罚中获得的是原来就预备好的快感。遭受苦难和惩罚不是快乐的原因,而是其必要的前提。在受虐癖中,幽默具有多种形式或层面:否认、悬搁、幻想等等。受虐癖者在谄媚中孤傲,在屈从中反叛,简言之,是个幽默家和因果逻辑学家,恰如施虐癖者是反讽家和原则逻辑学家一样。萨德颠覆法律是通过反讽式地把法律作为原则来描述的,法律增加了服从它的人的罪恶;马佐赫的受虐癖者则通过订立惩罚契约来使遭禁之悦成为可能,同样是对法律的颠覆,但强调的是结果。施虐癖中的父亲被置于法律之上,成为更高的原则,母亲则成为其主要牺牲品;受虐癖中的母亲蕴涵着法律的总体性,母亲把父亲从象征领域中驱逐出去。

二、精神分析层面的解辖域化

1. 施虐癖的超我与受虐癖的自我

德勒兹在《受虐癖》一书中最后三章侧重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对“施虐—受虐癖”进行了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理性思辨。他认为弗洛伊德式的SM一体说的精神分析和病因学的谬误可能要归咎于对自我与超我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误解。应该用解性欲化—再性欲化的思路考虑这个问题。施虐



癖与受虐癖关系的真实本质不在于两者之间发生学的偏移,而在于结构性的自我—超我的分裂。

施虐癖以超我为特征,它的自我仅生存在外部世界,施虐癖除了其牺牲者的自我之外没有其他自我。施虐癖的最终牺牲者是母亲与自我。这就解释了施虐癖显而易见的悖论,即它的伪受虐癖(pseudomasochism)。受虐癖以自我为特征,表面上自我为超我所摧垮,实际上受虐癖者的软弱是一种策略,受虐癖者以这种不无幽默的方式操控女人,使之进入他所指定的角色,构成受虐癖的理想形态。受虐癖所匮乏的是超我而不是自我。超我只能在受虐癖的外部呈现,以女性折磨者的形象出现。受虐癖赋予女人以超我的性质,结果却是它的自我获胜。因此,自我的胜利是受虐癖者策略的实现,幽默是自我获胜的手段,受虐癖是否定超我的艺术。在受虐癖中,母亲形象与自我合谋以反对父亲的相似者——性主导者和超我的形象。在受虐癖中有一个否认、悬搁的过程,它否认母亲缺乏菲勒斯,又视母亲的菲勒斯没有性欲的特征,是中性力量的理想器官,因此,这种否认可视为受虐癖特具意义的解性欲化的形式。在受虐癖中有伪施虐癖(pseudosadism),恰如在施虐癖中有伪受虐癖一样。

施虐癖和受虐癖皆有它们各自的解性欲化和再性欲化的形式。施虐癖中解性欲化和再性欲化的双重过程以思想展示的方式得到表达;而在受虐癖中,这种双重过程通过想象和辩证运动的形式得到表达(其辩证因素在于自恋式的自我与理想化的自我之间的联系,母亲形象是这种联系的条件,导向神话维度)。

受虐癖与施虐癖犹如两幕不同的原初戏剧:受虐癖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超我如何被毁坏、被谁毁坏以及这种毁坏所导致的结果的故事。受虐癖者以富于特征的幻想述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女人……”他讲述了她们之间互相发动的战争,子宫母亲和俄狄浦斯母亲遭到挫败,而口述之母最终获胜。受虐癖者以现代契约为工具,把他自己带入这个古老的故事中,引发了最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他弃绝了父亲相似者及其性别,挑战那种建构超我和强力统治的父亲形象。在反对父权制超我的斗争中,他在自我与口述母亲之间建立了契约伙伴关系。口述母亲是第一个母亲和第三个母亲之间的中介,她作为死亡的形象发挥功能,把冷酷之镜放在自我面前,展示对它的双重否定。但

是,死亡可以想象为一种再生,解性欲化可以转化成为一种再性欲化,口述母亲代表一种孤雌生殖,自我因此从超我和性别欲望中解放出来,以契约、幻想和辩证式的幽默重建了受虐癖的再性欲化领域。自恋式自我在母权的死亡之镜中看到了理想自我,并从理想自我的解性欲化的分裂中获益,相应的再性欲化:这样的故事由夏娃帮助该隐开始,由圣母玛利亚帮助基督而继续叙说……这就是马佐赫的幻象,带有他“上帝之死”的奇特蕴意。

施虐癖也讲述了一个故事:叙述自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和斗争中如何被殴打和驱逐的故事;叙述一个关于无法无天的超我如何扮演一个褊狭的角色的故事。超我的模式中父亲的角色成为一个膨胀的概念,母亲与自我成为他选定的牺牲者。因此,超我所代表的解性欲化不再从道德和心理层面指向内部的自我,而是落实在外部的牺牲者——被否弃的自我身上。施虐癖中再性欲化则具有思想家和理想自我的性质,在多方面与马佐赫的“幻象”恰成对照。

2. 文学批评与医学诊断

德勒兹认为,施虐—受虐癖的总体概念并不是真正建立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的,它甚至是一种前弗洛伊德思想观念。因此精神分析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我们可以从病因学、症状学和文学批评三个层面来对此加以思辨:从病因学看,施虐癖与受虐癖是两种性心理变态,两者各具一些互补互换因素,但超我是施虐癖的基本因素,而自我则是受虐癖的基本因素。从症状学视角审视,虽然两者有大致相似的症状,大致巧合的互证(施虐癖中有受虐癖,受虐癖中有施虐癖),似乎能说明施虐—受虐一体化的存在,但是,正如没有任何医生会把发烧只作为某种特定疾病的确定症状来处理,而是宁可把发烧看成是多种疾病都可能有的不确定的症候群(syndrome)那样,施虐和受虐亦复如此,它们皆属于性变态的症候群。在心理学与文学批评领域,萨德及其施虐癖一直是人们加以深入透彻研究的对象,而把马佐赫及其受虐癖作为附属物予以不公正的冷遇,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回到原点阅读马佐赫的原因。事实上,萨德和马佐赫是分别处于两个极端的天才作家,他们以完全不同的小说技巧和心理探索开创了两个分离的文学世界。

在阅读马佐赫著名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基础上,德勒兹对施虐—受



虐癖概念作了分裂式的总结：

- (1)施虐癖是思考—展示,受虐癖是辩证—想象。
- (2)施虐癖是否定和纯粹否定,受虐癖则是否认与悬搁。
- (3)施虐癖通过数量上的重复而得以表现,受虐癖则通过质量上的悬疑得到表达。
- (4)受虐癖对施虐癖者有特定意义,同样施虐癖对受虐癖者也有特定意义,但是两者从不混同。
- (5)施虐癖否定(negates)母亲,抬高父亲;受虐癖否认(disavows)母亲,废黜父亲。
- (6)两者中恋物癖的角色与意义、幻想的功能迥然不同。
- (7)受虐癖中蕴涵着审美论,而施虐癖敌视审美态度。
- (8)施虐癖是机构性的,而受虐癖是契约性的。
- (9)在施虐癖中,超我和认同过程扮演了首要角色;受虐癖则赋予自我和理想化过程以重要性。
- (10)两者的解性欲化和再性欲化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
- (11)最后,综合以上所有差异,两者最基本的不同在于施虐式的无情(apathy)和受虐式的冷酷(coldness)。^①

上述 11 项不仅是施虐癖与受虐癖之分,而且也是萨德和马佐赫文学技巧和艺术特质之分。

第四节 关于德勒兹“受虐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观的评价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诗学观是建立在他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基础上的。总括而言,德勒兹《受虐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意义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领域:实践跨学科比较研究——德勒兹基于其哲学和美学观念,打通心理学与文学的边界,辨析科学与艺术的差异。他对变态心理学与文学

^① 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论述主要根据德勒兹《受虐癖》(Deleuze, *Masochism*, translated by Jean McNeil, Urzone, Inc., 1989.)的内容而来。

两个既不同又关系密切的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论析,尽管也有一些论点失于粗略或缺乏说服力,但是也时有精辟之论,发人深省。德勒兹认为,在学科范畴层面,应当强调科学与艺术的分野,对病因学与症状学加以分裂分析,以凸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哲学的意义。与其把SM视为单一的实体(a single entity),不如把它看成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综合征(a syndrome)。但是应当把这种综合征分裂成为两条不可推演的因果链,即作出病因学与症状学的区分:病因学是科学,研究病症的根源;而症状学是艺术,关涉文学、文化和审美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例如,发热不是病因,而是多种疾病都共同表现出来的症状。医学史有两个维度:一是疾病史,一是症状学史。疾病史显然属于科学范畴,而症状学则永远是艺术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称赞萨德和马佐赫不仅是杰出的症状学家、人类学家,更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在“人类、文化与自然”的问题上以艺术家的姿态出现,为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灌注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活力。尤其是马佐赫,他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符号,力图将生活从其被隐匿和囚禁之处解放出来。

(2)方法论层面:强调分裂分析与回到文学“原点”研究——德勒兹认为,施虐与受虐常常被描述为合二为一的性变态现象,但是这种医学概念是有偏颇的,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应当回到开端,进行文学的还原研究,采用与临床医学判断完全不同的方法,即文学方法,重新阅读萨德与马佐赫。因为文学是根源,文学确立了施虐癖与受虐癖的最原初的界说。文学意义上的批判(critical)和医学意义上的诊断(clinical)必须在此语境下互渗以构成新的联系。与福柯、德里达那一代“1968年思想家”一样,德勒兹深受厄尼采系谱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对“受虐癖”的思辨,与福柯以“知识考古学”和“档案研究”探究“疯癫”、“麻风病”、“监狱”、“性”等问题的思路互相映衬。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他们把问题追溯到史前时代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探讨和比较三种社会体(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以及刻录体制的生成与差异;在《受虐癖》中,德勒兹同样把问题追溯到受虐癖概念的原点,进行类似“现象学还原”的研究。这种研究,既不同于阐释学所力图追寻的话语背后潜藏的真理,或文本后面隐匿的作者真正的主观意图,亦非结构主义和神话原型批评所看重的蛰伏



在意识深处的基本结构或文化模式，而是一种在差异哲学和美学语境中对既有结构进行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努力。

(3) 文化语言符号层面：主张色情作家 (pornographers) 与色情学家 (pornologers) 的区分——德勒兹认为萨德与马佐赫皆非前者，而是后者。色情文学在语言上依赖于一系列祈使功能和描绘功能，驱使和引诱受众沉迷于淫秽的文学世界；而萨德与马佐赫作为色情学家却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语言在这个世界中反抗自身的祈使功能与描绘功能的局限，他们以不同方式建构了一个思想平台，突破了传统文化规定的对男女之性情的表达的藩篱。在论马佐赫和受虐癖的问题上，德勒兹在反拨弗洛伊德一脉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和反思女性主义理论两方面都给人以不少思想启迪，昭示了他后来与加塔利合作的反俄狄浦斯题旨的一些思想脉络。例如，德勒兹反对精神分析关于受虐癖幻象的读解，认为这种读解把女性折磨者当作父亲的替代物实际上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来源于经典精神分析相信存在着一种施虐—受虐癖情结 (a sadomasochistic complex)，并且假设母亲总是代表自然，父亲总是亘古不变地标志着文化、法律和权威。德勒兹指出，父亲的确在施虐癖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但是受虐癖并不是施虐癖简单的颠倒形式。在施虐癖中父亲遮蔽了母亲的形象，而在受虐癖中父亲的权威被投注在母亲身上，父亲是作为受折磨的牺牲者个人出现的。在最终的萨德式幻象中，父亲与女儿结成反常的联盟，折磨和谋杀母亲；而在马佐赫幻象中，儿子与母亲结盟以羞辱和摧毁父亲。受虐癖式的牺牲者经由折磨而净化了内在的父亲，并且经由母系的单性生殖而再生成为“新的无性之人”。^① 德勒兹指出，马佐赫以特殊的方式对色情之爱解性欲化 (desexualizing)，同时又对整个历史加以再性欲化 (resexualizing)。作为伟大的人类学家，他们所揭示的两种心理类型具有人类、文化和自然的特殊蕴涵；作为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发现了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思维和感受形式，以及一种完全是原创性的语言。普鲁斯特、萨德和马佐赫都是将笔触深入到奇异的内心世界的特色斐然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体现了德勒兹关注反常现象的思想特征和文学即生成与创造的哲学和美学观念。

^① R.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49, London: Routledge, 1989.

(4)政治层面:强调马佐赫小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马佐赫具有斯拉夫、西班牙和波希米亚家世,其作品反映的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民族性和少数民族性的问题。因此,他的文本属于少数族文本,与数年后德勒兹和加塔利论卡夫卡的情况类似。少数族性提供了马佐赫文学故事的渊源和民俗故事的内核,构成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基础。马佐赫以其特有的风格把语言与叙事加以性别化,把政治问题色情化^①,体现了解构主流文学和重构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旨。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对多语言、多民族、多种文化语境共存的国家或地区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②就萨德与马佐赫而言,文学的功能不是描绘世界,而是关于暴力与纵欲的对位的界定。萨德持颠倒之镜,观照从时间之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自然与历史,其人物重建了世界,重写了心灵史。马佐赫类似萨德:持颠倒之镜观照所有的历史——从历史的开端到1848年奥匈帝国革命——极力勾勒出一部“爱的残酷历史”。马佐赫的小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典型例证之一。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少数族是其故事与习俗的不竭之源泉,加利西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普鲁士人的故事构成了他小说的主要部分。马佐赫在《该隐的遗产》的总题下,构想了一个普遍性的庞大创作计划:以爱情、财产、金钱、政治、战争和死亡六大主题构成的系列故事反映人性的自然历史。将这六种力量各自复归于其残酷的物质直接性。在该隐的符号下,马佐赫表达了他对爱情与政治的看法:该隐是人类第一个谋杀者,应当把元帅、将军和外交家投入监狱,与谋杀者一道正法。马佐赫喜欢想象斯拉夫人有一个美丽的女独裁者,一个可怕的女沙皇,以保证1948年革命的胜利,强化泛斯拉夫运动。

(5)哲学思维层面:区分辩证互补关系与褶子展开关系——德勒兹认为,由萨德与马佐赫分别代表的施虐癖与受虐癖,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性质同一、取向相反的一种变态心理病症,它们之间的关系,亦非辩证互补关系,而是褶子关系。它们之间自成体系,分属两个内涵丰富的褶子世界。褶子之中或褶子之间又有褶子。褶子的不断展开意味着新的范畴和新的思维方式的富有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 134,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② 参见本编中关于卡夫卡一章。



生命力的诞生或生成(becoming)。褶子思维即是差异思维。探讨施虐癖与受虐癖之间的差异性远比强调其同质性更有意义,因此应当对这一题目的传统或正典看法加以解辖域化、解符码化。德勒兹在《受虐癖·序》中指出:鉴于临床医学上通常把受虐癖视为施虐癖的补充形式,马佐赫的命运与萨德颇为不同,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他的名字成为“受虐癖”的词源和描述性变态的通用语之后,他的作品却被忽视了。萨德则幸运得多,无论是临床医学还是文学研究,都对施虐癖及萨德的作品相当重视,医学与文学互相促进,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而即使是关于受虐癖的最好的论述,也令人惊讶地发现忽视了马佐赫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萨德和马佐赫两人皆有重要的东西教给我们:一是施虐癖,一是受虐癖。德勒兹质疑 SM 的概念,认为施虐—受虐相结合的主题和二元论概念对马佐赫损害极大,导致人们假设受虐癖是施虐癖的补充,导致出现将两者视为辩证统一体的弊端。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马佐赫,就会发现他的世界与萨德毫无关系,他们的技巧、问题和关注皆迥然不同。^① SM 是两个不同的褶子世界。在哲学渊源上,萨德与斯宾诺莎有惊人的契合性,充满着数理精神的自然性与机械性,他的作品聚焦于具有理性色彩的暴力行为;马佐赫则具有柏拉图哲学的特质,具有辩证的想象力,喜欢受虐的男主人公往往致力说服和培育女主人公对他进行施虐。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建构一种由欲望所驱动的内在世界的平台,其理想被悬搁,快乐被延异。

^① G. Deleuze, *Masochism*, p. 13, translated by J. McNeil, Urzone, Inc., New York: 1989.

第四编

德勒兹与当代性：思想影响与未来维度

当代性
女性主义理论
电影哲学
控制社会
赛博空间

在当今世界多极分化又不断重构的格局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数字化是两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德勒兹在这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新世纪关于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德勒兹思想与当今政治理论有明显的关联性,他认为人类历史主要有三种社会组织形式:第一种,原始部落;第二种,主权国家;第三种,公理化的跨国体制。^①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晚期资本主义、WTO等都是金钱(资本)公理化为特征的体制。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帝国》(中译本200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齐泽克称它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帝国》的作者哈特和耐格里明确提到他们受到德勒兹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虽然民族-国家的主权依然有效,但是明显趋于衰落,我们已经告别帝国主义时代,正在走向无所不在的帝国时代,以“公理化”(当然其中也可能隐匿着霸权)为特征的“帝国”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现代国家的规训模式已经变成了以公理化机制、交互规则管理跨国事务的控制社会。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区分了三种建构当代世界的模式:其一是同构性(isomorphy)模式,指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那些国家:美国、欧盟成员国、加拿大等,以及WTO(世界贸易组织)、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EF(世界经济论坛),等等。其二是异构性(heteromorphy)模式,主要指原先称为第二世界的那些国家,如USSR、PRC,它们在当代世界里的意义正在流变。其三是多态性(polymorphy),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心/边缘(北/南)区分。在当今世界500首富的总收入超过整个非洲大陆的GDP的情况下,思考德勒兹、加塔利关于少数族、反中心主义和对固定疆域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理论立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布汉兰等主编的《德勒兹与当代世界》(2006)论文集中,西方学者采用德勒兹的概念去描绘、分析、批判和评价当代世界的色调、品质和节奏,专题讨论了团结协调,军国主义,公民身份,移居迁徙,历史与记忆,少数族、殖民化和抵抗,赛博空间的信息、控制和传

^① Ian Buchanan and Adrian Parr ed.,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 2,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播等问题。^①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传播与互联网的成在时间上巧合,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理解和分析赛博文化方面具有理论启迪意义,不少西方学者称他们是“赛博空间”的预言家,《千高原》的块茎论被视为“游牧”星球——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

在西方当代哲学与美学的众声喧哗中,德勒兹作为“哲学领域的毕加索”、“思想的骏马”和“播种无序的哲学家”,标志了当代学术思想一个特色斐然的维度。本编呼应“导论”所涉及的西方当代学术背景,以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探讨德勒兹富于特色的哲学思想与当代性的关联,深化中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会通,促进国内文艺美学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深入研究和当代文艺观念形态的建构。以下各章侧重讨论德勒兹思想对当代文艺美学的影响和未来维度,涉及德勒兹哲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电影哲学、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以及当今文化数字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德勒兹与鲍德里亚比较、德勒兹论控制社会等重要维度。

^① Ian Buchanan and Adrian Parr ed.,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p. 1~20,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九章

德勒兹世纪：文艺理论与电影研究举隅

在某种意义上,讨论“德勒兹思想”、“德勒兹世纪”或“德勒兹之后”,就是探讨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当代影响与未来维度的问题。克莱·科尔布鲁克的著作《吉尔·德勒兹》(2002)认为自1995年德勒兹辞世之后,其思想在三个领域具有重大影响:政治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哲学。^①本书虽然不拟在此专论德勒兹与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弥散于或渗透于德勒兹对女性主义理论、电影哲学和当代性的思考之中。

第一节 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

德勒兹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美学观念对女性主义理论一直具有强劲的影响力。德勒兹及加塔利把“生成女性”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甚至认为一切生成皆始于和经由生成女性。其理由之一是:之所以不提出生成男性(becoming-man)的问题,是因为男性本质上是多数族的,是历史文化的主体,是衡量一切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2, London: Routledge, 2002.



的尺度。德勒兹从抨击男性—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多元论出发,认为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是限定性的,因为虽然表面上这种观念常常设想我们应当允许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但是在深层次上,却预设了某种标准:大家都是男性大家庭的成员,遵循的是西方文化的基准。同理,德勒兹认为种族主义的逻辑实质上不是排外的,而是内敛的,其暴力和暴政依据的是白人男性中心主义囊括天下的逻辑。在此意义上,种族主义和道德主义成为建基于男性—西方文化基准的两翼:传统上种族主义者视他者为“非人类”的,而对道德主义者而言他者则是人类,“恰如我一样”,我们都是白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其他文化唯一需要的是认同于“我们”。^① 男性已经成为宰制生活的存在。而“生成女性”是针对着作为存在的男性(man-as-being)而提出的。但是德勒兹也提醒我们:不能把女性视为男性的他者,因为这样会坠入不同的存在(distinct beings)的逻辑陷阱。我们只能生成超越性别二元论的他者,德勒兹强调的是动态的生成(becoming)而不是凝固的存在(being),是生成他者而非生成男性。这种“生成女性”的观念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理论意义。

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生成女性”的观念具有显而易见的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的“横截线”。这个观念首先与德勒兹和加塔利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反俄狄浦斯观念密切相关。生成女性具有打破封闭的男性形象的特殊功能。德勒兹部分地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从弗洛伊德关于自由漂浮的欲望或利比多的观念出发,认为生活中有某种内驱力。例如人对食物与温暖的需要,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望。性意识的产生是利比多组构和偏移的产物。婴儿在母亲乳房缺场时仍然从“吮吸”动作中得到满足,偏移由此而发生。因此第一个性对象不是提供乳汁的实际的乳房,而是虚幻的乳房——记忆中愉悦的形象。德勒兹主要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两大剥离:

第一,把欲望从个体无意识和囿于家庭的俄狄浦斯情结剥离出来,拓展到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德勒兹批判弗洛伊德将欲望个体化,压缩成为家庭模式的取向,认为从原始部落,到拓展了的部族,再到现代核心家庭,俄狄浦斯情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39~140, London: Routledge, 2002.

结的三个要素即母亲—婴儿,以及父亲的形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构成。这一过程无法仅仅用弗洛伊德学说就能阐释。弗洛伊德认为欲望始于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二元联系,而德勒兹则强调欲望的社会文化维度,认为“母亲”与“婴儿”的术语只有在欲望被组构和社会化之后才得以形成。欲望并不始于个人之间(例如母亲与婴儿,再加上一个作为俄狄浦斯对象的“第三者”父亲)的联系,而是始于非个人和集合性的多元介入和跨越个体的投注。身体部分(body-parts)的介入要早于个人。婴儿的嘴巴寻找乳房,但是乳房并非是母亲的能指。而将乳房与“母亲”联系在一起之前,先有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性质的集体行为出现:原始部落最初崇拜的是大地乳房或子宫。当母亲的形象最终形成之际,她已经浓缩了所有这些历史的和政治的投注。现代广告依然通过自然形象投注母亲身份(motherhood)。因此,对德勒兹而言,欲望不能简缩成为个人之间的性关系,相反,“个人”是通过欲望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组构而形成的。德勒兹欲望理论对精神分析和常识的最大的挑战,是他关于生活与欲望并不始于封闭的有机体或自我的观念。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封闭的、自主的生命体,由死亡所框定。而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最大问题就是从封闭的个体或自我开始分析,而不是阐释自我的出现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对弗洛伊德而言,一切生命有机体的生活目的是回归其原初的静寂状态(死亡冲动),回归未受欲望骚扰的前状态。而对德勒兹而言,生命没有原初的封闭状态,生活并不始于框定的有机体,而是始于流变。生命是欲望之流。

第二,把欲望与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类概念剥离开来,走向“生成女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不仅是前个体的(欲望始于“身体部分的联系”),也是前人类的。长期以来,性话语和欲望实际上是被解释为人类的性话语和欲望,主要是源于男性生物渊源(男性身体)的解释。德勒兹则把欲望描绘为超越身体的生活之流,是创造性的差异与生成。“生成女性”是消解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一条途径。真正的政治学应当把性话语、生成与差异视为是反俄狄浦斯的:“不同于把儿童视为对母亲抱有欲望并且欲变成父亲的观念,反俄狄浦斯的欲望是一个‘孤儿’,既没有原初身份,也没有家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西方思想是建立在乱伦禁忌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我们必须谴责自己



对母亲的欲望以构成社会和成为人类的观念之上的。因此,这就导致了女性成为一种被遮蔽的、失落的禁忌之源——女性作为必须被压制和排除的对象,为的是让人类历史开始。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生成女性则开拓了理解欲望的一种新的途径……欲望是一种联系、生产,甚或更为复杂的差异之流。正是乱伦的‘故事’压制了这种基本的欲望,告诉我们必须需要什么东西。通过乱伦禁忌,社会生产出作为否定对象的母亲形象,创造了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法律;它将生活的力量转过来反对生活。政治源自大于女性的‘男性’形象,源自能够为了文化目的而贬斥生物学意义这种生命存在。‘男性’因此是通过对女性进行压制和禁忌的产物。这种禁忌生产出法律,法律规范身体。法律以权力和惩罚而启动,身体则是这种残酷法律的影响的结果。”^①在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生成女性就是不再把男性的欲望作为欲望的话语,不再把假设的封闭的人类身体作为基本的政治单元。而通过文学艺术,思考和表现超越女性禁忌的欲望,思考和表现生成女性和生成动物。生成女性就是开放前个体的、反俄狄浦斯的、革命性的欲望。这是不再从男人或人类历史的故事中进行阐释的欲望。由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生成女性与文学创作冲动联系在一起。

德勒兹和加塔利超验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意识形态的。他们把欲望视为积极的、生产性的要素,从而建构了不是基于匮乏(lack),而是始于联系(connection)的欲望微观政治学,建构了欲望与政治之间相联系的新途径。生命个体本能地自强、自立、自卫,个体的身体和欲望与他者的身体和欲望相关联,从而强化自身的力量。这种联系、互动、生成和生产最终构成群体或社会整体。因此,力量不在于欲望的压抑机制,而在于欲望的拓展和扩张。在对社会整体的看法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概念与意识形态理论方法大异其趣: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我们所服从的某种压抑性观念,统辖着社会整体;而德勒兹则认为,社会整体是积极的、生产性的。为了生产利益,社会整体把欲望——或强化生命个体的联系——加以编码,成为规律化的、聚合的和有组织的欲望的形式。婴儿的嘴巴与母亲的乳房相联系,产生和强化了生活与欲望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社会秩序的形象(作为母亲身份或家庭)产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143, London: Routledge, 2002.

生的是集体性的、普遍利益的欲望。德勒兹认为对社会力量的通常解释,应该从利益出发:欲望具有某种特定的目的。德勒兹的理论与方法皆致力于阐释利益——例如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如何从欲望(身体之间的具体和特定的联系)中生产出来的。因此,不同于意识形态观念,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不是被压抑的东西,欲望是被社会政治加以编码的,因而无法用意识形态的欺骗、掩饰和压制之类的观念对欲望作出解释。尽管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五花八门,但是在总体上人们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个体为了某种虚幻的、更高的目的而摒弃他们自己的欲望或利益。意识形态被认为是社会想象的产物,具有掩盖权力压制性的性质。因此意识形态论对权力给予了一种否定和压制的诠释。

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概念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文学批评而言,通常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认为文学具有掩饰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功能。例如,女性阅读浪漫小说,然后认同于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婚姻,从而自动地、心甘情愿地充当父权制游戏中一颗被动的小卒子。意识形态因此是解释经济的或婚姻的压迫如何为形象所掩盖的一种途径。意识形态分析认定有被掩盖的真正的利益:女性内心深处是真心追求自由解放的,但是却被意识形态欺骗了。故而意识形态还假定了亟待从文化幻象中解放出来或进行意识形态解魅的个体。显然,意识形态理论对权力和想象坚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或被动的观念:权力压制和扭曲了一个本来“真实”的世界,想象力因而是一种致幻或造魅的力量。

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微观政治学或“分裂分析”作为从个性塑造共性的一种艺术。克莱·科尔布鲁克以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来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同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微观政治学”女性观念:我们从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她关于身材、肤色、姿态、言谈和身体各部分的律动的描绘,如何塑造出了腰身细小、娇柔可人的“女性”。这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模型而错误表达(misrepresented)出来的女性形象。按照德勒兹美学思想,“女性”是社会编码效应的一种装配,而文学则是所有这些情感效应和强度的最佳表达方式。这使文学对女性个体的描绘成为普遍女性身份的形象,于是个性开始生成非个性和政治性。奥斯丁的女性以“白皙”为“美丽”,因而在不同种族的



身体肤色问题上已然具有政治意蕴。黛安娜王妃(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为女性形象的范本,但这不是一种女性原型的塑造,而是政治情感效应的装配的结果;黛安娜是由白皙、娇美、修养良好、宅心仁慈等特征所塑形的。在“男人”、“女人”个体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效应的符码存在了。“父亲”大多是银行家、警察、税务官、政治家之类的形象,而“母亲”则往往与演员、秘书、中小学教师、办公室白领等形象相联系。人们所构想的人性——女性与男性的一般形式,是由政治强度所塑造的。“这意味着与意识形态相反,欲望不是被政治所压制的,而是被政治编码的。欲望是男性与女性身体的联系,当欲望被编码成为神圣的资产阶级婚姻时,它就生成一种利益。……政治塑形或‘社会机器’从欲望中生产利益。”“意识形态理论在认识论层面运作,假设我们为权力所欺骗或误导;剥掉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形象,我们才会成为自己。德勒兹拒斥在权力和形象塑造之外设定某种存在。欲望本身就是权力,是一种生成和生产形象的权力。……权力并不压制我们,权力生产我们。”^①

在当代文艺美学中具有重大意义身份(身体)/认同、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the becoming-woman)论和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概念也有重大影响。它们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褶子关系。德勒兹的“褶子”论与其著名的“生成”论美学和“无器官身体”、“少数族文学”等概念精神相通,通过它们,可以把差异、他者、多元、流变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生物性别、种族、阶级问题联系起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热衷于倡导与主流形式及标准相悖立的‘少数族’实践。白肤色的西方男性成人建构了多数族性,并以此衡量和规范非白种人、非西方人、女性和儿童”,而抵抗主流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符码的权力与宰制则“必须通过生成他者(a becoming-other)而加以推进。这是在预设好的男/女、白人/非白人、成人/儿童、人类/非人类的范畴或分类之间开拓通道。这种通道建构着‘生成女性’、‘生成黑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从而解构了社会符码的二元对立,使思想和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创造成为可能。……这些‘生成’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少数族政治文化斗争中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92~94, London: Routledge, 2002.

扮演着重要角色”^①。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在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概念时认为,个体的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个体通过不同的行为和干涉关系可形成多元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观念关涉的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与其他个体和其他政治差异的事件的相关联系所导致的结果。伊丽莎白·格罗茨(Elizabeth Grosz)认为,德勒兹的著作提供了超越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一种重新思考的方式。^②例如,在褶子论和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论就是强调从单一的性(a sex)走向千万个小小的性(a thousand tiny sexes),其游牧主体的概念就是对以二元对立和等级制为特征的辖域化的性别、主体、身份等传统关键概念进行解辖域化。他们认为,个体的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个体通过不同的语境、行为和链接关系形成多元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关联性不是静态的存在问题,而是动态的生成问题。^③如前所述,德勒兹的思想对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的赛博空间的理论诠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千高原》被视为赛博空间哲学的“圣经”,他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启迪人们反思“数字美学”新的特征:身份、性别、个体、主体、阶级、种族、空间、文化等等都可以视为文化数字化时代新巴洛克美学的千姿百态的褶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哈拉维的著名论文《赛博人宣言》(1985)在关于高科技与性别政治的争论方面影响深远,在此可以从赛博文化方面有力地支持德勒兹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的思考。所谓赛博人(cyborg)是机器与有机体的糅合,既无生命,又有生命。哈拉维把赛博人的象征性与现实性作为拂掉西方哲学传统二元本体论的途径,以此消弭男性/女性、白人/黑人、主体/客体、生物/机器,以及异性/同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她认为女性主义者传统上会在这些二元对立项中力求呵护劣势者,因此反而被迫强化了现存体制。文化批评家马克·德里(Mark Dery)认为“赛博文化从本质上挑战

①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86,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③ 麦永雄:《德勒兹“生成”论的魅力》,原载《文艺研究》,2004(3)。



这些二元论”，促使“西方世界观的概念基石……充满了裂隙”。^①由此可见，在后现代文艺美学和当代性的语境中，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主体问题上，德勒兹与加塔利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可以为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提供新的开放性思路。

第二节 德勒兹与电影艺术哲学

在媒介哲学的意义上，电影或许是电脑面世之前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使是在今天电子网络全球化和文化空间数字化的时代，电影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颇为强劲。经历了以电脑为标志的数字传媒技术的冲击波后，曾经略呈颓势的电影很快就如火中凤凰一般重获生命活力：电子传媒与消费主义的结合使得电影重振雄风。电影至今仍然是一种值得认真探究的艺术门类，而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是我们理解与探索电影奥秘的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

德勒兹在其所谓的美学旨趣时期有两部阐述电影哲学的专著：《电影Ⅰ：运动—影像》（1983）和《电影Ⅱ：时间—影像》（1985）。在这一领域，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关于时间绵延（duration）的思想观念和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实用主义主要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的符号论（semiotics）使德勒兹在电影美学思想上获益匪浅。德勒兹的两部电影哲学著作从两种途径切入对电影的研究：一是探讨早期电影的动像；二是研讨现代电影的时像。概念对德勒兹意味着思想创造而非某种简单的标签，一种新的概念标示着一种新的思想取向，动像与时像概念的提出，旨在使电影成为转变人类关于运动与时间的观念或思维方式的重要媒介。

在《电影Ⅰ：运动—影像》的序言中，德勒兹把柏格森和皮尔斯作为对自己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哲学先驱，认为皮尔斯是“在形象系统范畴内最先进的哲

^① Neil Spiller ed., *Cyber_Reader: Critical Writings for the Digital Era*, pp. 108～109, London: Phaidon, 2002.

学家,符号论的奠基人”^①。索绪尔与皮尔斯是西方符号理论体系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刘禾教授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清华大学第二届高级理论研讨班(2002)曾结合“帝国研究”谈论过他们:“符号学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位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日内瓦,一位是美国东部的科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绪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做符号学的研究,皮尔斯比他还要早,他比索绪尔早二三十年就已经开始发展符号学理论,皮尔斯的理论叫 SEMIOTICS,索绪尔发展的是 SEMIOLOGY,它们的区别去年笔者在清华的高级理论研讨班上已经讲过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符号学家在构想符号学的同时,国际政治也在经历称其为‘符号学转向’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人造符号,比方说海军使用的旗语、灯语、电报符码,路标、聋哑人的手语、世界语等,都在这时候纷纷出现,使得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次符号系统的大爆炸。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理论为什么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没有人好好做过研究。”^②索绪尔的符号学以能指、所指的语言学二元对立为基础,而皮尔斯的符号论则以表达/对象/诠释的非语言学三联体为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皮尔斯是现当代符号学真正创始人。詹姆斯曾说过,皮尔斯是“后一代思想家的思想的金矿”。20世纪的许多哲学家都从皮尔斯那里获取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皮尔斯引入讨论符号的多重角度,符号分类问题是他的符号学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索绪尔的语言二元符号学和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两个符号系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而是互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皮尔斯的符号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它是一种泛符号论,具有自然科学倾向,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语言,它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的科学。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主要内容是两个交叉的三元组合(two interlocking triads)。首先是符号媒介、指称对象以及符号意义三者的结合;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on Cinema*, p. 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② 黄晓武:《帝国研究——刘禾访谈》,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3(1)。



其次是三种符号类型:图像、指示、象征的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产生了符号的丰富性。皮尔斯符号论中的符号是一个命题,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单词,这是皮尔斯符号论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两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区别。索绪尔创立符号学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语言学一个科学的地位。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符号观是认知的、交际的符号观。归根到底,它是为了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皮尔斯是先提出符号论的基本框架,再把其中规则应用于语言这一符号子系统;索绪尔则先研究语言这一符号子系统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反作用于符号学系统。皮尔斯的符号论比索绪尔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分析和解释功能,具有更突出的人文精神。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上是一种设想,被困于语言系统内,把符号系统看成是上帝般的先验存在,能够自行分解,是一种否定人类和客观世界的封闭系统;而皮尔斯的符号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跳出了语言符号的樊篱。符号的解释是离不开关于对象世界人类的生活经验的参照,因此是一种开放的、人性化的符号学。从某种程度上说,皮尔斯才是现代符号学的真正奠基人,因为他的符号学观点克服了索绪尔结构意义符号学的缺点,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人文性、历史性和解释能力。^①

德勒兹最欣赏皮尔斯之处是他的非语言学多元符号理论。德勒兹描绘其电影研究是“一种关于形象与符号区分的分类学”。《电影 I:运动—影像》的大多数篇幅都在阐发动像与符号的关系,将动像分为感知形象(perception-image)、动作形象(action-image)、效应形象(affection-image)、关联形象(relation-image)、冲动形象(impulse-image)和反思形象(reflection-image)等六种形象。尽管德勒兹笔下多指涉皮尔斯,但是他《电影 I》和《电影 II》的主要框架却是柏格森式的。德勒兹以柏格森的感知形象、动作形象和效应形象三种动像为起点,继而找出效应形象与皮尔斯第一符号之间的平行关系(两者皆与质量有关)、动作形象与皮尔斯第二符号之间的平行关系(两者皆与动作反应有关)。但德勒兹没有试图将感知形象与第三符号联系起来,而是提出了

^① 此处关于索绪尔语言二元符号学和皮尔斯多元符号论的比较研究,主要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的《近年来国内皮尔士研究简述》,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课题编号: B01019)“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重大演变研究”课题组,《当代西方哲学动态》,2005(1)。

第四种动像即关联形象(relation-image),且与第三符号相呼应,然后把感知形象作为一种外在于皮尔斯分类图式的特殊形象(零符号)。柏格森与皮尔斯图式的关系如下(「I」为德勒兹的概念):

柏格森		皮尔斯
感知形象	=	「零符号」
效应形象	=	第一符号
动作形象	=	第二符号
「关联形象」	=	第三符号

确立了四种动像之后,德勒兹又界定了两种添加的形象类型:一是在效应形象与动作形象之间的冲动形象(impulse-image),一是在动作形象与关联形象之间的反映形象(reflection-image)。至此,总数达到6种动像。^①这六种形象分别与皮尔斯三种符号相关联,共计有18种符号与动像关系。

德勒兹以电影为中介,赋予时间、运动和生活以特殊的原创力量 and 新的哲理蕴涵。在德勒兹的电影哲学中,他的旨趣迥异于通常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方法。他认为电影研究的目的既不是意义的阐释,也不是形象的再现,而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不是关注既有或给定之物,而是强调生成与变化之维。德勒兹并不简单地把电影视为另一种叙事和表达信息的方式,也不认为电影是文学的次生形式,而是认为电影模式改变了思考和想象的可能性。电影具有非人类之眼(inhuman eye),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不依附于人眼的“观看”方式来思考。例如,人眼视某物为红色,但是,他者之眼(如动物、摄影机镜头)则未必如此。不同的眼中有不同的视野、色彩和世界。正是电影镜头的这种“非人类之眼”把我们从人类有限的视野、固定的观念和道德意识中解放出来,从而提供了超越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因此电影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空间和精神世界。

对德勒兹而言,生活是时间之流或生成之流,是充满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或互相感知的总体。电影的出现,把我们从感知世界的固定而有序的视点中释放,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樊篱。电影从两方面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力:早期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on Cinema*, pp. 65~68,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电影中呈现的动像使我们看到了运动本身,而不是从一点到另一个点移动的身体。现代电影以时像为特征,形象不再以逻辑的序列链接。我们通过非理性剪辑方法获得时像本身。时像不是从一点到另一个点的简单的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种分衍与差异的生成过程。形象不再是某种既已存在的形象,而是新的创造与生成。蒙太奇的出现使得电影有了自己的“语法”,摆脱了单纯记录现实的属性和作为“真实”影像的附庸地位,从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由此拥有了使思想超越其窠臼或固定形象的力量,电影哲学则应对这些新的情感效应和感知力作出反应。

动像——电影由运动的画面构成。动像的力量在于,电影并不从某种固定的点出发以组构形象,而是在运动中拍摄系列画面,其本身就是一种跨越运动的运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运动、声音、色调、光线,以及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等建构了一种复合型的动像,从而把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有序世界中释放出来。克莱·科尔布鲁克指出,动像赋予我们一种关于这种时间差异之流的间接概念。在运动与时间的关联上,我们倾向于将时间空间化。我们根据太阳跨越天际的轨迹制作时间图式,我们设计的钟表以时针循环于时钟表面的方式标示时间,这样我们就将时间定位于我们感知的世界之内,置入现实化的形象世界之内。但是,可以提出质疑,我们是如何拥有这样的现实化世界的?人类的感知将丰富复杂的时间与运动的世界简化了。实际上,不同的生成和时间的绵延会产生不同的世界,包括动物和植物世界在内。“电影的动像把我们从这种以单一视点看待不同的时间绵延的同质、有序的世界抽身出来。通过电影镜头的运用,我们不再把时间视为运动发生的线索,而是视为一种发散性的脉动或不可通约的差异。这方面的一种主要技术就是蒙太奇。”^①德勒兹认为蒙太奇是时间和“绵延”的间接形象。既不是同质的时间,也不是空间化的绵延,而是一种情感效应的绵延和从动像链接中流出的时间。

时像——电影以时像为其理念。时间对德勒兹哲学、伦理学、文学观至关重要。我们由于经历时间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与时间形成伦理学的、政治学的

① 本节论述,多处参考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London: Routledge, 2002), 以及 Barbara M. Kennedy, *Deleuze and Cinema*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两部著作。

联系,时间创造某种内在幻象(internal illusion),我们从时光复杂的流淌中构想有序的整体,例如人类关于自我的概念。实际上,植物、动物和人类观察者的时间绵延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植物是毫不迟疑地“感知”或吸收光线、热量和水;动物在选择食物之际则有点迟疑不决,动物要对食物的种类和可捕食对象作出判断;人类则由于其思想和记忆的力量形成在时间绵延观念上的差异:“通过记忆、概念、艺术和哲学,我们可以在时间之流中向前和向后运动;我们可以思索其他的绵延……动物感到饿就开口去吃,而短篇小说家可以感到饿,但却不是去吃,而是去表现饥饿的某种形象或幻觉。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1961)揭示了人体有意去延迟对饥饿的满足,通过对饥饿境界的探索而生成的饥饿艺术家。”^①因此人类与动植物有着不同的反应速度,有着不同的时间绵延、感知、选择、决定和犹豫的频度。但由于我们通常是从自己感兴趣的视角感知时间绵延,因此惯于把其他所有的绵延都锁定在我们的时间观内。往往不会设身处地地感知他者的世界和时间绵延的特点。德勒兹从其抵抗人类中心主义的活力论出发,坚持在时间观上尊重人类时间绵延与非人类时间绵延的多样性。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幻觉使我们感到时间是线性流动的,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前行着,而电影中时像的观念或力量就在于破除这种同质的、线性的、无差异的时间幻觉,把时间视为开拓生活的一种强流(an intensive flow),而不是泛流(extensive flow)。电影赋予我们内在于机器的非个性、非感知、众生平等的抽象时间,没有谁有特权可以垄断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时间是无差异的;相反,时间正是差异的产物。……时间作为运动的力量,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开放和生成着”。^② 德勒兹哲学认识论的精髓在于强调动态的生成而非已然的存在——思想、感知、电影、科学与小说皆应作如是观。电影不是由作为人的观赏者加以综合而来的产物,而是由单一的、机器制作的形象所构成,使用剪辑和多元视点。例如,电影镜头从一个方向掠过一活动体,从左到右。然后,它停下来,移向另一个活动体,从高到低地拍摄。因此,时间无法作静态观,它是一个不断呈现差异的总体,变化多端,多元绵延。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42,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43~44, London: Routledge, 2002.



时像把时间本身给予了我们,时间不再被空间化而来自运动。

时像是时间的直接形象。时间意味着差异与生成之流,但是并非是说时间生成运动之物,也不是生成与其他运动相联系的人类生活。时间是一种无根基的生成,不依附任何基要主义。由此,“时像把我们带离了辩证法的否定性”,辩证法之所以是否定性的,是因为它只把差异或生成视为固定的存在,而时像的生成则是肯定性的,犹如生活一样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时像超越辩证法,超越既有的人与物的联系。德勒兹认为时像由非理性剪辑(irrational cuts)而运作。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倾向于以理性将形象加以综合或链接,使之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电影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打碎审美经验,以蒙太奇等非理性剪辑链接画面,组构形象的运动,开拓新的感知世界。对德勒兹而言,正是这种生成形象(this becoming-image)使电影成为哲学,哲学成为电影。^①哲学与文学艺术建立联系的目的不是为其提供某种艺术或美学的阐释理论,电影与哲学挂钩也不在于电影能够提供某种关于世界的观念,而是在于电影对人的眼睛和感知力生成了新的可能性,创造出新的情感效应,而哲学则对这种新的感知力作出反应。

在文艺美学层面,电影研究已经进入后理论时代。^②在传统的电影理论中,大多数关于欲望与快感的分析皆基于意蕴、文本、词义、符号和视觉,女性主义理论尤为如此。这导致人们将焦点集中在女性主义关于文本意义的解读的争论上,并与某种总体性的政治态度或立场联系起来。女性主义理论既是政治实践,也是话语领域,具有特定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在女性主义话语和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中,主体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哲学传统预设了男性/女性等级制和二元论的主体概念。反映到女性主义话语和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中,则是男性主体的“看”(look)与女性的被看(looked)。女性主义一词是对文化实践和政治立场的描述。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微观政治学、后人文主义与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美学观念在精神实质上是共通的。后女性主义的概念是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53, London: Routledge, 2002.

② 参阅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洛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柏敬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指一种微观政治学的介入,关注生活体验的琐事,主张在女性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内应当出现多元声音,呼应着后结构主义者质疑笛卡儿认识论的论争,简言之,后女性主义寻求和反思女性声音的游牧空间。大多数后结构主义者关注一种碎裂的主体(a fractured subject)和多元流变的主体性。德勒兹则以生成论的微观政治实用论影响到后女性主义,以生成女性的概念替代主体性。他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程式,挑战和颠覆柏拉图主义哲学传统,否弃了大多数电影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所预设的基于主体与意义的思想系统,倡导机器装配的功能——电影中的时间、空间、身体与文本都是一种“机器装配”。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身体视为一系列复杂的流、力、器官、过程、效应和强度,这有助于将女性身体从二元对立的思想结构中解脱出来,挣脱弗洛伊德/拉康以及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二元论设定。在后人文主义的思想轨迹中,人类身体与他者身体、人类与动物、生命体与非生命体、机器与非机器都可以链接,因此电影摄制机器的“身体”可以从物质层面以互联网流通的方式与观众的身体产生关联并进行装配。以微观政治学和实用论为前提的电影理论可以视电影为一种跨越身体的事件(event),视之为一种过程性的生成,而不是一种再现形式或系统。因此后符号学和后语言学对电影事件的研讨,提供了一种前沿的电影理论,它们质疑等级制视觉的预设,反拨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男性凝视”和“窥阴癖”等观念。在后理论的千高原或千平台上,德勒兹的身体观可以建构一种后女性主义理论的语用学。德勒兹的术语丰赡多姿,虽然常常被讥评为充满新造词义,但也有一些富有意义的术语成为当代电影哲学的新词汇。例如“生成”,尤其是生成女性(becoming-woman),以及感动(affect)、感觉联盟(bloc of sensation)等术语,为我们思考电影创造了新的平台和迥异于传统电影理论的词汇。^①

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的电影艺术哲学是一门新学科的创新,展示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美学范式。这种美学新范式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感性学的善的形式论和反映论,它强调过程感、流动感、持续运动、开放性结尾和多元

^① Barbara M. Kennedy, *From Micro-politics to Aesthetics, Deleuze and Cinema*, pp. 9~27,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生成,德勒兹称之为包含丰富异质因素的个体性(haecceity)或强度(寓杂多于唯一的场域)。“在这种美学范式中,过程压倒形式。‘美’包含在其自主性中。这种自主性是一种表现在感知过程的‘无主体的主体性’。”“后女性主义是我们用以描述女性主义多样性的一个术语,它与后理论、后结构主义交迭和共谋。……当代后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力图扰乱‘身份’、‘主体性’等概念和二元对立话语……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的新美学转向,与德勒兹反形而上学和活力论的思想共谋,可以使我们反思电影理论中美学的价值,引导我们经由生成过程走向创造性的情感与感觉的理论,而不是快感与欲望的理论。由此使我们回归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价值问题,不再陷入社会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的简缩论的范式中。电影理论由此可以从以视觉与偷窥为前提的欲望或快感的感知问题转向一种关于电影体验或电影事件的物质捕获力的创造性的思考。”^①在后理论话语中,身体不等于血肉之躯,而可以视为意义形式的动态、多元的装配,是可感知的美学、物质、技术、生物或机械的身体。灵与肉皆可以在抽象意义上技术化。身体的装配是与其他的装配相联系的一种复杂多元的装配。由此,德勒兹电影艺术哲学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生成与强度的新美学和机器装配论的唯物论美学,为我们重新思考电影的事件、身体与性话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阈。

^① Barbara M. Kennedy, *From Micro-politics to Aesthetics, Deleuze and Cinema*, pp. 30~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十章

德勒兹与鲍德里亚：拟像时代与控制社会

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未来维度，他关于真实与拟像的看法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20 世纪的法国是西方哲学与美学的重镇，涌现出了一大批对人类思想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拉康、德里达、福柯、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萨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德勒兹和加塔利……用英国著名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打趣说：与他们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中邂逅，比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碰面还频繁。其中，德勒兹从哲学、鲍德里亚从社会学对当代世界的拟像(simulacra)和控制问题予以了特殊的关注。这种理论关注突出地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当代性。

第一节 鲍德里亚与“完美的罪行”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被称为“后现代理论先锋”，是当代最重要、最富于挑衅性的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之一。对他而言，后现代社会文化已经转向以拟像为特征的超现实性(hyperreality)。日益全球化的网络文化传媒使得拟像凌驾一切，成为现实消解的征候。我们不再有



能力去在真实的世界与它的形象之间作出区分。例如,今日的广告兜售给我们的与其说是物品,毋宁说是形象;我们购买的是品牌效应而不是该品牌所代表的质量。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鲍德里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冷酷的记忆 II》中出语惊人,竟宣称海湾战争可以说并未真正地发生过。理由似乎是,早在海湾战争开始前,美国就在电脑上无微不至地演练了这场战争;而当战争爆发时,媒体铺天盖地地参与了这场战争,再加上交战双方出于政治军事的信息战、心理战的策略,不断发布真假难辨的各种信息,以致没有给这一事件留下真实的空间,而且战争是通过形象而获得胜利的。不仅是战争的形象——中东伊拉克战场上妖魔化的敌人、空袭的夜景、导弹发射的轨迹等等,而且当战事发生时,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可以把这场战争当作一种媒体事件来观看。战争的地点不再局限于伊拉克,而是拓展到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每一台电视机屏幕——我们已经无法分清看见的究竟是武器还是形象。换言之,电脑和媒体战争是“正本”,而实地发生的真正海湾战争却反而成了摹本!在此情况下,我们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无法以虚幻的形象来比对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感受。^①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再次爆发,中国媒体空前地以直播的方式 24 小时不间断地通过多个电视频道加以报导,使得众多的中国观众得以同样把伊拉克战事当成媒体事件来进行鲍德里亚式的体验。

在我们这个充满着复制、拟真与类像的数字文化传播时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文化传媒的革命导致信息内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电子网络空间正在大规模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以殖民化。赛博人(cyborgs,人机一体者)挑战传统文艺美学的主体、性别、身份等重要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辖域。虚拟现实完全可能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更为迷人、更加纷繁复杂。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维尔曾经在《1984 年》中突出地讨论了视觉权力的问题。作为 20 世纪西方文学“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部小说对极权主义领袖的“老大哥”形象和控制社会的“电幕”功能的描写令人印象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8, London: Routledge, 2002.

深刻。电幕作为电子监视器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用于工厂、企业、医院和监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福柯进一步拓展了奥维尔的论旨,他将边沁的全景观念(Bentham's idea of Panopticon)与之相互联系。在福柯的全景监狱的概念里,囚犯呆在分隔的牢房内,无时无刻都处在隐藏于中心塔楼内的狱警的监视下,“能够看见他人而不被人看见”的视觉权力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艾柯认为,奥维尔的讽刺不仅针对纳粹和苏联,更重要的是,它还针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本身。^①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和电子媒介时代,权力的逻辑已经与英雄崇拜时代不同,不再是一个人的逻辑。视觉权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大众传媒中的新宠电视和互联网已经取代“老大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马丁·艾斯林在《电视与电幕》^②一文中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在奥维尔这部杰作中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在《1984年》中,奥维尔出色地描写了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通过大众传媒操纵和控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恐怖场景。从奥维尔时代到现在,人类社会的划分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社会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在专制独裁时代操纵者是老大哥,在大众传媒时代的非极权社会操纵者是电视。就眼见未必为实这一点而言,融声音与动画于一体的电视要远远强于诉诸听觉的电台和以文字为媒介的报纸。电视广告有如“新话”,麻痹大众,给大众洗脑,误导大众(商品消费、明星崇拜等)。不仅虚构性质的文艺作品和栏目如此,而且新闻、体育运动节目、谈话节目、娱乐休闲节目和政治论争也如此。新闻事件被从独特的角度拍摄并重新剪辑安排,以获得最大的戏剧效果。艾斯林举了一个例子:一场政治游行可以延续数小时,其中只有30秒钟的暴力。而电视播出时只有这30秒钟未必是出于阴险的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因为这30秒钟构成了这一事件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展示了事件最有魅力的一面。确切而言,因为电视是一种图像媒介,它倾向于让受众毫无疑问地把它作为客观真实来加以接受。而电影更是拟真和制造幻象的高手,例如好莱坞梦工厂通过高度技术化的加工、剪辑、摄制,制造出现实世界的一幅幅拟真

① R. Lumley, Umberto Eco, *Orwell, or Concerning Visionary Power* (1984), *Apocalypse Postponed*, London: Flamingo, 1995.

② Martin Esslin, *Television and Telescreen, On Nineteen Eighty-Four*, ed., New York: Peter Stansky,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的图画。赫胥黎曾经在《奇妙的新世界》中想象有一种化学药品“soma”使一代人变得冷漠。奥维尔在距赫胥黎约20年后极为类似地看到了由大众传媒所致的这种冷漠。从传媒的政治维度,他看到收音机、电视对下一代的负面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对知识与文化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实现人性目标的巨大促进作用。^① 套用艾斯林的话来说,奥维尔关于技术政治与大众传媒的令人惊悚的警告在今天要比在1948年或1984年更值得人类思考。

与奥维尔阴郁的悲观主义警告类似,鲍德里亚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拟真时代,技术取代了资本,社会再生产取代了生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符号生生不已的增殖使劳动者不再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符号中的符号”,是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奴役模式的符号,工资也不再与个人的工作相关,而与他在该系统中的位置相关。因此,在当代消费社会里,符号价值和象征交换已经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的逻辑而成为核心概念。^② 拟像世界比现实生活更为真实,传媒时代的大众为强大的拟像世界所攫住,只关注场景而不关注意义,从而导致社会学理论失去了其固有的对象——意义、阶级、差异——一切都进入了无差异的黑洞之中。西方学者中有人认为,鲍德里亚的著述既可以当作严肃的思想探索来对待,也可以当作科幻小说来阅读。而这正是鲍德里亚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特点。

鲍德里亚以独特的洞察力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日益剥离、拟像要比真实事物更加真实的严峻景况。他在《完美的罪行》中指出:“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另一个年代将诞生——虚拟现实元年。所有在此之前的东西都将成为化石。”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充满着愤激的言辞和独特的人文悲情,如“实在是一条母狗”,“世界利用技术来愚弄我们”,“世界是一个根本性的幻觉”,“在一定时间内,我们还是妇女所生,但不久,我们就和试管婴儿这一代人一起返回亚当‘无脐’的状态:未来的人类将不

① 麦永雄:《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87~1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D. Kellner 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p. 7, Blackwell Ltd., 1994.

再有脐”。面对高度发展的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当代大众传媒文化中的新问题,鲍德里亚认为虚拟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完美的罪行”!“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①

第二节 德勒兹论当代控制社会

鲍德里亚是社会学家,德勒兹是哲学家,一般认为他们都是“后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当代性密切相关的真实和拟像问题构成了他们一个共同的理论关注点。从柏拉图以来直至20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西方思想传统倾向于设定二元论模式,其中一元凌驾于另一元之上,或一元被视为决定另一元的基础。辩证法思想亦是建立在二元论框架内的,既强调决定性的一元,又指出被决定的一元具有反作用。从比较视野来看,鲍德里亚仍然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二元论一脉:“今日我们谈及‘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之时,似乎那儿简单地存在着一个实在的或真实的世界,而后再谈论其虚拟的或非真实的摹本。我们也常常认为,今日世界进入了‘后现代’,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摹本和形象凌驾一切。后现代世界为电视、广告、商品设计的摹本、克隆、品牌无意义的重复、涵盖一切的电脑拟像所掌控。无论我们对这个世界加以庆贺还是表示悲哀,我们都通过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区分来描述它:我们曾经贴近真实(它是实在的),而现在一切都是形象的(虚拟的)。这就是为什么像鲍德里亚这些当代思想家那样,把后现代文化描绘成为‘拟像’的社会。”^②

德勒兹与鲍德里亚不同,他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是从哲学维度来看待真实与拟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主张多元生成的德勒兹认为关于真实与拟像二元之分的传统观念体现出思想上“能指的暴政”和哲学上的等级制观念。西方思想倾向于看重真实,忽视拟像(或摹本、类象),这实际上是忽视了生成(意

① 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32,46,8,19,21,25等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7, London: Routledge, 2002.



味着潜在性或尚未完成的状态)的虚拟力量。对德勒兹而言,生活是一种虚拟的力量,一种亟待生成的力量:不是走向某种既定的目的或以某种已然存在的东西(真实或实在)作为基础。虚拟拥有丰富的差异性,是一种强大的生成力量,它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进行创新,总是能比这个真实世界创造更多一点东西。因此,虚拟现实和差异生成正是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德勒兹反对真实与虚拟之间僵硬的划分,认为我们的世界总是真实—虚拟的。因为:第一,任何真实存在已经是一种形象。第二,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真实—虚拟的。真实世界是虚拟潜力的结果,每一种实在之物都持有其虚拟的和生成的力量。“我们倾向于认为有一个前于拟像的真实世界,但对德勒兹而言,只有一种拟像的‘原初’过程。存在与事物皆从拷贝、复制、形象和拟像(simulation)的过程中浮现。每一部独特的文艺作品或人类个体都是一种拟像。”人类的延续是一个基因的拷贝与复制,并带着偏移的过程;文艺作品的独特性不在于描述这个世界“是什么”,而在于通过亦真亦幻的艺术形象转化这个世界。而只有当虚拟的潜在性现实化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它们。文学的力量在于它迥异于现实。文学就是拟像或拟像的力量。它超越停滞与静态的生活,生产出新的拟像,生成对生活的一种新的表达式。“德勒兹甚至思考机器与电影的非人类面貌和感觉,实际上在德勒兹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现代电影的发明。在电影中,形象从人类眼睛和有机视角及叙事的掌控中获得解放。正是电影的力量以一种非人类和多元的方式‘观看’,从而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哲学与艺术的交互作用乃是创造差异和分歧,而非认同与常识。哲学创造概念,艺术关涉新的体验。但两者可以互相转化。电影使哲学家重新思考时间与形象的关系。”^①概言之,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德勒兹认为是一种动力学的、充满着生成际遇的联系。

后现代文学常常被界说为一种运动,人们认为它热衷于戏拟,长于引证既有的风格与形象而不言说和意指任何事物。鲍德里亚认为传媒文化把一切都缩减成为表面形象,没有真实作为坚实的参照,这是一种悲哀。与他相应,不少人都对这种拟像时代流露出悲叹的情绪。但是德勒兹的拟像概念既抵制这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6, London: Routledge, 2002.

种怀旧之情,也否弃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只有形象而无真实的后现代世界中的观念。既往的理论模式大都视拟像为一种拷贝,从而预设了某种原本。而在德勒兹看来,拟像或形象就是真实,生活是而且永远是拟像——是一种生产、创造、生成与差异的力量。德勒兹打破真实与虚拟的壁垒,为拟像辩护,他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中强调事物的生成嬗变与潜在的未来维度,对于理解我们大家都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在对当代社会的看法上,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探索似乎总是有政治因素。他与福柯在精神上相通,关注监狱调查、同性恋、意大利自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其著作中不断探讨社会制度问题。他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与政治哲学结合起来,对当代控制社会的文化特征作了阐发,对意识形态理论、当代大众文化的拟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是与现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中说:“《反俄狄浦斯》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著作。”“我认为加塔利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俩都是。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体系加以分析。这种体系不断地将其极限向外推扩并在扩大的范围内遇到新的极限,因为极限就是资本本身。”^①德勒兹曾经日益强烈地感到“生成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区别”,尼采曾经说,如果没有“非历史的模糊概念”,任何重要事物都不会形成,故而尼采关注的是正在形成的事物,谈论事件本身的生成。德勒兹把奥斯维辛和五月风暴都看作是一种生成,认为纳粹集中营把“作为人的耻辱”加在我们身上。而做人的耻辱我们有时也会在一些普普通通的场合中感到,如面对过分庸俗的思想,面对电视文艺节目,面对官僚的讲演,等等。耻辱,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耻辱。正是这些给人以无穷的思虑,“这是哲学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这使得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哲学。在资本主义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场。……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而德勒兹认为“艺术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参阅193~208页关于“控制与生成”及“关于控制的社会”的论述,以下引文不再标出页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就是抵抗者,它抵抗死亡,抵抗奴役,抵抗饥谨,抵抗耻辱”,虽然乌托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概念,但是其中蕴涵了一种人民与艺术所共有的虚构,应该重构柏格森的虚构概念,赋予它一种政治含义。

德勒兹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控制社会之中。他曾经在关于福柯的著作和与媒体的访谈录中建议,应当深入研究三种权力的运作——绝对统治权、惩戒权和正在变得霸道的信息传播控制权。“不必问哪种制度最残酷,或是最可容忍,因为在每种制度中,自由和奴役都在交锋。”专制独裁的社会体的绝对统治权无须多论。对现代社会体的严格的惩戒权,福柯作过精彩的论析,因而通常他“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錮(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和军营)的思想家”。福柯将惩戒社会定位于18世纪和19世纪,其于20世纪达到顶峰。惩戒社会的特征是禁錮。在这种社会中,“个人不间断地从一个封闭环境到另一个封闭环境,每个封闭环境都有其规则,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学校,再次是军营,再次是工厂,时不时是医院,也有可能是最佳禁錮环境的监狱。监狱充当了典型”。德勒兹强调的是当代社会的控制权,认为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我们处于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家庭等所有禁錮环境的普遍危机之中”。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錮来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控制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社会。‘控制’一词是伯勒用来指新魔鬼的,福柯认为此词指明了我们最近的未来”,“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变得霸道这一现象,反映了涉及言论和想象的统治已臻于完善”。德勒兹把他和加塔利的“机器论”与不同的社会体再次联系在一起,认为对专制独裁的绝对统治权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的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机器;对控制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但是机器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必须分析哪些机器仅是其构成部分的集合装置。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的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錮对我们来说都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对信息传播的研究使我们不寒而栗。”例如,电脑黑客的网络犯罪或电脑病毒的发作,“它们代替了罢工和19世纪被人们称为‘破坏’的行动”;青少年上网成瘾症,已经成为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当代社会的棘手问题。同时,言论与信息传播可以完全为金钱和权力所腐败,在当代社会,与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概念紧密呼应的有詹姆斯

基的意识形态“制造共识”和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拟像”等思想观念。

德勒兹指出,使一些类型的机器与一种社会相对应是很容易的,这并不是因为机器是决定性的,而是因为机器表现出那些能够产生并使用机器的社会形式。古老的绝对统治社会使用简单机器,使用杠杆、滑轮、钟表;最近的惩戒社会装备有能学的机器;控制社会则采用了第三类机器:信息机器和电脑。这是技术的变化,更深刻地说是资本主义的变化。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式生产状态,它在禁锢的环境中设立工厂,市场则是通过专业化生产、殖民化掠夺或降低生产成本而获得;而当代控制社会,资本主义不再是为了生产,它往往将生产,甚至将纺织、冶金和石油这些复杂形式的生产扔给第三世界国家。“这是超生产的资本主义。”它想卖的是服务,想买的是股份,因而已不是为了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产品即为了销售或市场的资本主义。工厂让位于企业,专制独裁和集权国家让位于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占领是通过对控制权的掌握,销售成为企业的中心或灵魂。德勒兹略带讽刺意味地说:“人们告诉我们,企业有一个‘魂’,这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消息。营销学现在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并培育着我们的主人——这厚颜无耻的一代。”金钱也许最能表现惩戒社会与控制社会的区别:惩戒社会一直与铸币和金本位相关,而控制社会则与浮动兑换相关。古老的货币的鼯鼠是禁锢环境的动物,而货币浮动兑换的蛇却是控制社会的动物。我们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鼯鼠过渡到蛇。“蛇的环节比鼯鼠的洞更为复杂。”德勒兹哲学与美学既有艰深的理性思辨,同时也紧密地贴近现实世界,关注当代人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他关于控制社会的剖析,具有思想警示的未来维度。



结 语

德勒兹哲学与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德勒兹是当代西方思想领域特色斐然的一流哲学家。从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精神实质及其后结构主义的链接(and)逻辑而言,没有最终的“结语”;而只有不断地链接、流动、生成和增殖的开放式结局,或千高原式、褶子式的一个个思想平台,只有“非结语之跋”。德勒兹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平台”链接异质性而不强加调和,不作盖棺定论之思。德勒兹的哲学思想强调差异与重复,重视在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三维关系中的差异特质与多元生成的哲学力量,倡导快乐的“逃逸线”之旅,因此他的哲学观念具有极大的增殖性,可以在众多不同的领域持续流变和生成新的思想结晶。一个个千高原式的平台之间,可供不同的思想者按辔徐行,纵情游牧。在此意义上,本书也仅仅是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平台而已。此外,完全也可能存在众多的其他研究平台和探讨德勒兹思想的维度。

鉴于国内关于德勒兹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的现状,笔者在尽可能掌握相关前沿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关键概念加以梳理和阐发,以期抛砖引玉,为促进国内文艺学、美学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全书由导论和四大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侧重论述德勒兹哲学思想与当代西方学术语境的关联,旨在梳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等的关系,从而为本书的德勒兹研究和论析提供一个较为宏阔的学术背景,凸现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特质与定位。笔者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用差异哲学和多元生成的观念(如机器“装配”等概念)表达异质因素多元化的分衍和无限

链接的思想,不同的块茎、褶子、高原不断地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编码化—解编码化—再编码化;克分子线—分子线—逃逸线),构成了一幅变化多端、异彩纷呈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景观。德勒兹与加塔利创造了一种启人睿智的认知世界的图式,一与多、同与异、静与动、能指与所指、男性与女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等二元对立在千高原与游牧之光的观照下皆消弭于无形。在西方后现代哲学和当代美学领域,德勒兹与加塔利标志了其特色斐然的一维。

作为正文核心的四大部分以德勒兹式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无限链接的逻辑或理念分为四编:德勒兹与哲学、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德勒兹与文艺美学、德勒兹与当代性。在结构上,前三编大致与德勒兹著述的三个板块(德勒兹自述的“哲学史”、“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研究”、“美学旨趣”三个时期)相吻合。但是,在这种结构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观念持续不断地穿透不同疆域的涌流和生成。例如,德勒兹的关键术语千高原、块茎、生成、解辖域化等等贯通了众多不同的结构和领域,并且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产生新的可能性。第四编重点选择了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电影艺术哲学、赛博时代与控制社会等题旨揭示德勒兹思想的当代意义。

第一编“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勾勒了德勒兹作为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史思想资源及加塔利、尼采、福柯的思想关联,侧重介绍和论述了德勒兹及加塔利哲学和美学中一些关键而富有特色的后结构主义观念。从思想过滤与观念创新两个重要方面对德勒兹与哲学关联的梳理和对其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的阐发,是本论文题旨展开的基础。本书后面所论述的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和对文艺美学的看法,也主要是从哲学视阈切入的,具有与众不同的理论品性。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分两章论析德勒兹和加塔利最有影响的“反俄狄浦斯:精神分裂症与分裂分析”和“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题旨。前者从“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的欧洲历史文化背景切入,把在当代思想中有重要影响的俄狄浦斯问题置于弗洛伊德、拉康、德勒兹/加塔利的理论视阈中辨析,凸现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理论方法的价值与意义。论文认为分裂分析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后现代思想探索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分裂分析一词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



俄狄浦斯的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前缀“schiz-”,既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又指更具哲学普遍意义的裂变、划分、生成的过程,标示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拆解总体化思想的特征。分裂分析既是哲学认识论—心理学批评,也是社会历史批评。后者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联域,论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思想观念与三种社会体(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系谱学的研究。

第三编“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探讨德勒兹哲学思想在文学和美学领域的理论内涵与批评实践。除了关于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专章外,依照重要性而不是编年史的顺序分别论述了德勒兹(及加塔利)三部文学批评专著:《卡夫卡:走向少数民族文学》、《普鲁斯特与符号》和《受虐癖》。

总述全书学术价值与意义的第四编“德勒兹与当代性”和“结语”,呼应“导论”所涉及的西方当代学术背景,以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探讨德勒兹的当代意义。侧重讨论德勒兹思想对当代文艺美学的影响和未来维度,涉及德勒兹哲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电影美学、当今网络时代的赛博空间与控制社会,生态美学以及当代文艺美学形态建构等重要维度。

在笔者看来,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研究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思维哲学层面,德勒兹的差异哲学与生成论美学创造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思维模式的视阈,丰富了哲学思维方式。他和加塔利创造和倡导的一系列后结构主义思想概念,构筑了新的问题框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既有的机械论、形而上学、辩证法、二元对立、基要主义、本质主义、人本主义等等的范式难以避免地遭到了他们富有哲学力量的流变论、生成论、多元论、生机论等思想的挑战。当然,这并非要否定此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说,读过德勒兹之后,我们已经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看待和思考世界与生活了。近期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的反思,如有人著书提出“一分为三论”,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广泛的典籍中寻绎相关的论据,论证这是一种有别于二元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和表述模式;^①还有人从理论上提出,简单地套用“一分为二”是有害的,长期以来这种作为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

^① 周德义:《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已经深入人心,不少人习惯于简单的“二分法”,以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两极为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结果往往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因此不能把一分为二的理论抽象出来当作标签到处乱贴,世上万物的情况极为复杂,有的可以一分为二,有的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甚至可以一分为多。例如新华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大师文丛”中,就有庞朴先生的著作《浅说一分为三》(2004)。庞朴认为一分为三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中最精彩、最引人探索的重要部分之一,指出在我们祖先倡导的人类和平共生、共存、共进化之中,潜藏着熠熠生辉的东方密码,即一分为三。庞朴在其网络主页的论文《一分为三——中国哲学的贡献》中以比较哲学的方法,分析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一分为三问题上的异同,例如他引证道——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他进而列数道:在鲁莽和怯懦之间是勇敢,在放纵和拘谨之间是节制,在吝啬和挥霍之间是慷慨,在矫情和好名之间是淡泊,在暴躁和蔫弱之间是温和,在吹牛和自贬之间是真诚,在虚荣和自卑之间是自重,在奉承和慢待之间是宾客,在谄媚和傲慢之间是友谊,在羞怯和无耻之间是谦和,在嫉妒和乐祸之间是义愤,在戏谑和木讷之间是机智,如此等等。和亚里士多德区分两极与中道的平面而静态的三分办法不同,黑格尔更进而提出发展的正、反、合规律。黑格尔的庞大体系,便是用正反合的三分办法螺旋上升而构筑成的。中国哲学主张世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包容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描绘的全部情景。这个系统,既非笔直的线,也非平铺的面,而是球状的网。网上的每一点,既是独立的存在,也是相依的关系。用以表示这种存在和关系的范畴,叫做“参”。参就是叁,大写的三,它被赋予数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性,以便概括地表示世界万物的存在及其关系。《逸周书·武顺》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管子·枢言》云:“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出所入。”《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得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



参矣。”张载《易说·说卦》云：“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又《正蒙·诚明》云：“得天地最灵为人，固人亦参为性，两为体。”抛弃那种不是盟友、便是敌人的二分法，政治家们便会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发现国家之间原来还有一种叫做伙伴的关系。这就是参，就是一分为三。如此等等。

倘若这些论述能够结合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关键观念加以阐发，无疑能够增添哲学思辨的强度，深化我们对人类复杂多姿的精神世界的认知。在思维方式上，德勒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视野。他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生成、差异与重复等概念，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千高原、块茎、褶子、机器等概念，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分裂分析、横截线、逃逸线、装配、解辖域化等概念，共同建构了一种不同于既往的思维方式（如机械论、辩证法、二元逻辑），丰富了我们会通中西方智慧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第二，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研究层面，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的欲望生产概念和分裂分析方法丰富和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是近代以来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篇幅宏大，内蕴丰赡，思路奇崛，概念多变，他们以欲望微观政治哲学分析资本主义，既不同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的历史宏大叙事，也迥异于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不同于意大利历史学家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对霸权与金融危机的剖析。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但是无疑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迪和益处。在对当代西方学术思想有重要影响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上，德勒兹和加塔利以他们独特的差异哲学视角，采借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以一系列似乎艰涩难懂又富于穿透力的思想观念给予人们以全新的启迪。他们给线性时间的历史叙事引入了系谱学与地理学以及地缘政治的多种维度，微观剖析与宏观审视相结合，开辟了一条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新途径。在对人类历史上复杂而重要的资本主义现象的分析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解构与重构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关于社会文化的思想，提出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等重要观念，其精微深

奥、独树一帜的阐释,构成了比较视阈中资本主义分析的重要维度。他们关于控制社会与拟像时代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鲍德里亚、罗兰·巴特等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形成对话关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代性的认识。

第三,在文艺美学层面,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看待事物与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放性思路。德勒兹和加塔利是在精神分析的废墟和残垣上建立分裂分析的,他们的著作具有生产与创造哲学和美学概念的特征,而这些概念在功能上亦是生产和创造的,由此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欲望、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我们观察事物和分析文本往往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种心理定式和思维习惯:精神偏执症式地寻求信仰中心或深层基础,建立固定的意义系统,不遗余力地搜罗万象,以追求真理,揭示主题,挖掘深层意义。而自后结构主义思潮崛起以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拉康的“转喻”观以及能指在意义链上不断“滑动”的文本分析(爱伦坡《窃信案》),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逻辑,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取向:拆解、分离、异延、裂变、流动、生成……从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德勒兹及加塔利关于贝克特的诗学特质的论述,关于卡夫卡与少数族文学的分裂分析,关于普鲁斯特小说中多元符号和机器装配的概念,关于马佐赫施虐癖—受虐癖情结的跨学科思辨,关于“生成女性”、“生成动物”等概念,以及对女性主义理论、电影艺术哲学、真实与拟像、控制社会等问题的论述,都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哲学和美学思脉。德勒兹及加塔利通过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佐赫等文学家的专论,以及散见的文艺美学论述,阐发了与上述诸概念相关的后结构主义诗学思想,对比较文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领域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从世界文论的视野审视异质文论的会通性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其中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美学的褶子、块茎、千高原、游牧等关键概念在这方面尤其具有开启睿思的价值与意义。世界文论之间犹如海绵的孔洞(亦是褶子),既有丰富的可通约性,又有众多的不可通约性。从文心相通的维度而言,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借鉴和反思具有前沿性的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关键概念,重点研究其与后现代空间、文学间性的关系。例如从后地理、后历史的维度研究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由于媒体与空间的变化引发的一系列重要文艺美学问题,以及相关重要人物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通过对西方前沿性学术话语的分析研究、理



论采借和文化过滤,进而反思和促进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学术话语的交融或转型。例如,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与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言、意、象的关联性,德里达的延异解构论,德勒兹的褶子、块茎、千高原等哲学和美学概念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意旨,“无器官的身体”与“大象无形”、“空纳万有”、“意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中国诗学和古代智慧的会通,等等。此外,赛博空间的褶子、块茎、千高原式的电子网络、网站、网页、博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器官的身体,或者是齐泽克所言的无身体的器官——无结构的结构,可以无限延展与生成,可以多元互动,瞬息同步。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当前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或绿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德勒兹非常重视生态共生、化生等问题,并且在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诗学、易经阴阳宇宙论以及意境等术语作过阐发。德勒兹的生机论和一系列哲学和美学概念启迪人们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传统模式,把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无机界)的空间与关系构想成为互为依存、彼此链接的生态圈和生物链,互动共生,不可或缺。在2005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文化互动与民族性: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学”国际学术论坛上,香港学者王建元教授认为,德勒兹思想中蕴涵了比深层生态学更为深刻的生态哲学,可以从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维度在德勒兹与中国文化之间抽绎出生态问题的新范式——人与万物之间“横截线式的交流”,他从西方文论背景中阐发“德勒兹生成论阐释学”,结合中国审美文化的虚空与坚实、常数与变数的辩证关系,探讨太极、阴阳、乾坤、五行、八卦一系列概念与德勒兹褶子、交迭的思想观念,分析德勒兹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和逃逸线的特质与易经的变化之玄、庄子的生机之道、中国诗画的留白之趣,并据此分析王维的《鸟鸣涧》和《鹿柴》两首诗。在这种跨文化空间研究中,德勒兹的差异生态学和生成论哲学与中国文化/文学相互比照、相互印证,曲径通幽,又启人睿思。中西文论和思想智慧的交流、比较与会通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空间。德勒兹的生成论和生机论与中国文化艺术形成共生对位,两者都强调流变与差异的丰富生命形态,敬畏宇宙大化的力量和公正无私。阅读《千高原》,可以发现德勒兹颇为熟悉中国诗人,甚至东方哲学、美学、宗教、文化都进入了其理论视野。如在文化符号和文学形象思维问题上,中国结、印

度曼荼罗、犹太教圣符、伊斯兰心象和基督教圣象,都成为德勒兹与加塔利阐发思想的具象。但应当指出的是,强调异质文论与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可能更为符合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美学取向和精神特质。块茎之间、褶子之间,完全可以既通且堵,在繁复多姿的新巴洛克美学的千高原上作游牧之旅亦非易事!学界一些人所倡导的异质文化、文论之间的互证、互补、互阐、互动的新人文主义难免有点儿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其间存在着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心血来潮式的乱点鸳鸯谱,不求甚解而强作解人都会损害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学理性和逻辑性。

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特点、长处和弱点都应当被纳入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与奥斯维辛、五月风暴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同时,从中国学术立场来思考当代文艺理论形态的建构,也可以深切地感到:德勒兹美学思想既是亟待开发的富矿,同时也具有某些弱点,那就是对叛逆精神和反常之思的偏爱所导致的结果。面对后结构主义思潮和代表性的思想家,人们常常感到难以言说,因为其中一些重要概念难于界定,难以捉摸,意义玄奥飘逸。虽然德勒兹的“活力论”(生机论)和后人本主义思想对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富于价值和启迪意义,他的生成、褶子、块茎、逃逸线等后结构主义概念,对阐发生态圈、生物环链的链接关系,对反思和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很有效,但同时也潜藏着颠覆人文思想传统和启蒙精神的危险。德勒兹差异哲学与生成论美学否定或扬弃柏拉图以来的树状思维、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总体化思想、等级制观念和二元对立模式,固然有标新立异、反思传统的革命意义,但同时也潜藏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的威胁,隐伏着泼洗澡水将婴儿一块抛弃的危险:一切皆流,一切皆块茎,怡然作千高原的思想逍遥之游,作快乐的逃逸线之旅,没有真正的规则与限制,这未免有点罗曼蒂克的理论色彩。而且大千世界本身也并不如此,而是既有乔木,也有块茎、花卉、草丛、藤蔓……没有乔木和森林,我们的世界也将大大地损毁其自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统一性、内在性中蕴涵着丰富的差异性才是理想的图式。

毋庸置疑,德勒兹是法国知识界最具有思想阐释力量且风格独特的哲学家之一。他异彩纷呈的后结构主义关键概念如千高原、块茎、褶子、游牧等确实启人睿思,但是他的相对主义差异哲学和离散性的“后”主义思维有时又使



他成为自己构想的奇异幻象的牺牲者。

在某种意义上说,二元对位(立)关系是人类思想史和认识论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帮助人类主体方便地理解和把握客体世界。二元论并不限于西方哲学史、思想史的柏拉图传统,在世界众多民族或国家都是主要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图式,例如古埃及文明的模式的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上、下古埃及的二元对峙与相互融合,北方农耕民族与南方游牧民族的不同生活与文化导致其神话思维中的二元论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大神奥西里斯与塞特的对立形象蕴涵了生与死、善与恶、农事与自然、光明与黑暗等关系以及循环运转的太阳原型。^①再如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概念、范畴与关系,波斯索罗亚斯德教义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二元论,都是例证。一系列二元论概念如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在场与缺场、能指与所指、主体与客体、善与恶、理智与情感、男与女、黑与白、光明与黑暗已经成为我们表情达意的基本工具。

就是德勒兹本人也常常无法逾越二元论的范式,譬如,他对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划分,对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以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阐发就是如此。罗伯特·韦克斯不无道理地指出:“有理由相信,社会并不是像块茎式地统一结构而成的,人也不是简单地机器般地聚合而成的。尽管世界并不是像黑格尔所构想的那样是单一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体系,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仍然具有可以辨识的系统性、理性和有机整体的维度。尽管德勒兹的分析很精辟,但是健康的人体仍然保留着一种动力学的、统一的系统组织的范式,恰如大千世界里的生命体形式一样。……德勒兹反对僵化的思想结构的悖论在于,他块茎世界的结构方式本身在否定经验的系统性和有机性方面的同时,开出的却是一剂教条般僵硬的猛药。”“德勒兹对自由解放的追求是否与他关于社会是欲望机器的装配的模式相互抵牾也是一个问题。在德勒兹的模式中,‘自我’是解中心的,这即是说,究竟‘谁’是从偏执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主体,难以言说清楚。……或许更令人困扰的是,德勒兹显得不是引导我们获得一种健康的个人解放,而是把我们带入三重困境:如果我们不自我欺骗地相信我们是有机统一的个性,那么我们就沦陷到

① 麦永雄:《多维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学》,61~10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要么是偏执狂式的法西斯主义,要么是精神分裂症式的疯癫的境遇。”^①

在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二元论、本质主义加以批判性质疑之后,人们的思想之流很容易走向“本质虚无”论。我们反对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论和静态的本质主义来看待富于差异、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的普遍规律,也不认为会有僵死固定的共同本质。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和一定的条件内,世界万物总是有一些占据主流的事物或者主导型的因素处于支配地位,并且决定着该历史时空内事物的基本属性。历时与共时的因素常常交相激荡,导致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而原来相对主导、相对稳定的辖域化事物,其存在的形态、属性与本质也随之解辖域化,而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权力体系又导致事物的再辖域化。

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有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德勒兹的伟大思想贡献在于他从充满智慧的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提供了其他哲学家、思想家没有深刻思考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新思维,尽管它们还可能有粗疏、过激、自相抵牾等不足,但是其中显现出的是一种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的思想创新精神,一种富于穿透力的哲学睿智。“哲学中的毕加索”——德勒兹无愧于此称号!

德勒兹的意义在于,他从哲学思想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快乐的逃逸线式的精神——美在语境变化、魂在差异生成的开放性、叛逆性精神。在此,笔者同意 I. 布坎兰《德勒兹主义:元评论》^②中的观点:德勒兹主义的雄心和精神实质是引发另类的、反叛式的思考与阅读,我们倘若有反德勒兹(anti-Deleuze)的想法和做法,实际上也需要不拘形式或不拘小节地秉承其思想精髓:以自由的创造精神否弃一切奴性形式。研究德勒兹,应当既读德勒兹,又循其哲学、美学精神。既读墨水写就的文字之书,又读以热血与痛苦铭刻出来的灵魂之书。旨在从德勒兹特立德行的哲思中,抽绎出其建基于乌托邦冲动之上的社会批判思想的精髓。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p. 276~278,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② Ian Buchanan, *Deleuzism: A Metacommentary*, pp. 4~9,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参考文献

一、德勒兹的著作

1. 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彼岸人文译丛),杨凯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吉尔·德勒兹:《时间—影像》,谢强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4. 吉尔·德勒兹:《游牧思想》,陈永国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 吉尔·德勒兹:《康德与柏格森解读:柏格森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思想文库 经典译丛),张宇凌,关群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7. 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Gilles Deleuze,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 ~ 1974*, Cambridge, Mass: Distributed by MIT Press, 2004.
10. Gilles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11.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reface by Michel Foucaul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1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13. Gilles Deleuze,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4. Gilles Deleuze, *Critical and Clinic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5.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 1972~19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19. Gilles Deleuze, *Masochism*, Zone Books, 1991.
20.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 Gilles Deleuze,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Zone Books, 1990.
22. Gilles Deleuze, *Cinema 2: the Time-ima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23.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Zone Books, 1988.
24. Gilles Deleuze,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City Lights, 1988.
25. Gilles Deleuze, *Foucaul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26.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27. Gilles Deleuze,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Faculties*, the Athlone Press, 1984.

二、关于德勒兹的研究著作

1. *Deleuze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Constantin V. Bounda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Gilles Deleuze; edited by David Lapoujade; translated by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 Cambridge, Mass.: Distributed by MIT Press, 2006.
3. *The Logic of Expression: Quality, Quantity and Intensity in Spinoza, Hegel and Deleuze*, Simon Duffy, Ashgate, 2006.
4. *Deleuze and the Three Syntheses of Time*, Keith W. Faulkner, Peter Lang, 2006.
5. *The Anti-Oedipus Papers*, Félix Guattari; edited by Stéphane Nadaud; translated by Kéline Gotman New York: Semiotext(e); Cambridge, Mass.: Distributed by MIT Press, 2006.
6. *Deleuze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Violence of the Text*, by Mark Halsey,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7. *Art Encounters Deleuze and Guattari: Thought Beyond Representation*, by Simon O'Sulliv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8. *The Poetics of Political Thinking*, Davide Panag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Deleuze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Constantin V. Bounda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Deleuze and Space*, edited by Ian Buchanan and Gregg Lambert, Edinburgh Univ. Pr., Ltd., 2005.
11. *Philosophy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From Kant to Deleuze*, by Claire Colebroo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Gilles Deleuze: An Introduction*, by Todd M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ted by Adrian Par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Deleuze and Horror Film*, by Anna Powel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Art as Abstract Machine: Ontology and Aesthetics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by Stephen Zepke, Routledge, 2005.
16. *The Signature of the World, or, What is Deleuze and Guattari's Philosophy?* éric Alliez; translated by Eliot Ross Albert and Alberto Toscano; preface by Alberto Toscano. NY: Continuum, 2004.
17. *Discern(e)ments: Deleuzian Aesthetics = esthétiques deleuziennes*, editors, Joost de Bloois, Sief Houppermans, Frans-Willem Korsten.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4.
18.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A Guide and Glossary*, 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 *Deleuze and Music*, edited by Ian Buchanan and Marcel Swibod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 *Deleuze on Cinema*, by Ronald Bogue. Routledge, 2003.
21. *Deleuze on Literature*, by Ronald Bogue. Routledge, 2003.
22. *Between Deleuze and Derrida*, edited by Paul Patton and John Protevi. Continuum, 2003.
23. *The Matrix of Visual Culture: Working with Deleuze in Film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Nicholas Thoburn, Routledge, 2003.
25.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by James William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 *Organs without Bodies: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by Slavoj Žižek, Routledge, 2003.
27. *Understanding Deleuze*, by Claire Colebrook; series editors, Rachel Fensham and Terry Threadgold. Crows Nest, Allen & Unwin, 2002.
28. *The Feminine of Difference: Gilles Deleuze, Hélène Cixous, and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the Marquis de Sade*, by Marta Zając,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2.

29.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by Robert Wicks,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30. *Gilles Deleuze*, by Claire Colebrook, Routledge 2002.
31. *A Shock to Thought: Expression After Deleuze and Guattari*, edited by Brian Massumi, Routledge, 2002.
32.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Thinkers*, Routledge, 2002.
33. *Deleuze and Guattar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Routledge, 2001 (vol. 1: 472p; vol. 2: 475—1006p; vol. 3: 1009—1503p.).
34. *Deleuze and Religion*, edited by Mary Bryden, Routledge, 2001.
35. *Deleuze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 *Deleuze and Cinema: The Aesthetics of Sensation*, by B. M. Kenned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0.
37. *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 by Paul Patton, Routledge, 2000.
38. *Deleuze and Feminist Theory*, edited by Ian Buchanan and Claire Colebroo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 *Deleuzism: A Metacommentary*, by I. Buchana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0.
40. *The Brain is the Screen: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 edited by G. Flaxma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41. *Germinal Life: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of Deleuze*, by K. A. Pearson, Routledge, 1999.
42.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by A. T. Callinicos, St. Martin's Press, 1999.
43.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by E. W. Holland, Routledge, 1999.
44.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by A. Uhl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Culture)*, 20.3 (Fall, 1998),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德勒兹国际研讨会”专集)
46.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by John Marks, Sterling, Pluto Press, 1998.
47. *Isolated Experiences: Gilles Deleuze and the Solitudes of Reversed Platonism*, by James Brusseau,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48. *Multiplicity and Becoming: The Pluralist Empiricism of Gilles Deleuze*, by P. Hayden,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8.

49. *Culture and Critiqu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Discourses of Cultural studies*/J. P. Surber, Westview Press, 1998.

50. *The Two-fold Thought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Intersections and Animation*, by C. J. Stiale, Guilford Press, 1998.

51. *Deleuze and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Engineer*, edited by K. A. Pearson, Routledge, 1997.

52. *Reconsidering Difference: Nancy, Derrida, Levinas, and Deleuze*, by Todd Ma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3. *Deleuze: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P. Patt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54. *The Guattari Reader*, edited by Gary Genosko,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55. *Gilles Deleuze: Fluchtlinien der Philosophie*, by F. Balke, Joseph Vogl (Hrsg.), München Fink, 1996.

56. *Postmodern Wetlands*, by R. Gillel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57.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dited by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58. *Gilles Deleuze and The Theater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C. Boundas and D. Olkowski, 1994.

59. *Nietzsche's Aesthetic Turn: Reading Nietzsche after Heidegger, Deleuze, and Derrida*, By James J. Winchester, 1994.

60. *The Myth of the Other: Lacan, Deleuze, Foucault, Bataille*, by F. Rella, 1993.

61. *Cultural Criticism, Literary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by V. B. Leit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2.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by Madan Sarup,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63.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by E. Wright, London, Routledge, 1989.

64. *Deleuze and Guattari*, by Ronald Bogue, Routledge, 1989.

65. 潘于旭:《反同一性逻辑的生成性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博士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

66. 贾福生:《流动中的生命:德勒兹内在性理论及对于文学解释》(博士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5。

67. 姜宇辉:《审美经验与身体意象:思索德勒兹美学的一个视角》(博士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4。
68. 程党根:《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博士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4。
69. 麦永雄:《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与当代语境》(博士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
70. 汪会:《德勒兹后现代哲学观研究》(硕士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2。
71. 李惠国等主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2. [日]筑原资明著:《德鲁兹——游牧民》(“现代思想冒险家们”丛书之一),徐金凤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3.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4. [美]凯尔纳和贝斯特合著:《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75.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6.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7.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8.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9.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0. 方生:《后结构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81. [英]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渠东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82.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后 记

作为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关键人物之一,德勒兹思想特异而深邃,尤其与当代性联系密切。认真了解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观念,能够有效地深化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深化对当代性的理解。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笔者于2000~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艺学专业西方文论方向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广西科研项目“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与当代性”(2002~2004)研究成果的汇总。谨此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罗钢教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章安祺教授、钱竞研究员、刘象愚教授、周启超研究员、陈永国教授、黄卓越教授等专家对我的鼓励与指导。感谢刘禾教授和李陀先生主持2001年清华大学—美国伯克莱大学暑期“后结构主义与当代性”高级理论研讨班时给我的思想启迪。感谢杨乃乔教授和李春青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所进行的学术指导。感谢良师益友柏敬泽教授在外语和学术方面对我的帮助。在拙著面世之际,谨向评审和资助本书出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致谢。感谢我的妻子,为了让我潜心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她多年来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工作,并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儿子从一个有点贪玩的高中生培养成为清华大学学生。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所申请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勒兹诗学与跨语境理论意义》获得立项资助(批准号07XWW002),这将促使我以更大的热情、信心与干劲拓展和深化德勒兹研究。

德勒兹哲学、美学既艰涩玄奥、规避阐释,又富于思想穿透力,启人睿智。恰如巴巴拉·肯尼迪所言,德勒兹的语言和概念创造常常使读者陷入迷惘之境,在新词新义的森林中踉跄而行。人们需要耐心,要学会随其概念的力量与流变前行,因为它们会将你导向令人兴奋的途径、新的领域、景深、静默的风

光、孤独,或常常是精神分裂;需要将他的哲学概念加以梳理,打造成为新的构架,成为审视电影、艺术、音乐、舞蹈、文学和表演艺术的新视野。德勒兹表达的不是结构,而是装配或开放系统。这位美妙的陌生人总是教育我们不故步自封,永不满足,从不说“这便是如此”。^① 本书的写作是一种充满概念的眩晕和思想的战栗的特殊体验,囿于本人的学识,颇感德勒兹的思想至今仍然有着不少令人迷惘之处。但是,思想的痛苦折磨也蕴涵着充实与收获。

总体而言,鉴于本书的绝大多数相关资料都是外文文本,且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也颇为深奥,因此阅读理解、中文移译表达和理论反思都是艰巨的任务。另外,德勒兹思想与影视、网络等现代文化传媒的关系,与东方文论及中国文艺思想的会通,与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理论关联性等论题,也亟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本书有时写得比较艰涩,或许还有不少错谬,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笔者在文艺美学领域的学术思考与探索,谨此热忱地希冀海内外方家不吝教正。

麦永雄谨识

2007-03-25 于桂林王城

^① Barbara M. Kennedy, *Deleuze and Cinema*, p. 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